

党
史
人
物
生
活
传
记
丛
书



情感·才华·心史

瞿秋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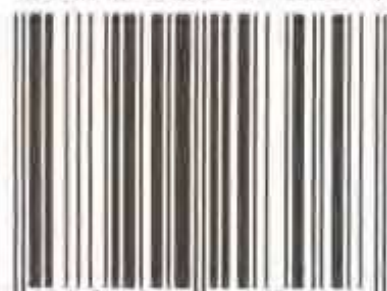
刘福勤 著

济南出版社

封面设计 / 李兆虬
责任编辑 / 朱孔宝



ISBN 7-80629-305-1



9 787806 293058 >

ISBN7-80629-305-1/K · 12

定价 22.00 元



瞿秋白

情感 才华 心史

刘福勤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瞿秋白:情感·才华·心史/刘福勤著. —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9

(党史人物生活传记丛书)

ISBN 7-80629-305-1

I. 瞿...

II. 刘...

III. 瞿秋白(1899~1935)——生平事迹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376 号

策 划 朱孔宝

责任编辑 朱孔宝

封面设计 李兆虬

印刷监制 郭建业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印 刷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97 千

印 张 13

印 数 1-45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瞿秋白(1899-1935)

瞿秋白之母。



少年瞿秋白与父亲瞿世玮合影。





1919年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求学时绘赠友人的一幅山水画。

1920年瞿秋白与《新社会》同人在北京留影。左起：瞿秋白、郑振铎、瞿世英、耿式之、耿济之。





1920年10月瞿秋白起程赴莫斯科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两年期间写了大量通讯和著名的散文集《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并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图为1923年之瞿秋白。



王剑虹(右)和丁玲(左)
摄于上海大学时期。

年子甲卯日七廿月一十年三十國民華中

小說月報

本場次第

之制之秋

白龍神白蓮

啓啓啓

事事事

式自式自式自

一廿一廿一廿

合九合九合九

第 二 第 二 第 二

友四友四友四

給年的年的年

類十類十類十

係一係一係一

CHON O

十八十八十八

日 日 日

起 起 起

我 我 我

的 的 的

的 的 的

正 正 正

民 國 日 報

RE
DA

號六
號九
分三

號六
號九
分三

瞿秋白、杨之华结婚启事。

瞿秋白与杨之华
1924年于上海。





1925年瞿秋白在北京时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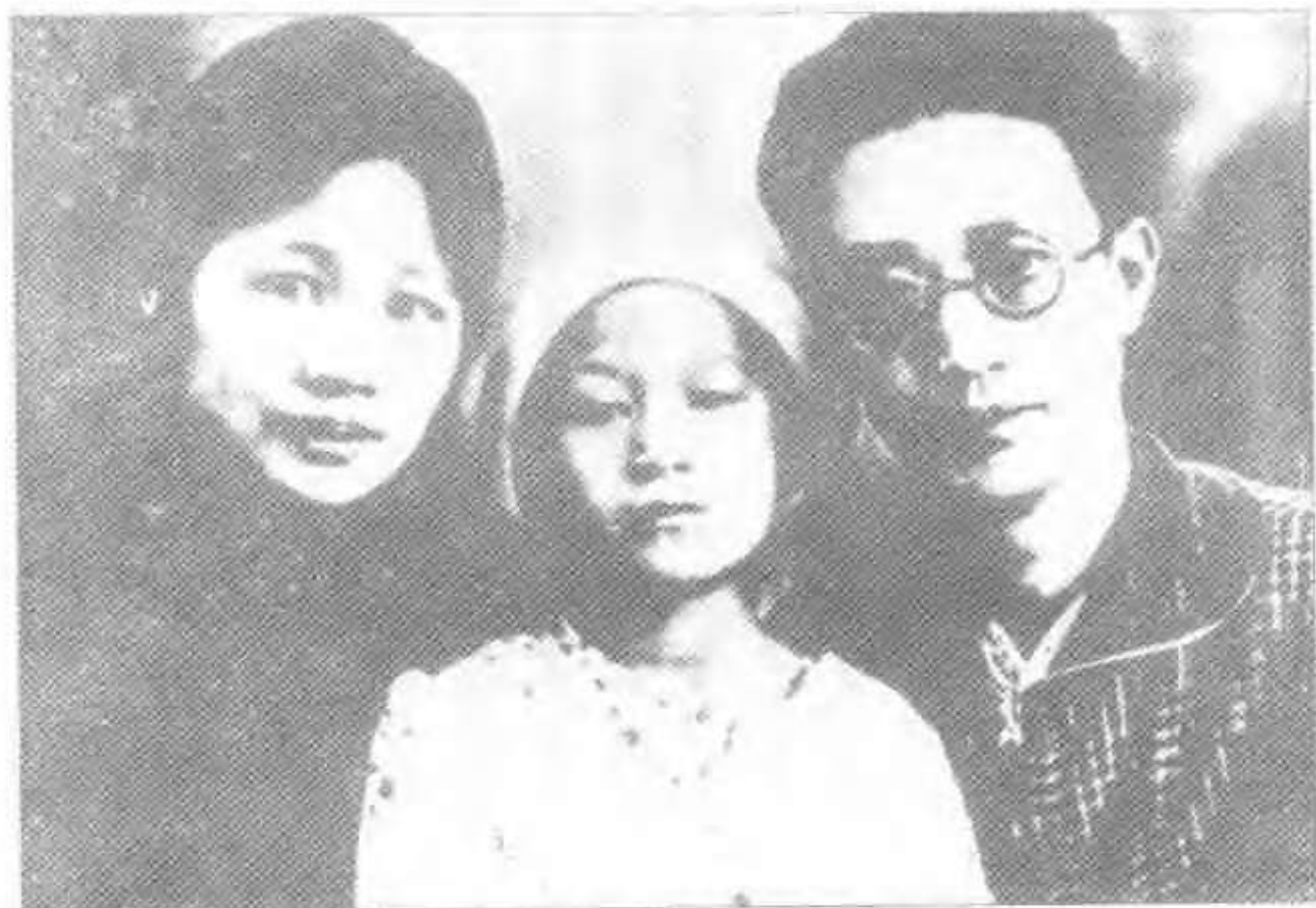
1927年4月28日于武昌第一小学，瞿秋白、杨之华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瞿秋白与杨之华1928年在苏联南部参观时的合影。

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7月受命回国。图为回国前与杨之华在莫斯科留影。





瞿秋白、杨之华与独伊 1929 年摄于莫斯科。



瞿秋白（右二）、杨之华（左二）与苏联友人（左一为蔡和森） 1929 年于莫斯科。

1930年8月瞿秋白途经柏林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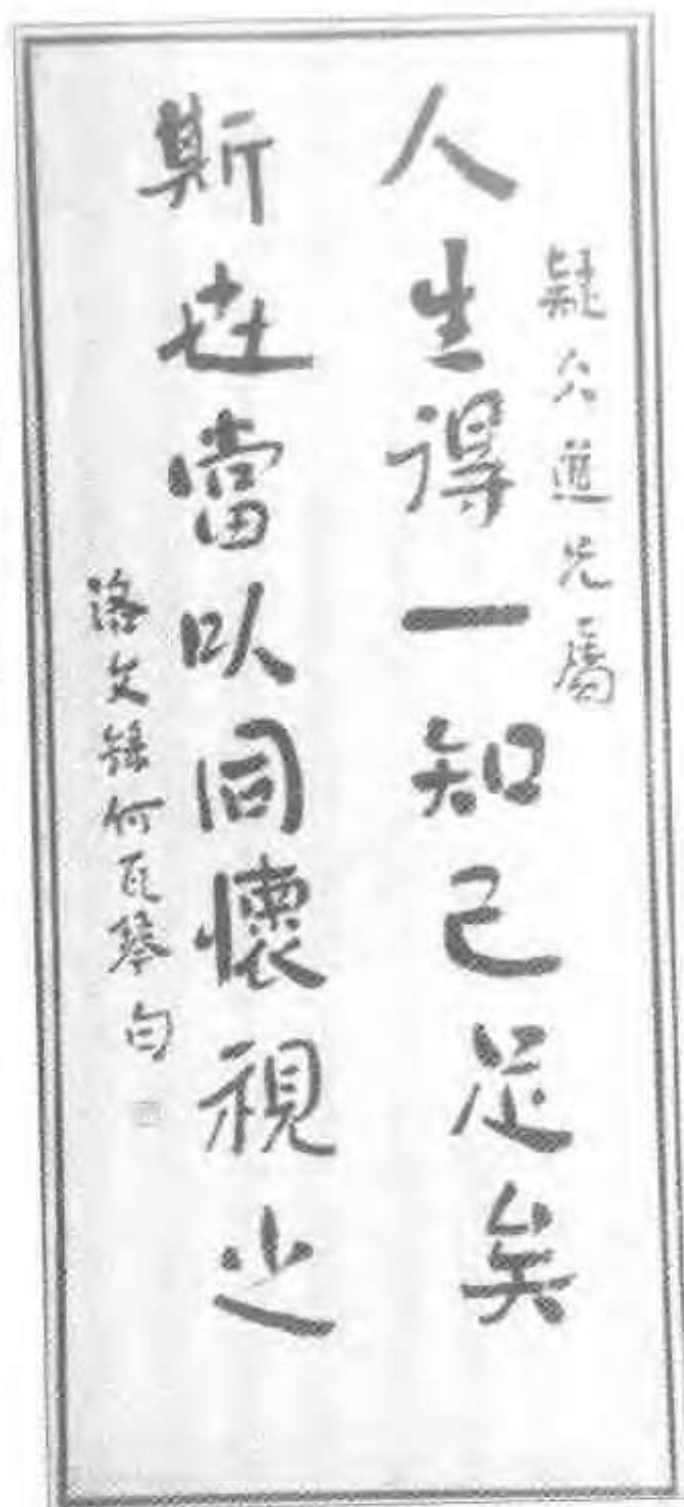


从1931年起有两年多时间，在上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瞿秋白与鲁迅共同领导“左联”进行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结下了崇高的友谊。图为画家徐悲鸿所作素描《鲁迅与瞿秋白》（未完稿）。

瞿秋白 1933 年书赠鲁迅诗手迹。



鲁迅于 1933 年书赠秋白。





瞿秋白

瞿秋白被囚于福建长汀时的留影和手迹。

一九三五年一月
 在长汀监狱中
 所作手迹
 瞿秋白

廿載浮沉萬事空
 年華似水一流
 東枉拋心力作英雄
 湖海樓邊
 芳牒夢江城
 草葉落花飛黃
 昏已近夕陽紅
 注建功

寂寞此人間
 且喜身無主
 眼底空
 烟過盡時
 正我浙邊家
 花落
 如春殘
 一任風和雨
 信是明年
 春再來
 應有魚如故
 一弄
 山澗細雨作春寒
 料峭孤念舊夢
 幾何事
 萬綠保寂沒
 留待繞
 望山
 早田 於三五年中

瞿秋白手迹

瞿秋白

瞿秋白獄中詩三首手迹。

1935年6月8日上午，瞿秋白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引吭高唱《国际歌》和《红军之歌》步入刑场，从容就义。图为牺牲前在福建长汀中山园的最后摄影。



毛泽东 1950 年为《瞿秋白文集》出版题词。

序 言

在出版了《心忧书〈多余的话〉》和《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两本书之后,我重新翻阅了70年代后期以来瞿秋白研究的资料,发现人们多是在瞿秋白作为革命家的政治大事上,在其思想、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理性内容的研究上用功夫,而对他的情感世界、高尚情操的特点,对他的精神发展变化历程即心灵史,对他的卓异才华及发挥情况,则比较地缺乏探讨,缺乏专题的和较有系统的研究。于是我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秋白情感、心史、才华的材料,试图对瞿秋白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

1995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纪

念瞿秋白同志就义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瞿秋白的情感世界》的论文,接着又写了有关才华和心灵史的几篇,如《瞿秋白的知识分子特点》等。温老(温济泽先生)在北京会上谈到将在 1999 年纪念秋白同志百年诞辰的事,说要早作筹备,以通过纪念活动更好地发扬秋白同志宝贵的精神传统。我于是想再写一本书作纪念。但因手头有别的事,就还是只搜集材料,而没动笔写。

1996 年秋,济南出版社朱孔宝同志来南京,约我写一本关于秋白的书列入一个书系,他要求这书重点突出地写两、三个侧面。他的要求正和我的原计划相合,我就答应了。只是在写法上,我原想写成学术论著,孔宝则希望是一本把研究成果作通俗化表述的书,要“深入浅出”,有较强的可读性,以可感的材料使较广大的读者受到秋白精神的感召,而不要取那种沉闷的考辨论证的论文表述方式。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好,就努力按他的要求写。然而,是否达到了要求,是很难说的。

出版之际,写了以上这几百字,算是这本书的序罢。

刘福勤

1998 年 1 月 29 日写于南京

目 录

第一篇 情 感

- 3 “做一个中国人……”
- 17 故乡之爱
- 26 心中永留慈母爱
- 35 感念不已父子情
- 44 手足情深
- 50 有情意的亲人
- 57 亦即亦离的恋爱
- 61 “梦可”王剑虹与“安琪儿”丁玲
- 78 “最亲爱”的“生命的伴侣”

- 91 一颗炽热的慈父的心
- 98 与《新社会》同人的情谊
- 108 终生的知己
- 116 亲兄弟似的至交
- 124 对先烈的感念
- 143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
- 149 情谊深厚的俄国朋友
- 156 与毛泽东是好朋友
- 164 与鲁迅的生死之交
- 184 与冯雪峰的真挚友情
- 191 同蒋光慈关系很亲密
- 200 肝胆相照的挚友
- 210 秋阳浩浩似春阳

第二篇 才 华

- 219 人们怎样谈秋白才华
- 224 “没有学历”的“天才人物”
- 230 写作的高速、高效和勤苦

- 234 出众的谈吐和辩才
- 240 第一流的奇异新诗
- 247 “别人无法代笔”的旧体诗
- 253 写散文的大手笔
- 265 “并世无两”的译笔
- 275 优化语言文字
- 281 办报办刊编书的巨擘
- 291 开创性的理论思想
- 298 卓越的领导才干

第三篇 心 史

- 313 瞿家的“千里驹”和“名士化”倾向
- 318 “知识饥渴”和厌世心理
- 323 “热烈”、反思、“猛进”心态及复杂性
- 327 探寻心海的灯塔
- 335 激越心态和“韦护”的忏悔
- 344 “热血沸腾”与“怅然若失”
- 348 血的教训,太沉痛了

- 253 “盲动”时期的心态与“退出”之念
- 358 反对“老子党主义”的独立意识
- 362 “无可形容的重压”
- 365 在上海文界和苏区的心理矛盾与忧虑
- 371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 379 附录:多余的话

第一篇

情感



“做一个中国人……”

1 “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这是苏联学者 K·B·舍维廖夫评述瞿秋白一生的文章所用的题目。^①

是的，瞿秋白的确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的伟大人格和历史贡献举世瞩目，他“属于全世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他的英名“载人人类真正历史的序言”。然而，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主要在中国度过他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为开辟中国的光明之路和人民幸福而奋斗、而贡献了生命。他热烈地、深深地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这种爱胜过物质生活欲望，胜过对自己生命的爱。

^①见《瞿秋白研究》6，第241页。

他的爱国心,自幼就得到培养,十来岁就很热烈了。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和瓜分中国,蹂躏中国人民,劫掠中国财富,摧残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近代中国处于积弱落后和亡国的危机之中。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长期处于腐败和黑暗状态,有些当道者卖国、祸国,还与外来强盗勾结着残酷压迫、剥削以至杀戮同胞。在瞿秋白出生的那一年,旧历戊戌年,致力革新的爱国“六君子”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林旭被杀害;在他一两岁的时候,侵略者血腥镇压了义和团的起义;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仅“窃国”而且屠杀革命党人……这些令人悲、令人愤的事情通过亲人、师友和书籍进入他的心灵,加上他在家道破落中饱受穷困和接触底层社会、接触劳苦人民的感受,忧国忧民、救国救民、为振兴祖国而奋发的情怀就产生了,并且日渐强烈和深化。

常州冠英小学校歌中“睡狮千年,誓将惊醒”的歌词使他为国为民而进取;辛亥革命的浪潮使他兴奋、热情地盼望着孙中山等领导民众创建出一个新中国来;袁世凯窃国,常州也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他因而义愤填膺,于“国庆”日在灯笼上写“国丧”二字挂出去;看见贫家女孩头上插草被领在街上出卖,在书中读到官吏横暴、老百姓被逼上梁山,他也联系现实,想为国为民而有所作为;诗词、篆刻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的学习,经史等传统典籍的“讨究”,模塑着他的中国文化心;阅读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阅读《新民丛报》、《太平天国野史》、《中国近世秘史》等书籍,更增进其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精神情感。他的学习,总是和要好好地“做一个中国人”的志愿和情怀联系着的。据他的幼时小友羊牧之后来回忆,秋白约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曾经说:

我们做一个中国人……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

学。……五经,汉代的辞赋,建安、太康、南北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先秦的诸子学,汉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佛学,宋明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①

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前三年的北京生活虽然十分枯寂,但他在学俄文专业的同时读了大量的书,哲学程度显著提高,他对孔子以来的中国传统的国学、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佛学等,都深感兴趣地研究。他的“二元的人生观”虽然在当时不算是先进的,但是,“以文化救中国”②,却是很明确、很有积极意义的志愿和情怀内质。

2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秋白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

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③

“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爱国学生运动一开始,秋白就成了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领袖,后又成为与铁路管理学院、汇文大学等学生联合行动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他组织爱国学生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示威游行,罢课,讲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筹集学

①《党史资料》丛刊 8,1981 年版,第 54 页。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1,第 25 页。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1,第 25~26 页。

生储金等活动,并亲自多次到街头讲演宣传,鼓动民众的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讲题有《爱国》、《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抵抗强权》、《争回青岛》、《国民快醒》等等。

虽然时常遇到警察的镇压和便衣警察的追捕,但他毫不畏惧,机智地对付或甩掉“尾巴”。在五四运动中,他曾两次被捕。一次是1919年6月3日,他带领俄文馆学生参加北京20多所学校的联合行动,军警逮捕178名学生,他就在其中;6月4日,学生更大规模地行动,军警又逮捕700多名学生。秋白和其他学生一起,一面强烈抗议当局非法逮捕爱国青年;一面在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全国爱国群众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时而拒绝出狱,在临时监狱中集体行动捉住7名警察,缴获军警篷帐两个,当作证据来控诉军阀政府。后来,为了组织再一次的请愿,他才和被捕学生一同于6月8日出狱。

瞿秋白另一次被捕是在8月23日,那是因为反对山东军阀和北京政府袒护罪恶的戒严司令马良。“马良祸鲁”是当时一大事件,引起全国范围的巨大风涛。7月21日,济南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大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将制造卖国舆论的《昌言报》经理和主编拉到街上示众,要求政府予以惩办。北京政府竟于25日下令济南戒严,任命济南警备司令马良为戒严司令,镇压民众爱国运动。马良不仅袒护卖国分子,而且自己也大讲中国应该在侵夺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还公然主张中日合并,表示对日本接济他“饷械”的“感激”。山东学生愤然请愿,要求解除戒严和释放被捕爱国人士。马良竟又逮捕请愿学生,并枪杀了3位回族爱国人士。于是,8月,全国爱国学生和民众又掀起要求取消戒严、惩办马良的运动。各地代表来到北京,联合请愿。秋白是请愿代表之一,他与其他代表30余人一同于8月23日下午到新华门要求总统徐世昌接见。徐世昌

不仅不接见,竟拘捕了全体代表。26日,北京、天津等地的代表又请愿,徐世昌还是不见。27日,北京2000多学生又到新华门请愿。28日,军警又拘捕请愿代表10余人,并驱散请愿群众。全国爱国学生和民众愤怒之极,反帝反军阀的运动持续扩展。北京政府这才不得不于8月30日释放了被捕的请愿代表。秋白出狱后重病数月,咳嗽吐血。亲戚来信慰问,他复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

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中的高度热情,一方面表现在上述行动中,一方面自然流泻于他当时留下的文章里。1919年7月他写的《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对政府、对国民、对学生分别提出几项切实的建议,表现了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他在给政府的建议中说,要“保存中国对于山东问题最后决定之权”,要“取消……有碍中国主权”的协定,“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在对国民的建议中说,“今日政府万不可靠”,“一切秘约及二十一条……誓不承认,必须废除”,“抵制日货,坚持勿懈”。这应是他公开问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7月17日的《晨报》,引起颇广的社会关注。当时他才20岁。

同年,瞿秋白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有的文章中指出一些人“宣而不战的文章”和段祺瑞“宣面不战的政策”是误国的,以往“中国的失败”在于“中国人”没有坚毅明敏地“组织一良好的社会去迎合世界的潮流”,“中国人……要是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②;有些文章则提出革新“家庭制度”、加强“创造新道德的力量”的主张^③,“全社会,各民族,各阶级”的“普遍

^①秦讷敏:《回忆瞿秋白烈士》,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第61页。

^{②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第5~7、11~18页。

的”革新，“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的主张^①，而且说到了从“废止知识私有制”到“废止财产私有制”的看法和设想^②，说到了“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原”，“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进步”，“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要迎着“痛苦困难”并在其中追求社会“向上”的革新改造^③，创造出一个实行“新社会”的新中国。

在五四运动中，当一些人（包括许多热烈的学生）还仅仅在浮面的“山东问题”、“不签字”以至“真理战胜”的情绪中的时候，年仅20岁的秋白的爱国感情和思想已经深化到在中国创建“新社会”的层次了。所以，他稍后的文章说：“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

3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高潮之后，瞿秋白的爱国情怀继续深化，进到了与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情怀结合着、统一着发展和深化的阶段。这就是他决然奔赴“饿乡”，他说“宁死亦当一行”，他以“猛进”的心态，“向着红光里去！”这是为了要把“阴沉沉，黑魑魑”的、“黑甜乡”的中国变个样子啊！是为了“中国再生”而毅然到“饥寒”之地去求中国的“思想发展”啊！是去为中国、为中国人民去寻找、去开辟“光明的路”啊！^④

一个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到远离祖国、家乡万里之外的“饥寒之国”，身体又弱，深深的怀国思乡、念亲感慨之情自然而然常常涌上心头。1921年中秋节，秋白在莫斯科写的《“东方月”》一诗很值得一读：

①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第20~25、40~46页。

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第37~38页。

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31页。

一

万里奇游，饥寒之国。
闻说道“胡天八月雪”，
可也只萧萧秋意，依依寒色；
只有那赤都云影，掩没了我“东方月”。

二

月圆月缺人离别，
人离别，长相忆。
万古“中秋”，未入欧人诗思词说。
原万族共“婵娟”，但愿“婵娟”年千亿。

身在异乡的万里游子，在中国独有的“中秋节”那天，最容易荡动起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古诗里“千里共婵娟”的名句，虽是游子自我慰藉的方子，而当处于“欧人”环境中，周围了无过“中秋”节的迹象，连“中秋”一语也无人提起，无人能同会中国“万古”相传的独有文化美意深情，那怎能不令游子更怀念祖国呢？我们的“东方月”，我们的年轻的秋白——现代的“西天取经”使者，也将中国这独特的文化心传送给“欧人”。他和俄国人谈起“中秋”的意义，竟使他们“引为奇趣”，说中秋月圆“团圆的象征，大有诗意”。^①“欧亚华俄——情天如——”，梦影碎、云幕掩、凄凉雨意中的“东方月”，怀念祖国的心意可感，精神文化使者在万里异国为祖国而承担责任的情状又岂能不引起我们的敬意呢？

在俄采访中，秋白为俄国儿童很快地学会了“中国瞿秋白”几个字而兴奋；当他感受了俄国的“白林寒雪”文化时，立刻念及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80页。

中国的“长河平原”文化的“坦荡性”，并作对比思考^①；被采访者的言谈和情状自然是极多的，但凡遇到他们关于中国的谈话，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和思想，他都非常在意地记下；他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自然想到要革除为中国所固有的某些秽俗陋习如多妻、缠足、散漫而又拘谨等，却又不是盲目崇洋，宗教俄国的昏昧缺点、“新官僚”的恶相、“‘不是那个，就是这个’的‘西洋’笨逻辑”（指简单的机械的非此即彼思维法）^②等等，他都是加以剔除的，而以优尚的中国智慧去吸取融会外国的先进文化，以改变中国的“‘东方式’的死寂”的方面；在为自己已被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而十分兴奋的时候，他的心灵活动是“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是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③“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指的是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他的爱国情怀已达到一个新高度。

4 第一次旅俄回国时，秋白已是一个较成熟的革命者了，尽管刚刚 24 岁。他豪迈地投入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涌动的革命大潮之中。他在致其爱妻王剑虹的信中写的《我是江南第一燕》一诗，所表现的既是革命激情，豪迈的工作激情，深而新的爱情，也是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的情怀，为在祖国创立新社会的、“检点新泥筑旧巢”的情怀啊！

他的著名诗作《赤潮曲》，是革命之歌，也是激昂的爱国之歌：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1，第 221、248 页。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1，第 213 页。

赤潮澎湃
 晓霞飞动，
 惊醒了
 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
 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
 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革命情和爱国情统一着，一同激荡在心灵里。

5 瞿秋白以极大的热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急切地渴望着一个新中国的出现，劳瘁到常常病倒，但除了昏瞶得实在不能工作的几天，他都抱病坚持。那是为了中国，为了人民呀！黑暗顽固势力的根深蒂固，大浪潮中的复杂状况，敌人和投机分子的狡猾、阴险和残酷，也许是书生出身的秋白和他的同志们所未曾完全料及的。大革命在高潮中突然夭折，革命新都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他在带着告别之意再去黄鹤楼的时候，吟诵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名句，还“指着夕阳”和“远方群山”说：“大好河山，又得沉沦一个时期了”。^①这也并非什么“不应有的悲观情绪”。他在深思，怀着爱国爱民、忧国忧民

^①《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101页。

的心情深思,反思革命的过程,接受料所不及的严酷现实,在回顾中吸取教训。但为了挽救“大好河山”在恶风险浪里的“沉沦”,他也许想到的是救国救民的革命浪潮也如“滚滚”江涛,低而复高,长流“不尽”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是临危受命,尽最大的努力,来挽回形势,挽救革命。

心绪的高低起伏,会随周围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为救国救民而革命的深切情怀却是永在的。

6 第二次赴俄期间,秋白对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曾某种程度地迷信共产国际、迷信苏联共产党的情形有所反思,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的意识有所增强。在参与共产国际工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中山大学纠纷、为被“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错打的“江浙同乡会”平反的事情中,他不再总是顺从“国际”和“苏共”某些头面人物,而是在深入调查、掌握准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和处理,哪怕与“苏共”的某级组织有对立的意见,也照样独立实行。这样,“国际”和“苏共”的某些头面人物,还有他们扶植的王明宗派就大为恼火了。后来,他们联手终于把瞿秋白“打倒”了,把他开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秋白的心情如何呢?他自己没有留下较详明的文字材料——大约也因为中国共产党仍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苏共”终究是老大哥,矛盾终究是革命党内部的,说出来写出来都在“大局”上有碍,所以,直到写《多余的话》时,他仍然是很含蓄、很婉曲地涉及。但和他比较接近的朋友,他当时的较年轻的下级,有些回忆记述补了这方面材料的不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秋白当时的心境里作为中国人的那种可贵的情感——那种情感又确实是与革命利益、革命精神决不矛盾的。吴黎平说,在瑞

金,他多次请瞿秋白到自己家里,相互间谈了不少,特别给他“深刻印象”的是秋白的下面一番话: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为中国革命胜利而奋斗,必须有我们民族、我们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的勇气,决不能奴颜婢膝地听命于人。据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这上面不仅俄国当权者时时想卡我们,而且我们的一部分人……也对俄国人奴颜婢膝、阿谀逢迎,丧失伟大民族的气节。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是有崇高道德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有崇高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道德的。……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但是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采用合乎中国人民利益……合乎中国人民崇高道德标准和无产阶级道德标准的正当的方法。决不应采取阴谋诡计、造谣诬陷……这不符合中国人为人的道德……^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瞿秋白作为中华民族的精英的气节和尊严,作为中国人是如何发扬一个伟大民族的崇高道德的,如何以自身的堂堂正正来维护民族尊严的。

7 瞿秋白的爱国心,他的民族感情,他为祖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所作的奋斗、所做的文化工作、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与那些空泛的爱国口号截然两样,与那些维护旧中国的腐朽制度、把传统文化中沉滞猥劣之物视为宝贝的“爱国”完全相反,他更

^①《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64页。

憎恶和痛斥那些打着“国”和“民族”旗号而干着祸国、卖国和败坏中华民族的败类。请看他那管笔是多么犀利地戳穿假民族主义的：

白党……一切种种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客，帝制主义的军阀……他们在这里“为着民族而剿赤”，据说是要扑灭杀人放火的布尔塞维克。自然，他们一定还要说是为着民治，为着人权……然而，谁都明白：他们不过是日本美国……帝国主义的猎狗。^①

30年代出现了一种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标榜着“爱国”的文学，讲什么“为民族而战的尚武精神”，可是仔细一考察呢，作者们、组织者们大抵是把枪口对着中国老百姓的国民党军官、党棍和特务骨干，他们的“民族”是绅商“民族”，背后还有帝国主义列强。其代表作如《陇海线上》，写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陇海线上，雇用着德国的“凶哥儿(Junker)”顾问，豢养着“白俄的哥什哈”，这样一个“民族”军对着“三个村落的老百姓”展开了“民族”战争。“我”作为叙者是代表“中央”军即所谓“民族主义”者的态度的，然而，非常奇怪，“我”在陇海线上“每天晚上……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刺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秋白把这种“民族主义”文学拿来示众，说：

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刺伯人看待。^②

他挖掘这种“民族主义”文学的根子，是“中国的绅商”及其政府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围剿”革命力量，屠杀百姓。他们需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438～439页。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368页。

要这样的战争,却虚伪地、恬不知耻地打起“民族”旗号。秋白写道:

中国的绅商……不是说和平是中国的民族性吗?!然而社会斗争太剧烈……和平主义的假面具是不能够不揭穿的了。因此,战争变成了民族性。

帝国主义的列强和中国……绅商需要战争……也就是抢夺民众膏血……所谓剿匪更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要紧事情……这样的神圣战争就要有狗样的英雄。

因此,中国的绅商就……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哼!绅商所要杀的并不是“人”,而是奴隶,牛马,并不是“中国民族”,而是别一个民族。^①

对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反动统治者及其“定做”的狗子文学的揭露和鞭挞,正表现了秋白的真正的中国心,真正的民族情感、爱国情感。

瞿秋白的爱国情怀,更突出地表现在他一生都不遗余力地反对帝国主义,揭露他们侵略中国,掠夺中国财富,传播奴化中国人的文化,屠杀中国民众,镇压中国革命的罪行;一生都不遗余力地呼唤中国人民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自己也总是亲身参加反帝斗争。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到北伐,到土地革命反“围剿”,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他都是以最强烈的爱国感情,尽最大的努力投入宣传和实际战斗的。

中国大多数的工农民众正在觉醒起来,……帝国主义的势力,不论哪一国的,都要驱逐出去。^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367页。

②《瞿秋白选集》,第557页。

这样的最深厚、最强烈的反帝爱国之情，渗透着他的整个心灵世界，表现于他所有的革命行动中，贯穿着他的全部生涯。

故乡之爱

1 乡情是几乎人人都有的,秋白的乡情似乎特别地令人觉得深切、细致、美尚。去读读他的作品吧,读读他的友人的有关回忆吧,了解了解他全部生涯中的心情表现吧,只要你注意,就能随时感到他对家乡是那么爱,那么怀恋。而他的那种爱,那种怀恋,他的有关心理活动的内容又是那么的丰富和深邃。

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①

离故乡之前,常州红梅阁的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5页。

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寄托我的奇思遐想。^①

秋白是那么地爱家乡美好的“天然”环境，一草一木，为生长在富饶秀丽的江南水乡而自豪；他是那么感念家乡风物给予他的养育和怡乐。当离开故国，远在异国，特别是在病魔缠身、心境冷凄之时，他更是念及故乡：“温情的抚慰，离故乡如此之远，哪能享受……冰……雪……风暴……哪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争艳的心灵之怡养？”^②“我，——江南花柳明媚中的产儿，怎不觉得，他——‘俄雪’，是‘我’与自然之间的屏障”^③。“况且……感慨低徊……家园，故乡，人生的意趣，将来的责任都拼在泪花里……”^④爱乡怀乡是一方面，由“心海中的灯塔”引着“孑然漂零，远去故乡”又是一方面，为锤炼自己“这绕指柔钢”，为开辟中国和人类的光明的路，他又决然离乡。经常萦绕于心的“故乡之思”，以及包括着“江南环溪的风月”之“旧怀”，在他于赤潮中重铸心灵之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都是消极的，他有这样的理智：“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返于真实的‘故乡’。”^⑤——那是实现了理想境界的故乡，一个新精神、新人、新社会代替了陈旧腐朽社会的故乡，一个花更香水更秀春光更明媚的故乡。

2 瞿秋白的乡情之深，与他自幼受江南文化特别是常州文化的陶冶密切相关。就稍大一些的范围来说，江浙一带的古代文化传统和近现代的文化流变、名人文化遗风和现时的活动，在秋白青少年生涯和毕生的心史上都明显地起着作用。这是他的乡情的一条重要的深根。

①②③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6、165、235、181页。

⑤《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09页。

秋白在故乡常州生活到18岁,就个人所受乡区文化影响形成的文化格调的乡区特点而言,比那些一辈子都在故乡的人,自然弱一些,但比那些自幼无定所,江南几年、塞北几年、中原几年、海边几年的人,则显著些。常州的才子英杰,不要说与齐鲁燕冀、晋陕鄂豫、四川湘赣、两广闽浙的迥异,就是与近处宁镇苏沪的也颇不同。常州文化有明显特点,秋白得其滋养,得其润泽。

常州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向长江三角洲延伸之处,在瀕湖与长江之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长江和大运河的水上交通之便更助其繁荣,从南宋时代常州就成了江南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它有运河文化的基本特点,得发达地区、南北各大都会风气之先,能与各地较快地交流物产和精神文明。因而,这里的人较为通脱、放达,有走南闯北、尚交游、趋时尚的传统,或做官,或为文,或做水运等经营,都与国内最先进最高层次的人事接近和融通。加上江南水乡富庶而柔和、清朗而灵秀的特点,它就和运河文化在北方各处的情形不相同了。它有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基本特点,得与沿江发达的重镇、大港交流之利,鄂湘皖苏之长物和荆楚到宁沪各种人文佳品,都汇集容纳,形成其博大宏阔、迅速流动演化的特点。与南京苏杭相比,它算是没有什么自然方面的佳胜名山和特异水景,没有苏杭似的天堂之名,没有宁杭似的作为帝都的显赫历史,但这使它同时没有它们那种奢华娇冶或做岸老大之气,而重视现实人事作为,靠智力文化,开拓创造。没有名山,那著名的天宁寺、红梅阁就建在平地上;本地条件有限,就靠交通和聪明才智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再把四方的优越昌明带回来融会。总之,水乡文化、运河文化、长江文化和重现实人事、因地开辟创造、博取融会、外向发展等综合起来就构成常州文化传统的特色。到了近现代,又和上海这个最开放的

地方有沟通之便，凭铁路等新的交通条件，迅速与最新思想文化、最新产业、最新式人群接触、交流，因而更加昌明，进变速率更高。常州文化又和整个的“江南文化”是一体，秋白的故乡文化，就稍大的范围说，可以说是“江南文化”。

秋白在这种常州文化以至“江南文化”中被模塑了18年，占全部生涯的二分之一。因而，习性情感、思想才智、行为方式、事业成就等，皆与故乡文化密切相关，得其优长，并多有体现和发展。同时，反转来又为故乡文化增色、增光。

秋白少年时代的言行都和故乡文化紧密联系着。他自幼喜欢诗词，稍长就善于此道，这与江南文化里的诗词之盛有关，幼时是母亲教他，大了就与“名上化”的少年们一起切磋；他自幼喜欢绘画，十几岁能作很好的山水画，也是与故乡文化里的艺术风盛联系着，其父即画家，他自幼跟父亲学画，参加革命后虽基本上不画了，那绘画上的艺术素养也于文化活动有所裨益；他自幼学篆刻，这种爱好持续了一生，其最早的渊源也是常州文化、江南文化里的篆刻艺术土壤，最早教他篆刻的就是他伯父，后受常州中学的老师指导，而江南文化人中的篆刻风气也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书法很有功力，写得既秀气又潇洒，也是早年在家乡文化氛围中学成的，母亲、父亲都写得一手好字，叔祖瞿赓甫的书法还颇有名气呢。他在道家、佛学方面的知识和心理久久存在着的有关意识，也有幼时在家乡文化里深受陶冶的原因，其父就“习黄老术”，读佛家书也是文化空气甚浓的常州读书界的常见现象；其他方面的文化素养、心理也都有家乡文化的渊源的。因而，无论从他的著作看，还是从他谈吐、事迹看，其乡念、乡情，与他受家乡文化的模塑都密切联系着。

3 启程赴俄时,在火车里看见北方那种“显得很枯寂似的”原野,他就“想起江南的风物”,说江南家乡“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得天赋较厚啊”^①。在《饿乡纪程》里,他述及中学时代的情形,说“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欧化”敌不过“政治恶相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于是走了“名士化”之路,“研究诗古文词……讨究经籍……还以‘性灵’相尚”。那固然有消极影响,但如秋白自己所说,那又是一种“无形之中”得到的“教育”,至少在基础文化素养上,在优良的文化传统心理和情感上,是留下具有积极意义的积淀的。这种积淀会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例如忆及家庭离散,看到老父穷愁潦倒的情形,自己又远行在即,要去异国寻求光明,寻求社会变革的路向,不能像其他人家那样父子相依偎、举家乐团聚,他的心里就自然地发生与常州文化相关的动态:

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名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②

《饿乡纪程》书名中的“饿乡”二字,也是从江南文学家管同(字异之)那里得到启发而借用的。当时,秋白的“心灵的要求”十分强烈,远远胜过物质欲望,说自己“不期然而成一‘斯笃矣派’……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只想着要到新俄去,“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不怕那里的严寒和饥饿。正好,“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伯夷和叔齐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精神坚毅,一心守义崇仁而毫不在乎富贵与否,以至宁愿饿死,决不移异心志的人物,此二人是殷末周初一个小国国君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两人彼此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0页。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0页。

谦让,都没有继承君位,而投奔西伯(后来被尊为周文王)。西伯死后,周武王未葬其父就兴兵伐纣,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以暴易暴”,就“叩马而谏”,说出要尽“孝”守“仁”的一番话来。武王的侍卫们要杀掉他们,姜太公说这是两个“义人”,让他们走吧。武王胜,天下统一于周,伯夷叔齐则以此为耻,“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快要饿死的时候还作歌曰:“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等等,终于饿死。^① 秋白并不对伯夷叔齐与武王之间的是非和他们说的忠孝仁义等具体内容作评判,他只取“心理上的要求”胜过“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这一种现象,认为自己当时正是这样,宁愿离开尚有“粟”吃的中国而奔向他自己的“饿乡”——新俄国。他说:“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暂且不管……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已决定走的了……明天就动身”。^② 去考察社会革命的新俄,去实现“心理”的要求,去承担“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自然不是得之于管异之等人的文章,但“饿乡”一语及由管异之、蓝鼎元(也是清代江南文学家,在其所著《饿乡记》里记述和议论过伯夷叔齐之事)所涉及的精神追求和物质欲望关系,则在秋白的知识和文化理念中先有了储备的。他赴俄的激情,从其全人的知识和文化心理来说,也就不能说与江南故乡文化毫无关系,如果从借用“饿乡”这一说法和对“自己心灵的要求”要“负绝对的责任”的情怀来看,寻追其文化渊源,则更可以说是颇有关系的了。

4 秋白在谈到自己五四前的状况和思想历程时,说曾经“因研

①《史记·伯夷列传》。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31页。

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有使“佛教人间化的愿心”,因而既“经营我‘世间的’责任”,又“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他这种心态,后来当然大大地变了,但若仔细考察起来,在“救中国”上重视“文化”以及对今文经学派某些精神的继承,则是他一生都持续着的。他的情感自然也不可能不与此有所牵系。

“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龚自珍语)在文化史上,单是清代就有以常州人为代表的、影响及于全国的多种学术、诗词、散文、小说、绘画的流派。经学上,有乾隆晚期庄存与、刘逢禄代表的“今文经学派”,或称为“常州学派”。该学派是今文经学复兴的真正开端并形成“经世致用”的传统,借经学批判时政。后来的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都受其启发,渐渐把今文经学与现实社会的改革同吸取西学结合,到戊戌变法时期成为维新的理论基石之一。秋白要复兴今文经学,显然是受了常州学派影响。文学上,常州有恽敬为宗师的阳湖文派。该学派不满于桐城派戒律,而取法于“经”,博纳诸子,求实学,尚宏放,感情性,叙述描写与较自由的哲理发挥相结合。这种传统显然是秋白《饿乡纪程》式散文形成的因子之一。张惠言为开山的常州词派,虽重形式,崇词体,讲寄托,求微言大义,但倡“深美闳约”,重个人真实性灵,“心神洒然”。诗方面,堪称一代诗宗的黄仲则和堪称名家的赵瓯北(翼)之外,常州还有 300 多人刊行诗集。秋白爱诗词,成诗人,自然有多种原因,而在常州这诗山词海里十多年,与学友以性灵相尚,研讨诗古文词并有人量写作,显然有常州传统的作用。绘画史上,著名的昆陵派即以常州恽南田为代表。秋白之父也是画史上有地位的画家。秋白受其传统影响更不待言。小说方面,有《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秋白多次论及李的这部小说,称之为“近代中国文学的典籍”。秋白

的幽默讽刺才能,对丑物旧物、官场腐败现象、恶浊政治的认识和谴责,也显然受过李宝嘉等的影响。

常州文化源远流长,学术文艺土壤尤其肥沃。这个地处中吴,从东周时代就成城邑之处,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到秋白所处的时代,虽有清帝国的败相,封建文化陋劣积因,但常州文化的优良方面也继续起作用。包括秋白在内的一大批现代名人出于常州,即足为证。比秋白早一两代的,除了他的叔祖瞿赓甫、小说家李宝嘉,还有盛宣怀、董康、庄蕴宽、吴稚晖等。这些人都较复杂,有的晚年反共,甚至当汉奸,秋白都曾予以评说,但从他们与常州文化的关系看,则该承认其基础文化素养的形成有共同之处。秋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时,也并未一概否定其文化、经济方面的事迹。与秋白属同一代的有张太雷、恽代英、赵元任(秋白著作中多次提到赵氏)、刘海粟、瞿世英、华罗庚等,这一代常州名人大多数既在文化上有卓著贡献,又是革命或进步的。张太雷、恽代英则是秋白的亲密战友。秋白和这一代文化名人、革命家,既同是常州优良文化汁液哺育的,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为常州文化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增益了新内容、新光辉。从这个角度去看,秋白牵念着常州,对常州以至江南“风物”怀有深厚的感情,是毫不奇怪的。武汉时期他还很有兴趣地向人介绍常州古迹,特别是与苏东坡有关的观子巷、猷桥、藤花、旧馆等。

5 但是,我们切不可把乡情狭隘化,而把秋白对故乡的心意领会偏了。他的爱不是偏袒,不是对旧有故乡的一切都以为尽善尽美,可以不变革,他是希望其保持好的,清除污秽,变得更好。他的母亲是在常州被“穷”和“饥谗”逼死的,他的父亲是在常州

无法生存而把子女分散寄养,自己飘流他乡、穷愁一世的。他当然希望革命的大潮洗刷出一个新的常州、新的江南!在狱中,记者曾问他“果若红军发展至武进”,瞿家族属“假如有反共行为”,是否“大义灭亲”呢?答曰:“彼等决不至有若何行为”,“倘真有”,“如何处置,我亦不能作主。(微笑)”这虽是有关族亲的问答,而且记者问得幼稚,秋白答得机智,但秋白心态基本上表现出来——如果还是当了官的人“作主”,怎么能行呢?那不还是旧的一套吗?“我亦不能作主”,是由人民真正“作主”,“武进”如此,全国也如此,那才是新的武进,新的常州,新的中国!秋白的爱乡之情,和这种思想情感是统一着而并存不悖的。

心中永留慈母爱

1 秋白 17 岁那年(1916 年),春节刚过,正月初五的夜里,他的母亲自杀了。这是他的家庭“一场如天崩地裂的变故啊!”几个弟弟妹妹都那么幼小,最小的才 3 岁。据秋白的妹妹轶群回忆,瞿母在年前就准备自尽了,趁瞿父和秋白都不在家的時候,又要轶群去舅舅金声侣家,让那还不懂事的二弟阿云买来一封红头火柴,把火柴头全部剥了下来——红火柴头是毒性甚烈的东西——然后就是选择服毒的日子了。瞿父于腊月二十四日从湖北回到家里,没挣到钱,“到了家里,就钻进书房,看医书……也画一点‘岁寒三友’之类的画,母亲很失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过年时秋白不在家,在无锡,除夕家宴母亲“有意做得丰

盛一些”，孩子们都很高兴。父亲说：“今夜菜肴比往年好，阿双不来吃，可惜！”母亲“讲了一些吉祥如意之类的话，希望我们尊敬父亲和哥哥，兄弟和睦”，还跟父亲对酌。但酒酣之时，母亲的谈话里有“伤心失意”的心情：“爸爸（指秋白的外公金心芑）前年去世，在这个世界上，疼我的、保护我的人是没有了……”初五夜里，轶群曾见母亲到哥哥的书房里在灯下疾书，神情严肃。轶群说：“怪我不懂事，我还来不及想一想……又睡着了。我依稀觉得母亲曾到我床前来站了一回，俯首在看我。”“初六凌晨，父亲面色青白，大声痛哭，原来母亲昨夜在哥哥房间里写了绝命书……”^①

按秋白《记忆中的日期》，他到无锡教书是从母亲去世后开始的。春节期间没在常州过年，是到无锡“面谈”教书之事去了，住在表姐家里，母亲曾嘱他就在无锡过年，不必回常州。他虽因家贫失学，处在“彷徨、思考、苦闷”之中，但哪能意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家庭悲剧呢？收到电报，他兼程赶回来，“一到家，他就跪在母亲床前，扑在遗体上，哭得滚倒在地下”。他的心灵由这最惨痛的悲剧受到的“创伤很深”。他在这一年的清明节写了一首《哭母》绝句诗，十分哀恸：

亲到贫时不算亲，
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问，
落上灵前爱子身。

后来，他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这一悲剧的影响。他常常说起母亲的自尽，而每次谈到时都沉默很久。

“他是父母最疼爱的儿子”，母亲在世时，秋白也是“最爱和

^① 墨轶群：《母亲之死》，见《瞿秋白研究》2，第311～313页。

最能体贴母亲的”。^①他自幼聪明伶俐,好学懂事,被伯父夸奖为瞿家的“千里驹”,给母亲带来欣慰和希望。到少年时代,秋白更能体会母亲的艰难。据他的幼时小友羊牧之回忆,秋白曾说:“我一生就只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而那一次则是:当他把自己身上的褂子给了农村一个“光着背,在风里发抖”的少年之后,母亲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家境困窘,读书期间吃穿都较差,他却由此想到更穷困的连稀粥都吃不到的贫民百姓,而并不埋怨父母。因贫辍学,自然心情郁悒,但也唯有“很沉默”而已。他虽然非常想继续求学,但当母亲决定给他找个教书的工作,挣点钱,分担家里的困难时,他也顺从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能够这样做,能够这样体会母亲的心情,替母分忧,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母亲自杀,这一天崩地裂的家庭变故,对于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来说,是太突然、太意想不到的,其中复杂的原因也太难想清了。《哭母》诗里那种失母的哀恸,对于“贫”的凄凉感,对于亲戚关系的那种“饥寒此日无人问”的令人心冷的状况,可见秋白心灵创痛之重。后来他还在多篇诗文中写到母亲,说到母亲的自杀,记起母亲的慈爱,写出自己与此相联系的心灵现象。

凄凄的月色,冷冷的秋风……黯沉沉的灯光,惨淡淡的人影;岸边的衰柳萧萧瑟瑟的,花台下的落叶噉噉喳喳的,又像是低低的私语,又像是远远的哭声……树头小鸟啁啾啾啾……母鸟飞出去了,这时候似乎刚惊醒了我的噩梦。唉!还是夜色沉沉的,何尝天亮呢。一年,两年,三年,足足三年了,经过了多少艰难,痛苦,谬误,堕落,如今呢,又是何

^①《忆秋白》,第9页。

等的沉寂,恐怖,凄凉,悲惨;还不如……还不如……双目一瞑,也落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天亮了。推开了水阁门……站了半天,红霞掩映着水色天光中的残月……唉!还不如……这是我几年前……时的感想。^①

母亲自杀后,少年秋白在“凄凉,悲惨”中,稚嫩的心经受着噩梦似的刺激,隐约朦胧地想到过“双目一瞑,也落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写这篇文章时,他虽然已经由悲哀转向对旧社会的痛恨和战斗,但那深受创痛的心里,还是有“哭声”的。同时写的《自杀》一文,其写作动因里的重要一条也是对母亲的自杀的反思。之后的《饿乡纪程》又有如下多处记述和感想:

从我母亲去世之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

“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了谁呢?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

母亲去世,一家星散,我只身由吴而鄂,由鄂而燕……我的悲怀诗思……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须得暂时有个交托,——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啊!

表旧母……道:“……你母亲一世愁穷,可惜等你学好

^①瞿秋白:《唉!还不如……》,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第4页。

了本事,他再也看不见了。”我道:“这也罢了!我是很爱学的。穷迫得紧,几几乎没有饿死……一点希望本只在自己。”

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现了无里数的“?”

稍后的《赤都心史》一书又有些感念和反思:

我的母亲为穷所驱,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爱,永远留在我心灵中,——是他给我的唯一遗产。

我不得不回想父母膝前的旧梦,——我曾有温情乐意陶养我的心性。

据羊牧之回忆,1925年,秋白在上海听羊牧之述说常州瞿氏宗祠已经“西风拂槛,落叶满阶”而瞿母“孤柩尘封于蛛丝鼠迹之间”的情形后,曾有五言古诗赠羊牧之。诗曰:

君母去年亡,我母早弃养。
亡迟早已埋,死早犹未葬。
茫茫宇宙间,何处觅幽圻。
荒祠湿冷烟,举头不堪望。

诗艺风格似乎不像秋白当时之作,但与幼时好友谈及母亲,谈及母亲早逝未葬、灵柩蒙尘等等,他是会有诗中所写的心情的。

1935年,秋白就义前在囚牢中写的《多余的话》,正文第一节《“历史的误会”》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第二节《脆弱的二元人物》里又写道:

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

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

瞿母的“唯一遗产”——慈爱,的确一直留在秋白心灵之中。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在狱中他还有上述文字,而且还准备以《娘娘》为题(见《未成稿目录·痕迹》)写专文,忆述母亲之事,感念母爱,反思母亲的悲剧。

2 秋白的母亲,名金璇(1875—1916),字衡玉,是江阴西乡大岸村(常州北门外)人,金心芑的次女。金心芑曾做过广东盐大使,视其女为掌上明珠。因而,金璇幼时颇读些书,会作诗填词,写得一手很好的小楷。但金心芑早就卸任归里,又双目失明,家业也败落下来,从大岸村迁到贤庄。衡玉便随着父亲与堂兄金翰如住在一起。金翰如是世玮的大姐夫。衡玉与世玮年岁相同,处境相似,受教育的程度也差不多,又同有文艺情趣和才气,而且老亲戚又联姻,本来也认识,所以既是“门当户对”,彼此的家族都是高门台而自身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财产,又是夫妻班配的。他们结婚后的几年,尤其在八桂堂住的时期,生活比较优裕,面子上相当排场,夫妻、婆媳关系很和谐。衡玉持家,尊老爱幼,又同情和真诚帮助穷苦人,因而颇得族人亲戚街坊的好评。世玮专注于绘画,又常外出会友游乐,家事和教育子女的责任主要落在衡玉身上。她心高志刚,温和之中总有些不满于世玮的无官无业赋闲悠游的状况,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特别寄托在聪敏好学的秋白身上,盼他能学有所成,兴家立业。

但是,家道迅速衰落造成了瞿母的悲剧命运。她早知道靠家族和亲戚生活非长久之计,但无奈世玮无心于仕途。振兴家业的希望终于破灭。其实社会和家族方面有深深的原因,世玮

也有其无可奈何之处。到了极其贫苦、极难维持生活时，世玮也听了她的主张，把母亲庄氏送到长兄处奉养，自己外出谋事，但仍然没能改变困境。金璇的处境倒更加艰难起来。丈夫外出，婆母由于不愿离开故土，曾骂过她。婆母到外地后一年多就去世了。这些，成了她“不贤不孝”的“罪状”。住在荒祠里，丈夫不在家，本已十分枯寂，再加上已经典当无物，债主逼索，不仅子女无法继续上学，而且到了饥寒难熬的末路了。据轶群回忆，祖母去世时，“母亲捧着祖母的遗照痛哭了一宵……她哭自己辛苦服侍病中的婆婆十六年，悔不该在最后两年里把她送走……反招来了非议，她也哭一家生计无着”。^①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还责骂她：“把丈夫逼走了，把婆母搬死了，不给儿子中学毕业。”^② 她曾对人说：“我只有去死，我不死，不会有人来帮助我，孩子就不得活。”^③ 世玮在湖北黄陂两三年，没挣到钱，这大约也是她完全绝望的具体原因之一。于是，她在1916年2月7日夜吞服了用烧酒拌和的两盒红头火柴头，次日离世。

金璇自杀后，世玮写的挽联原有“受尽讥谗全大局”的话，怕得罪亲友，改成了“受尽饥寒全大局”。其兄金声倡的挽联中有“我妹非如人妹，傲骨珊珊男子相”的话。这些都可借以推知金璇的为人和处境。

3 瞿母性格柔中有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并寄予极大的希望。她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识、文学情趣上对秋白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秋白接受和发

①《瞿秋白研究》2，第310页。

②《忆秋白》，第9页。

③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26日。

扬了。这些和其父瞿世玮的影响相汇合,为瞿秋白形成良好气质,打下受用终生的文化素养的底子。但瞿母在志向、追求方面的诱导,希望秋白将来大有作为而兴家立业,与绅士阶级、与瞿氏大家族的传统一致,而与瞿父世玮的性情道路、行为方式的影响有别。秋白后来自身的矛盾与此不无关系。社会及其变动情形极其复杂,秋白的父母及其关系也极其复杂。他们的心性、素质、志气、行为的优良方面都很可贵。但他们各自的特点却因相异而发生悲剧,和他们的优良方面相联系,也都既有绅士阶级人物传袭性的共同局限,如脆弱性、“面子”观念、实务能力差等,又有各自由于特殊的环境、履历而发生和固化的个性和追求。他们的个性和追求既和绅士家族难以和谐,又和平民百姓多有不通之处,更与世俗生活多有不适应之处。秋白父母这一切种种的情况,加上瞿氏大家族的历史传统,所给予秋白的“遗传”、熏陶、刺激、催迫和诱导,都融会到他的心灵演化和生涯足迹之中。因而,其中的矛盾也就不可免了。

瞿母的自杀是各种社会关系、家族家庭内部关系复杂交织的结果,也是各种性情精神因素的矛盾激化的结果。这一悲剧给予秋白最强烈的心灵刺激,而且在其一生中发生恒久而有力的牵系作用。这一悲剧使他在家族制的弊害、家族家庭命运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妇女的命运等问题上深思和求索,更在内心深处留下创痛,时而引起浓重的悲哀。他在生活道路上的转折、对新道路的寻找也与此相关。瞿秋白20岁时所写的散文《自杀》,表达了要“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情感,而其所以和一般性的口号不同,也是因为经历了母亲自杀的悲剧而有极深切的感受和极深沉的思考的缘故。此外,瞿母自杀,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为子女而牺牲的行为。自杀前“受尽讥谗全大局”,自杀时内怀深忧,但参透了生死,为了使“别人”不再因为她的存

在而不来救助这一家人,为了换取子女得抚养之所,得上学的机会,而从容赴死。她是从家族和亲戚关系的特定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死”的。秋白最后的从容就义,在心理活动的具体内容上,在“死”的社会意义上当然与其母不同,但在柔中有刚、参透了生死、牺牲自己而为了他人的方面,似乎也有某种联系。

瞿母自杀前后数年的生活状态,对秋白的影响要比他更幼小时期的“少爷生活”的影响大得多、深得多。况且,这七八年的痛苦愁惨、枯寂、簸荡、“噩梦”般的生活,与前此小康时期的“少爷”生活形成强烈反差,更剧烈而深刻地影响心性和思想。“少爷”生活固然是“绅士意识”发生的条件之一,但是,一则当时很幼小,“少爷生活”发生作用的深度与他的前辈远不相同,应该说浅得多;二则“少爷生活”本身的作用也并非全是消极的,受基础文化教育早而且内容丰富,社会联系的方面多,也有使他见多识广的作用。急遽陷入贫苦悲惨,所受心灵冲击更强烈。剧变使他实际上早就与“少爷”圈子里的人们大不相同了,从生活到情感方式、精神趋向都大不相同了。实境逼得他趋向出离旧环境,寻求新价值、新出路。所谓“读书的高等游民”的特点,自然有其不良方面,但在家庭破灭后,不得不“游”的东奔西走的生活,倒使他半游离于“昏昧”的精神环境,而较多地与别种精神氛围联系了,有了感受新潮的机会,也更容易接受。他那么早就到无锡、武汉、北京寻出路,形成他后来背逆原阶级、背逆原来那种大家族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感念不已父子情

1 山东济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灯光，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旁，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老者，风尘憔悴的容貌，越显着蔼然可亲，对着一位少年说道：“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啊！……”那少年答应着站起来。其时新月初上，照着湖上水云相映，萧萧的芦柳，和着草棚边乱藤蔓葛，都飐飐作响。三人都已走过来，沿着湖边，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时，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种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叫人何以为情呢？

这是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对他赴俄之前拜别父亲时的情形描述。“少年”即秋白，“老者”即其父，第三个人是瞿父的要好朋友王璞生（江苏人，曾任兰陵知县）。瞿父曾在王家做家庭教师，当时寄居在王家。秋白文中“风尘憔悴”“蔼然可亲”等用语及所记父亲嘱他“随处自去小心”的话，都深蕴着父子亲情。从瞿父所说“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和“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啊！”等话语，可以看出他是很有见识、很达观的，也是有积极生活态度的；可以看出他很支持儿子远行赴俄，并且寄予深切的希望，不像那些囿于俗见、要把子女拴在身边的人。秋白将父亲的这些话郑重地记入著作，也可见他是深有感受而铭记于心的。精神上的联系、所受的影响也就都在其中了。

秋白又写道：

从我母亲去世之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我父亲只能一人住在山东知己朋友家里，教书糊口。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能尽的责任呢？我……还要求发展……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决定到俄国去……因此到济南辞别我亲爱不忍舍的父亲。

当那夜大明湖畔小酒馆晚饯之后，我父亲的朋友同着我父亲和我，回到他家里去。父亲和我同榻，整整谈了半夜，明天一早就别了他上火车进京。从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呢！

一人坐在车里，寂寞得很……窗外凄凉的天色似乎有些雨意，还有那云山草木的“天然”在我的眼前如飞似掠不断的往后退走，心上念念不已，悲凉感慨……猛然看见路旁

经过一个小村子,隐约看见一家父子女女同在茅舍门口吃早饭呢。不由得想起我与父亲远别,重逢的时节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名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秋白从当时“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会使人们“失去一切的可能”来理解父亲的穷困潦倒,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对于老父“忧煎病迫”、孤处异乡的凄凉,对于父亲那种不事“钻营”的德风等等,“心上念念不已”。父子同榻,“整整谈了半夜”,更见得父子间感情的融洽,精神上很能互相沟通。见大自然的“云山草木”从眼前飞掠退走,见别人家父子女女一起吃饭的天伦之乐,就引动父子深情,更念念不已,而有“悲凉感慨”的心境。我们从他引用家乡诗人黄仲则“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的诗句,从他的“亲爱不忍舍的父亲”等直抒爱父之情的话语,更可以看出他们的父子关系决不是那种相疏远相隔膜的关系,而是非常相爱的。秋白很珍重这种爱,所以这么写出来;同时又将这种情感扩展,升华到为解决造成父亲这样孤苦潦倒、“忧煎病迫”的“中国问题”而致力的精神境界,“不忍”远别而又决然远别,去“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在秋白的情感世界里,深深的亲情与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就是这样联系着的。

2 秋白的父亲瞿世玮(1875~1932),字稚彬(或稚宾),号圆初、一禅。他在秋白的祖父瞿贞甫(廷仪)的子女中最小,在亲兄弟中排第四,和秋白的叔祖瞿赓甫的儿子们排在一起是第七,所以在常州被人称为“瞿七爷”。贞甫去世时,世玮才8岁。按旧时大家族传统,赓甫有照顾寡嫂、抚育侄辈的义务,从贞甫多年为赓甫办文案、理官署之事方而说,赓甫也有抚恤贞甫遗属的义

务。因而,世玮少年时代是同母亲庄氏和哥哥、姐姐们一起,随着叔父赧甫及其一家在湖北生活、读书。

赧甫有四个儿子,加上贞甫遗下的四子二女,赧甫虽“天性孝友”,在胞兄故后,“恤其孤寡,婚嫁教养,引为己任”^①,但限于经济力量,在贞甫子女中只能着重培植一人,他选定作为贞甫长子的世璠,因而在秋白的亲伯父中,只有世璠一人做了官。世玮天赋甚高而未“进学”做官,虽与赧甫无力着重“培植”有关,但也许还因为其父的仕途坎坷、壮年早亡和叔父、兄长们做官的情形使他发生了逆反心理吧,他不像父辈和兄长们那样热心于“仕途经济”,而信道教,尚黄老,习剑术,尤其对艺术有兴趣,善绘画,一生致力。他在山水画方面达到上流水平。他虽有一张写着“浙江候补盐大使”的大红名片,但除了在清末的几年可以表示绅士身份,使“面子”好看,对普通百姓有点威风之外,就毫无用处了。

一个艺术家的“穷”途厄运,是很令人悲叹的。世玮一直没有一点自己的房产家业,连结婚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新房。尽管婚礼也算排场,却是在他人姐、大姐夫的家——也是他岳父的住处成礼。婚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搬到常州青果巷八桂堂瞿宅,住天香楼。秋白的降生处——八桂堂这所十分阔气的高门大院,其父世玮也没有一点儿产权,只是替瞿赧甫看管而已。不过,在赧甫去世前,世玮至少在表面上是这里的当家的,在常州人心目中是响当当的“瞿七爷”。世玮少年时代靠父辈、兄长的抚育庇护,过着优裕安逸、悠游玩乐的生活,后来经管八桂堂,虽云闲居却在充当瞿家盛期在常州的留守代表人物,在代表显族声威的同时,成就了其自身的画艺。表面上的显赫排场和实际上一无

^①转引自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60页。

所有的矛盾,既须留守大家族的老根据地常州瞿宅,侍奉年老病瘫的老母亲,又被埋怨为入仕无才、兴家无能的处境,使他“平日郁郁寡欢,沉默少言”。他信道教,尚黄老,大约也与这处境和矛盾有关。

赓甫去世后,世玮夫妇失掉了一个主要靠山,断了经济来源的大半。赓甫的后裔卖掉了八桂堂,使世玮既失掉了看管那宅院的差使,又无法再住在那里了。此后先迁到本城乌衣桥住了数月,后租住星聚堂的几间房,但不久因付不出房租只得搬到城西庙沿河觅渡桥附近的瞿氏宗祠里。世玮夫妇侍奉着病瘫的母亲,其长兄世琥从官俸中每月寄来50块大洋,这就是世玮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了。此外,他大姐家逢年过节也送些柴米来。由于子女越来越多,六男二女,又由于世玮闲居悠游习惯了,没有钻研手段,也没有经营实务的本领,夫妇还染上了吸鸦片的毛病,所以生活越来越困窘。到1913年秋白14岁时,家里已经极其贫苦。世玮不得不外出谋事,先把母亲送到杭州世琥那里,然后带着才四岁的第五个儿子阿尧到湖北黄陂,替秋白的二姐夫周福孙家当帐房,每月有30元的薪金。但世琥这边由于丢了官,也由于母亲已不再由世玮夫妇侍奉,就不再往常州寄钱了。这样,秋白一家的生活反倒更苦了。秋白的母亲在常州带着几个孩子只能靠典当衣物和借债维持。1916年初,春节前,世玮几乎空手而返。秋白的母亲金氏就在这年春节后自杀。世玮很悲哀,借了100元钱,亲自处理了丧事,把几个幼小的孩子寄养在兄长和亲戚家,自带一个孩子随堂弟世玖到山东平原县做县署会计。世玖“官亏”逃走;世玮被扣,又历一番波折,约于1920年到济南,先后住在友人王璞生家和悟善社、正宗社,曾在美术学校任山水画教师,著《山水入门歌诀问答》。1932年6月去世,葬于济南南郊。总之,秋白的父亲是个善良而命运悲惨的旧

式读书人、艺术家。

秋白曾在《赤都心史·家书》里写道：

父亲一生经过万千苦痛，而今因“不合时宜”，在外省当一小学教员，亦不能和自己的子女团聚。

这和《饿乡纪程》中所记的一样，可以看出秋白对父亲的爱和理解，他为父亲的“万千苦痛”而苦痛，他深知主要是畸形社会造成了父亲的厄运。

3 王观泉在《瞿秋白传》里曾说，《饿乡纪程》第一节中有关父亲的记述和心情抒写，和朱自清的散文名篇一样，是“感念父爱的炽烈的篇章”。此外，秋白还有些文章写到父亲。《饿乡纪程》第三节说，对于以前的“诗古文词稿”，自己“已经视如敝屣”，但由于父亲要“做个纪念”，就决定在赴俄前把它们“整理出来”。父亲很看重儿子的作品，很有感情地要保存，儿子尽量满足父亲的要求，彼此间慈爱与孝敬之情即在其中。前文所引的《赤都心史》的《家书》一文，又一次写了对父亲的深切怀念。1932年6月10日瞿秋白在“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致鲁迅的信中说：“我小时候……大概是十岁那年，‘大年初一’，爸爸买了一部《三国演义》给我，我在走廊里翻着那书上的‘绣像’，正看得得劲……”秋白就义前夕在狱中曾拟过一份《未成稿目录》，其中“痕迹”部分里至少有两个题目是写父亲的：一是《大红名片》，二是《父亲的画》。可惜这两稿都“未成”——由于敌人杀害了秋白，他没来得及写。但从这两个题目我们可以知道，秋白在最后的日子里对父亲还是“心上念念不已”的。

秋白与父亲的关系，是秋白与他那个破落的绅士家族关系的一部分，父子感情、心性、精神上的联系，自然有绅士阶级精神

文化传统的因素,然而,却有明显的特殊性。瞿父世玮虽然生在绅士家庭,但由于特殊的遭遇、特殊的不幸,其心性、情感与一般绅士是大有区别的。人们常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有三: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三大不幸竟然集于世玮一身!绅士家庭在“破落”途中,其成员所遭遇的不幸,必然引起心性、精神的变化,有精神上的“破产”或堕落现象,也有离心、异趋或叛逆现象。在世玮身上,不能说没有不良精神和习惯,但说不上是堕落,他属于秋白所说的“破落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那种“好的”人,大致上是“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①而在某些方面,则颇为明显地与读书做官、“经国济世”的政治参与的传统族风逆向,也与那种虚伪、“嫉恨怨悻诅咒毒害”的人际精神现象是两样的。他其实是有一种与“仕途经济”相背、与“钻营”之风相背而任个人兴趣、发展个人特殊才智、寻求身心安宁的倾向的。他信奉道教,习黄老术,喜好游乐,寄情艺术,专注于绘画,实际上含着自发的叛逆性。作为具有较高程度传统文化素养的知识者,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在极大不幸的生活中身历万千苦痛的人,他的情感是丰富细致的。因而,作为父亲,他是慈爱的,感情是深而细的。有几件事,我们不要忽视,那是他作为父亲在子女身上所表现的亲情之深之细:一是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他到玄妙观、红梅阁游玩会友,也常带秋白等子女去;二是前文提到的给秋白买绣像本《三国演义》等书;三是在经济窘困时,为了家、为了孩子们,他能抛下绘画,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帐房”,去挣钱,挣多少那由不得他自己,但那份心意则不可低估;四是在家庭离散、无以为计之时,也是他把一个个孩子安排在亲人家里生活和受教育,而且把那个自幼迟钝,有神经病现象的儿子带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4页。

在身边。

秋白从小就得到这样一位父亲的爱,受其影响,存在着精神联系,直到赴俄前还那样亲切地沟通心灵。后来,他多次在文章里写到父亲,感念父爱,回顾和反思这种关系,是很自然的事。秋白情感上的某些特点,如丰富细致、安祥而又灵敏等等,显然与父子传承有关。他的艺术素养之形成也显然有父亲的影响,会作画就是跟父亲学的。自幼得以耳濡目染,能握笔时就跟着父亲学画了。秋白爱读并且读了许多道家的书,也明显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所读之书有些就是父亲的。据秋白幼时小友回忆,小时候见其父常常“闭目端坐,不出一声”,也就跟着学起来,小朋友们一起玩耍时也“仿效为戏”。其父平素的言谈内容、行为方式、情绪心态等等,在倾向上与绅士家族读书当官的传统对秋白的规约和影响是两路,与那些嘁嘁嚓嚓、互怨互憎互害的恶浊精神也是两路,这样留给秋白的感觉、心灵印痕和带着个性、情绪特点的艺术兴趣等等,是断不可忽视的。

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往往不是单从理性上和有形迹的材料上能够说清楚的,无形的、潜隐的方面,情感心理方面倒更重要。秋白幼时艺术爱好的发生,艺术心灵的陶冶,少年时代的尚性灵,青年时代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内的要求”,以至后来在革命生涯中仍有洒脱风度,时露超然心绪,后期在政治上受排挤打击迫害时不再对政治有强烈兴趣,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的心性、素质、习惯与文艺更相适合等等,都与他父亲无意间、无形中的“遗传”或影响有关。早期的“名士化”倾向、“避世”“厌世”心理等,与他父亲的精神联系更是明显的。

羊牧之的回忆文章曾写到瞿秋白在1927年说:“我父亲的画是好的,但一生无益于社会,太没价值。”瞿轶群、王铁仙也都认为秋白是会这么说的。那时,秋白在革命队伍中正处上升期,

尚未遭受严重挫折，“纯粹无产阶级文化”倾向正强，所以“价值”评论很可能如羊氏所说。但若按其后来的心态和文化意识，《父亲的画》一文若写成，评价也许将大不相同。

手足深情

1 据秋白之妹轶群介绍,他们同胞兄弟姐妹共八人,其名字、生卒年月和大概情况依次如下:

轶群(1900~1981),小名群群。长女。母亲去世后先在常州表舅妈陆家和舅舅金声侣家,1918年到江阴贤庄大姑母家,1921年到杭州伯父世琬家,后嫁杭州王氏。

懋焱(1902~1964),小名阿耘,后改名云白、昀白。母逝后先投靠本城费家(即其伯父世琬的岳家,云白按旧家族制过继给世琬,即嗣子。世琬去世,云白随伯母在费家生活),一年后到北京纯白(世琬长子)家读书。后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被捕,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俄文编译工作。

懋鑫(生卒年不详),几岁时夭折。懋森(1906~1929?),小名阿森,后改名景白。母逝后,先随秩群在舅家、大姑家、伯父家,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1924年毕业后进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赴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失踪。

懋垚(1909~?),小名阿垚。自幼患癫痫病。母逝后,随父亲先后在湖北黄陂二姑母家、山东平原县、济南生活,后来主要由纯白养大。但因病生活不能自理,境遇甚惨,据说很年轻就死于武汉。

红红(生卒年不详),次女,三岁时夭折。

懋毅(1913~1944),小名阿毅,后名铨、坚白。母逝后随姐姐秩群先后在陆家、金家、大伯家。15岁小学毕业于杭州志诚小学,后曾在淳安、嘉善、镇海等地当县教育局雇员,1938年由徐特立介绍,往延安入陕北公学,后转到抗日军政大学,1944年5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2 秋白是长兄,一直很关心爱护弟弟妹妹,“弟妹们也尊重他”^①。在家境十分窘困时,他才16岁就停学并遵从母亲的主张决定去教书挣钱,一面是替母分忧,一面也是为了弟弟妹妹。母亲去世后,他一面自寻出路,一面协助父亲把弟弟妹妹寄养在亲戚家。约1916年冬,秋白和三弟阿垚一同在武汉黄陂二姑母家,表兄周均量教阿垚读唐诗,因阿垚半天背不出一首绝句,就罚跪。据周君适回忆,当时秋白就走进书房,大声喝道:“起来,这成什么样子!”周均量生气,不再教阿垚,也不和秋白说话。事后秋白对表兄说,自己不是袒护弟弟,而是反对体罚的教育方

^① 懋秩群:《母亲之死》。

法。周均量接受了秋白的意见。秋白一心想把弟弟教育成才，但阿占有癫痫病，又耳聋、迟钝，秋白为此深感苦恼。秋白在北京读书时，还曾带着云白、阿占两个弟弟。两个弟弟的生活和教育费用靠堂兄供给，秋白说自己“当时吃的饭”也是“堂阿哥的”。但他在读书的同时，尽着负起照顾、护爱弟弟的责任。

母亲去世后，他们家已经“失去一切必要的形式”，但“精神上的系连”还存在着。秋白走上革命道路后，弟弟妹妹也受到他精神和情感上的积极影响。景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小弟坚白也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承其遗志，参加革命，而成为英烈。

3 秋白的著作中多次写到弟弟妹妹，表现了他深厚的感情、与弟弟妹妹“精神上的系连”和对他们的殷切希望。

从我母亲去世之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我兄弟三个住在北京，还有两弟一妹住在杭州四伯父跟前……^①

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人”——我决然忍心舍弃……兄弟姐妹亲友而西去了。^②

……北京东车站，我纯哥及几位亲戚、兄弟送我……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③

前几天我得看北京来信，——是哟弟的手笔……音问梗塞直到现在方来。他写着……家庭里都还“好”。唉！我读这封信，又何等感想！一家骨肉，同过一生活，共患难艰辛，然而不得不离别，离别之情反使他的友谊深爱更沉入心渊，感切肺腑。况且我已经有六个月不得故乡只字。于今也和“久待的期望一旦满足”相似，令人感动涕泣，热泪沾襟

①②③《黑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7、15、32页。

了。

然而，……虽则……“家书抵万金”，这一封信，真可宝贵；……又引起我另一方面的愁感，暗示我，令我回想旧时未决的问题；故梦重温未免伤怀啊。……

唉！……“家里好”……哟白，哟白，你或者是不愿意徒乱我心意罢了？我可知道。我全都知道：你们在家，仍旧是像几年前……那种困苦的情景啊。

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总有那一天啊……①

秋白心里总是牵挂着弟弟妹妹，总是惦念着他们分处各地、寄人篱下、孤苦患难的生活，而每念及又总是愁感伤怀。弟弟的来信有“家里好”之语，本意是安他的心，要他不要太牵挂，他却由于“全都知道”他们那“困苦的情景”而决不可能释念的。数月没通音信，就觉久久期待的不安，见弟弟信来就那样“感动涕泣，热泪沾襟”。如此“沉入心渊”的友谊深爱，的确感切肺腑！

4 1923年，秋白从苏俄归来，“兄弟姐妹都引领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②。他先在北京与两个弟弟相见，准备在北京找工作，这与要照顾弟弟的心思有关。但由于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参加党的三大，接着是其他革命工作，他再难有多少精力管弟弟妹妹的事了。但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他也不时到杭州伯父家探望，与妹妹和两个小弟弟相聚。到上海大学就职后，他先后把云白和景白带在身边，培养教育他们。

1923年秋，景白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已经有了进步思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209～211页。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第413页。

想,并且像秋白一样热爱文学了。秋白于1923年10月曾以《弟弟的信》为题写过一篇散文,先引景白的杭州来信,然后写感想。景白在信中说,在西湖湖滨见一个“衣冠禽兽”,像“狗叫一般”地在那里骂工人模样的一个人”,还“将他的兽掌打工人的面颊”。小景白由此发生感想,写道:“我以为这爱,光,安慰,幸福,是给‘人’……可决不是衣冠禽兽‘所可得而与’的。这种人,我们只该驱逐……只可使他消灭,不可使他繁殖。”秋白读后写道:“弟弟,景白,你大概渴望那东方,那东方……早升旭日?”接着,就景白信中所说在西湖风光中读泰戈尔、徐志摩的诗,觉得“无忧无虑的大乐”的话作分析,引导小弟去认识西湖“一重重的楼房”中的“灯火”并“不是泰戈尔的‘光’和‘爱’”,指出“你应当懂得,那光明是私有”,应该听得出那“管弦丝竹的淫声”、“闻得见酒香肉臭”,既要“到自然界里去领略泰戈尔”,又要懂得现实社会“不是森林”,不是泰戈尔的“森林哲学”所能认识的。

秋白基于心底对弟弟的深爱,为幼苗似的小弟弟的纯真和思想进步而欣慰,同时又给幼苗以新的光和热,催其茁壮成长。作为长兄,作为引路人的心意、情感,多么令人起敬!

在上海,有一次羊牧之间起秋白弟弟、妹妹的消息,秋白吟诵杜甫诗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来表达心情,接着说:“弟弟妹妹星散各处,但星散何止我一家啊!等革命成功后,再回瞿氏宗祠团聚吧!就不知那时祠屋还在否?”20年代,他只和云白、景白在一起的时候多些,别的弟弟,还有妹妹轶群仍然星散相“隔”,所以仍有“天涯涕泪一身遥”的心情。但他总以革命为重,追求着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追求着所有的“上”都革命化的那一天。同胞兄弟姐妹之爱和革命的情怀,在他心灵里是统一的。

就义的前夕,写《多余的话》,拟《未成稿目录》时,他仍然记

挂着弟弟妹妹,说“家庭离散”,说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说到对亲人的“留恋”,都包含着难以释然的手足深情啊。他还拟了《忆景白》的题目,准备写成散文。那心境是深邃的,悲辛的。如果不那么早地牺牲,关于弟弟妹妹的事,他一定会在《忆景白》和“痕迹”的其他一些题目下写出来的,他那沉入心渊的深爱,不能不表达啊。

景白在五卅运动中就是一位有智有勇的革命斗士了。1928年他随秋白赴莫斯科。1929年,米夫、王明宗派集团利用莫斯科中山大学事件,在打击秋白的同时,把景白打成“反党分子”。景白极其愤慨。据盛忠亮回忆,在一次会上,宗派主义者公开诬蔑秋白“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到会的俄国人,包括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代表却一致鼓掌,表示对宗派主义分子的赞许。于是斗争更残酷了。景白一气之下把联共预备党员证退给区委。第二天,他就失踪了。王铁仙在《瞿秋白论稿》中说:“据瞿秋白等人分析,景白决不是自杀的,而是被谋害的。”

秋白留下的虽然只是“忆景白”三个字,但却是手足深情和革命感情的表现。

有情意的亲人

1 瞿秋白 17 岁时在《哭母》诗中有“亲到贫时不算亲”、“饥寒此日无人问”的诗句,那是他从 1915 年因贫辍学到 1916 年春母亲“为穷所驱,出此宇宙”,几个幼小的弟弟妹妹啼饥号寒、嗷嗷待哺的时候,在与那些失了情意的族人、亲戚关系上的感受。他的心受到深痛的创伤,凄哀悲凉得很啊!母亲自杀之前,家庭“破产”途中,“人与人的关系”早已在他的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①;母亲悲惨的死,家庭因贫困而不能不分散的苦痛,更增强他哭母时的那种感觉。是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族中的人际关系、亲戚关系,的确是十分复杂的,尤其在“贫”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1,第 15 页。

的时候，他一定会感到那漠漠然的凄苦悲凉。北方乡间有这样的说法：“门前拴着高头马，不是亲的来认亲；门前摆着讨饭棍，姑舅姨娘不上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那么几个人，甚至一两个族亲或表亲来抚恤，哪怕只是一口饭、一句有情意的话，也显得非常可贵。出身贫苦的人，尤其是幼年失父或失母，特别是双亲并失的，对“有情意的”人，包括保持着“亲”的真实情意的人，往往有特别深、特别牢的记忆，往往一辈子感念而报以真情。秋白就是这样。从他的著作里，从别人的回忆里，我们都能深感到他的情感世界的这一方面。他一辈子都铭记着“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①

2 秋白的“有情意的”亲人主要是四伯父世琥，他的堂兄、世琥的长子纯白，舅父金声侣家、大姑母家、无锡姨表姐表姐夫秦耐铭夫妇、湖北二姑母家的表兄周均量，还有一位他在《饿乡纪程》第三篇里说到的“表舅母”。按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制的习惯，族亲称为“家里人”，世琥、纯白都是。

世琥，字薛斋，是秋白之父世玮的同胞长兄，按秋白曾祖父的孙辈们排行，世琥行四，所以秋白称“四伯”；按秋白父亲的同胞兄弟排行，世琥该是大伯父。他在晚清时做过浙江桐乡、山阴、嵊县等县的知县，民国初期做过江苏丹阳、泰兴的县知事。秋白在《饿乡纪程》第一篇就有记述：

四伯做官几十年，清风两袖，现时中国官场，更于他不适宜，而在中国大家庭制度之下，又不得不养育全家，因此生活艰难得很。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5页。

世琥一家租房住在杭州板桥路。约在 1913 年,世玮把母亲送到杭州后不久,世琥丢了官,在家闲居。从 1920 年起,秋白的妹妹铁群带着两个弟弟(景白、坚白)寄居在他家里。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世琥还供景白等读书。

秋白 1923 年自俄回国后,去拜望“四伯”和伯母,自然是怀着感激之情的。“他规矩周到,很讲礼节,不露革命者锋芒”,他陪着两位老人,“用常州话和他们谈谈家常”,还“描述在苏联的见闻,如剧院里的演出和马戏团的滑稽表演之类,四伯父、四伯母听得兴致勃勃”。^①

3 1925 年,秋白又到过杭州一次。他与四伯一家在感情上是亲近融洽的。

纯白,名常,字纯伯,京师大学堂法文专业毕业,曾任南洋万洋学堂、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教师,后成职业外交官。王铁仙(铁群之子)说,秋白与纯白“关系极为密切”。^② 秋白于 1916 年冬赴武汉考进武昌外语专修学校,就主要是因为纯白当时在京汉铁路局担任通译。1917 年春秋白赴北京也是跟着纯白去的。秋白带着两个弟弟寄居在北京纯白家里多年,当时住在东单观音街草厂胡同 28 号。秋白读俄文馆,云白、占白由纯白供给读书。秋白赴俄期间,两个弟弟仍由纯白养育。秋白著作中多次写到他这位“纯哥”:

我离中国之前,同着云弟、占弟住在北京纯白大哥家里已经三个年头……^③

① 瞿铁群:《回忆哥哥瞿秋白》,见《忆秋白》

② 《瞿秋白论稿》,第 164 页。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1,第 7 页

我离山东回到北京……不知道辜负了这小院秋花的多少好意。我纯哥的家庭，融融泄泄……留我许多感想。我因远别在即，黄昏时归来就同哥嫂家常闲话，在北京整整的住了四年，虽纯哥是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或者有和他反背的意见——纯哥当初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一切都已决定，纯哥亦就不说什么，勉励我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兄弟的情分，平常时很觉泛泛，如今却又有些难舍。……哥嫂的谈话，在家事上也帮助我不少。^①

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②

十月十六日一早到北京东车站，我纯哥……送我，……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③

在最后的遗著《多余的话》里，他仍不忘这位“堂阿哥”，正文的开头就写道：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

1916年尾至1917年春，秋白在武汉除了“寻着了纯哥”，就是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留下的印象比较深了。他在《饿乡纪程》第四篇里写道：

会见表兄周均量，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了一层；他能扶助我的，不但在此，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这三四个月的旅行……心灵上却渐渐得一安顿的“境界”。

周均量长秋白五岁，又名君亮，颇有旧学根底，懂佛学、经

①②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7、25、32页。

史、诗词,也通新学。秋白初到黄陂时,据周均适回忆,二姑母曾为秋白和弟弟妹妹的失母和离散而十分动情地痛哭。均量教秋白读书,辅导秋白也很尽心。秋白与均量等一起游玩吟诗品画,情感既得到宽解,学问上也有进益,从他所说“由吴而鄂……黄陂铁锁龙潭的清波皓月,也曾使我低徊留恋”^①来看,他同均量相处甚好。

4 瞿秋白对姑母家的女儿、他的表姐们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写道:

我忆及我一少寡的表姊。他现在只他一人同一遗腹子孤苦伶仃的住在母家,我姑母受儿媳的供养已是很为难,何尝能好好周顾到他呢。姑母家……顿然现出濒于破产的现象。于是我表姊的寄生中之寄生生涯,精神苦痛不可言喻。……还有一个表姊……感着“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生活起疑问。他又何尝能解决呢?^②

秋白由对表姊的悲怀,引到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上:

生活困难,心绪恶劣,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中国的社会生活,好像朦胧晓梦,模糊得很。^③

还有位表舅母,曾对秋白有实际的帮助,把首饰拿去当了钱,借给秋白作出门求学的路费。《饿乡纪程》第三篇写道:“他的屋子……究竟太窄……表舅母道:‘……可惜你学好本事,他(指秋白的母亲)再也看不见了。’我道:‘……第一次从常州出门求学,亏得你当了头借给我川资。这次出去求学,也刚巧借着了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6页。

②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8页。

钱……”^①

5 秋白在《饿乡纪程·三》里说那位自幼丧母的“表姊”就是无锡秦耐铭夫人，她是秋白大姨母的女儿，姓杨，名庆令，长秋白8岁，幼时曾寄居在常州武进姨母即秋白母亲这里，所以秋白说“和我一处长大”。1911年嫁到无锡。丈夫秦耐铭受过高等师范教育，先做小学教员，后做师范学校、辅仁中学教师，教英文和国文。夫妇俩有四子一女，所以秋白说她“儿女非常的多”。这位表姐和秋白的母亲及秋白关系很密切，感情甚好。秋白到无锡教书，就是秦耐铭几经周折才介绍成的。1916年1月，耐铭夫妇到常州瞿家小住时，秋白的母亲托他们把辍学的秋白带到无锡去，觅个小学教员的工作。秋白就跟着他们到了无锡，春节前后在那里生活得还算不错。耐铭曾送给秋白一些唐诗集子，并辅导讲解，还带秋白“到惠山去玩”。

耐铭后来回忆道：

游惠山，在景微堂前面喝茶。那天天气还暖，秋白兴致勃勃地说：“我喝这许多有名的泉水到肚子里，要泛出许多诗句来了。”当晚吃完晚饭，他果然到我房中，拿了张纸，上面写了游惠山七律诗两首。^②

秋白在就义前夕所拟的自传性著作《痕迹》的“未成稿目录”，第一部分“家乡”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宁姐》。这“宁姐”很可能就指我们上面说的他的姨表姐、秦耐铭夫人杨庆令。她的名字，初见于尤伟、周汉成《瞿秋白在无锡遗踪考辨》一文。“令”字与“宁”字，在吴方言里几乎是同样的读音，秋白用“宁”字，与韦、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9页。

②秦耐铭：《秋白逸事》。转引自《瞿秋白研究》6，第296页。

周文章考察出的“令”字,当是同一人的名字。秋白离家之前,在无锡教书,这与这位表姐家经历相合。当时他与这位表姐从幼时“在一处”,到后来又常常往来,关系最密切。还有,从《饿乡纪程》中所记来看,他也认为这位表姐比较有思想,“感着‘中国妇女的痛苦’”(这“感着……痛苦”一则是可能指自身的,二则是从母亲的早逝、姨母即秋白之母的自杀所感到的),留给秋白印象深,引动的思考也多。因而,他拟这个题目来写她的事,写两家之间的关系、感情,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也最有内容。拟这一题目,也表现了秋白对于“有情意的亲戚”的情意是终生保留在心间的。

亦即亦离的恋爱

1 秋白在《饿乡纪程》第二节写有如下的话：

我……亦有耳鬓厮磨啾啾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现在都成一梦了。

第三节又写道：

我记得，我心灵里清纯洁白的一点爱性，已经经过徘徊缠绵的一番锻炼。如今好像残秋垂柳，着了严霜，奄奄地没有什么生意了。

与异性小友之间由“清纯洁白”的爱心所自然而然形成的“耳鬓厮磨”的情形，几乎是每个少年都有的。是友谊还是“恋爱”？谁也没法说清楚。但那是很可贵的情谊，天真，纯洁，朦朦胧胧的“缠绵”，徘徊惻惻、若即若离的相互怡悦。

这美好的情感,稚气却又那么真纯的心灵经历,往往终生不忘。久后忆及,虽然可能觉得像远逝的梦,但所唤起的总是真、善、美。

2 秋白少年时代的这种友谊,最早也许是在他后来在文章里一再提到的“环溪”发生的吧?环溪在他外祖母家和大姑母家所处的江阴贤庄一带。贤庄在常州东北约10公里处,四面环水,水颇深广,附近还有一座颇具诗意的水阁,溪畔和村庄里有绿树、丛花和禾稼,这都足以引动少年们的奇思遐想。秋白少年时代常常到那里去。那里远远近近的亲戚家有与他年岁不相上下的表姊妹们,自幼常来常往的玩耍中,也就结下了可贵的友情,其中有的就能有“啾啾情话”,就是“亦即亦离的恋爱”了。请看他在21岁时发表于《新社会》第18号的《心的声音·错误》一文所写的他与表姊妹们一起玩的情形:

我的心灵回复到五六年前去。——菊花的清香,映着满地琐琐碎碎的影子,横斜着半明不灭的星河,照耀着干干净净的月亮。花篱下坐着三个人,地上纵横着不大不小的影子,时时微动,喁喁低语,微微的叹息,和着秋虫啾啾唧唧……地上参差的树影密密私语……忽听得远远的笛声奏着《梅花三弄》,一个人……说道:“今天月亮真好。”……这就是我。……(现在)桌面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秋白明天同到三贝子花园(即今之北京动物园)去。……那时,这时,果真都是我么?……唉!都错了!……

同一篇文章又写“四年前”的情形:秋白“住在一间水阁里,天天开窗,就看着那清澄澄的小河……远远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江阴的山……朦朦胧胧的,有时有,有时没有”,听小孩子们谈

“月亮”，由“怎么能天天都是圆的呢？”之类话，引动亦即亦离的恋情心态。而这些都是由1920年写这篇文章之前看见桌上的一张纸条引起的回忆。这约他去三贝子花园的人是谁呢？是《饿乡纪程》第三节写的表妹“三小姐”么？

一位“表舅母”和秋白谈到这位“三小姐”的时候说：“三小姐这桩亲事，真正……小孩子的时候就定亲许人家，最坏事。”还说“三小姐到京了”，问秋白去看她没有。从语气看，“表舅母”似乎知道这“三小姐”与秋白是有情谊的。而秋白文章中紧接着就是从自己“清纯洁白”的“爱性”说起，说到自己的“心神现在虽已在别一个世界”，但依然有旧时“遗迹”——复杂的“人与人之关系”里的精神联系；说到自己曾去“看三妹”的情形：二人见面时说到“我们一别，不是四五年了么？现在又得分手，人生还不是驿站似的”，则又引起以前那清纯洁白之情的回忆了，“半晌大家不言语”。虽说时移境迁，各自也都有了大变化，一个经过了多年枯寂生活后又经历了五四大潮的洗礼，一个已经出嫁，承担着家事，“样样事要担些斤量”，但一谈起以前在环溪“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两个人还是“不知不觉谈到黄昏时候”，当秋夜时分的秋声雨意催人离别的时候，才离去。《饿乡纪程》里的这些记述，瞿秋白是当作旧生活的“遗迹”、“过去的留恋”来写的，那时他已经“一心另有归向”，“一挥手，决然就走”，要奔他的“饿乡”去了。

但是，四年前秋白到无锡教书前和辞教职后在环溪的时候，却正是清纯洁白的爱性经历那“悱恻缠绵”的时候，也正是快要相离的时候。这“三妹”即秋白大姑夫金翰如三女儿珊珊，即金君兰。

3 秋白与四表妹纤纤即金君怡也有纯真的情谊。1916年赴武汉前到贤庄辞行时,他曾以折扇和横幅山水画“江声云树图”赠纤纤。羊牧之曾以“青梅竹马如无意,团扇佳人似有情”的诗句写秋白与纤纤的关系。少男少女初始清纯的爱性,往往实际上并不被“专一”的框框所拘束的。羊牧之《瞿秋白少年琐事外编》一文^①说君怡原与秋白有终身之约,后因秋白一去不返,就“嫁在有近园的恽家”;吴之光据他自己访问金人莉的笔录,说君怡“适常州织机坊许学征”,君兰是“适常州长生巷恽逸云”的^②。羊牧之是秋白幼时好友,其“有终身之约”之说,大约别人也难以否定,君怡后来嫁于何人,或以吴说为是。

据尤伟、周汉成《瞿秋白在锡遗踪考辨》一文^③所说,秋白表姐夫秦耐铭的大妹秦振玉长得“极为秀美”,而且“与秋白感情颇好”;表姐曾有心让他们结亲,并且对婆婆(即耐铭、振玉的母亲)提过此事。1916年春节期间,秋白曾在表姐家“高高兴兴地和振玉等人玩过‘掷状元筹’的游戏”。这件轶事也发生于秋白17岁时,当也属于“亦即亦离的恋爱”。

①《瞿秋白研究》5。

②《瞿秋白研究》3,第339页。

③《瞿秋白研究》6。

“梦可”王剑虹与“安琪儿”丁玲

1 秋白就义前约 20 多天，在狱中写过一份《记忆中的日期表》，只有两个印刷页，里面记的都是他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人和事及有关日期。其中有两项是关于王剑虹的：

一九二四 一月 与王剑虹结婚
 七月 剑虹死

差不多同时，也是在狱中写的《未成稿目录》里《痕迹》的“上海”部分，列有《丁玲和他》一题。“他”，就是指他爱恋至烈的第一个妻子王剑虹。他们有过最热烈、最深挚、最纯美、诗一样的爱，然而，太不幸了，结婚才半年，剑虹就溘然而逝。丁玲，就是写《韦护》、《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小说的著名作家，他早年叫蒋冰之，又叫丁冰之，是王剑虹的同

学、好友,1923年起也成了瞿秋白的好友。王剑虹和丁玲曾在秋白的生活里占着很重要的位置,而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内心深处还被与她们有关的纯真美尚的感情牵系着、渗透着。秋白曾准备以《丁玲和他》为题写成文章,作为计划中的《痕迹》一书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也把她们两人一起写。当时,尤其是1921年至1924年,王剑虹和丁玲几乎一直在一起,1923年夏天起与瞿秋白的爱情或友谊又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分开写倒要多费些笔墨。

2 1923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召开,瞿秋白参与领导。会议期间,秋白由柯庆施和施存统介绍认识了在南京过着游荡工读生活的王剑虹和丁玲。五个人结伴同游灵谷寺等名胜。王、丁一见面就喜欢上了秋白。王剑虹没留下印象记之类的文字,只以后来很快地与秋白恋爱结婚的事实证明了最初是一见钟情的。丁玲则在后来写下了小说《韦护》和《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等一些文章。1929年发表的《韦护》就是以秋白和剑虹为书中男女主角的原型来创作的。“韦护”二字就是秋白的一个别名。此二字又是佛经中韦陀菩萨的名字,秋白也曾以“维陀”为笔名。韦陀菩萨疾恶如仇,见人间不平就生气,所以他的塑像总是面朝着如来佛,让他不看“生”面,只看佛面。小说《韦护》自然有“虚构”,但其纪实性很强,有许多地方大致上就是秋白、剑虹生活和心理的实写,丁玲自己的感受也很生动地抒写了出来。《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虽是约半个多世纪后回忆之作,却由于作者是那么熟悉秋白和剑虹,仍然写得相当细致真切,又由于是“回忆”而非小说,这篇文章成了研究秋白与剑虹恋情的极其重要的资料。

王剑虹和丁玲初识秋白时的情形怎样呢？丁玲描述道：同来的三位男友中，柯庆施是老熟人，被叫作“柯怪”，她们没有感到他想追求谁，也不喜欢他；施存统是“好人”，他早就把她们的的好友王一知找去结婚生了女儿，曾在她们“平静的生活中吹起一片微波”；“新朋友”瞿秋白和前二位大不相同。怎样的不同呢？丁玲在半个多世纪后还忆述得出他当时“惹人高兴”的声色眼神：

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

王剑虹和丁玲都是受过五四大潮洗礼的新女性，当时剑虹21岁，丁玲才19岁，但是她们在前此的两年中已经有了在上海、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在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指导下参加妇女运动的经历了，也有了当女工、当家庭教师、当佣人、当卖花女的经历了。她们有美好的理想、热烈的追求，正在寻找真理、寻路闯路，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崇尚“自由”，她们要“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狱”。她们大约是两个月前到南京来“遨游”的，“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如果能买两角钱一尺布做衣服的话，也只肯买一角钱一尺的布……没有买过鱼肉，也没有尝过冰淇淋，去哪里都是徒步，把省下的钱全买了书……生活得很有兴趣，很有生气”。她们的这种情形与秋白同样年岁时“总要突破范围”的心态和艰苦生活的特点也是有些相似之处的。不过1923年的秋白已经是远比她们成熟的革命者了，在她们心目中，他一方面是机智幽默、英俊潇洒、很有风度的男友，一方面也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她们认识了秋白，立刻像迸飞的火红铁花被电磁石吸住一

样,听他讲新俄国、讲社会、讲文学,“都听迷了”。

王剑虹和丁玲两人,大致是同一类型的少女。丁玲一辈子都深深地记着秋白讲过她的一句话:“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剑虹其实更是如此。她们对于革命,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真理也总是像飞蛾向着光明那样“扑”上去,“非死不止”。她们又都酷爱文学,这又是和秋白共同的突出特点。在南京最初接触时,当秋白知道她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多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在心灵上、感情上相通了、相得了。两个少女之间的不同是丁玲更天真烂漫,情绪比较外显,剑虹则在情感上比较内隐;丁玲在生活行为上更倾向于“自由”的“飞翔”,剑虹则因年长两岁,读的书多一些,有过当学生运动“领头人物”的经历,在上海和革命者们的接触、做妇运工作的经历也比丁玲多一些,所以更“有思想”,当时比丁玲深沉一些。但当时,她们却共同地在“东流西荡”,要“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秋白一面“抱着极大的兴趣”听她们讲“遨游”或“流荡”的经历,赞赏她们的热诚追求和自由意志;一面引导她们,鼓励她们到他正创办的上海大学文学系,并且保证可以让她们“自由听课,自由选择”。秋白回上海不几天,剑虹和丁玲就结束了她们在南京的“遨游”,被秋白的精神场、情感场吸引到了上海大学。

3 剑虹和丁玲之所以能与秋白交为好友,也有身世方面的原因,尽管他们各有具体情形,却都有和秋白身世相近似的地方。

王剑虹原名叫王淑璠,出生在四川酉阳地区的龙潭镇(今属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一个绅士、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王普山(王勃山)是个智识者,很有传统文化素养,既有医学医术

的专长,又通文学尤其是诗词,曾参加同盟会,民国初期当过国会议员,后来担任过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革命政府的职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等职。剑虹也和秋白一样经历过家庭悲剧,秋白是17岁丧母,她是12岁丧母。秋白有一弟一妹在几岁时夭折,剑虹的姐姐也在很小时死去。她父亲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因而剑虹幼时就读过私塾,后入高等小学,少年时代随父在湖南度过。1916年考进湖南桃源二女师。五四运动时,她是二女师学生领袖。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透辟的言论使顽固派瞠目结舌,而激起同学们的热情,引起雷鸣般的掌声。丁玲当时感到剑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这种情形、这种风格也同秋白有近似之处。1920年她来到上海,从龚自珍“万·禅关若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的诗句(《夜坐》)取“剑虹”二字为名,不再用“淑璠”之名。起初,他父亲通过朋友谢持把她介绍到黄兴夫人徐宗汉主持的中华女界联合会工作。在这里,她认识了徐宗汉的秘书即李达夫人王会悟,认识了李达、陈独秀等。1921年参与创办《妇女声》杂志和平民女校。她在《妇女声》既做编辑又写稿,发表过新诗《轮舟晚景》(第八期)和《节制生育与保持恋爱》(第九期)等文章。在平民女校,她既做学生(听过陈独秀、李达、沈雁冰、邵力子、陈望道等人讲课),又到社会上去做妇女运动工作和其他革命工作,如背着竹筒沿街为罢工工人募捐,到工人中去讲演等。^①她和高君曼(陈独秀夫人)、王一知、杨之华、丁玲等总共23名学生,都是这样一而受教育、一而做社会工作的,活动范围远不限于学校。平民女校是1922年2月10日正式开学的,剑虹就是在这个日子之前的寒假里即春节期间回到湖南,从常德把丁玲找来,

^①丁玲:《我景仰的邵力子先生》。

一同进平民女校。去找丁玲时,她还帮助丁玲进行了一场“反封建、反豪绅”的斗争。丁玲回忆说:

1922年春节后,我母亲找我三舅商谈,解除了我和我表哥的旧式婚约。……三舅父却找岔子……对我提出严厉的指责。……我感到非常委屈……顶撞了他。三舅父大发雷霆……对我大声叱骂。我自然不甘示弱……说完我就拿了一床铺盖离开他家(我和母亲原借住在他家,自理伙食)……接着我果然写了一篇文章,揭露我三舅是豪绅恶霸……拿到常德县出版的《民国日报》……但他们不愿登载。我和好友王剑虹以一种小孩子的天真想法威胁他们,说我们即将去上海,要把这篇文章投给上海《民国日报》,还要告发他们,说他们与豪绅勾结,压制青年……后来,他们登载了这篇文章,只是我三舅的名字用了三个×,我的名字用了△△△,我胜利了。

在平民女校一年多之后,她们渐渐不满意了,才跑到南京去闯荡。

丁玲,于1904年出生于湖南临沅县,祖父做过大官,父亲早丧,四岁便跟着当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1918年考入湖南桃源“二女师”预科,与剑虹同校读书,所以知道剑虹1919年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她自己呢,虽还不满15岁,也“被卷进了这股革命的浪潮”。她说:

我在长期孤苦伶仃的童年中感受到旧社会、旧时代所加于我的歧视和压迫,使我常常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愁绪,尽管我还很天真、幼稚、简单、无知,……谈不到理解,可是五四运动突然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在黑暗中发现了一线光明……随着高班的大同学,一同冲出校门,上街游行,大声疾呼,要唤醒民众,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要求男女

平等,婚姻自由;我们创办夜校,在工农群众中扫除文盲……追求新知识、新理论。^①

从王剑虹和丁玲的家世、教养、经历和精神状态看,她们引起秋白特别的注意,多有情感的沟通,是毫不奇怪的。

4 秋白与剑虹、丁玲更多更深的交往和思想感情交流是在上海大学。

剑虹和丁玲都很喜欢上海大学。喜欢的原因很多,但这种喜欢显然是和秋白这位“最好的教员”密切联系着的。秋白非常忙,却几乎每天都要到她们的小亭子间来。他教社会学、哲学课,却并不同他们讲哲学,而只讲文学,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托尔斯泰、普希金、唐宋元明清的文学都讲。他也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讲死人也讲活人,和她们“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他教她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用诗来教俄文,以诗的优美使她们对于拼音、生词、文法、用词特点等“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大约一两个月吧,她们两个人更加酷爱文学,也似乎都离不开秋白了。

这时,施存统也发现秋白“变”了,问他,“他说确实堕入恋爱里了,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说”。丁玲把施存统的话告诉王剑虹,王剑虹“却是一片沉默”,而且决计要离开上海大学回四川去。丁玲问其故,她只苦苦一笑,以至于“甩开”了丁玲。她们之间本来从无“秘密”,这时却不同了,关系变得别扭了。也许如丁玲所说,王剑虹虽在心里“热烈地爱着秋白”,但似乎难以断定秋白是否也爱她,又由于“她是一个深刻的人”,“自尊心极强”,宁

^①《和平老人邵力子》,第69页。

可“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息”,也“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也许是王剑虹以为好友丁玲也爱秋白,自己想躲开吧?丁玲有热情外显的特点,秋白又比较善于隐蔽内心真相,王剑虹发生误解也并非不可能。但王剑虹没有留下来有关的说法,秋白也不大可能就此说什么,所以,我们还只能按丁玲的回忆去研究他们的关系,去体会她们两人发生别扭的情形。

秋白再来找她们的时候,丁玲突然发起“怒火”来了:“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秋白毫不介意,下次见到了丁玲时,他好像未曾经过丁玲的那场“风暴”似的。丁玲后来有对那“风暴”的解释:“完全是无意识和无知的顽皮”,自己“傻”到对王剑虹的“变化”竟毫无感觉,直到偶然发现王剑虹藏在垫被底下的诗,才大吃一惊,才知道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丁玲先不让王剑虹知道,就把剑虹的诗拿去找秋白,“无声地”递给他。丁玲后来说,当时她把剑虹的诗拿去给秋白,完全为着帮助剑虹、“救援”剑虹;可又说,至于他们该不该恋爱,会不会恋爱,能否和谐幸福,她脑子里没有生出一点点怀疑。丁玲半个多世纪之后写的回忆文章,也许对当时的情形不能那么完全和准确地反映出来。她向秋白发“怒火”,她把王剑虹的诗“无声地”交给秋白时的心理活动也许还稍微复杂一些吧?把剑虹的诗送给秋白是在秋白的住室,她曾留下这样的印象:

以我的生活水平来看,的确是讲究的,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得几摞线装书。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了一层温柔的微光。

秋白看毕剑虹的诗,对丁玲的“帮助”当面表示“谢谢”,就去找剑虹了。爱神丘比特的箭射中的是秋白和剑虹的心。

初恋的微妙雾纱揭去,到来的是热恋的火焰和结合的熔融。秋白、剑虹二人在热恋中天天写诗,一篇又一篇,秋白还把二人共同读的历代名家诗词中最喜爱的句子刻在各种各样精致的小石块上。他们在共同醉心的文学之中酬唱,任情滋长,尽兴发挥。他们的火样的热情、海样的深情形成“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

丁玲说,秋白也写过一首诗给她,说她是“安琪儿”,有赤子之心,感谢她对他们恋爱的帮助。

秋白当时由于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往返广州上海之间。在广州时,“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结婚前夕,1923年12月底的信中,秋白有诗曰:

万郊怒绿斗寒潮,
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
为衔春色上云梢。

诗里表现了他在恋爱中心态的一个方面:与革命形势高涨相应的高昂、兴奋、豪迈、进取。

他们爱得很深,很热烈,不得不分离时的信中表现得很充分,很突出。1924年1月8日,秋白在信中写道:

我已经第三天没有看见你,没有听见你,我实在无力支持了。这整整的一个月如何度过得去?!你的影儿刻刻的伴着我,你的声音,说那些不详的话的声音,时时萦绕着我。我心魂不定,如何是了!……我回来之后不能再离别了。

1月9日的信写道:

你驱策我的人格。

1月12日的信写道: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

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你……

1月15日的信写道：

我是一切为“你”啊。我领略到生命的意义了。我也满心的希望，然而，不是你的，我便不要。我要你的命令……你即使不命令，我也要想着“所做的事”都是你的意旨，——那时我才能安心去做；我是为“心”做的。

与炽热的爱相联系，分离之苦的感觉也特别强：

梦可！梦可！我叫你，你听不见，只能画几个“!!!”，可怜，可怜啊！

他称王剑虹“梦可”，是法文的音译，意思是“我的心”。

感情炽烈而复杂，理智还是清楚的：“爱恋未必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悒悒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1月12日信）

他们就是这样心系情牵，如此倾诉肺腑。爱恋之烈和分离之苦，的确都是“高尚的感觉”。他们的爱根植共同的美好理想，与“人类将来的希望”相联通：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啊。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1月13日信）

秋白认为两情深相爱恋所体现的“生命的意义”、“高尚的感觉”本应该是和理想的社会相统一、相调谐的。为了使他们相爱的生活与所从事的社会改造的事业、所走的革命道路相统一、相谐调，他很注意在这方而与剑虹沟通，增进共同心搏的协调。1月28日的信写道：

恋爱和社会的调和，——我不过抽象的说，——本是我一生的根本问题，我想他们本是调和的，我自己不敢信，要

问我的“心”，“心”若给我一个承认，我可以壮壮气往这条路上走去。自己的“心”都不肯给我作主，谁又作得主呢？

丁玲有一句话说到她和王剑虹的区别：“她（指王剑虹。——引者注）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王剑虹很可能在与秋白结婚后发生了这种心理倾向。在与秋白分离时，她因深爱秋白会感到孤独之苦，却又闷在心里，加上身体的病，很可能与秋白那种社会活动的热劲儿多少有了距离，也很可能与丁玲的那种总是“要飞”的特点难以相谐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就不会单以自己的需要去向秋白发什么“命令”；环境条件弱化了她自己在社会活动中“飞”的可能，秋白说“心”（当指剑虹）“不肯给我作主”的话，就很可能指的是剑虹在矛盾心态中听任秋白意志的态度。

瞿秋白不是那种简单的机械的思考者，他的理想（社会理想、事业理想）是和“爱”，和每个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相联系的。他在1924年1月23日致剑虹的信里有如下的诗句：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
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

有人，特别是“讨瞿”时候的“英雄”们，曾经把秋白致王剑虹的信翻出来乱批一通，“爱之囚奴”、“自由花魂”等，曾被加上许多可怕的罪名，甚至于“我的心”“吻”“没有爱便没有生命”等也被加上政治的大帽子，或被嘲笑。我们应该想到，他那时是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啊！想到他们是热恋中、新婚后的远别啊！爱，他们的爱，何罪之有？况且，秋白一直在为革命奔忙呢。

5 “要革命,但是不要恋爱,闹得革命先生和恋爱小姐打了三年零六个月的无头官司。”^① 这是瞿秋白后来论及“多余的人”时说的。其实,革命者也都会有恋爱与革命、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的矛盾,一般人也会有婚姻恋爱、家庭生活与别方面生活的不调谐而发生的心理矛盾。瞿秋白与王剑虹恋爱结婚以至王剑虹生病早丧过程也毫不奇怪地发生了这类生活矛盾和心理矛盾,但他们发生了那样的悲剧,倒实在太令人扼腕痛惜。瞿秋白那段时间的公事太忙了,矛盾的诸方在什么时候谁该服从谁,有无更好的方法处理的问题暂且不论,就从实际情形来看他们“幸福”、悲辛和心理态势起伏演化的规律吧。

从1923年10月初瞿秋白就为国共合作等事往返奔波于沪粤之间,那时他们已在初恋中;11月下旬正当热恋时,他必须去参加11月24日开始的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12月写“江南第一燕”时他也在广州,那已是他们结婚前夕了;1924年1月,刚结婚他又须奔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接着出席中共三届二次执委会;2月有16日的信、28日的信证明他至少在3月初还在广州。大约从春天王剑虹已显病状,但秋白即使在回到上海时仍须参加各种会议,忙着做“上大”的事,随时当翻译,没能一直陪伴照顾生病的妻子。5月份,王剑虹病已重,他还不得不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反映在信里,婚后一个多月,2月16日的信已经隐约说到死了。秋白说:“我做事时总是做梦似的——时时刻刻晃着你的影子……没有你,我怎能活?……(中略)将来没有你便又怎样呢?我希望我比你先没有……”看来大约是王剑虹因病因离别而说到了死;瞿秋白的心殷殷地时时牵挂着她,然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426页。

而未免开始闪现不祥的阴影了。2月28日的信在“承认是‘爱之囚奴’”的同时,说到“苦得很”,而且说:“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①看来所谓“人生问题”一定涉及家庭、爱与社会角色的关系了。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册所收《失题》、《寄××》二诗,也和王剑虹有关,表现了与她在婚恋中的心理纠葛。“何劳你咏风弄月”,“何必再踌躇踟蹰”^②似乎都是在心理矛盾时的自警自励之心声。“一个是浪漫世界中的豪客,一个是情天万劫里的皇冠;一个撤废了一切藩篱,一个却还尽着痴憨;这期间数不清的泪珠儿”,在“汗和血”的“锻炼”中,“偶然间凉透了晓风残月”,竟然是“鼙鼓声中哀弦急”而“不堪回忆”,“到如今说什么忏悔悲哀:牺牲的是牺牲了,徘徊的还是徘徊”——这当是某悲剧发生后的诗。“情天使者”和“过去的心儿之神”,与“炎炎的红日,普照的光明”之憧憬相交会相矛盾时,如何“成就这整个儿的生命”呢?^③当时自然已有正确方向,但那复杂的内而世界仍存在着。

6 丁玲回忆瞿秋白夫妇新婚阶段^④,他们三人在慕尔鸣路寓所一同生活、畅谈文学的情形是美的:小屋里有只小炉子,“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三个人“总是把电灯关了,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屋子里的气氛也美极了……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

①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第196页。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第369页。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第370~371页。

④《丁玲写作生涯》,第141~146页。

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然而，丁玲渐渐感觉到王剑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不能“飞”了，“将沉沦在爱情之中”。这也许有很真实的一面，但王剑虹的病是事实，病中又常常与秋白分离，“人去楼空”的情形，不仅“凉透了晓风残月”，而且连求医治病、生活起居也难！

就心情而论，丁玲以她自己眼中的秋白夫妇的“甜蜜”生活反观乎己，“感到寂寞”，“深感惆怅”，因而“厌倦”了慕尔鸣路，“厌倦”了上海大学，都是可以理解的；就个人行为而论，她为“新的梦想”而“飞向北京”，离开上大，离开秋白夫妇，的确“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别人不应非议。然而，三人之间的不愉快发生了：丁玲离去时，秋白夫妇都没有送，都“沉默”着，连房门也不出，丁玲的感觉是“死一样的空气”留在身后，心里想的是“珍贵的剑虹，我今弃你而去”。丁玲也许真不知道王剑虹的病情之重，她还“感受到心灵的创伤”呢；王剑虹当是受心的创伤更重的。丁玲在暑假将到的时候离沪，王剑虹在7月上旬就离世了，相隔大约只有半个多月吧。这悲剧对于瞿秋白则是一生都留着心灵创伤的。他写给丁玲的信里“总是”说“对不起”王剑虹，“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他一直深爱王剑虹，她相信王剑虹“了解”他。他丝毫没有想冷落她，倒总是急切地渴盼着和她在一起，而且“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①。他后来“责骂自己”仍然是因为爱她却由于自己被“形格势禁”地逼在政治活动上和其他社会事务中，实际上冷落了她。《寄××》中的诗句也许是他当时心灵里真实而强烈的活动：“同样是历史的误会，同样是时代的牺牲。沧海中的

^①杨之华：《忆秋白》，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19页。

波涛,沉溺了几多个性!”

丁玲后来写了《梦珂》,又写了《韦护》,都带有纪实性。她说写《韦护》时对瞿秋白的“矛盾”“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但当时又“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然而,由于曾与秋白有其多的接触,写得的确很切近。韦护向丽佳说:

我相信你是比其他一切人都能了解我的。当你听我述完我幼时的困苦,和我母亲的自杀之后,你抱着我,为我的过去嘤嘤啜泣的时候……我能得一点爱,即使只有你所给我的百分之一,我一定也满足了我的梦想,可是……我却在未得爱情以前,接受了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这将我全盘变了……我竟遇着了你,你喊醒了我曾有过的,和未敢梦想的一切热求。于是争斗开始了,一面站在我不可动摇的工作上,一面站在我生命的自然需要上……真是你的不幸,你为什么爱我呢?……多么可惜啊!你没有看出我的怯懦来。你没有一丝一毫想从我工作上取得胜利。于是终究造成了我们的爱情的不可弥补的悲剧。

瞿秋白后来在《多余的话》里曾讲自己性格中的“怯懦”,那主要是指在对共产国际和党内居统治地位的错误倾向曾“忍耐,躲避”;恋爱时也许早已向王剑虹和丁玲讲过自己“怯懦”,然而那主要是指如果王剑虹用爱情的强力硬把他拉在身边,他倒是很可能就范的,因为他也爱得至烈。王剑虹没有那样做,因为她也不是具有那种性格的人。这样倒造成了“悲剧”。

王剑虹的早丧留给瞿秋白的心灵创伤持久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但实际生活上的悲惨境况,他很快就改变了,精神情绪也迅速从悲哀中解脱。其原因除了丁玲在《韦护》中写的他在其“不可动摇的工作上”持之以恒的精神,还有杨之华的爱。

7 丁玲离开上海大学之后,秋白除了曾有许多信给她(她称为“谜似的来信”)之外,1924年冬还乘去北京开会的机会看望过丁玲,在学校门房等了“足有两个钟头”却没见着,留了地址约她去看他。丁玲去旅馆看秋白,希望听到秋白谈“剑虹的一切”,可是她没等秋白回来就告辞了,原因是秋白之弟云白把杨之华的照片“高兴地拿给”她看。丁玲早认识杨之华,她后来写道:“一见这张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没有兴趣打听剑虹的情况了,不等秋白回来,我就同云白告辞回学校了。”^① 情感这东西,有时复杂得难说清楚。

1930年秋白读了丁玲的小说《韦护》,写信给她的时候,“信末署赫然两个字‘韦护’”。丁玲说:“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

1931年,丁玲主编“左联”刊物《北斗》,因受严重政治打击而回到文艺界的秋白用“司马今”笔名在《北斗》发表总题为《乱弹》的文章和翻译剧本《解放了的董吉歌德》。这时正值丁玲的丈夫胡也频烈士牺牲后不久,秋白与丁玲重逢时的心情都是很沉重的。她后来回忆道:

我在鲁迅家里遇见秋白一次,之华同志也在坐。……生活中的突变,使我的许多细腻感情都变得麻木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完全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谈话。……他似乎只是在我提供的话题范围之内同我交谈。我对他的生活,似乎是漠不关心的。他对我的遭遇应该有所同情,但他也噤若寒蝉,不愿触动我一丝丝伤痛的琴

^①《丁玲写作生涯》,第147页。

弦。

1932年春,在丁玲等人的入党仪式上,他们又见了一次。丁玲后来说:“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的、赫然使我惊讶的却是瞿秋白……秋白讲了话,只是一般的鼓励。”丁玲的入党仪式,秋白很可能是自己要求来参加的。这时,他会想到曾有的“飞蛾扑火”之语吧?会想到丁玲的作品《韦护》吧?会想到十年的友谊吧?他们未料得,这一次便是他们的永诀!当丁玲被囚于南京国民党监狱时,1935年6月,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被杀害了。

就义前,当记者来访问时,秋白谈到丁玲,说:“丁玲原为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有一爱人与之甚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子脾气,尝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亦未强之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可读。”这文字虽出于记者笔下,确实很像秋白言语的实录,虽仅数语,却将丁玲画得很像,而言外的情感,熟悉他们的人也是能体会得到的。巧妙地保护丁玲,也是这情感的一种表现。

“最亲爱”的“生命的伴侣”

1

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朗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樯，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①

这是秋白 1929 年 7 月 15 日致杨之华信中的一段。他们夫妻就是这样的一双爱侣，秋白对杨之华的感情就是这样

^①《瞿秋白研究》7，第 9 页。

的深切、美尚。

“六年以来”，指他们相爱、结婚已有6个年头。6年前，1924年7月，正是秋白心灵里“哀弦”急响的时候，他的爱妻王剑虹才22岁竟溘然逝去。在他精神创痛最重的时候，是杨之华以爱的热力使他凄凉的心复苏、回暖。四个月后，1924年11月27日起上海《民国日报》连续几天刊登过三则轰动一时的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恋爱”在当时是时兴的说法，在这启事里则带有微妙意味。按一般人的概念，沈杨“脱离”的是婚姻关系，瞿杨从11月18日算是正式结婚，而瞿杨“恋爱”实际上则更早。

瞿秋白在《记忆中的日期》表里说“十一月七日与杨之华结婚于沪”，有人以“启事”来证其“误”。其实，不必这么拘泥。查《记忆中的日期》所记之事大抵只写出年月，而只有生日、“八七”会议、“被开除政治局委员”等几处记着日子，与杨结婚日是其中之一。看来都是绝对有把握的。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一般人也许不一定在意，瞿秋白则不大可能误记。他亲笔写下的这个日子，很可能是他们实际上已经结合的时间。杨之华的回忆也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我和秋白结了婚。”^①

^①《回忆秋白》，第14页。

启事上所写的日子用的说法是“正式”，这当是因为瞿秋白、杨之华已经定情之后才共同与沈剑龙谈妥离婚之事的。瞿、杨到浙江萧山找到沈剑龙，三个人竟然谈了起来，决定一对离，一对合，而瞿沈结友。这决定的日子大约就是11月18日。一般的中国人至今恐怕都无法理解他们三个人的这种行为方式。然而这是事实，是当时的新潮青年浪漫的、崇尚个性解放的自由“恋爱”，而且是被传为美谈的。启事看来都出自瞿秋白手笔，美事能如此发展，关键却在杨之华。

2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县坎山街三岔路，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的名美人。幼名小华，杏花。幼时曾在家塾读书，不拘旧俗，反抗缠足等，追求自由；后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想做一个教员，对社会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五四”大潮更使她“睁开了眼睛”，不仅更加开放地追求个性的发展，追求时尚，敢于在旧文化氛围还比较浓重的家乡剪掉长发，以至于上街骑自行车、下水游泳，引起轰动；而且“第一次接触了政治”，受到《星期评论》等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她听说《星期评论》要组织青年到新俄学习，就到上海来了，但没能去，就留在该杂志社工作。1921年春，该社被封闭，她回家乡“与浙江第一师范的进步青年宣中华等办农村小学，做农民工作”。^①

杨之华在21岁时与沈剑龙自由恋爱并结婚，既没带嫁妆，也没坐轿，只穿一身粉红色衣服去沈家。沈家也没设酒宴，全都不按旧礼俗办。沈剑龙之父沈玄庐是当时著名的新派人物，共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页。

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1921年与萧山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杨之华参加办农村小学，是沈玄庐请来的。沈还请了宣中华、徐白民等把衙前镇农民小学办成了农民运动的中心。1921年尾，李成虎被捕，杨之华、宣中华由于受了实际斗争的教育锻炼，都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杨之华与沈剑龙虽是恋爱结婚，又生了一女，但大约婚后不久就都觉得性格不合了，“就一心想摆脱家庭的束缚”了。1922年她又只身跑到上海，7月至11月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发表过《社交和恋爱》、《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离婚问题》、《谈女子职业》等文章，参加妇女运动，早就认识王会悟、向警予等，也认识王剑虹。杨之华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录取在社会学系，读书的同时在向警予领导下，与王一知等一起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工作。蔡和森、向警予夫妇，施存统、王一知夫妇，都是瞿秋白、王剑虹夫妇的熟人、同志。这样，杨之华就一面作为学生，一面作为做妇女运动工作的同志，和瞿秋白接近了。他们最早的直接交往是1924年春。杨之华后来回忆说：“我和秋白的初次见面，是一九二四年一月间”，“当我听秋白的课时……课堂里的气氛很活跃……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亲切地微笑着……他的神态从容，讲话的声音不高……”但她听人说秋白“骄傲”、“冷酷”，自己也从他平时的“严肃”、“很少讲话”觉得“似乎不大容易接近”。^①然而，工作提供了“接近”的机会，鲍罗廷（孙中山的苏联顾问）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不在上海，就指定杨之华去谈。杨之华后来回忆说：

在鲍罗廷家中，出乎意料地，我看到了秋白，原来他是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第3-5页。

专为我们做翻译的。一见到他,我觉得有了依靠,心情就平静下来了……谈话的气氛又十分亲切友好……秋白满意地微笑着,仔细听我说话……最后,秋白又把鲍罗廷夫人介绍的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翻译给我听,唯恐我理解不了,还给我详细地解释……^①

后来,越来越熟悉,瞿秋白成了杨之华的人党介绍人。“一个春光明媚的晴天”,秋白约她谈入党问题,几天以后,上海大学党支部就接收她入党了。从她几十年后的回忆仍然能微细地映出第一印象,仍然漾起与当时类似的激动心情来透视其心理,是可以说她最初就既敬佩又爱慕秋白了。

这爱也许只能藏在心里吧,因为当时瞿秋白与王剑虹新婚,爱恋正热。但瞿秋白与杨之华,由这样的师生关系、介绍人和新党员的关系、上下级和朋友的关系,加上身世、经历、性格、追求、事业上的许多相近相通和一致之处,再加上一个貌美出众,一个才华横溢、风度潇洒,他们在后来发展为恋爱关系是很自然的事。

结婚后,他们一直是彼此深深相爱、心心相印、情融意洽的夫妻,更是为革命事业同奋斗、共患难的夫妻。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的《多余的话》中有一段说: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中略)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弱,使我对于她终究没有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第5页。

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这是深情的令人心碎的告别,也完全是为其爱妻着想的告别。所谓“没有彻底的坦白”是指《多余的话》里所写的某些思想并没有向杨之华讲过。他预料自己在狱中特殊环境以曲折含蓄的特殊文笔写成的《多余的话》会被误解和曲解,造成死后的灾殃,才那么说的。他所说的是真情实话,也是对杨之华的一种保护。他的狱中诗《忆内》(集唐人句)则是既有深情又寄希望的绝唱:

夜思千重恋旧游,
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问当年事,
海燕飞时独倚楼。

“夜思千重”,其关切之情深可知;“海燕飞”,则是基于对共同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而希望所至爱的人继续奋“飞”。这同他们从恋爱结婚到十年共同生活的崇高精神境界仍然是一致的。

3 秋白在狱中拟的一份《未成稿目录》中《痕迹》部分有一题《“生命的伴侣”》,显然是由于深深的感念杨之华对他的爱,深深地怀恋他这位患难与共的妻子,而要以专文来写她,来写他们共同生活的历程,写他们“最亲爱的”关系的。秋白曾以一枚金别针赠给之华,他亲自在别针上刻下“赠给我生命的伴侣”八个字(这别针现在存于常州瞿秋白纪念馆)。《未成稿目录》中的《“生命的伴侣”》一题与以前所赠之物上亲自镌刻的话相一致,虽然文章没写成,他的至诚和深情却永留杨之华心中,也永远值得后人感念。他们的爱是生死不渝的爱,是两个高尚生命融一的爱。

他们结婚后,杨之华非常想把她和前夫生的才三岁的女儿

接到身边。母子连心啊,在杨之华,这是很自然的心情,很合理的要求。但是,由于离婚的纠葛,自然也由于沈家老一辈人舍不得小孙女儿离开,开始一段时间是反对杨之华带女儿的。这使得之华很难过,很不安。“秋白很能理解这种母亲的心情”,“想尽一切来安慰”之华,还写了一首长诗给她,其中表达了要和她一起爱护和培养女儿。即使工作非常繁忙,秋白仍抽时间和杨之华一起从上海到浙江萧山去,想尽办法要使杨之华与女儿在一起。杨之华后来写道:“我感到秋白是如此细腻深刻地了解我。”^① 后来他们终于把女儿接到身边。

他们之间的爱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革命感情、共同的奋斗精神上。他们相互鼓舞,相互支持。他们结婚不久,在大革命的风暴中,敌我斗争激化起来,环境危险起来。秋白被敌人通缉,转入“地下”,杨之华冒着危险保护他,做他的秘密联系人之一。杨之华常常穿着女工服装,走遍杨树浦的纱厂、烟厂、丝厂,办工人夜校,很艰苦,但生气勃勃。秋白最喜欢她穿女工衣裤和布鞋的样子,赞赏她那种工作精神,曾说:“我们的爱就建筑在这里。”^② 秋白总是“很有兴趣”地听她讲工作中所见的各种情况,给予她多种帮助,帮她编夜校课本,帮她学习理论,有时“指定一些参考书,指明有关段落”,还“每天在本子上写好简要的通俗解答”。^③ 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他们曾分别参与向孙中山上书的签名,联手与戴季陶、叶楚伦等较量。1927年中共“五大”前后,他们在武汉安了个“家”,在复杂紧张的斗争中,两个人都很忙(杨之华在“五大”上也被选为中央委员),但生活仍很和谐。秋白爱听京戏,自己也学谭鑫培、刘鸿声的韵调低

①杨之华:《忆秋白》,《瞿秋白写作生涯》,第106~107页。

②《忆秋白》,第31页。

③《回忆秋白》,第41页。

唱《金沙滩》等，杨之华往往笑着说：别唱了，别唱了，观众嚷着要退票了。秋白也笑着说：退归退，总比蒋光头只会哼“想起了当年事”那儿句好多了。有一次说起刻图章，他对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之华听了笑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二方更妥贴简便些。”后来，他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向警予来秋白家与杨之华对坐着绕绒线，谈到恽代英、张太雷都是常州人，就对秋白说：“你们常州出人才。”之华开玩笑说：“出人才不见得，出‘乱臣贼子’倒是事实。”^①“乱臣贼子”自然是幽默的反语借代，指现在正闹革命的秋白等。

1928年，他们一起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然后留在苏联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这两年虽然革命工作方面仍旧处在各种矛盾中，心境也有许多不安静的时候，但在他们的家庭生活史上却是一家三口最安定、最幸福的一段了。秋白自然还是忙碌得很，常常连续工作很久而不休息，面带倦容。庄东晓回忆说：

（秋白）需要休息时，华姐在旁就说几句诙谐风趣的话，或者叫秋白放下笔去做点什么，调剂调剂。有一次我和潘家辰同志去看他们，寒暄了几句，秋白又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了。华姐向我递了个眼色，笑着说：“有个人连脸都懒得洗，洗手也只洗手心，连手背都不洗，这个人更不喜欢搞卫生，房子里有气味，他就洒点香水，你们猜这个人是谁？”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秋白也只好放下笔，同我们一起说笑，这才

^①见《瞿秋白研究》1，第396～397页。

稍得一点休息。^①

这是中共“六大”结束之后不久的事。星期天，他们一同到莫斯科郊外的儿童院去看女儿独伊，高高兴兴地带她玩一天。后来秋白曾经短期离开莫斯科到别处工作，还有段时间因病弱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曾经到海滨疗养。还有，杨之华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就有些书信，特别是秋白的信，留下了当时的心影。可惜保存下来的太少了。如1929年3月12日的信里有如下的话：

之华，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之华，我要吻你，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②

“文革”中有人写“讨瞿”文章时曾抓住个别字句“上纲”说，“叛徒”瞿秋白还有“资产阶级爱情至上”主义之“罪”。其实，在同一封信里就有因杰出的革命家苏兆征之死而极其悲恸的心情表达，还写着“一切人的市侩式的幸福都是可鄙的”的话。从前面所引的表示对妻子的爱“像火山的喷烈”那段话里看，他的爱、他们共勉“保重”，也同时是“党的……同志”之爱啊，是想着继续去承担“早”逝的老同志的革命工作啊！况且，他是在给爱妻写信，即便全是爱语，又有什么不好呢？他们热烈真诚的夫妻情爱何罪之有？

1929年2月26日，秋白在致杨之华的信中说：“你的信，是如此之甜蜜，我像饮了醇酒一样”，“想快些快些见着你”，“我……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

①《回忆杨之华》，第40页。

②《瞿秋白研究》7，第8页。

划,想着……如何的帮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要睡了,要梦见你”。^① 在别的信里,如1929年2月28日的信里,还“念念”地计划着“如何的弄好生活的秩序”,想着“怎样……创造新的生活方法,怎样养成健全的身体和精神”,如何使之华和独伊快乐幸福。他把爱情放在事业中,说个人应与“巨大的历史的机器”达到“互相融洽”,形成“伟大的力量”,朝着理想境界“转动”前进。

秋白受到宗派集团的排挤、打击、迫害,杨之华也被株连,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从这时起,特别是1931年至1933年,他们的爱情也经受着考验。有的女同志,因丈夫受批判、受打击也跟着倒楣时,受到巨大压力,退缩了,和丈夫分居,离婚了。杨之华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非常熟悉杨之华的周晔写了一段话,比较真实地说出了杨之华对秋白的爱的特点。

(她)却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像这时候这样爱秋白。以前,她倾心于他的才华和翩翩的风度。这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秋白的肺病从来没有痊愈过,这时又吐起血来,面目浮肿着;被撤职,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还哪里施展他的才能?但是,之华更爱他了。这究竟为什么?因为她坚信秋白不是应当受审判的人!为了革命的利益,秋白是在忍辱负重,委屈求全啊!^②

在那几年里,杨之华尽力把家里的事做得更好,尽量照顾好秋白,在翻译和写作等事情上,也尽力协助他。这主要是30年代在上海的事了。那时环境非常艰危,内部的迫害和敌人的追捕同时临头,如果不是夫妻俩携手相伴、相濡以沫,更不知将如

①《瞿秋白研究》7,第5-6页。

②《回忆杨之华》,第75页。

何度日呢。

在精神上,在学习和工作上,秋白对之华关心和帮助更比以前有增。秋白觉察之华的委屈情绪和要求工作的心情时,就宽慰和鼓励她说:“革命需要我们做的工作多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会独立工作,要自觉地、主动地寻找合适的工作去做。”他引导之华读书、学习俄文,鼓励她翻译文学作品,鼓励她把所熟悉的工人生活写成小说。她的第一篇小说《豆腐阿姐》(发表在《北斗》二卷二期)就是经秋白仔仔细细修改过的,两人还一同拿给鲁迅看过。绥拉菲摩维支的短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译文发表时署杨之华的笔名“文尹”,那也是秋白一字一句把着手教她翻译的,后来编入《瞿秋白文集》。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一文中说:“算是父亲的译文……也是可以的。”

在生活上,主要是杨之华照顾秋白。他们的经济收入很微薄,组织每月给他们的生活费是每人15元,如果不是鲁迅送来些稿费,如果不是杨之华把家务担起来,生活很难维持,秋白更没钱看病。为了节省开支,杨之华“把一切家务都担当起来:买菜、烧饭、洗衣,天不亮就起来倒马桶。她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计算着,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为秋白治病。在敌人追捕中,住处又很不稳定,“已经记不起来这三年里搬过多少次家了”。^①

杨之华有段回忆说:

秋白久患肺病,身体很弱,但生活上是一点儿也不讲究的……甚至连吃药也要我经常提醒他。有一次,我看他很久没有吃过一点好菜了,就托邻居买到一只肥鸡,我高兴得不得了,尽心尽意地把它炖得稀烂,准备让他吃顿好饭。想不到晾衣服……竹竿碰翻了鸡锅子。我心疼得不得了,就

^①《回忆杨之华》,第75~76页。

一边收拾一边埋怨他没帮我晾衣服。他马上一声不响地帮我收拾,像哄孩子似的说:“算我已经吃了吧,应该高兴嘛。不要想它了,该读书和翻译了,把你昨天译好的拿给我改。”说得我心宽了。^①

杨之华总是把好的给秋白吃,吃鸡从来没吃过鸡腿。遇有“警报”,逃难时,她总是首先想到秋白的安全。有一次发现有特务盯她的梢,她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直到确信后面没有“尾巴”了才去找秋白。

秋白被调离上海到中央苏区,宗派主义者不允许杨之华与秋白同去。秋白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深深相爱的夫妻难舍难分,一方面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还有党内错误倾向居主导地位,形势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何时再与爱妻团聚难以预料。临行前那一整夜他都没睡。杨之华后来回忆说:

我醒来的时候总看见他还在整理着什么,或者轻轻地踱着步,或者坐着抽烟沉思。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就悄悄地走过来,拿着我买给他的十本墨漆布面的本子……把它们分成两半,对我说:“这五本是你的……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他又指着桌上的一叠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我还给你订了个半年的读书计划。”秋白实在是我最好的导师,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他始终帮助我学习,即使在他疲劳的时候,也一定要给我讲完课才休息。……他说:“……希望你快来,如有可能,书也带来。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相见……”我看出他在为我担心。……突然紧握我的手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第93~94页。

意料中事……”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深夜十一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①

盼着“重见”，然而，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4 秋白牺牲了。杨之华化悲痛为力量，坚毅地工作奋斗到最后一息。1935年，她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后留在苏联；1941年回国到新疆时被盛世才逮捕，在狱中领导同志们同反动派斗争；抗战胜利后出狱，担任中央妇委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参加上改；解放后历任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长，八届中央监察委员、候补常委。她在群众中一直有很高声望，做监察工作时被称为“包公”。

然而，光阴的流逝并不能冲淡她对秋白的记忆。有人问过她：“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丧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人重新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再结婚呢？”之华回答：“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在38年的时间里，她怀念、铭记着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的終了。^②

“文革”中，秋白墓被砸，杨之华亦遭诬陷，被“监护”（等于坐牢）了六年，“出来只呼吸了三天自由空气”，1973年10月20日就与世长辞！瞿独伊写道：“妈妈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③

①《回忆秋白》，第149~150页。

②③《回忆杨之华》，第72页、第163~164页。

一颗炽热的慈父的心

1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这是1929年3月15日瞿秋白在给杨之华的信里写的一首诗。《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编入了这首诗，编者注曰：“是赠其女儿独伊的”。杨之华早在写《忆秋白》一文述及秋白对独伊的爱时就引用过这首诗，不过她只是说“秋白还写过这样一首诗”，并没说是赠给独伊

的。瞿独伊 1980 年发表的《怀念父亲》一文也引用这首诗,说是“后来,母亲给我看过我小时候父亲写给我的一首诗”。杨之华和文集编注者都没有解释诗的内容,唯独伊写道:“今天,每当读它的时候,我却感觉到了一颗炽热的慈父的心在跳动,鼓舞着我为祖国而更加努力工作。”^①

秋白写这首诗的时候,独伊才 7 岁。那时候他还有些信给小独伊,语句都是“儿童化”的,很好懂,对小独伊的爱洋溢于字里行间。例如:

独伊: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因为你想着: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画独伊牵着一只兔子)

小独伊:

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来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见。

《小小的蓓蕾》诗却大不相同了,虽然“手迹”的第一行写着“好独伊,亲独伊!”但无论意蕴还是文字都是很深的。“含孕”“几多”“陈旧的死灰”“沙场”“血花”“赤化”“结晶”等等,决不是一个 7 岁的孩子能懂的,就是成人,要想真正明白诗的含蕴,恐怕也不是很容易的。直到如今,也没见到研究秋白的人来作比较详细的解释。我觉得这首诗至少不是写给当时的小独伊读的,秋白也许会想到独伊长大以后会读到,但写这诗的时候是在给妻子杨之华写信,想到小独伊,他就由小独伊的可爱引发了心海的波涛,流泻出“好独伊,亲独伊!”的呼语,诗情潮水般地涌动

^①见《瞿秋白写作生涯》,第 138 页。

起来,可爱的小独伊就化为“小小的蓓蕾”了。诗里所说是小独伊如同可爱的小“蓓蕾”,而由这可爱则引出了丰富深刻的内容:这是可爱的新“生命”,然而,她曾经“几乎”被“陈旧的死灰”淹没了“光明”,如果没有革命的大潮,没有“沙场”上革命斗士们的“血花灿烂”,没有父母辈的抗争、奋斗,“死灰”般的旧物(包括各种陈腐灰暗的原有社会关系和旧的精神文化)就可能把她“淹没”;这可爱的新“生命”,具体一些说,是“赤爱”(实际上当主要是指秋白自己与杨之华的“爱”,主要是革命情感相合的爱)的“新的结晶”,而不是“无意”中的赤化。秋白是用诗来说:已经并继续自觉造就朝着理想方向发展的可爱的新生命。独伊长大成人之后读这诗的直感是准确的,诗里是“跳动”着一颗炽热的慈父的心,这颗心深爱着“新”的“生命”的“光明”,期望着这“再生”的、出自“赤爱”的“新的结晶”——“小小的蓓蕾”,开出最美的花。这不单是对一个独伊的期望。独伊没有辜负父亲的爱和期望,她牢记这诗,承着父亲诗里的精神而生活和工作。

2 在叙述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时,我们已经提到独伊是之华与前夫所生的。但是,“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因为秋白“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①他对独伊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

大革命期间,瞿秋白和杨之华几经周折把独伊接到身边。幼小的独伊已经记得一些生活片段,加上杨之华常常说起秋白作为“好爸爸”对女儿的爱,在小独伊心里早就留下深刻印象。她后来写道:“母亲也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爸爸对我十分

^①杨之华:《忆秋白》,《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40页。

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①到莫斯科时独伊已7岁,印象更清晰了一些。她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享受着天伦之乐。”^②“妈妈很爱爸爸,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要我喊他‘好爸爸’……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③回国后“父亲对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感到高兴,而且总忘不了鼓励我。一次,父亲给我寄来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④杨之华回忆在苏联的情形说:“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秋白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独伊在伊凡城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去看她……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我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孩子也很高兴,拍手大笑。”^⑤

杨之华回忆中说的幼儿园,独伊称之为“森林营”,其实是当时苏联办的儿童学校。学校为了讲卫生,给孩子一律剃光头,女孩也得剃。独伊被剃了光头,作为女孩子,她非常不愉快,说像

①②③《瞿秋白写作生涯》,第137页、第138页,第139页。

④《秋之白华》,见《百科知识》1980年第3期。

⑤《忆秋白》,第211~212页。

个小和尚。秋白得知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她: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

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充满爱而又活泼风趣的信,使小独伊得到安慰,感到温暖,渐渐消除忧虑,安心在“森林营”学习了。

3 瞿秋白对独伊的爱,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的高尚人格的表现。

秋白在就义前夕写的《多余的话》中专门有一段写道: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在狱中所拟的《未成稿目录》中,他单列有一题:《独伊》。那自然是特别看重父女之情、特别对爱女寄予厚望的表现。但从《多余的话》把“女儿”与“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联系在一起说的情形来看,从他的“小小的蓓蕾”诗来看,他的爱是更深远、更广博的爱,他在给予独伊的深爱中寄托着对革命、对祖国、对世界的未来的希望。

有人说《多余的话》说到女儿时在“我的”二字上加了引号,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灵上的一抹阴影……两次结婚,都没留下后代……”我觉得不能这样去理解那个引号。秋白是个思虑非

常细腻的人,又是个十分崇真的人。独伊是他的养女而非亲生,这是事实,用引号表示出来,记下这层事实上的关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此其一;他对独伊一直付出百般的真情的爱,而说出“养父”“养女”关系,并且联系着对所有后一代“欣欣向荣的儿童”的爱和祝福,这是他真实而伟大的人格的表现,独伊和后人们会理解,而且更加敬爱他——这不是他主观上希求这种敬爱,而是说此事上的整个历史真实如此,独伊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他的女儿,敬爱他,继承他,便是证明,这是第二层;再者,他已预料到“死”和身后的灾殃,说出自己并无亲生女儿,这对独伊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此其三。杨之华给女儿起名叫“独伊”是决意只生这一个孩子,秋白同杨之华结婚时就只想到两人的“赤爱”,只想到共同为伟大的事业奋斗,在后来紧张艰险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显然也同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并不以个人有无子嗣后代为意的。况且,秋白有兄弟多人,即便想到(他未必去想)瞿家的后代,在说到女儿时,在他讲到对“非常美丽”的“世界”的爱和“留恋”时,在向一切孩子们“祝福”时,会因个人“没留下后代”而在心上出现“阴影”么?他心灵里的别处会有别的阴影——因为一个人总不是通体完全晶亮光明的——但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感到他那引号之下有阴影。

对小小“蓓蕾”的纯真深切的爱,对女儿独伊捧出的那颗“炽热的慈父的心”,对一切“新的”生命、“赤爱的新的结晶”、一切“欣欣向荣的”孩子们的博大深热的爱,是秋白高尚人格的、美好情感世界的最灿烂光彩的一方面。他在离开上海到苏区去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心思搅绕着他的精神的时候,他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女儿独伊,“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

独伊怎么样了呢?!’”^① 他的心始终这样牵系女儿,“我的亲爱的独伊”是他的情感最重要的所寄处之一。

^①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113页。

与《新社会》同人的情谊

1 在 1919 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进步青年主要是大学生们办起了许多刊物。有一份以“北京社会实进会”(又称“社会服务会”)名义刊行的杂志《新社会》旬刊于 1919 年 11 月 1 日印出创刊号,其《发刊词》宣告宗旨说:“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瞿秋白就是这《新社会》“主要的‘谋主’”(郑振铎语),而郑振铎正是另一个主要的“谋主”。他们和瞿世英、耿济之、王统照、许地山等都是 20 岁上下的朋友,以《新社会》为中心造成了一股与“五四”大潮相一致的改造社会的旋风,以至于被旧派看作“激进党”、“洪水猛兽”似

的，杂志出到第 19 期便被军阀政府查禁了。他们百折不挠，换了个《人道》月刊的名称，于 1920 年 8 月印出发行，又活跃起来。他们在这样的奋斗中结下了可贵的友谊。

瞿世英(1900—1976)，是秋白远房叔叔，又名菊农，当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教育家。早在 1923 年著名的“科玄论战”中已与胡适、丁文江等对阵，说“物质可以于某种限度限制我们的身体，却万不能侵犯着人格的活动。”(《人格与教育》)他当时和秋白关系很亲近，秋白赴俄归来之初仍有较多的联系，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一书里说他是秋白的“密友”。1923 年秋白自俄回北京后，除了在纯白家住，还常住在瞿菊农的家里，朝夕亲密相处。

耿济之(1898—1947)，名匡，上海人，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翻译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多种。1919 年至 1920 年间，曾和秋白合译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编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学丛书》的一种于 1921 年 12 月出版。据瞿菊农后来说，当时秋白与耿济之关系“很密切”，“合作得很好”，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程度都比耿济之好，耿济之的译文“差不多都经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人共同翻译，秋白看着俄文原著口译，由耿济之记录下来，由“秋白修改定稿”。这样翻译出的作品，“发表时或者署秋白的名字，或者署耿济之的名字”。^①秋白还为耿济之和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写过序言。可见秋白与耿济之那时友情甚深。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人。当时是中国大学学生，已开始小说和诗歌创作。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笔名落花生，原籍福建，生于台湾。当时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 100 页。

在燕京大学学习,经常为报刊撰稿。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宗教和民俗学家。王、许与秋白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和改造旧社会的热情,关系也很亲密。王统照是第一个评论秋白著作的人,早在秋白旅俄期间,他就撰文评论了《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秋白回国后,与王、许仍因同在文学研究会而有联系。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五四”运动爆发时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俄文馆、铁校和汇文学校当时靠得很近,在运动中学生们常常在一起聚会、游行和商讨。在学联的活动中郑振铎认识了秋白,成为好友。郑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史家和文化活动家,一直与秋白有较多联系,感情很好。

此外,并非《新社会》和《人道》社成员的郭绍虞(1893—1984,字希汾)也是秋白当时的至友。他是苏州吴县人,算是秋白的同乡,“五四”爱国运动中经郑振铎介绍与秋白相识,也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强烈社会改造要求的青年。1919年,郭到北京后就给《晨报》副刊撰稿,活跃于文坛,后又成为著名文学史家。

2 他们这群朋友之间的情谊,是以爱国反帝和致力于社会及思想文化变革的“同志”情谊为主调的。他们又都热爱文学,笔力甚健,相互沟通切磋勉励,更增友情。秋白在《饿乡纪程》里几次提到他们中的几位时,都称“同志”。

秋白赴俄启程的前一天晚上,这群朋友在耿济之家聚会,送秋白。那天的北京,深秋的夜风已让人很觉得寒冷,加上黄沙飞起,扑面障眼,天气、环境够恶劣的。然而,“红红面孔”、长着“希腊式鼻子”的郑振铎来了,戴着“高高的土耳其式黑绒帽子”的郭

绍虞来了，瞿菊农、王统照、许地山也冒着风沙赶来了，还有秋白的新知己小友郭叔奇、通过郭绍虞认识的郭梦良。大家与秋白殷殷话别。关于这次送别聚会，王统照于1950年写的《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一文记述甚详，而且因为对挚友的感情深热，写得非常生动。其中记述道：大家见秋白不时咳嗽，还在吸烟，担心他的身体到俄国那么寒冷的地方难吃得消。而“希腊式鼻子”（指郑振铎）却另有深刻的思考，出语惊人，他说：

冷？我看北京也够数。——到更冷可也更“热”的地方重新锻炼一下，秋白这把瘦骨头准会有抗冷的本领。怕冷的，还能去？——话是一样，要找热的他才能去！

秋白在离开北京前还一直为办好《人道》月刊“勇敢而兴奋地工作”着。不过他已开始感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这群朋友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人道》有“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的“倾向”，需要“整顿思想方法”（《饿乡纪程·五》），因而，他在这次聚会时，既提出这个问题，又深感着大家的友情和志向，说道：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唯实的理论”）用不着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着手进行……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啊！（《饿乡纪程·五》）

秋白在聚会上说这番话时已是夜里“十一、二点钟”了，大家还是谈兴很浓。

第二天，1920年10月16日，“几位同志”又和秋白的其他亲友一同到车站送行。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郭绍虞还写了送别诗，“追寄”给秋白。郑、耿的诗写道：

新世界的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但是……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松柏依旧青春，
秋花依旧笑着；
燕都景色，几时再得重游？

……

鱼雁呀！

你们能把我们的心事带着去么？

瞿世英(菊农)的诗写道：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你们却走了！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们多回几次头，
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样。

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

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

……

我们虽和你们小别，

只是我信：

我们仍然在宇宙的大调和，

普遍的精神生活中，

和谐——合一……

秋白于10月18日就有复信和答诗，也是热情洋溢的：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以上三首诗都发表在10月25日《晨报》上(秋白录入《饿乡纪程》时作了些改动)。郭绍虞的诗没有寄出，稍后发表在10月29日《晨报》副刊，题为《流星——赠秋白、颂华、仲武，时三人有赴俄之行》，诗中说：

忽地
 有三颗流星冲开凝雾
 直往西北飞去！
 顿时打破了这岑寂境地
 ……
 你们冲开这云气的沉郁；
 和别的星儿们
 起新样的化合，
 作强度的固结。
 太阳的中轴为你们震荡，
 行星的轨道为你们错忒。
 ……

这一群朋友，当时都非常年青，对祖国，对社会改造事业，对思想、文化革新都满腔热情，大家肩并肩、手携手地工作，奋斗，前进，他们的友谊情份是兄弟般的，纯真的，美尚的。后来，各人的生活道路颇相差异，事业成就各有千秋，理性上复杂化起来，也就不免有分歧，但他们的情谊大抵保持着，至少是心里永存着青年时代的美好感觉。王统照在30年后写文章回忆秋白时还

那么动感情,记忆还那么细而确切,写出的文章还是那么诗化的。郭绍虞 88 岁高龄时还兴奋地谈起了《流星》,并且深情地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瞿秋白。他说:“秋白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一般青年都有一种妖气,他比较的没有。我好像感到他和别人不一样,有一股英气。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及他的地方。因为这样一种概念,我一向钦佩他。”^①

3 《新社会》、《人道》团体的朋友们,后来仍然与秋白有较多交往的是郑振铎。两人在“五四”时期互相了解就比较深,友谊也最厚。王统照在评《新俄国游记》(即《饿乡纪程》)时回忆说,早年郑振铎曾向他和许地山讲过秋白赴俄的心理,讲得很深刻。郑说:“他为什么走?……他的心意的罗盘针,与他的境遇的四周氛雾,使他下定了决心走这条路!……他是抱了满腹人生的苦痛走的,是从刻苦与烦闷的人生中,找得出一条死路;也可以说是一条生路……”不是知心之交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

1921 年 1 月,秋白离开北京才三个月,文学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从发起人名单来看,除了周作人、孙伏园、蒋百里、朱希祖等几个年岁大一些的,青年发起人大致是以原《新社会》、《人道》那班青年朋友群为主体的,郑振铎、瞿世英、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耿济之都是,占了全部发起人的一半。郭绍虞说:“文学研究会在瞿秋白走以前就开始酝酿了。他若是不出国呢,也一定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②因而,秋白 1923 年回国后参加文学研究会,与该会关系密切,是很自然的事。事实上,秋白的《饿乡纪程》早在 1922 年 9 月就由郑振铎收入他所主编的《文学研

^① 唐天然:《流星,直往西北飞去》,见《瞿秋白研究》5,第 205 页。

^② 《瞿秋白研究》5,第 205 页。

究会丛书》，改书名为《新俄国游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赤都心史》也是郑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的。1923年，秋白到上海后，郑振铎也在上海，两人关系仍然密切。郑负责的《文学》周刊于1923年12月公布的特约撰稿者和负责编辑者两种名单里都有瞿秋白，并连续发表了秋白的《滹漫的狱中日记》、《新的宇宙》、《铁花》、《弟弟的信》等小说、散文和诗，还有所译高尔基的小说《劳动的汗》。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连续发表了秋白的《郑译〈灰色马〉序》、《劳农俄国的新作家》、《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等一些文章，及所译契诃夫小说《好人》。此外，郑振铎与高君箴结婚，秋白为他们夫妇及郑母精刻急用的图章相赠，还出席婚礼，幽默地讲话，表现出友好之间的情谊。

后来秋白的革命活动紧张而危险，郑振铎很为他担心，曾在1927年7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做梦梦见瞿秋白，“好像见秋白的肺病非常可怕的样子”。^①

秋白于1931年回到上海文化界，郑振铎也从欧洲回来重新主编《小说月报》。郑原拟刊登秋白翻译的长篇小说《新土地》，稿子却被“一·二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毁。后来郑编的《文学》月刊、《文学季刊》、《世界文库》月刊等，都发表过秋白的文章或译品。总之，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交谊深厚。

秋白身陷囹圄，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当在《多余的话》里写到“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他还是在怀念好友啊！当他写到“有机会到俄国去了”的时候，他一定忆及1920年10月15日夜的送别聚会吧；当他写到“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文艺问题”、后来不能从事文

^① 陈福康：《松柏依旧青春》，见《瞿秋白研究》8，第333页。

艺却“还怀念着文艺”的时候,不会不怀念文学研究会诸友和 30 年代初期在上海与郑振铎等共同搞文学的“惬意”和兄弟般的情份吧!

据陈福康考察,郑振铎约在 1935 年 4 月底或还早一点知道秋白被俘并被叛徒供出了身份。6 月 24 日前已同鲁迅、茅盾等商议过为秋白出版遗著的事。其后不久商定了经费和印刷等具体事宜,郑振铎负责筹款和联系排版印刷。8 月 6 日晚,郑振铎在家里设便宴,邀请鲁迅一家和茅盾、胡愈之、叶圣陶、陈望道等秋白生前友好共十人,秘密哀悼烈士,并正式决定了出书的各方面问题。在筹款中,郑振铎到处奔波,从他手书的一份认捐名单看有 12 人,共捐 200 元,其中胡愈之、耿济之各捐 50 元,他在名单后面写道:“余款由我担任”。他“担任”了多少呢?从后来鲁迅给茅盾的信中可推知,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一是由他捐的。鲁迅早在向现代书店赎回秋白遗稿时已付出 200 元,茅盾捐出 100 元。^① 凡捐款者无论多少(都是些穷文人,穷中还有更穷的,各有其艰难)都是可贵的情谊啊!鲁迅、郑振铎、茅盾、耿济之与秋白的关系,对秋白的感情更特殊一些。这在他们的捐资上也看得出。秋白译著《海上述林》出版是鲁迅、郑振铎等秋白的至友的深情所成就的啊!

郑振铎对后来秋白文集的出版所作的努力,也可看出友情的可贵。抗战时期,他就对他的学生说:“秋白同志的遗著,决不允许就此湮没……凡是能找到的先把它收集起来。”^② 抗战胜利后,他又曾与郭沫若、茅盾等研究过出版秋白文集的事,还亲自撰写了一份计划。解放初又曾指示上海出版公司重印了秋白

^① 见陈福康文,《瞿秋白研究》8,第 334—335 页。

^② 方行:《狂护文献耗中年》,见陈福康文,《瞿秋白研究》8,第 336 页。

编的《鲁迅杂感选集》。那时他写了《回忆早年的瞿秋白》和《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既是他怀念好友、怀念烈士的一片真情，又提供了研究秋白的宝贵资料。

终生的知己

1 秋白的好友中，郭质生是很重要的一个。未成稿《痕迹》目录在“第一次赴俄”部分中单列了一题“郭质生”。

郭质生，俄国人，本名维·斯·郭罗哥洛夫〔В. С. КОЛОКОЛОВ〕，也音译为弗谢罗德·哥罗科洛夫，1886年出生在中国新疆。他的父亲曾长期在新疆工作，他的青少年时代主要在中国度过，自幼学汉文，就有“郭质生”这个汉文名字。青年时代回国，曾在红军里任职，不久转到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后来成为文学博士，语言学教授，著名的汉学家，曾翻译中国小说名著《红楼梦》及其他文学作品，有语言文学及比较语言学著作数种，他所编的《汉俄词典》是苏联同类词书中最早问世的一部。

2 秋白认识郭质生是在第一次赴俄于 1921 年春到莫斯科不久的时候。郭质生在 1960 年致杨之华的信中详细忆述了最初与秋白相见的情形：

我记得……一九二一年的春天是温暖的，常有阳光和煦的日子。五一节前的一天……我领着自己的两个小女儿在救世耶稣教堂附近的公园里散步。我穿着军装，……突然，我的注意力被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吸引住了……其中一个手里拿着质地很好的皮包，挽着夹大衣，戴着金丝镜，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那沉稳的风度和他的年龄不太相称；另一个则显得活泼好动，手里拿着照相机……他们正想给那座教堂拍照，但看见我后有点发窘……也许是我不好，因为我掩盖不住自己的好奇，直瞪瞪地望着他们而使他们发窘。我没有立刻猜出他们就是我在报纸上读到的新来苏俄采访的中国记者。两个年轻的中国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向我走来。那戴金丝眼镜的用俄语向我问道……他们的俄语不是在苏俄学的。我想用自己的汉语知识使他们感到惊讶，就用汉语回答说：“要‘入乡随俗’嘛！你们是不是这样考虑的？”效果大出所料：两个人立刻用俄语和汉语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果然他们是北京《晨报》派来的记者……戴金丝眼镜的就是瞿秋白。^①

瞿秋白在《饿乡纪程》里有如下的记述：

饿乡！饿乡！你还是磨练我的心志，还是亏蚀我的精

^① 转引自瞿独伊：《寻觅双亲的足迹》，见《瞿秋白研究》1，第 365—366 页。

力呢？工作开始了，看看罢。

我们的工作条件是不很困难的。……东方司（指苏俄外交部的东方司，即郭质生当时所在的机关）还派一翻译郭质生……我们也另有英文翻译……自己又可以说几句俄文，本来用不着他，然而后来我同郭质生竟成了终生的知己，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革命中的奇闻逸事，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过程……“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

上面引文中“后来我同郭质生竟成了终生的知己”这句话显然是很久以后补写的，并非当时的记述。这句话透露出秋白与郭质生的友情是不同寻常的。

3 瞿秋白和郭质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郭质生虽是俄国人，但由于自幼生长在中国，深受中国文化陶塑，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亲切感，所以一遇到秋白等人，就万分欣喜，表示愿意为他们当翻译、出主意，帮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三位中国青年。有一段时间，秋白处境困难，连合适的住处也找不到，郭质生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就把秋白请到家里去住。他后来回忆说，秋白“安静面和气”，与左邻右舍都处得很好，邻居们都喜欢他；秋白“很忙”，每天外出考察、采访，回来还得自己动手做饭，但他们两人常抽时间促膝长谈，关于革命，关于历史、文化、宗教，还有各自的心境、思想等；秋白有了房子，从郭质生家搬出之后，交往始终不断。^①

在《赤都心史》里，秋白多次记述了与郭质生的交谈和自己当时的心态或看法。《宗教的俄罗斯》一文写道：

^① 参阅瞿独伊：《寻觅双亲的足迹》，见《瞿秋白研究》1，第367页。

基督教主庙壮丽的建筑……昂昂突显神秘的奇彩……鲜黄嫩绿，拂拭游春士女的衣袂。俄友郭质生来谈，说今天是……复活日曜日，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行大礼拜呢，因邀我们去看。……回到寓所，郭质生问我有何感想。我说仿佛不在欧洲。他笑着说俄国东方文化很深。

农民因俄国旧文化的缘故，守旧而且愚昧。据郭质生说……革命前俄国人民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识字，如今识字者的数目一跃而至百分之五十……

秋白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4月23日，那么他和郭质生相识的时间该在这之前。如果是作为苏俄外交部派的俄语翻译，他们相识的时间也许早在2月里。

《官僚问题》一篇记述了郭质生讲的一个案子：官僚利用职权“作弊”取利，贿赂长官之妻，却因女人“吃醋”而案发，被判决死刑。秋白由此研究“官僚问题”并涉及当时苏俄不易解决的两个问题：“智识阶级问题”和“农民问题”。他写道：“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郭质生对俄国实际情况了解较多较深，这对秋白有很大帮助。他是秋白的益友。

《新资产阶级》一篇转述郭质生所讲的“新资产阶级发生起来”的具体事例，例如一些“委员长”等共产党的头面人物们以权谋私、玩“女郎”、庇护亲戚牟暴利等腐败现象，“店老板”等市侩们如何“肚子如牛的胀起”的情形。秋白在这篇文章里对郭质生有句评语说：“郭质生——虽是‘非政治主义者’，然而始终是热烈的‘忏悔的贵族’，嫉视市侩主义的文化”。“非政治主义”、“忏悔的贵族”加了引号，是有特殊的具体含义的表述。“政治主义”多被用来指单纯用政治手段处理复杂的问题或偏于片面强调用政治手段去完成社会变革的任务而排斥或忽视文化、道德，

不重视精神人格等。不赞成这种路子、这种倾向的,会被称为“非政治主义者”。在当时的苏俄,“非政治主义”似乎是一种“帽子”,被戴了这顶帽子的人似乎就是被认为不革命或近乎异端。秋白加了引号表示借用,他是不会认为郭质生这个“非政治主义者”不革命的。因而,他强调郭是“热烈”的“忏悔的贵族”。“贵族”,在俄国并不单指皇亲国戚,也不单指有爵位的家族,大致是指相当于中国的有官宦家史而传统文化教养较深的“绅士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现代革命的冲击,一些“贵族”子弟,尤其是逐渐破落的贵族知识青年,灵敏地先感到和认识了本阶级的坏处及破产衰败的趋势,因而厌弃、背叛、“忏悔”,其中有不少带着对平民、对社会的负罪感而倾向于革命,投入革命队伍,成为革命者的也颇有一些。如同中国的“绅士”家族的“读书种子”式知识者一样,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比较传统优尚的道德人格、精神追求的特点,使他们“天然”地厌恶庸俗的资产者,尤其反对“市侩”及“市侩式的”一切粗俗、污浊、铜臭熏心、尔虞我诈等等。郭质生就是成了革命者的“忏悔的贵族”知识者。说他是“热烈”的“忏悔的贵族”,一方面是说背叛“贵族”阶级、参加革命的“热烈”;一方面就是指“嫉视市侩主义”。“忏悔的贵族”们,尤其是其中的较高层次的知识者,如郭质生这种类型,他们在革命中,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也多在精神、人格上有强烈的高层次的追求,他们自然看到并且亲自参加了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因而不会不重视“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然而,他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并且显得更重视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人”的问题。在自己的职任选择上,他们往往选择和致力于文化工作。他们不是没有广义的“政治兴趣”,但这种兴趣往往是在他们的文化工作上能得以较好的保持,发生较好的效果。对单纯的政治事务,他们会感到不满足。

后来,瞿秋白也曾自云有“忏悔的贵族”的特点。缺点方面,他有时因太苛求自己而过分地自我批判;在“嫉视市侩主义的文化”方面,他与郭质生也相一致,他不遗余力地抨击“市侩主义”。他们同是“热烈”的“忏悔的贵族”,同样都成了革命者,这或许是他们感情融洽而成为知己之交的重要因由吧。

1921年9月16日,这一天俄国人是不会怎么在意的,瞿秋白则会因为这一天是中秋节而思归,而想到团圆,而记起“千里共婵娟”的诗句。《归欤》一文写这一天的事和俄国其他朋友听秋白谈起中秋的意义后认为“大有诗意”、“引为奇趣”而借地方给秋白等中国游子们聚会“一为庆祝”的情形。然而,和那些朋友不过是“嬉笑”解闷,夜深散宴归来还是得向知己朋友倾诉心怀,所以秋白又到质生处一谈。当时秋白的肺病发作了,“病体支离,要做的,应当做的,也都不能做……情感易动,感慨低徊,抛一滴……热泪;家园,故乡,人生的意趣,将来的责任都拼在泪花里……”。在这种心境下,他找郭质生去谈,自然是因为友情分达到了能吐诉这些话的程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特意记下“夜深……过质生处一谈”的情形,也因为知己朋友的理解、宽慰和其他多种帮助,使他深有所感,觉得应该永留纪念,才写在“心史”里的。

4 1928年至1930年,秋白第二次旅俄期间,郭质生曾来到莫斯科柳克斯公寓看望秋白,并且把秋白第一次旅俄期间寄存在他那里的研究拉丁字母、研究汉字改革的笔记送来。1922年,在东方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秋白再度见到列宁的时候,列宁

曾说：“拉丁化对东方语言是一个革命的因素。”^①当时，秋白与郭质生就开始探讨汉字拉丁化这个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了。这次，郭质生送还的笔记对于秋白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继续研究很有帮助。第二次旅俄期间比第一次更忙碌，但他仍然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去看郭质生。瞿独伊忆及幼时与父亲一起见到郭质生的情形时写道：

从我记忆的深处一再浮现出郭质生的影子：中等个子，栗色的头发，清瘦的面孔上闪动着一双深邃的眼睛，说起话来慢悠悠的，一派学者风度。我的脑海里还清晰映出这样一幅图景：在郭质生家中，两个大人（郭质生和父亲）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而我和郭质生的女儿（一个与我同龄的小女孩）在地毯上兴高采烈地玩着一只玩具狗……^②

1931年初，秋白被米夫、王明排挤出中央政治局。2月7日，他寄了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给郭质生，附一笺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当时他确实也发了病，但信中的话同时暗示了自己的政治处境，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秋白还“请求”他这位知己朋友寄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子、著作、杂志以及语言学等方面的一般书籍和文学、小说以及杂志。这封信称“质生兄”，信中说“时常想念你”、“很希望……常通信”，向“夫人和小孩子”问候、祝福，都不是客套话，而是衷心怀念和祝愿。一个多月后，3月12日，又有一信给郭质生，称“亲爱的弗谢伏罗德！”是切盼复信而未见复信，又写信去的，信中除了再次说希望寄些语言文字书刊和文学书刊（开了几种书刊名）之外，还关切地问：“你生活得好么？”还郑重地写道：“我的妻子常常想念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最后还拜托转一封信

^① ^②瞿独伊：《寻觅双亲的足迹》，见《瞿秋白研究》1，第367页。

给独伊。信中提到中国文学时,有如下的话:“尽管中国有过自己的‘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但……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是马路文学。”在说到语言文字问题时有这样的话:“倘若你有兴趣以你本人或某个团体的名义和这个学会(指中国语言文字学会。——引者注)联系,那么就可以通过你提出我们主张的方案,用它来批判南京官方的草案。”^① 这些都是有深厚情谊的知识朋友之间才可以说出的话。再者,当时秋白处在“地下”的危险环境,正被敌人追捕,如果不是完全可靠的知己,如果不是非常信赖,是不会写信、不会求助的。

郭质生虽然有革命履历,后来又当了教授,但其生活和处境并不很美满。家庭生活上,第一位夫人离婚,重新结婚以后仍然心境不好。1979年辞世而去了。

^① 见《墨秋白写作生涯》,第60—62页。

亲兄弟似的至交

瞿秋白和张太雷是同乡、同学、同志，长期并肩前进、浴血奋斗的亲密战友，感情最深厚的至交。

他们还是同龄人，太雷长秋白数月，按华历都生于清代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变法那年，也即谭嗣同等“六君子”为变法维新而殉难的那一年。他们又都是著名的革命领袖人物，都曾是中共中央最核心的领导集体政治局委员，又都英年牺牲，张太雷于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的战场上身中三弹，壮烈牺牲，秋白于八年后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从容就义。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是可歌可泣的，他们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是弥足珍贵的。

他们的交友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那是常州中学同学之谊。由于秋白比太雷早入学两年,他们熟识起来当是辛亥革命之后了,较多的往来和交谈可能是1915年的事。据羊牧之回忆,有一次,秋白诵《老子》中“民之饥也,以其上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等,太雷则接着说:“还有庄周的话呢,‘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急,其可得耶?’”他们还谈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以及苏东坡“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等名句,^①表示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愤慨和起而斗争的情绪。这大约是他们于1915年在全国讨袁(世凯)浪潮中的心态。据李子宽回忆,1915年放暑假之日,学校贴出一布告,其中说:“近起风潮,张复、瞿爽素行不谨……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②张复即太雷,瞿爽即秋白,据说学校出这布告是因为他们参与反对专制校政。他们就这样不再“来校”了,自然是因为都决不低头“悔改”。停学后他们常有来往。秋白之妹回忆说:“哥哥在失学的日子里……本城的张太雷、扬州任氏兄弟……常到书房里晤谈。”^③太雷夫人王一知回忆中提到秋白、太雷“一同游历过”红梅阁。^④羊牧之在《太雷轶事》中有更详细的记述。

秋白、太雷两人家境很有些相似之处。他们在少年时代,家庭都已十分贫寒。秋白的父亲是穷教员、穷画家,借住宗祠,母亲早丧;太雷的父亲是个穷秀才,曾在安原煤矿做职员,37岁病逝。当时太雷8岁,寡母带他和他姐姐回常州,借住别人家“坟屋”,靠做针线和亲戚帮助维持贫寒生活。秋白后来在《悼张太雷同志》一文中说:“他那时还没有十岁。他的母亲一直是借债

① 羊牧之:《记秋白故居》,见《常州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② 《回忆张太雷》第54页。

③ 《瞿秋白研究》2,第310页。

④ 《回忆张太雷》,第5页。

度日。^①这几句话之所以能在秋白笔下出现，是因为他自己在少年时代也感受同样的困苦和悲哀。这大约也是两人思想一致、感情相合的原因之一吧。

1916年，太雷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秋白1917年到北京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时，曾到天津去和张太雷会面，还合影留念。“五四”运动中，张太雷被推选为天津学联领导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即主要领导者。秋白则是北京学联代表之一。当时京津学生运动联系很密切，他们的会晤、交谈、互相支持是不言而喻的。1919年8月23日，各地学联在北京新华门向北洋政府总统请愿，要求解除山东戒严令，秋白是组织者之一，并且因此和全体学生代表一起被捕；张太雷也带领天津学生参加这次请愿。8月26日至28日京津学生坚持请愿，并要求释放秋白等全体学生代表。这是他们第一次的“社会活动”，二人在“五四”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翻天巨浪”中并肩战斗。虽然他们个人之间的联系没有留下详细的材料，但从秋白的《饿乡纪程》和他们各自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他们的交往比中学时期大有发展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太雷在天津组织“社会改造社”，秋白在北京组织了《新社会》旬刊，以“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会共进”为宗旨，可以推测是商讨过的。1920年春他们都参加了李大钊为首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思想上共同“转向社会主义”，并且开始了“到民间去”的活动。据他们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的李子宽回忆，1920年，张太雷经常到北京大学来，“有时秋白同来访李守常（大钊）。太雷留一宿即去，问所往，则答去长辛店……见其箱内所存皆为宣传斗争之小册子。”^②当时长辛店是工人运动

^①《回忆张太雷》，第90页。

^②《回忆张太雷》，第55页。

的中心,秋白是否也和太雷一同去过,尚无资料可确证,但太雷去过并且和秋白共同研究过,当是没有疑问的。

秋白于1921年1月到莫斯科;5个月后张太雷也到了莫斯科,代表即将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来,秋白在狱中回答记者李克长的访问时、写《多余的话》和《记忆中的日期》时,几次提到他是在这时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多余的话》)

一九二一 五月 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 (《记忆中的日期》)

次年(指1921年。——引者注)……张太雷等到俄,介绍我入共产党。^①

秋白在通讯报导和《赤都心史》里都记述过共产国际“三大”的情形,当时他和张太雷在莫斯科会晤,对他一生的道路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这不是偶然的,从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来说,当时的确已经“归向”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了;从他和张太雷这位极其热情坚定、思想敏锐的革命者的关系来说,有了“五四”、“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往民间去”的共同奋斗的经历之后,又经过秋白出国前夕在天津的彻夜“抵足长谈”,那么半年后由张太雷介绍入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其实,1920年10月16日,秋白在天津与太雷长谈时,太雷已经在筹备“S.Y”(社会主义青年团 Socialist Youth 的简称)了。太雷在北洋大学时的同学回忆说:“(1920年)十月初到了北京,请求李大钊先生帮助……过了几天,李大钊先生派张国焘通知我,要我先去天津找张太

^① 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引自拙著:《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第319页。

雷成立 S.Y。”^① 由此可以推知太雷、秋白“抵足长谈”的一些内容。张太雷在苏俄工作到 1921 年 8 月回国,那么 5 月至 8 月这段时间,是他们两人较多相处的时间。秋白 9 月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任翻译,并正式入党,其中自然是与张太雷有关的。应该说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是创建者之一。

1923 年 6 月,他们一起出席中共“三大”。事实上大会开幕前就参加了预备会和筹备工作,并一起起草党纲。会上,又一起做大会组织工作。在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即国共合作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又完全一致,都主张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变成统一战线形式,共产党员在其中起骨干作用,促其革命化。他们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聘请俄国共产党人鲍罗廷为高级特别顾问,秋白和太雷又都同时做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同时,他们又同在上海大学共事(太雷于 1923 年、1924 年先后两次在上海大学当教员),又曾同在一个党小组,接触的机会是不少的。

1925 年 7 月的中共“四大”上,秋白当选中央常委;太雷为候补委员,同时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他们都较早地发现并反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张太雷于 1926 年 6 月 10 日发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一文,揭露右派反共的种种行为,指出要解决的是左派应该争取领导权而不让右派篡权的问题。6 月 28 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训话时,曾信口雌黄地谩骂张太雷,胡乱给张太雷扣上“破坏两党关系、引起两党恶感”的帽子。8 月,太雷发表《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的文章,“有节制而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蒋介石

^① 湛小岑:《张太雷与天津第一个团小组》,《回忆张太雷》,第 57 页。

石”。^① 8月间，秋白到广州考察，他原则上赞同张太雷的意见，只在斗争方式上稍有修正意见。太雷8月份的文章很可能是与秋白商讨后写的。秋白返上海后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预言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极端危险性。

1927年3月秋白到武汉时，太雷已在那里，他是1926年底随鲍罗廷来的。从3月份到“八七会议”前后，又是两人接触较多的时期。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公开地背叛国民革命，举起屠刀大规模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内右倾的错误越来越显示出恶果来。4月27日至5月9日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开始受到党内的公开批评，瞿秋白和张太雷都以批判彭述之的理论的方式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并开始系统地思考在蒋介石叛变后，党的路线和政策究竟应该怎样制定的问题。大会上两人都被选为中央委员，秋白选为政治局委员，太雷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瞿秋白在武汉的初期，张太雷住武昌城内湖上园，经常与鲍罗廷一起到汉口“南洋大楼”开两党联席会，每次会后，总要来秋白住处。“五大”之后，太雷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住到胭脂山去了，因为隔条江，有重要的事才来。“他每次来，头发总是蓬蓬松松，穿一双黄色旧皮鞋，说话总不拖泥带水。之华说他待人热诚像把火，处事干脆利落像把剑”。有一次太雷再三强调“汪精卫迟早也要和我们分家”；还有一次，秋白不在家，太雷告诉之华，“暴风雨来了，今后得好自保重，特别要照顾好秋白的身体，说着像阵风似地走了”。^②

汪精卫叛变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中央内部矛盾也复

^① 阳翰笙：《忆我良师益友张太雷同志》，《回忆张太雷》，第49—50页。

^② 羊牧之回忆，见《瞿秋白研究》1，第398—399页。

杂化起来,为应付事变,会议也多起来。约在6月底7月初,陈独秀已不大问事,7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改组,张太雷为五人临时政治局成员之一,当月21日秋白也补入临时政治局并且实际上开始主持工作。7月13日秋白与鲍罗廷上庐山,张太雷也随后到了那里。在那里,瞿秋白、张太雷、鲍罗廷与李立三、邓中夏等人于21日讨论南昌起义及紧急会议的筹备问题,商定计划。26日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召集临时政治局成员传达“国际”急电,决定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与“国际”代表一起筹备“八七会议”。此后,太雷参加8月1日南昌起义后,8月3日又到武汉出席秋白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接着继续共同筹备和出席“八七会议”。会上,秋白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全面工作,张太雷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之所以用“临时”二字,是因不是正式代表大会选的,而是“紧急”会议选的,但这临时政治局领导了“六大”之前这一年最紧张、最复杂、最艰难的革命大转折的工作。

“八七会议”后,张太雷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南方局书记,在南方发动起义,配合南昌起义后南下的起义军。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张太雷是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牺牲了,秋白非常悲痛,还写了文章悼念张太雷同志。他写道:

张太雷同志……被反革命军阀惨杀而死了!……张太雷同志在暴动之前三四天,每天晚上亲自到革命兵士的秘密会议,去做报告,去组织他们……他受共产党的指挥……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极其艰苦地工作。暴动的前后,他尤其是非常的劳瘁。

……他在党里历次担任负责的工作,他的坚决与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如今他死了!……

……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①

太雷夫人王一知后来回忆说:“秋白对太雷的牺牲更加悲痛。不久,他和杨之华同志邀我住到他们家中。”②

秋白不仅当时在一些文章里追怀张太雷,说他是“中国革命的最好的领袖”之一,而且终生敬仰他,贯彻他的精神,心中永存着对他的深深感情。除了我们在前面已引用的《记忆中的日期》等所表现的,还有他的《未成稿目录》,在《痕迹》一书目录中专门有一题《忆太雷》。就义前拟这一题,其情何等感人,可知在他心中太雷既是生死与共的同志,又是亲兄弟一样的至交之友啊!

①《瞿秋白选集》,第388—390页。

②《回忆张太雷》,第42页。

对先烈的感念

1 在那个革命的年代,特别是 1927 年和以后的几年,作为革命者,作为革命领导者,瞿秋白经历过不知多少次失掉同志、失掉亲密战友、失掉得力的革命领袖人物的深切而剧烈的悲痛!

李大钊、张太雷、苏兆征、彭湃、恽代英、邓中夏等等,都是秋白很亲近的同志好友啊!对这些同志好友的悲悼和纪念,是他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着他的情感的真纯和高尚本质。

1923 年“二·七”惨案,是他第一次赴俄归国之初所遇到的军阀残酷镇压和杀害共产党人、杀害革命工人的事件。作为满腔热忱的革命者,他的心与当时的共产党人的心,与革命工人的心同搏共振。他对遇难者的哀悼、纪念和共鸣

的感情,凝结和抒发为文学作品《滹漫的狱中日记》等。

“人”迹稀少,毒蛇猛兽横行……凄凉荒芜的秽土,白骨如山……我们几百万几千万人……团结;这一股气已经直冲出来,大家勇得很呢……一两个曹贼挡得住么?

我们之后还有不少人呢……杀得净么?

刑场却成了我的天日!

听说前天扬子江边我们的人被杀了不少……我想那一个人头(姓林的)^①……睡梦中都可以看见那切齿愤恨的形容……无缘无故三十多人杀了……“开枪!”……惨呵!难道这还是人的声音?不是!

笑话!谁说唯物论的人没有人的感情!更大!

这是秋白自己在以诗抒情,对烈士、对难友深敬深爱,对“不是”人的凶残军阀的痛恨至极!

1924年10月10日,国民党右派勾结租界当局,收买地痞流氓,破坏在上海天后宫召开的革命群众大会,打伤好多人,其中黄仁同志受重伤,抢救无效,次日去世。正受追捕、处境危险的秋白还亲自到医院看望黄仁,安排黄仁同志后事。杨之华后来回忆说:

午夜……病房里……秋白突然来到了。他急切地轻声问我黄仁同志的情况……他俯下身去,摸摸黄仁同志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察看受伤的身体,轻轻地呼唤着黄仁同志的名字。然而黄仁同志闭着双眼……

秋白缓缓地站直身子……默默地注视着黄仁同志,沉思着……沉重地对我说:“不要气,只要记!”^②

① 原有括号。指烈士林详谦,共产党员,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二七”大罢工领导人之一,在惨案中牺牲。

② 《回忆秋白》,第12页。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了,而且是最残酷的绞刑。李大钊等数十位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于4月6日被捕后,北京9所大学的校长组团造访张学良,要求释放李大钊;25所大学的校长又于12日联合吁请;那段时间还有其他许多知名人士和民众参与营救。虎狼似的军阀,丝毫不顾民众愿望,丝毫不听社会舆论,酷虐地绞杀了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李大钊在狱中安详无畏,坦然陈述“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就义那天,“首登绞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①

不幸的消息传到武汉,正是中共“五大”期间。李大钊被捕,大家早已知道,心情是沉重的,但大概以为李大钊是著名学者、教授,又有那么广泛的营救舆论,就料想张氏父子即使不释放李大钊,也不至于丧心病狂地立即杀害,更不至于杀那么多人。所以,噩耗传来,大家都感到十分震惊和异常悲恸。当鲍罗廷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说到李大钊“牺牲了”,“在狱里受过种种酷刑”,“竹签插进他的十指的指甲”,“他是上绞刑架死的”的时候,做翻译的张太雷已经哭不成声,不能再译下去了。全场的人的脸上都是很悲伤的。^②瞿秋白多次很沉痛地说道李大钊的牺牲,有一次,说到历来的英雄豪杰,说到许多同志牺牲,他又沉痛地提起了李大钊,悲怆地说:

大钊同志在张作霖的绞刑架下,英勇地牺牲了,他为人民革命而死,死得光荣。

当因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心忧的时候,他说:

我们要问……是不是对得起已为党的事业而牺牲的李

^①《晨报》,1927年4月29日。

^②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转引自王观泉:《瞿秋白自传》。

大钊同志?^①

秋白怎么能不为李大钊的牺牲而特别悲恸呢?李大钊是党的最可敬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党的灵魂,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又是秋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也是他在工作的关键大事上有力的推荐者和支持者。

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河北乐亭人。他虽然比陈独秀小10岁,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和陈有同等的声誉,在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认识和贯彻中,他实际上比陈更纯正和执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骨干是“五四运动”时的学生,约比他小10岁左右,都是同样尊敬和信赖他和陈独秀的。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威信渐渐下降时,李大钊还是深受爱戴的。陈独秀对年轻的同志会表现出“家长”式的作风,但对李大钊却很尊重,很敬佩,一向不争“头牌”的。瞿秋白曾讲过陈独秀在武汉时期的一件事:当人们有“南陈北李”之说时,陈独秀诚恳地说自己无论在道德文章上,还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共产党的工作上,都不如李大钊。李大钊从来没有丝毫争头牌的意念,他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为革命真理在中国的贯彻而奋斗。国共合作以后,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重要领袖,也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总负责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无论和孙中山的合作,还是共产党的工作,都有伟大贡献,博得崇高评价。他的牺牲对于中国革命损失太大太大了,秋白怎能不特别沉痛呢?

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李大钊是主要发起者和主持者,瞿秋白也参加了,那时就和李熟悉了。秋白在《多余的话》里特别提到这件事。1923年秋白旅俄归来,到北

^①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100页。

京首先拜访的就是李大钊,起初想进北京大学工作,也是李大钊引荐,但未成;后来进上海大学当社会学系主任和教务长,也是李大钊推荐,李与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友善,同时推荐的还有邓中夏(任总务长)。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他们两个人都共同工作,都被选进执委会,李大钊是执委,秋白是候补执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后,他们都是委员。在中共中央的多次会议和多项工作中,他们更是密切配合的。他们的关系如此,李大钊牺牲,秋白能不特别痛惜吗?

瞿秋白于1927年12月在《悼张太雷同志》一文中又沉痛地提到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等不少同志的牺牲。后来每谈到革命烈士,他总是想到李大钊,总是以烈士的承继者自任,而奋斗下去。直到他写《多余的话》时,还深怀着对李大钊等烈士的感情,他能那样宁死不降,像李大钊一样从容就义,证明他始终在心灵世界高悬着李大钊等烈士的英雄形象的。

2党的另一位较年长的领导人苏兆征与秋白的关系也非常亲密。苏兆征的病逝,令秋白特别悲恸。

1929年3月,杨之华在信中把苏兆征去世的消息告诉秋白。我们从秋白3月12日致杨之华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心情:

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惊得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整天要避开一切人——心中的悲恸似乎不能和周围的笑声相容。面容是呆滞的,孤独的冷清清的廊上走着。大家的欢笑,对于我都是很可厌的。那厅里送来的歌声,只使

我想起：一切人的市侩式的幸福都是可鄙的，天下有什么事是可乐的呢？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如何我们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史太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的——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可是他的死状，我丝毫也不知道，之华，你写的信里说得太不明白了。他是如何死的呢？^①

这封信是从疗养院写给在莫斯科的杨之华的。苏兆征1月里还在莫斯科，但他急于回国开展工作，并决定了启程时间，可是突然得了阑尾炎病，秋白劝他住院切除阑尾，休养一段时间再回国。他却认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不容延缓，执意要尽早回国，秋白不得已，只好让他启程了。回国后，他的病已很重，疗救已经来不及了，于2月20日在上海逝世。不久，秋白得知苏兆征死于阑尾炎，十分后悔而更加哀痛。后来，他经常疚心地自责：没有坚持叫他留下动了手术、休养之后再回国，说这是自己的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②

苏兆征出生于1885年，广东雷山人。他比秋白年长14岁，既是同志，又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大哥。1925年入党，在省港大罢工中突出地表现了对革命的忠诚和领导才干。秋白早就听说他的事迹，1927在武汉时期，他们两人开始经常地在一起共同工作了。据羊牧之回忆，那时秋白多次说自己搞农运不如谁，打仗更谈不上，搞工会则不如苏兆征。苏兆征当时做武汉国民

^①《瞿秋白研究》7，第7页。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第73页。

政府劳工部长,党的“五大”上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和三常委之一。在对路线方针政策的看法上他们比较一致。苏兆征是位非常认真的人,越在紧要关头、工作越艰难,他越是充满信心。1927年6月下旬,武汉的环境已经严重恶化了,汪精卫已同南京的蒋介石勾结起来,正在加紧所谓“分共”的准备,有些地方已搞起白色恐怖来。这时,苏兆征曾来找秋白商量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当时,他反对工人纠察队缴枪,主张保持和发展党所领导的工人武装,说“要以革命的暴动反对反革命的暴动”。他们商量如何“以牙还牙”,“搞红色恐怖”,还谈到要把当时劳工部的“失业工人救济金”控制好,一旦汪精卫叛变,就将这笔经费交给武汉工会,决不能让国民党的“老爷”们拿去。“八七会议”是他们共同筹备、共同参加的。文件的起草主要是罗明那兹和秋白,苏兆征也参加了部分文件的起草。会后,秋白主持中央工作,苏兆征作为临时政治局常委之一,兼管工委。他们配合得很好。在党的“六大”的筹备和召开期间,他们亲密配合,两人同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苏兆征任工委书记,秋白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28年7月到9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同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一起参加“国际”纲领起草委员会,相处十分亲密。苏兆征的死,对秋白的心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冲击。他的悲恸无可名状!他把这种心境转向忘我的工作,总嫌自己做得少。他对杨之华说:

我昨天因为兆征死的消息……一夜没有安眠,乱梦和恶梦颠倒神魂……

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

3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这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地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这是秋白于1929年9月写的《纪念彭湃同志》一文的第一段,我们从中可以深深感觉到他那颗剧痛的心!

1929年8月,国民党在上海龙华杀害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共产党人。其中彭湃是秋白非常熟悉、非常亲近,也一直很赞赏的战友;杨殷也和彭湃一样,是“六大”选举的政治局成员,他还是工人运动领袖,当时在中央军委工作。秋白刚刚受到苏兆征之死的情感冲击,又传来彭湃等四位战友被杀的噩耗,作为领导者,作为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的心怎能不撕裂般地剧痛啊!

彭、杨等是因叛徒出卖于8月24日在军委开会时被捕的,9月初在莫斯科的秋白才得到消息。9月6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信说:“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购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9月15日又有信十分焦急地问中共中央:“彭、杨如何,急死人了!!”实则彭、杨等已于8月30日被杀害,因国民党封锁消息,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得知的时间也晚,9月下旬在莫斯科的秋白才得到噩耗。在20多天里他心急如焚,噩耗传来又悲恸不已。在《真理报》发表的《纪念彭湃同志》正是他含着泪在深夜写成的。

彭湃,广东海丰人,1896年出生,长秋白三岁。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民革命运动领袖,独立开展运动,喜欢做群众工作。1921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在海丰创建全国

第一个农会,1923年任海丰总农会会长。国民党“一大”的时候,他就在党内提出,要在国民党改组运动中制定出农民土地问题的路线。1924年夏,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之前,他就有《海丰农民运动》的著作,很详细地描写了农运的发生发展和他自己做发动组织工作的情形,批评了各种“穿长衫”的“阔老”或“少爷”的态度。秋白与彭湃的交往就是在改组国民党的时候开始的。他很钦佩彭湃那种生气勃勃的,虽是出生在“豪绅家族”却“穿得非常破烂,一切生活都和农民一样”的,深入到苦难深重的农民中做革命发动工作的作风。早在1926年春,彭湃就说“国民党对于农民、工人已经成为腐烂的死尸了,农民是要求自己的政权的”,秋白特别记述了这件事,说当时已有错误倾向的中共中央还为此“大大骂了他一顿呢”。可以看出,秋白在认识上和情感上是和彭湃一致的。1927年,他们在党的“五大”上,一致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秋白在《纪念彭湃同志》一文中写道:

武汉时代,他到了汉口,被选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彭湃同志非常之讥笑这种官样的讨论……专门讨论大地主、小地主的大小分量,他认为都是无意义的。他时常说:“呵!借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名义,仿佛就一定要顾虑着‘小’地主,难道他们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吗?”

秋白在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写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到彭湃的贡献,说毛著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认为彭著也是“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的。

彭湃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的关于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意见得到了秋白的支持。也就是在“五大”上,秋

白纠正了以前曾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看法——以前,当彭述之说“今天有人主张全部没收土地,那是非常不行的主张”时,秋白是“不作声”的。“五大”上,他改变了态度,很可能就与听取彭湃等人的意见有关。汪精卫叛变后,秋白已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准备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彭湃是南昌起义的前委委员;参加南昌起义后,彭湃又去领导海丰起义,组织了海丰工农自卫军,于1927年11月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他一直支持瞿秋白、张太雷的工作。“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11月任中央农委书记。他牺牲后,秋白怀着悲愤的心情,挤出时间,亲自动手在莫斯科出版了《纪念彭湃》的小册子,自己设计了封面,画了彭湃同志的头像,并撰文写道:

他(指彭湃。——引者注)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他现在被国民党的强盗一样的专制魔王杀害了……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①

^① 见《瞿秋白选集》,第448—449页。

4 在秋白就义前,为革命牺牲的他的同志和好友还有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恽代英、邓中夏等。

秋白在《悼张太雷同志》一文中同时追悼了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他们都是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的。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安徽怀宁人。按中国算年岁的方法,是与秋白同龄,他们都是戊戌年人,按公历还长秋白一岁。陈延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党,1924年回国后任两广区委书记。1924年至1926年,秋白经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多次与陈延年共同工作。秋白与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多有意见分歧,而与陈延年则多相一致,陈延年也是不赞成陈独秀的右倾主张的。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陈延年向中央提出针对蒋介石的阴谋的对策意见,陈独秀大发脾气,硬说延年的报告是错误的,秋白则支持陈延年的意见。在党的“五大”上,陈延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曾有些人提议让陈延年取代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6月,陈延年在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期间被捕,7月在上海龙华就义。

赵世炎,四川酉阳人,秋白第一个妻子王剑虹的同乡,1901年出生,长秋白两岁。早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入党,1924年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长。1925年起在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代理书记期间,与瞿秋白多有交往。特别是在上海第一次、第二次工人起义中和第三次起义的准备中,秋白作为中央常委是多次和赵世炎一起商量工作的。党的“五大”上,赵世炎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7月被捕牺牲。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和秋白熟悉了。1925年3月回国后,在“五卅”运动中和秋白经

常共事,多有交往,他们一起参加了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12月起罗亦农担任江浙区委书记以后,他们的联系就更多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罗亦农也和瞿秋白、陈延年、任弼时、汪寿华(当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一样“感到陈独秀右倾”。他们有时到秋白家里来商量工作。^①1927年2月,上海第二次工人起义前,秋白曾和罗亦农(还有任弼时等)一起与陈独秀争论,试图纠正右的错误。2月22日起义后,在2月23日的中共中央和江浙区委联席会议上,罗亦农和赵世炎报告起义中出现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秋白作系统的分析,他们都批评了当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胜利后,他们一起出席党的“五大”,罗亦农当选为中央委员,以后仍多有接触,互相支持,配合工作。他们一起出席“八七会议”,一起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此后,罗亦农又领导过多次起义。1927年9月下旬起先后任长江局书记、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局长。这段时间起到他于1928年4月被捕就义,差不多一直与秋白在一起工作。他们虽然都发生过“盲动”错误,也都制止过一些盲动做法。秋白在党的“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在“盲动”问题上首先是自己作检讨,承担责任。在“为着政治上的明白”,为了总结经验教训而“不得不说”罗亦农的错误时,他说:“亦农同志曾在党内做了很久的工作,也曾领导数次暴动……他现在死了。现在暴露他的错误是很难过的……他在湖北指导工作,估量唐生智还有两三日的使用寿命……这是他唯一的错误。然而他制止湖北省委的盲动,这是他对的。”^②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瞿秋白的心灵是多么深广,他的情感是多么纯尚。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56页。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5,第565页。

恽代英，名蘧轩，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常州），是秋白同乡好友。1895年出生于武昌，长秋白4岁。1921年7月入党。1923年8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委，任宣传部长。当时秋白也到南京出席这次大会。秋白从苏俄回国后开始主编《新青年》季刊时就与代英有了联系。这次共同参与会议的领导，情谊又加深了。接着就是在上海大学共事，又共同发动革命文学。

1924年恽代英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继续与秋白有经常的联系。后来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他们互相密切配合。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们携手并肩做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一起出席了5月31日的中央紧急会议。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中，他们的文章相互呼应。杨之华还有段回忆说：“秋白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公开发行……党的支部和国民党的支部展开了讨论。大家……还请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作了报告。”^①1926年初他们一同出席国民党“二大”，共同反击右派的进攻，恽代英当选为国民党二届执行委员。同年3月恽代英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书记。

1927年1月，恽代英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秋白也在3月里就到了武汉，他们又在一起工作，都力图扭转党内的右的错误倾向。秋白曾被代英请去讲课，作报告。恽代英也常来看秋白。有一次，恽代英来，他们谈到吴稚晖，秋白说：国民党迁汉时，吴稚晖留在汉口，一再表示不再依附蒋介石，但后来发现他暗中拉谭延闿、宋子文去南京靠蒋，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恽代英也说：以前我们对吴稚晖有幻想，主要是我们读旧礼义的书太多，“历史上有清谈误国，搞不好，我们是书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51页。

生误国啊！”秋白点头称是。^①

在党的“五大”上，他们共同批评彭述之、陈独秀的错误倾向。当秋白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在会上散发时，会场气氛活跃起来了，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②说标题“尖锐”指的是小册子扉页上的话：“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现在看来，他们当时把符合不符合“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意旨看得很重，而且尚未较深地看到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对中国革命指导上存在的问题。不过，他们已觉察出陈独秀、彭述之、鲍罗廷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错误，有共同的激情希望纠正错误。他们曾就农村工作、农民问题与陈独秀争论过。^③恽代英要加强农村工作的想法发生很早。据周恩来说，“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想“到乡村里搞一搞”，那时毛泽东尚未注意到农村工作的重大意义，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④到了武汉时期，毛泽东、瞿秋白都已经非常重视农村工作，以至于开始考虑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农村武装斗争，恽代英也是很有激情的一个。认识上、事业上的一致性，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八七会议”后，他们还是在中共中央共事。瞿秋白后来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中讲到“五大”前后的争论时说，约在6月下旬，中共中央搞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政纲”是个逃避斗

① 参阅羊牧之回忆。见《瞿秋白研究》1，第393页。

② ③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79页、第71页。

④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第333页。

争和恭送领导权给汪精卫国民党的政纲,当晚便自动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共产党也退出了武汉国民政府。7月1日中央武昌会议讨论时,共青团中央要求发表他们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却被禁止了,于是恽代英说:“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报告是‘进攻’、‘进攻’,中央又是决定要‘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陈独秀说:“正因为不一致,所以要开会呵!”^①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恽代英是积极支持秋白的,秋白这样陈述也含着对恽代英的钦佩和感念之情。“七·一五”以后,恽代英去参加南昌起义,后又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六大”以后,恽代英在上海担任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瞿秋白在苏联,两人虽在两处工作,但亲密情谊依旧。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等刊物上,他们的文章都相呼应。意见虽有参差,共同的观点现在看来也未必完善,但在当时,总的看来他们是共同致力于较正确的理论和方针贯彻的。1930年恽代英第一个严正批评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极其错误地用惩办主义的方法把他贬到沪东区委。恽代英5月被捕,1931年4月29日就义。他有一首狱中诗写道: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拚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恽代英就义时,秋白已被宗派主义者撤除了中共中央领导职务,正受批判,处境非常困难。但他还在上海,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开始转到文艺工作上,写政论比以前少得多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数月几乎没有政论之后,忽然于1931年5月10日写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5,第415页。

了《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一文。文前有一行非常引人注目的话:

“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唯嗜杀人者,能一之”——改《孟子》。

(孟子原句为:“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见《孟子·梁惠王》。——引者注。)

秋白这篇文章写于恽代英被杀害之后 11 天。那时他一定知道恽代英被杀害的事了,这是他以笔作剑,愤怒地向杀人者的反击: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蒋介石自己的供状是明明白白的说:

国民党的政治“理论”是:

第一个过渡阶段是军政时期——军阀主义——杀工农兵士!

第二个过渡阶段是训政时期——法西斯蒂主义——杀工农兵士!

第三个过渡阶段是宪政时期——资产阶级的民治主义——杀工农兵士!

第四个过渡阶段是世界大同——帮帝国主义——杀天下的工农兵士!

把“改《孟子》”数语书于卷首,是说蒋介石这个嗜杀者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实行的是反“三大主义”;也与他红口白牙讲着孔孟仁义、固有道德是完全相反的,孟子的“不嗜杀者,能一之”变成了“唯嗜杀者,能一之”。这篇文章另有更带普遍意义的要旨,虽不是专门悼恽代英等烈士,却含着秋白的悼怀心情,并转化为对“嗜杀者”的白刃格斗精神。

邓中夏,名康、安石,字仲瀛,在秋白著作中又作仲夏,湖南宜章人,1894年出生,长秋白5岁。秋白和邓中夏至少是在1920年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候就认识了,邓是该会的主要发起人,稍后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党一成立即为党员。秋白旅俄期间在《晨报》发表对新俄的报导也必然为邓中夏所关注。1922年,邓中夏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23年秋白回国后,他们一起创办上海大学,邓担任总务长。他们一同出席党的“三大”。同时邓中夏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长,秋白也参加了团的“二大”前后的工作。这样,他们就在多方面共事。况且,他们又都是诗人,热爱文学,热心提倡革命文学活动,都有文章发表,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1924年的上海工人运动高潮中,在1925年“五卅”运动及以后反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他们都并肩战斗。邓中夏在广州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后来他也一直是工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1926年9月15日,秋白在《由粤回来报告》中曾讲到邓中夏。他说,“在广州仲夏同志已成市民运动的领袖”,他举出大资本家简玉阶的谈话(说“罢工工人应当援助”,中共中央《向导》周报“能代表人民说话”,“农民是大哥,工人是二哥,商人是三弟,我们要团结”等)来证明邓中夏的工作做得有了很大的影响。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他们一同出席“五大”,都当选中央委员。秋白在武汉期间多次说自己缺乏在实际斗争第一线的锻炼,“搞农运,不如彭湃、毛泽东;搞工运,不如苏兆征、邓中夏”。^①汪精卫叛变后,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挽救革命、扭转形势的问题,否定右倾路线,组织工农运动,策划起义等。邓中夏和李立三一起曾到庐山向鲍罗廷和瞿秋白等报告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可能

^① 羊牧之回忆。见《瞿秋白研究》1,第394页。

性的情况,建议举行起义,秋白表示赞成。后来他们共同出席“八七会议”,邓中夏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在贯彻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的工作中都满怀激情,意见也很相得。邓中夏在“八七会议”之后任江苏省委书记,常和迁至上海的中央一起开会。张太雷牺牲后,他又去广东任省委书记。

党的“六大”从筹备到开会,他们都在一起工作,意见也比较一致。“六大”以后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邓中夏也留在莫斯科作为代表团成员,与秋白一起工作,在第五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派别纠纷时,他们两人和代表团的多数成员表现出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中国共产党维护党的团结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据理抵制“联共”和“国际”某些人的大党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倾向,通过调查研究澄清事实,批评了党内王明宗派的某些错误,为被冤枉受打击的同志平反。但是,这样就得罪了“联共”和“国际”某些头目如米夫等,引起了王明宗派的忌恨,再加上与“联共”和“国际”内部矛盾斗争搅在一起,瞿秋白、邓中夏被妄加罪名,受到“国际”政治委员会的谴责,并通知中共中央撤换他们。这时,实际上就决定了瞿秋白和邓中夏此后必被排斥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命运。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瞿、邓更加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了,情谊也更深了。

邓中夏于1930年回国后到湘鄂西苏维埃省委工作,1933年在上海被捕,10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当时秋白再次受到党内“左”倾教条的宗派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在党刊《斗争》上的文章《庐山会议的大阴谋》、《反帝大会——反对外债的问题》等,与王明等人的说法有别(现在看来秋白的这些文章要比“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观点切实,基本立场也是正确的),

没有照抄他们的“左”高调,就被扣上“老机会主义”的帽子,被强逼着检讨。有人甚至极凶横地叫嚷要把瞿秋白“一棍子敲出党外去”。邓中夏牺牲一年多之后,秋白也因“左”倾宗派的“甩包袱”而被俘牺牲了。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

1 瞿秋白于 1923 年起参加中共中央工作,陈独秀起了关键性作用。秋白很尊敬陈独秀,陈独秀很器重秋白,两人关系很好。约于 1925 年起,二人政见渐异,至 1927 年“五大”时“路线”分歧在党内公开化了,秋白也仍然很尊敬陈独秀。历史发展到要由秋白取代陈独秀来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秋白自己仍然是“不愿”的,但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八七会议”之后,秋白与陈独秀的情感联系还是保持着。后来,即使到了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了,即使到彼此没有直接来往的时候,秋白心中还是对陈独秀有感情的。

2 陈独秀生于 1879 年,比秋白大 20 岁,有学问,又是革命的先驱,“在秋白心目中,陈独秀是一位长者”。^①“五四”时期,秋白曾到北大旁听过陈的课。1922 年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 11 月 5 日至 12 月 5 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秋白当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和会议后约两个多月,秋白给陈当翻译,朝夕相处,甚为相得。后来,陈独秀邀秋白一同于 1923 年 1 月回国参加中共中央工作。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不久……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

回国后,陈独秀就把编辑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的工作交给秋白。在 1923 年 6 月召开中共“三大”期间,《新青年》季刊第 1 期开始发行,瞿秋白还协助陈做了大会文件起草和大会组织工作。瞿秋白对陈独秀在建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功绩,对陈独秀为人的光明磊落一直给予充分肯定。尽管他们从 1923 年就开始发生某些理论上的分歧,到 1926 年陈独秀已经在中央一些会议上常与彭述之一起与秋白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秋白还是十分尊重他,曾说:“他传布马克思主义有贡献,应该受到尊敬。”^② 1927 年 2 月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秋白说自己是“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做理论工作。在别处,他还说过:“他(指陈独秀。——引者注)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③

在中共“五大”上,很多人不愿再选陈独秀做总书记。陈继续当总书记后,一些人仍表示反对陈,秋白总是耐心劝告别

①《瞿秋白研究》1,第 381 页。

②《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 87 页。

③《瞿秋白研究》1,第 381 页。

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谁也拿不出具体办法，这就要靠我们全体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而实践必然会遇到失败，不允许陈独秀摸索，不允许陈独秀失败，是不公正的。”^① 他还说“独秀对中国的具体情况钻研了解得透”。但是，秋白认为，陈独秀德高望重，大家很尊重他，因而他自己容易原谅自己，好固执己见，一个人说了算。“五大”期间，他们之间的争论算是在党内大会上公开了，但仍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的私交还是很好。在武汉，秋白常去看独秀，陈独秀也常来秋白这里，除了商讨工作外，其他方面如文学、历史、哲学、翻译也无所不谈。秋白十分钦佩陈独秀的治学精神，说他常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律，从不卖弄文笔。^② 秋白还讲过如下一件事：

人们对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敬仰，有“北李南陈”之说，陈独秀一次对宣传部的同志说：无论是道德文章，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我都不如李大钊，与他并论，不符合实际情况。^③

秋白讲这件事，是对陈独秀那种不争当“文章魁首”的风范表示钦佩，对他的为人表示赞赏。

陈独秀与秋白交谈有时很活泼，很有趣。有一天晚上乘凉时，秋白复述过陈独秀讲的一个笑话：

猪八戒的妈妈不知自己长得丑，经常涂脂抹粉，扶着栏杆引人看，吓得年轻后生不敢从她楼下过。说得大家捧腹大笑不止。陈说：“现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虽不是猪八戒的妈妈，倒像猪八戒的爸爸。”^④

① 《瞿秋白研究》1，第381页。

② 《瞿秋白研究》1，第381—382页。

③ ④ 《瞿秋白研究》1，第383页。

秋白之所以能复述陈独秀的谈话,自然是因为留的印象深,是因为他很注意从陈的谈话中学习。他来复述就是宣传陈独秀的看法,就是告诫大家,同时也是自勉,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连自己的“丑”都不知道,还要文过饰非,把群众都吓跑了;同时,他复述陈独秀的谈话这件事本身,也是他对陈独秀的感情的表现。杨之华也说过,陈独秀和秋白,因工作分歧而争论是常事,但相互说些聊以自娱的幽默话,也是常事。^①

3 “八七”会议之后,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那是共产国际的意图,同时也是党的会议选举的结果。秋白却是在“不愿”取代陈,而又“没有别的办法”的心情中取代陈来主持工作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陈独秀由于犯了他自己承认并在后来的文章中真诚地作过自我批评的“机会主义”错误,由于党的多数人已经不再信赖他了,由于他对于新的方针还有所保留,即对于共产国际的主张和党的大多数人都赞成的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他有抵触情绪,认识上的差距也比较大,所以他实际上也不再适合继续主持工作。从他自身的心情来看,由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决策者们把大革命失败的党内原因主要归之于、甚至有完全归之于陈独秀的错误的倾向,也由于他的性格弱点,陈独秀已赌气不怎么问事了,他说“国际”把他当了替罪羊。所以,他实际上不好再主持工作了。这时,共产国际曾要他到莫斯科去——那是安排他的工作的一种办法。但他也赌气不去。这时,秋白仍经常去看望陈独秀,征询他对工作的意见,并动员他去莫斯科。^② 秋白如此做法,决不单是例行职责,而显然

^① 《瞿秋白研究》1,第397页。

^② 《瞿秋白研究》1,第383页。

是带着对陈独秀的敬意和在长期共同工作、奋斗中深潜于心的感情的。然而,陈独秀十分倔强,他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首先要检查,他决不做斯大林的替罪羊。他说:“共产国际一方面批评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方面又要我去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工作,岂非自相矛盾了?”^① 陈独秀终于没有去莫斯科。但此后,秋白还是像往常一样安排他的生活,还约他为党刊《布尔塞维克》写稿。

4 1929年,陈独秀与中央的矛盾尖锐化,而且确有非组织活动,他公开批判和反对中共“六大”的方针,联系彭述之等人,有与中央对立的行动。中共中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当时瞿秋白在莫斯科,他在处理陈独秀的过程中究竟有怎样的意见和表现,没有留下详细记载。但可能也是同意的,至少是没有阻止这件事。

后来,当瞿秋白自己也由于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意识,表现出对共产国际和俄共某些有“老子党”倾向的人物、对米夫王明宗派的抵触情绪而被撤销中央领导职务的时候,秋白也许会想起陈独秀吧?他在《多余的话》里多次提到陈独秀,固然是所述内容的需要,但是说到当陈独秀的翻译和被陈邀回国,说到“独秀就退出中央”,“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说“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说到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时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等等的时候,秋白显然仍旧表现了对陈独秀的感情。当他把自己的升沉与陈独秀的遭遇作比照的时候,也许还有更深的、

^①《瞿秋白研究》1,第397页。

潜隐的复杂心境吧！

情谊深厚的俄国朋友

1 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他们年仅9岁的女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了。那么小的孩子，虽说能在提供食宿的国际孤儿院里受教育，可完全没有家庭温暖，总让人放心不下啊。秋白夫妇就拜托鲍罗廷夫妇作为“爷爷”、“奶奶”来照顾小独伊。每逢假期，每当小独伊生病的时候，或者别的需要家庭照管看护的时候，鲍罗廷夫妇就把她接到家里来，给她家庭的温暖、亲人的爱。鲍罗廷的小儿子也乐于以“保护者”自居，爱护和关照小独伊。这件事不能单用鲍罗廷的国际主义精神来解释，还应该从中看到秋白与鲍罗廷及两个家庭之间的友好情谊是不同一般

的。

瞿秋白与鲍罗廷这位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友谊主要是从1923年秋鲍罗廷开始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苏联派驻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鲍罗廷离华4年中建立的。秋白第二次赴俄期间即1928年至1930年,他们仍然有些接触。

2 鲍罗廷出生于1884年,俄国共产党员。来华之前,他担任共产国际密使多年,曾经在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德国、英国工作过,是一位文化素质很高又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革命政治家、外交家。在俄共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中,他的影响最大。他对中国革命是尽了自己的努力的,也应该说是有很大贡献的。他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致力于国共合作,发展中国革命力量,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形成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北伐为标志的革命高潮,带出了中国共产党一批年轻的革命家,团结了国民党左派人上等等。大革命虽然失败了,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公开反共,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在总结教训的时候我们可以指出他在见解、策略、举措等方面的缺点、错误,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他是始终为争取胜利而尽其最大努力的,不能不看到他在主要的方面和许多实际工作上是正确的,更不能不看到他多年的工作所产生的深层影响。

鲍罗廷所指导过的中国青年革命家之中,瞿秋白是得到教益最多的一个;自然,鲍罗廷从中国战友那里也得到许多帮助,受到很大启发,获得精神上和认识上的教益。

鲍罗廷于1923年9月一到中国,瞿秋白就做了他的俄语翻译(英语翻译是张太雷)。10月上旬,秋白与鲍罗廷一起到广

州。18日孙中山签署了任命鲍罗廷为改组国民党特别顾问和指导的委任状。鲍立即投入工作,指导并亲自动手起草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瞿秋白就协助鲍罗廷开展工作,不单是翻译。鲍罗廷请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团中央执委先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案,决定力劝孙中山召开改组会议;秋白也参加了讨论,然后作为翻译与鲍罗廷一起与孙中山商谈。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并成立改组工作执行委员会,讨论改组的必要性和具体计划。孙中山指派廖仲凯、谭平山参加,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在这次特别会议上,改组工作执委会通过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决议。1924年1月18日,准备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人在广州开会,主要听取鲍罗廷的报告,讨论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工作;瞿秋白作翻译,同时也是代表。1月20日至30日他们一起参加国民党“一大”。所以,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对改组国民党的贡献时,是把瞿秋白与鲍罗廷并提的。

1924年春到7月,秋白的爱妻王剑虹生病以至病危、去世那段时间,秋白由于要在广州协助鲍罗廷工作而难以经常在上海照顾剑虹。六、七月份正是国民党右派大搞“制裁”共产党活动的“检举案”、“弹劾案”的时候,秋白与鲍罗廷及其他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反击右派。7月16日秋白进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鲍罗廷为该委员会顾问。秋白于7月间回上海看护病危的剑虹,剑虹病逝,办理完丧事后,他又立即回广州。8月,国民党中央政委会、执委会连续开会,讨论“弹劾”等问题,秋白、鲍罗廷密切配合,多次发言有理有据有节地驳斥右派,争取左派,取得了反击“弹劾”的胜利。

1924年秋,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全会批评了鲍罗廷,说他在军事政策上给予国民党帮助,实际上加强了国民党右派的

反动势力,认为鲍罗廷犯了一系列错误。^①这个决议是在瞿秋白写了关于广东省的路线的报告后作出的。瞿秋白个人的意见与鲍罗廷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更不同意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把国共合作中的矛盾看得那么尖锐,似乎就要决裂了。他实际上在陈独秀、魏经斯基(也是共产国际代表,主要驻上海)与鲍罗廷之间大致居中。他和鲍罗廷在许多共同的工作中,与国民党人接触较多,比较清楚地看到右派的反共阴谋。但当时,他也认为与左派的合作尚大有可为。从1924年冬天起,秋白主要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而不能常与鲍罗廷一起工作了。

秋白与鲍罗廷分在两地工作期间,多有书信联系。从现在收编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里的书信看,虽然主要是谈工作,谈情况,有时代表中央说话,意见也有分歧,但是,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情感很亲近。

亲爱的鲍罗廷同志:

我早就应该给你写信……

您与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您何时到达这里?

您的夫人已经来了。

这是1924年4月5日的信,有近2000字,详细叙述评议了许多事情。5月6日写信时才隔1个月,他就说“又有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可见他们通信之经常、感情之亲近。这封信又是1000多字,谈了许多具体情况。6月份有好几封信。6月20日的信以具体事例告诉鲍罗廷,国民党“右派早已开始准备公开反共反俄”;并转达了陈独秀的意思:想知道孙中山本人的态度。7月14日,秋白在上海照顾病危的妻子期间,仍然有信致鲍罗廷,

^① 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99页。

谈的是什么时候能到广州去及国民党右派在上海的活动情况。

1924年10月8日,秋白受中共中央委托把中共中央全会决议寄给鲍罗廷并知会鲍就“您同中共中央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原则分歧”到上海“进行政治磋商”。10月21日仍然主要谈共产党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请鲍把拟定的上海《民国日报》编委名单尽快呈送孙中山,以防右派把持该报。此外还代于右任请求鲍罗廷以私人方式借经费给上海大学。

3 鲍罗廷于1926年底到武汉,次年3月瞿秋白也到了那里。共同在武汉的四个月中,秋白尽管工作很忙,但仍常去看望鲍罗廷;同时因工作上的联系也常会面,特别在党的“五大”期间,他们简直是朝夕相处。在一些问题上,秋白与鲍罗廷的意见也有分歧,但那都是同志间切磋讨论,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迅速恶化,鲍罗廷和秋白的工作特别艰难和紧张。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和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不怎么问事了;在中共中央的工作上,鲍罗廷与秋白商讨倒比以前多了。当时鲍罗廷住在原德租界西门子洋行,称鲍公馆;秋白身体很差,常咳嗽,有时还吐出血丝,但他仍常跑到鲍公馆去。跟着秋白去鲍公馆作会议记录的人后来回忆说:

会议室是在一间前半间的房子里,也没有会议桌,同志们都在四周乱坐着……鲍罗廷出来了,我看他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八字胡须,坐在中间一个高靠背椅上,两手置膝,态度很严肃,一口英语,说话很慢,表现着刚毅、沉着,但生动而富有感情……由张太雷译成中国话……

……鲍罗廷约讲了一个多钟头……他特地问秋白:为什么不好在长城内外塞北一带组织赤色马队?像我们哥萨

克马队那样……与反革命势力相周旋。

会议一连开了两个晚上,秋白丝毫没有倦意……^①

这大概是6月初的事。一个多月后,7月15日汪精卫悍然举行所谓“分共”会议,公开叛变了。在此之前,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五人临时政治局。鲍罗廷通知瞿秋白和蔡和森赴海参崴,通知陈独秀赴莫斯科。这或许是在危险时刻既组成应变的临时指挥班子,又隐蔽部分精干力量的意思。但当时的形势瞬息万变,赴海参崴的决定没有执行。7月13日,鲍罗廷与瞿秋白秘密离开武汉,上了庐山,秋白住在仙岩客寓。接着举行了一个会议,瞿、鲍听取李立三、邓中夏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可能性和成功可能性如何的汇报。秋白表示赞成起义。这之前,鲍罗廷已接到调他回莫斯科的通知。他在与秋白等商议起义之事后曾到住在牯岭的宋子文那里,宋建议他取道上海返苏。宋庆龄则劝他千万不要听宋子文的,说宋“是不可信的”。后来,7月27日,鲍就辞别宋庆龄、秋白等,带着他的顾问团汽车队,取道洛阳、西安、平凉、固原、宁夏,穿过戈壁沙漠回苏联。10月才到莫斯科。

半年之后,1928年4月,秋白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袖离上海到莫斯科筹备党的“六大”。独伊回忆说:

1928到1930年期间,父亲再次来苏联工作时,也常和妈妈一起带我去鲍罗廷家做客,让我称他和他的夫人为“爷爷”和“奶奶”。鲍罗廷夫妇有两个儿子,长子弗雷德,次子诺尔曼。^②

秋白夫妇回国后,鲍罗廷夫妇对小独伊照顾得非常好。数

^① 羊牧之回忆。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98—99页。

^② 瞿独伊:《寻觅双亲的足迹》,见《瞿秋白研究》1,第373页。

十年后,独伊还深深铭记着“最疼爱”她的“爷爷奶奶”鲍罗廷夫妇和有“骑士风度”的、很爱护她的诺尔曼。独伊说,当时鲍罗廷在主编用英文出版的《莫斯科新闻》,“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时常在夜间醒来,从自己的地铺朝写字台偷偷地望去时,总会看见他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高大身影,同时听见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①

除了独伊,在国际儿童院的苏兆征、张太雷、蔡畅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也得到了鲍罗廷夫妇的照顾。两位老人给了这些远离父母或失掉父母的孩子以温暖和爱。秋白牺牲后,杨之华再度赴苏,工作到1941年,她也受到鲍罗廷夫妇的亲切关怀和照顾。

后来,鲍罗廷在苏联扩大化的对敌斗争中,遭到极大的冤枉和杀身之祸。

^① 墨独伊:《寻觅双亲的足迹》,见《瞿秋白研究》1,第373页。

与毛泽东是好朋友

1 冯雪峰很熟悉毛泽东,更熟悉瞿秋白,他曾说:“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① 长征路上,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杀害的噩耗传到毛泽东那里,他沉痛地对雪峰说:

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②

红军于1934年10月要从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包围中突围,撤离江西苏区远走高飞的时候,瞿秋白正在苏区。他要求随军远征。但是,当时的决策者们无理“拒绝”了他的请求。伍修权回忆说:

在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下……

^①《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

^②冯夏熊:《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见包子衍:《雪峰年谱》,第74页。

连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陈毅、项英等是被留在苏区负责中央局工作的。——引者注）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①

领导干部的走还是留，当时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张闻天回忆说：

当时关于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的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②

重大战略决策要保密是应该的，但连被留下来主持“留守”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项英、陈毅都不让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作为中央常委的张闻天也只能依通知行事，连他提出带走秋白的意见最后也被“三人团”否决，这更是不正常的。如果“留守”的确需要秋白，“留”也是应该的。可是，红军主力撤离之后，中央苏区将立即被蒋军的铁蹄践踏，“留守”的人处在极其艰苦危险的游击环境之中，将难以自存。后来的事实证明，连陈毅、项英那样身强力壮、带着武装部队的军人，都是九死一生啊！在“三人团”作决定的时候，其实是预料到了红军主力撤离之后的情形的。在主力撤离时让一些人“留守”，从军事布署来说，自然

①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

② 转引自上观泉：《瞿秋白传》，第621页。

是必要的,但瞿秋白身患重病,一直比较衰弱,还有年已花甲的何叔衡等,是完全不适应“留守”的游击环境的。因而,当“三人团”决定留下瞿秋白的时候,有许多人替他抱不平,他自己也为此而“心情有些激动,但没有吭气”。^①然而,留下秋白的这个决定,却是由身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青山”会议上宣布的。但他不是决定留下秋白的人,他当时也是被排挤打击的人之一,被排斥在最高决策层之外。只是由于他还担任着政府主席的职务,开那种会要由他来念一念名单。毛泽东有苦难言。吴黎平回忆说:

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同志这样的同志,怎样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②

毛泽东对把秋白、何叔衡、刘伯坚,还有他的爱弟毛泽覃留在苏区这件事非常气恼。这几个人牺牲后,他曾经就这件事明确地说过如下的话:

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应该带出来的。教条主义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③

将来要跟他们(指宗派主义者。——引者注)算帐,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④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的

① 吴黎平回忆。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66页。

② 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66页。

③ 莫文骅、苏进:《冯雪峰在长征途中》。转引自王观泉:《瞿秋白传》,第622页。

④ 陈早春:《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见王观泉:《瞿秋白传》,第622页。

统治之后,毛泽东曾经从遵义打电报给留在苏区的中央局同志,要他们妥善安排瞿秋白。^①

2 瞿秋白与毛泽东,在苏区时同是宗派主义者的打击对象。他们之间颇有交往,感情不错。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瞿秋白继续担任中央教育部长和中央工农政府委员。但是由于当时在苏区执行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所以瞿秋白虽然非常努力地深入群众,刻苦工作,但在情绪上是抑郁的。他写过不少诗歌,同毛泽东互相唱和,表达了自己的忧愤之情。^②秋白在苏区时的秘书庄东晓回忆说:

王明极左路线者在反盲动主义的幌子下,篡夺了党的领导,把白区的党的工作葬送了,搬进了中央苏区,又把毛主席一手创建的中央苏区也搞垮,连毛主席本人也受到排斥和打击。瞿秋白同志是毛主席最接近的战友,在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问题上,两人的观点经常是一致的,可是这时都遭到排挤,他们的内心该是多么沉重啊!可是每次见到他们两人,总是面带笑容,还常在一起谈笑咏诗呢。^③

由此可以看出,瞿秋白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虽然都受着排斥和打击,但他们还是常到一起谈谈心,还有“唱和”、“咏诗”的情形,也许是相近的政治处境给他们之间的情谊增加些新的内容吧。

可是,瞿秋白与毛泽东的相交却远在这之前。最早当是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

① 吴黎平回忆。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66页。

② 吴黎平回忆。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65页。

③ 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见《忆秋白》。

党的“三大”是在1923年6月召开的。瞿秋白和毛泽东都是大会代表，都住在广州东山区恤孤院后街路南的“春园”里。他们几个好友张太雷、蔡和森等都在一起。大家对大会中心议题“国共合作”的意见也是一致的，都坚决主张合作。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组织部长，瞿秋白在宣传部工作。会后，他们也都作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他们又会晤了。他们都是大会代表，又都被选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会后，他们又都回到上海，毛泽东做国民党上海分支机构的组织部长，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也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参与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瞿秋白在国民党改组中的重要作用，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后来论及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和重大作用时，举了两个人作例子，他说：“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①1924年7月，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瞿秋白曾应邀在那里讲过课。1925年1月，他们又一同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四大”，瞿秋白被选为中央常委。毛泽东在会上讲农民问题，得到瞿秋白的支持。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他们又共同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羊牧之回忆说：

他(指秋白。——引者注)以极其兴奋的心情第一次向我提到了毛泽东：在……大会(指国民党“二大”。——引者注)讨论决议的休息时间，我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代表正在凭栏远眺，刚好戴季陶等几个顽固派人物也上楼来，我出于礼仪，主动上前和他们几个握了手，毛泽东当然也去逐个

^①《“七大”工作方针》，见《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握了手,但与戴季陶握手时,毛爽朗地笑着说:“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弄得戴季陶十分尴尬。

秋白边讲边点着了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继续说: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党的优秀工作者。有一次,我与张太雷谈到毛时,他也钦佩地说:还是这位湖南辣子来劲。^①

3 1927年,毛泽东经过深入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送到中央,但只在党刊《向导》发表了一部分就停发了。瞿秋白到武汉后读了这个报告,认为很好。4月份他主持中宣部工作后就叫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以使之更广泛地传播。他把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是打算出套农运丛书。他还为该书写了序言。他说: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②

主持出版毛泽东的《报告》并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序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产生了重大作用。从两个人的关系来说,这是瞿秋白对毛泽东的深切理解和巨大支持,也说明两人在农民革命问题上,在党的路线问题上是一致的。当时,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国民党右派和新旧军阀一起大骂革命农民和他们的领头人毛泽东、彭湃等人的时候,在党内有的同志怕得罪国民

① 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84页。

② 《瞿秋白选集》,第347页。

党而不敢支持甚或抑制农民运动、对毛泽东的主张抱怀疑态度的情况下，瞿秋白这样鲜明地支持农运和毛泽东，并在序言中讲革命农民“实在‘无分可过’”，讲“革命家”们“都要”像毛泽东那样代表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真是太难能可贵了。毛泽东之所以对秋白“很有感情”，说是“好朋友”，与此事大有关系。

后来，在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上，在贯彻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上，他们都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秋收起义和海陆丰农民起义之后，瞿秋白在1927年12月上旬写的《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一文已开始触及到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农村开展的问题，触及到“创立革命的地域”问题，这种认识上的新推进，也是与总结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创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相关的。

在瞿秋白直接主持中央工作的后期和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他们两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毛泽东对当时中央的“路线”有意见，自然也涉及秋白。但从他们后来在苏区的关系来看，毛泽东对秋白个人并没有什么意见，他们还是非常重视彼此间的友谊的，都是以革命为重的。

瞿秋白牺牲后，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次会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和通过的。这个决议说瞿秋白是党的“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被打击以后仍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牺牲时表现了“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这也代表了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和感情。

1950年，毛泽东为出版《瞿秋白文集》的亲笔题词说：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

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①

毛泽东这一题笺不仅是他在理性认识上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而且是带着对烈士、对早早失掉的好朋友的深深感情的。

^①《瞿秋白选集》卷首。

与鲁迅的生死之交

1 许广平回忆鲁迅与秋白于 1932 年夏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说：

鲁迅对这样一位稀客，款待如久别重逢有许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满堂皆春，生气活泼……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太快了似的。

他们“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秋白语）。一位是著名的革命领袖和天才作家，一位是文学泰斗、文化革新的精

神领袖，他们早就互相神往。1931年4月起，瞿秋白介入上海左翼文化界的具体活动，在与茅盾的接触中就常常问起鲁迅。5月，冯雪峰在茅盾家里初次见到瞿秋白，秋白读了雪峰送来的《前哨》杂志上鲁迅的文章，即追悼左联五烈士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赞曰：“写得好，究竟是鲁迅！”从此，秋白与鲁迅以雪峰为中介建立了经常而密切的联系。他们没见面就很亲密的情形，可从雪峰的回忆中略见一斑：

两人没有见面……秋白同志已经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鲁迅先生，对他表示着那么热情了。在鲁迅先生也是差不多，只要有俄文的或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就交给我说：“你去时带给他罢！”

瞿秋白与鲁迅在见面前就有多方面的合作。曹靖华寄来小说《铁流》译稿，没有译序文，鲁迅请秋白翻译，秋白就赶紧译了出来，并有信致鲁迅和雪峰。不仅以“迅、雪”称呼，信文的内容、语气、表述方式也已经是挚友之间才有的了。鲁迅在《铁流》译本后记里写道：

缺少一篇好的序文……幸而“史铁儿”（秋白笔名。——引者注）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托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是尽了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

鲁迅据日文译文转译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珂德》，译文第一幕已在《北斗》杂志发表，但得到俄文原著后就中断了自己的翻译，而请秋白按俄文原著翻译。秋白译完，鲁迅联系出版，写后记，译《作者传略》，选来木刻插图，并亲自校对。他在后记中说德文和日文译本都大有“删节”，自己“怀疑”起来，

然后写道：

编者竟另得了从原文直译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场登下去（指在《北斗》杂志上接着第一场连载。——引者注），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后来辗转觅得未刊的译稿，则连第一场也已经改译，和我的日译颇不同，而且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给它出版，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的。

“不可以言语形容”的“高兴”、“极可信任”、“极可庆幸”等话语，既是深厚真情的流露，又是经过慎察深思而出于理智的重视和信任。

秋白读了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小说《毁灭》之后，于1931年12月5日写了一封长达6000余字的信给鲁迅，鲁迅于28日复信，也很长，约4500字。人们都很重视他们这两封信互称“敬爱的同志”这一现象，因为这在鲁迅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但更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是事情的经过和信的内容。秋白认为鲁译本《毁灭》的出版“极可纪念”，文学战线及每位中国读者都“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他称赞译文“非常忠实”，说由此可见“一个诚挚、热心，为光明而斗争的人”是“刻苦而负责”的；还说“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看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信的大部分篇幅坦诚而恳切地阐明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批评严复、赵景深，认为他们或者“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或者“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主张是拿读者“开玩笑”或“学阀主义”，提出要“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的主张；同时指出鲁迅的译文中把“新的……人”中的“人”译成“人类”和某句中缺少“甚至于”一语等不完善之处，还认为“我们的同志”所作的“为着保存原作精神”而容许“多少的不顺”的结论是不对的，应该连同

翻译实践中的缺点一起作自我批评。秋白恳切地谈自己的上述意见,与鲁迅商量,然后写道: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①

鲁迅一面较前更深地感到秋白的真挚情谊,一面又极看重秋白深刻而有系统的意见,于是立即将秋白的来信加上标题《论翻译》,送给左联刊物《十字街头》,发表在当月出版的第一、二期上。秋白的信发表后,鲁迅于12月28日复信,一方面表达读秋白来信“非常高兴”的心情,表达自己与秋白共同的对《毁灭》的爱——爱它就像爱“亲生的儿子”,并且由此“想到儿子的儿子”,想到既然共同认为已取得的“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就“很希望多人合作”扩大胜利;更一方面,鲁迅并不像某些“谦谦君子”那样虚浮敷衍,假客气地完全赞同对方所说的一切,而是也同秋白一样极其坦诚而恳切地阐明自己关于翻译的意见,与秋白不同的看法也说出来,真诚地切磋。他根据翻译史实和自己读严复译作等的体会,作具体分析,指出不可将赵景深与严复相提并论,认为“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关于翻译的“信”与“顺”,他把读者分为三个层次,认为对应文化程度高的、中等的、识字无几的,翻译该有不同要求,对较高程度的“至今主张‘宁信面不顺’”,不必要求“完全中国化”,“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以使中国“群众的语言……丰富起来”,“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

^①《鲁迅全集》4,第378页。

一种“进攻””。^①他们就是这样，既不回避不同的看法，以自己的独特见解同对方商量，又互相敬重而十分亲密。鲁迅的“很希望多人合力”这句话，字面意思之外，显然有热诚约请秋白与之更多更密切“合力”的深意。

二人见面前就很亲密还与共同反击打着“民族主义文学”幌子的鹰犬文艺有关。1931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长潘公展、上海市政府委员朱应鹏、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兼政府电影检查委员王平陵、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国民党军官黄震遐等一班人，按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策划，借用“民族主义”招牌搞“运动”，抹杀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以国民党及其政府冒充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妄图蒙骗被压迫、被剥夺的人民群众屈从其统治；同时凶恶地把矛头指向觉醒而起来反抗的民众及其精神代表“左翼”文化，指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这是国民党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的同时发动的文化“围剿”的一部分。以鲁迅为首的“左联”当然要反击。瞿秋白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三期（1931年8月20日）、第四期（9月13日）连续发表《屠夫文学》（后改篇名为《狗样的英雄》）和《青年的九月》两篇反击文章，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鼓吹战争”、“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在民族危机中，不仅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而代表反动“绅士”、“豪商”的利益，“保卫帝国主义宝座”。他还写了《非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等杂文揭露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者及其主子的丑恶面目和灵魂。鲁迅紧接着于10月里发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显然是与秋白联袂作战。鲁迅说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宠犬”文学、“流尸”文学，他举黄震遐

^①《鲁迅全集》4，第380—383页。

的小说《陇海线上》、剧诗《黄人之血》等为例作分析,揭露那帮以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为主子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者”的虚伪本质及“沉滞猥劣和腐烂的命运”。他说,他们将“永含着恋主的哀愁”,“只尽些送丧的任务”。秋白与鲁迅这样密切配合着战斗,友情自然步步增进。

2 1932年夏初,很可能是5月14日,秋白去拜访鲁迅,二人初次会面^①;9月1日,鲁迅、许广平带着海婴到秋白夫妇的住处过了一天。此后的来往更加密切起来。秋白一直被敌人追捕,多次在危险的时候,是鲁迅掩护了他。

第一次是193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11月快到月底的时候,发现有个叛徒盯上了杨之华,秋白立即到鲁迅家,杨之华甩掉盯梢的敌人后也来到鲁迅家。许广平回忆说:“秋白……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指秋白和鲁迅。一引者)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至极。”秋白这次在鲁迅家避难期间曾于12月7日把青年时代写的一首诗书赠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

秋白录出青年时代这样一首诗书赠鲁迅,而且写了这样的

^① 刘福勤:《瞿秋白与鲁迅初会时间新证》。

话自评其诗并且说多年相隔、心情变化,这是很有特殊意义的现象。我以为这至少可以证明,当时他们之间的谈话已经非常深入,连身世、青年时代“忏悔的贵族”似的精神状态等都谈到了,自然更有现时心灵的沟通。这一首写于早年的诗,在1932年这个时候书赠鲁迅,录写时又恰值寒冬,诗中“雪意”、“凄”、“心惘然”、“旧梦……如烟”、“折梅”、“伴醉”,倒更像从某种意义上写现时环境和心态。当时秋白外受敌人追捕,内受宗派打击,“雪意”“天寒”正是写照;20年代曾有的革命政治宏愿和路线策略及各种具体目标步骤设计,现在由于被撤掉中央领导职务,在革命政治的重大举措上已不能再有作为,这与“旧梦……如烟”可以相合;尽管环境恶劣艰危,自己严重受挫,却能处之泰然,精神另有寄托,文学上、文化上的事做起来倒挺惬意的,亦不乏浪漫自得的色调,“犹折梅花伴醉眠”的诗句不正可表现这种精神状态吗?所以,我们可以把秋白书赠鲁迅诗看作他同鲁迅心灵深层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青年时代”“恍如隔世”云云,只可看作表层,看作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借诗来隐含现时的环境和心境。12月9日鲁迅日记中记着“下午维宁(秋白笔名。——引者注)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25日有“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的记事。许广平回忆说,赠玩具时秋白在盒盖上写明某个零件有几件,共几种等等,都很详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小孩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秋白自指,当时过‘地下生活’为防走露风声,他用过许多化名,何凝、何苦都是,在鲁迅家就称何先生。——引者注)!”鲁迅12月25日收到的信是秋白夫妇从鲁迅家刚刚搬到别处住之后向鲁迅报平安的信。这次是陈云在“一个深晚”把秋白从鲁迅家接走的。陈云在1936年10月20日为追悼鲁迅写的文章记下了这件事:

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保护了……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深夜十一时许……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鲁迅……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的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回头望去，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①

秋白第二次在鲁迅处避难是1933年春节后约十天即2月5日至10日之间的某一天。1932年12月下旬到1933年2月初，秋白夫妇住在党的一个地下机关里。杨之华说，当时警报接踵而来，他们只得又到鲁迅家避难。鲁迅日记2月4日有“得维宁信”的记事，说明这时秋白尚未到鲁迅家，他也许就是说要来的。2月10日有“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的话。靖华即曹靖华；它，指秋白，因为秋白有个笔名叫“屈维陀”，陀字有时写为“它”，鲁迅在日记中像用“何先生”、“维宁”指秋白一样，有时也用“它”字，这是为了安全，万一日记落到敌人手里，也不会暴露。鲁迅给曹靖华写回信，秋白恰和鲁迅在一起，才有可能也写信给曹靖华，由鲁迅附寄。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五，秋白夫妇在这一天或前几天再次搬到鲁迅家住。3月1日鲁迅在日记上记着“同内

^①《人民日报》，1982年5月3日。

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的事；3日又记“往东照里看屋”，并有“内山夫人来并赠堇花一盆”的记事；6月有“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的记载。“看屋”是为秋白夫妇找住所，结果在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租到一个亭子间，可能是为了安全，租日本人住的房子，而请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夫人出面交涉。鲁迅3月6日“访维宁”和赠花，是秋白已住进东照里12号了，鲁迅去贺其乔迁。不久，鲁迅一家于4月11日搬到大陆新村9号住下，与秋白的住处在同一条路上，一在路南，一在路北，离得很近。杨之华回忆说：

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鲁迅几乎每天……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像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我们舍不得鲁迅走。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声、愉快和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亭子间里。他还经常留下一些书刊。这些，都使秋白深感欣慰。^①

秋白夫妇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是在1933年7月下旬。他们6月初按中央局的意见从东照里搬出，去和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同住，便于为一个通讯社审改稿件和为党刊写文章。但与冯同住不到两个月，省委机关被敌人发觉，牵连到他们的住处，得到紧急警报后半小时内必须搬走。这么紧急，别人还好办，秋白到哪里去呢？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里说，他和秋白夫妇“不约而同”地认为还是到“周先生家里去罢！”于是，秋白夫妇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冯雪峰和杨之华都清晰地记得那天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35页。

下大雨，秋白夫妇正好可以坐黄包车，扯闭了车篷，在挡雨的同时也挡住特务的目光。从鲁迅日记看，七月下半月只有21日“下午雨”，26日“雨，午晴”。秋白当是在这两天中的一天到鲁迅家的。这一次大约住了几天，杨之华被分配了工作，夫妇俩便“搬到机关去住”了。^①

第四次是一个多月之后。杨之华回忆说：

同住在机关里的是高文华同志一家。过了一个多月，在一个深夜里，忽然传来了警报……已是凌晨两点钟了，秋白和我先后坐着黄包车到鲁迅家里去，恰巧差不多同时到达，只是一个在前门，一个在后门，……惊动了鲁迅全家，秋白和我深感不安。但鲁迅夫妇仍一如既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鲁迅体贴地让许广平同志为我们准备了夜餐。^②

这一次也是住了几天。《鲁迅日记》9月3日有“得宁华信，即复”记载，可能是秋白夫妇这次避难后搬到别处住时的来信。

许广平的回忆把第三次和第四次误记为一次，把秋白夫妇深夜到来这一次误记为7月里的事了。按杨之华、冯雪峰回忆，第三次是与冯雪峰一起接到警报，夫妇俩一同在白天冒雨而来，雪峰晚上来看秋白和鲁迅时，他们二人“正谈得起劲呢”；第四次是与高文华一同得到警报，在深夜里，秋白夫妇俩分开先后而来。冯杨二人的记忆显然较清晰。但是许广平所述秋白夫妇深夜到来的情形与杨之华的回忆也有相合之处。她写道：

约在深夜二时左右……连鲁迅……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前面大门（向来出入走后门）不平常的声音敲打得急而且响……鲁迅要去开门，我拦住了他以后自己去开，以为如果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40页。

^②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40页。

是敌人来逮捕的话,我先可以抵挡一阵。……是秋白……仓卒走来。……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迅速而急迫……原来是一场虚惊。但东邻住着的日本人和西邻住着的白俄巡捕都开窗探望这不寻常的事件,我们代秋白夫妇担心也不是偶然的了。^①

当时,鲁迅的处境也很危险。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铨遭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鲁迅也是该同盟的执行委员,据说蓝衣社早已把他列入了暗杀名单,人们盛传杨之后就轮到鲁迅了。秋白多次劝他要注意安全,劝他到苏联疗养和编写中国文学史。他却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倒是反过来热诚地劝秋白到苏联养病和写作,说:“你写作的环境比我的坏得多。”他曾向曹靖华谈秋白的困难处境说:“他不断受猎犬搜索、追逐。他像地老鼠似地到处逃。有时一天迁三四个地方。有时被追逐得不得已,跳上野鸡汽车,兜几个圈子,到半路再下来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就逃到这里(指鲁迅家里)。”秋白处境如此,到鲁迅家避难,鲁迅也冒着身家生命的危险多次掩护秋白。单从这样的事实也可看到他们之间的情谊是多么深厚!

3 鲁迅曾非常郑重地把一副联句亲笔书写为条幅赠给秋白:

疑欠道兄属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洛文录何瓦琴句

^①《瞿秋白研究资料》(下),第360页。

鲁迅为了表示对反动势力的愤慨,分别取“堕落”二字的上半和下半,加上“文”字,拟为“隋洛文”这一笔名。“洛文”又从“隋洛文”变来。署此名表示自己和秋白一样是被恶势力所不容、被追缉的人,表示二人是患难中的同道至交。

鲁迅这幅字写于秋白夫妇第二次在鲁迅家避难之后,即秋白夫妇住到东照里、鲁迅家于1933年4月搬到大陆新村9号、秋白编好《鲁迅杂感选集》并写成序言的时候。

对于鲁迅,尤其对于他的杂文,敌人是忌恨、诬蔑和必欲灭绝之而后快;文化倾向与鲁迅相反的文人们是反感、攻讦和贬低;左翼文化界内部和比较进步的人士中也有不少人虽在一些重要方面基本肯定鲁迅,引为同道,却还是很不了解,缺乏深层的理性认识和较切近的情感融通,也不那么重视鲁迅杂文,有的甚至在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幼稚的文化理论影响下,怀疑、敷衍、冷淡或非难鲁迅。秋白是在这种情况下选编鲁迅杂感、写那篇著名序言的。他曾对杨之华说:“我和鲁迅谈了不少,又反复研究了他的作品,可以算是了解鲁迅了。我有必要选编他的杂感,不但因为这是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①

瞿秋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在杨之华的掩护下用四个夜晚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序言,把鲁迅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放在中外文化关系和世界文化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系统方法,作实事求是的研究;把鲁迅杂文与鲁迅道路、与鲁迅其他作品、与鲁迅精神结合起来,作综合性的考察分析,具有宏大的理论气魄、深切的文化史感、惟真是求的科学性和强烈而切要的现实性,第一次比较充分地肯定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36页。

了鲁迅杂文的文化价值,比较中肯地论述了鲁迅及其杂文在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序言》指出,鲁迅是近现代中国和世界特定历史环境产生的“现代式”知识分子之一,虽然“背着士大夫阶级和宗法社会的过去”,但他具有“对科学文明的坚决信仰”,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诅咒自己的过去”,“竭力的要肃清”旧的社会文化“这个肮脏的旧茅厕”。秋白从文化素质和心理上指出鲁迅的倾向和特点及其发生的原因,并且依历史程序具体分析了鲁迅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三次大分裂中的战斗历程、思想进变和精神状态。他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阵营里来的”;“从满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党、陈西滢们……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都是他所亲身领教过的。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鲁迅的宝贵传统:1. 最清醒的现实主义,2. “韧”的战斗,3. 反自由主义,4. 反虚伪的精神。

《序言》写成之后,鲁迅到秋白住处来的时候,秋白拿给鲁迅看,“鲁迅认真地一边看一边沉思着,看了很久,露出感动和满意的神情,香烟头快烧着他的手指头了,他没有感觉到”。^① 鲁迅很看重这篇序言,后来与冯雪峰谈起这篇序言时曾说:“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中说:鲁迅说这话的时候,“态度是愉快而严肃的,而且我觉得还流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37页。

露着深刻的感激的情意”，是“自自然然”的“对战友的感激”。^①据许广平《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一文所忆，鲁迅还说：“只是说得太好了，应该坏的地方也多提起些。”

4 自从秋白第一次到鲁迅家避难，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深了。前文所说四次避难的情形、秋白选编鲁迅杂感、鲁迅书赠条幅等均可见其不同寻常的亲密，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志同道合，而是更深的心灵相谐、感情融通。此外，还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他们这种亲密关系的深化。

第一件事是1933年2月，他们合作编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英国剧作家萧伯纳于2月17日到上海，宋庆龄在家里设便宴招待，同席还有鲁迅与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史沫特莱等。当天下午，世界笔会中国支会会员在世界学院聚会欢迎萧，蔡、鲁、林等陪萧出席。从这天起，上海许多中外报刊发表了形形色色的文章。一时间，满城传遍了萧的“幽默”、“讽刺”、“名言”、“轶事”，把他宣传得仿佛是西洋唐伯虎似的，把他弄成一个“戏台上的老头儿”，把他正正经经说的真话，改变得只是滑稽的“幽默”而已，妄图掩掉真实的萧。有的说他像他自己的剧本《鳏夫的家庭》里的人物特仑池“迷糊”、“彷徨”；有的说他“不诚恳”；有的说他自相矛盾，既是富翁，生活奢华，坐在安乐椅里，就没资格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既讲这主义就该先散尽家财。起初，有人想利用他，说他是“和平老翁”，说他“伟大”等，当看到他不仅不能被利用，而且表现出作为“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的思想和态度，就说他“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32页。

肉”。有的文章还无聊到专门把他夫人写成“褐色的老婆子”“眼睛下面的肌肉,松掉了”,把他对夫人的爱说成“怕老婆”。在北京的胡适说:“北平教育界及学界决定在萧游北平时不予接待。”秋白与鲁迅共同感到有必要把有关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一方面以引言、序、按语等表达中国民众和革命文化界对“忠实朋友”、“伟大”的萧伯纳的“真正欢迎”的态度,也把真实的萧伯纳作些介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本书,通过萧伯纳到上海这件事所引起的各种反应,比较集中地让人们看到当时奇形怪状的中外各色人等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看到上海以至中国当时文化气氛的污浊和昏乱,从对照中反观左翼革命文化的进步性和正气。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萧的伟大”的地方(“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也不被帝国主义的中国“跟丁”所利用等)也反衬出来;用秋白的话说,就是“萧的伟大”并不因中外报刊许多奇文的昏乱而受损失,书中收罗“借重或歪曲”萧的文字,可以“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鲁迅提出编书的动议后,秋白欣然接受,并极迅速地动手辑译各种文章,为书中各部分和编人的文章写按语,还写了些补白及杂文小品,为全书写了引言《写在前面》。鲁迅写了《序》,并具体处理出版事宜。该书署“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乐雯”二字是由前文讲到的鲁迅笔名“隋洛文”的“洛文”变来,但署在这本书上当看作是鲁迅和秋白共同的笔名。鲁迅的《序》直接署“鲁迅”二字;秋白执笔的文字,在当时环境下既不能用真名,也不能用他自己已为别人所知的笔名。该书实为二人合作的产品,署“乐雯”二字既使人们猜测编者主要是鲁迅,又与鲁迅用过的“隋洛文”有别,作为二人密切合作的印记。

第二件事是秋白和鲁迅合作选编了一本《引玉集》，介绍苏联版画。秋白节译了楷戈达耶夫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一文作为《引玉集》的代序。鲁迅非常高兴，并且在后记里特别郑重地记下二人这一合作史实：“我毫不知道俄国版画的历史；幸而得到陈节摘译的文章，这才明白……”代序译者署秋白笔名“陈节”。

第三件事是他们继《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的合作之后，在三、四月份还合作写了十多篇杂文：《王道诗话》（3月5日写）、《苦闷的答复》（3月7日写，3月9日发表在《申报·自由谈》的题目是《伸冤》）、《曲的解放》（3月9日）、《迎头经》（3月14日）、《出卖灵魂的秘诀》（3月22日）、《最艺术的国家》（3月30日）、《关于女人》（4月11日）、《真假堂·吉诃德》（4月11日）、《内外》（4月11日）、《透底》（4月11日）、《人才易得》（4月24日，发表在4月26日《自由谈》上的题目是鲁迅改成的《大观园的人才》）、《中国文与中国人》（10月25日）等。据许广平回忆，这些文章大抵是这样写成的：秋白先把腹稿讲给鲁迅听，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作些补充，有时变换内容，然后秋白执笔模仿着鲁迅杂文的风格、笔调和用语习惯写出，鲁迅再过目。这些文章都用鲁迅的笔名（何家干、干、洛文等）发表，而且鲁迅还把秋白执笔的这些杂文分别编在自己的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南腔北调集》里，使之留传。这些杂文含着丰富的多方面的思想，表现出强烈鲜明的革命情感，表达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同时又具有很高的杂文技巧。

第四是他们共同批评和纠正文艺界的“左”倾错误。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于1932年11月出版的第4期上发表了一首署名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这首诗虽是把矛头对着胡秋原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但却摆出极左的面貌，用了些“丢那妈”和“切

西瓜”(砍脑袋)之类辱骂和恐吓的话。鲁迅以给编者的信的方式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发表在12月出版的《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批评芸生的诗,表示“左联”自己来纠正“左”的错误。当时还是左联成员的祝秀侠竟化名“首甲”与邱东平、方萌联名在《现代文化》第2期上发表《对鲁迅发表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宣言》,还假造了“郭冰若”这么一个名字,令人猜想是“郭沫若”三字误排了第二字,将这假名字与“首甲”等三人排在一起,形成四人联名的样子。他们的“宣言”给鲁迅扣了“右倾机会主义”、“戴白手套的革命论”、“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等帽子。许多人连鲁迅提出的要团结“同路人”,“要招致路旁看着的看客也一同前进”的意见都不能接受,连“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样的衷告都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以至对鲁迅这样的伟大文化战士也滥加攻击。秋白则支持鲁迅,与之共同致力于纠正革命文化界内的极左错误倾向。由鲁迅出面写信致《文学月报》编者批评芸生的诗,就是秋白、雪峰与鲁迅商量决定的。“首甲”等的“宣言”发表后,秋白写了《鬼脸的辩护》一文,批评“首甲”等的“宣言”及所代表的错误倾向,他说:“鲁迅决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因为辱骂和恐吓‘确实’决不是战斗”,而那些戴着“鬼脸”(吓人的面具)冒充激进的人们,在文化斗争中不是切实地进行理论批判,只会“喊一声‘斫你的脑袋’”,“用一些空洞的词句,阿Q式的咒骂和自欺,来代替战斗”,搞起或支持虚弱的“辱骂和恐吓”之风,“却的确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是错误的、有害的。秋白这篇文章虽然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而没有发表,但他作为当时上海革命文化界实际上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通过冯雪峰等发挥影响力,抑制极左倾向,维护鲁迅的正确方向和各项正确的主张。

5 秋白奉命于1934年1月到中央苏区去。在非常紧张、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他一定要去和鲁迅道别。杨之华回忆说:

秋白……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深情和渴望,对我说:“我无论如何要去和鲁迅、茅盾告别,跟他们好好谈一谈。”……当时外出是很危险的……为了安全,让他等到晚上才去鲁迅家……一月四日晚上,他就去鲁迅家。我很不安地等了他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他总算平安地回来了……他仿佛年轻了许多,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停了一下,他带着抱歉的口气说:“昨天夜里,大先生一定要把他的床铺让给我睡,他们夫妇睡了一夜地板。”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里也述及此事:“秋白同志……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叙别。这一次,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自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同志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友情之万一。”不料这次告别竟成永诀!

秋白在苏区一年,时时怀念着鲁迅。冯雪峰回忆说:“在瑞金的时候,谈鲁迅是秋白同志碰见我……闲谈时的话题之一。”秋白在苏区从事的教育、文艺、文化工作,仍然贯彻着他在上海时期与鲁迅共同形成的基本思想和方略。被俘之后,在身份没暴露时,他化名林祺祥,谋求取保释放,他想到的是给鲁迅写信。鲁迅得信后尽了最大努力做营救工作,由于秋白身份很快就被叛徒指认出来了,鲁迅找的铺保也无法保释秋白了。身份暴露后的秋白,在狱中答《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问的时候说鲁迅“发表作品,完全出于其个人意志,只能算为同路人”。有些人曾据此批判秋白,说他贬低鲁迅。其实,秋白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在

被俘并已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这样评说鲁迅正是对鲁迅的保护。秋白在狱中对鲁迅的怀念还有两点极明显的表现:一是其狱中遗著《多余的话》在末尾说到自己觉得“很可以再读一读”的书时,列举七本,其中就有“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二是本来还想再写两本书《痕迹》和《读者言》,稿未成而就义,留下一份《未成稿目录》,《读者言》目录十题中至少有《“阿Q”》、《“阿Q”以后》、《酒瓶问题》、《翻译》四题是在拟题的时候要想到鲁迅的,若动起笔来必定写到他与鲁迅在文学形式问题上(关于“旧瓶装新酒”的研讨等)、翻译问题上的切磋。

秋白离开上海后,鲁迅时时记挂着他。得知秋白被俘的消息后,他极力设法,从各方面筹资营救,紧接着就得到秋白被杀害的消息。许广平回忆说:“秋白同志被俘及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了,他感到这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未能完成为亲密战友服务的心愿。”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及秋白的就义,认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冯雪峰回忆说:

一九三六年我回上海,鲁迅先生也是谈到什么问题都会不知不觉地提到秋白同志的……不管这个谈到那个,那个谈到这个,我都没有听见他们谈到过他们之间的友谊或感情之类,而只听见他们的一个是说这些话:“这个问题,鲁迅是这样看的”,“鲁迅做了这些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另一个也同样说:“何苦的说法,我看是对的”,“这工作,能有何苦那样的人来做就好了”,“至今文艺界还没有第二个人……”诸如此类。……

有时还要表现得更沉痛些,说了“人手又这样少!”这样的话,就沉默起来。

知鲁迅心情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支撑着病体,呕尽

心血,收集保存秋白遗稿,编辑出版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在当时那么恶劣的环境里,为秋白出书是十分困难的。他一面和茅盾、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等商议集资来出版;一面从集稿、编辑到选纸、选插画、设计封面都事事躬亲,一丝不苟。书上署“诸夏怀霜社校印”,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出版社实体,而是鲁迅代表参与该书出版之事的全体人员虚拟这么个社名,表示“诸夏”(中国,中华民族)对秋白烈士(“霜”是秋白幼时名字)的沉痛追悼和深深怀念。可是当印制精美的《海上述林》上卷(鲁迅说:“中国书没有像这样的讲究的出过。”)在日本印出寄到鲁迅手中时,他已重病垂危,距他逝世只有十几天了(1936年10月2日收到,19日逝世),他还亲自动笔写了《介绍〈海上述林〉上卷》一文,说:“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他在1936年3月11日写的《白莽作〈孩儿塔〉序》里说:“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这就是他收存秋白遗文,编辑出版《海上述林》的心情。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曾这样说:

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指《海上述林》。——引者注),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①

① 《回忆鲁迅》1952年版,第158页。

与冯雪峰的真挚友情

1 瞿秋白在文界交谊最深、来往最多、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患难与共、最相信赖的朋友，除了鲁迅就是冯雪峰。

冯雪峰(1903—1976)，原名福春，笔名画室、洛扬、何丹仁、O.V等。浙江义乌人。著作甚丰，是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他很早就知道那么有名的瞿秋白是《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作者，早就知道他是革命领袖。但他们第一次见面却是30年代的事，是在瞿秋白受到党内宗派主义者的严重打击之后。1931年1月瞿秋白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职务后，仍留在中宣部，不久与上海文艺界联系，做起文艺、文化工作来，后又受中央委托，参与文化工作的领导。1931年5月，担任“左翼作家

联盟”党组书记的冯雪峰，在茅盾家里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两人很快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瞿秋白当时没有合适的住处，就托冯雪峰找。这就是非常的信赖，因为当时瞿秋白在中共中央内部虽被排挤，但他原来是最主要的领袖，敌人对他追捕得很紧，住处是不能让丝毫不可靠的人知道的。6月里，雪峰把秋白夫妇安排在紫霞路68号谢澹如先生家居住，秋白的对外联系也主要靠雪峰。鲁迅和秋白没见面的时候就彼此感到成了很“亲密”的人，在他们之间起着传递信息和促进友情作用的人主要就是冯雪峰。鲁、瞿最初的见面，就是冯雪峰精心安排的。后来，他们三个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瞿秋白的文稿多是雪峰送出去发表，或拿去请鲁迅处理。雪峰在《关于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一文中回忆说：“我大概三、四天到他那里去一次，至少一个星期去一次，主要是去和他谈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讨论问题，和拿他的稿子。”^①从1933年6月初开始约有两个月，秋白夫妇与雪峰夫妇同住一所房子，他们朝夕相处，互相照顾，情同手足。在发生危险、有警报来的时候，雪峰总是先考虑安排秋白安全转移，他和自己的一家另想办法。杨之华后来回忆说：“雪峰同志热诚负责地保护秋白，确保绝对秘密，只让一个党内交通知道。”^②但个把月后，党的一个机关被敌人发觉，牵连到这个住处，必须立即搬走。雪峰说，他和他妻子“到无论哪一个熟人那里去停一天，再找房子也可以的，但秋白同志怎么办呢？”他们想到了鲁迅，就让秋白夫妇先坐上黄包车，扯上车篷先走，安全转移到鲁迅家。但他还不放心，当天晚上安排了自己的住处后又跑到鲁迅家，看看秋白住下了没有。^③他们就是这样共

① 《忆秋白》，第260页。

②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40页。

③ 《瞿秋白研究资料》下，第375页。

度艰危,比亲兄弟还亲,秋白写给雪峰的信,亲切地只称一个“雪”字。

2 他们都非常热爱文学,都是诗人、文艺理论家,都景仰鲁迅,都对革命文艺运动有满腔热情 and 高度责任感,而且见解也是一致的。他们共同做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工作。

1931年10月,雪峰为左联起草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他征求秋白的意见,二人反复讨论,写成了文件。后来他说秋白的意见是“指导”性的意见,是深刻正确的。这个决议当时经过集体讨论通过,它的贯彻执行使左联进入了“成熟期”,“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而出击的阶段”。^①在反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资产阶级右翼文艺论和错误文化思想方面,他们一直密切配合,观点也一致,他们既坚持原则,又掌握政策,充分说理,争取团结更多的人。因此,每一个“战役”都打得很漂亮。

1933年底和1934年2月初,冯雪峰和瞿秋白先后到了中央苏区红都瑞金。雪峰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后来当副校长。秋白担任苏维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即教育部长,最初还兼任过苏维埃大学校长。他们住的不远,工作又相近,经常在一起交谈。当时做秋白秘书的庄东晓后来回忆说:“大家都在关心着秋白同志的健康……冯雪峰同志是最诙谐和健谈,而且是和他(指秋白。——引者注)谈得来的人,一听到他俩的谈笑声,我们也感到轻松。”^②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里曾写道:“在瑞金的时候,谈鲁迅是秋白同志碰见我而又有时间闲谈时的话题

^① 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

^② 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见《忆秋白》,第337页。

之一。”^① 秋白身患肺病，杨之华又未在身边，心境由于当时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宗派主义者的打击而难以愉快，雪峰常来看他，诙谐地同他“闲谈”，这就是深深的关心啊。

3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雪峰跟随红军长征。秋白也曾要求随主力转移，但是被“最高三人团”拒绝了，同时被“甩”下的还有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等。瞿、何等和那些留守苏区的军人们不同，他们病弱的病弱，年老的年老（何叔衡当时已60岁），让他们“留守”的实质性原因是他们和把持着中央领导权的人在路线和政策上意见不一致。特别是瞿秋白，他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是被王明等排挤出中央政治局的。王明等始终心里有鬼，怕他重新掌握领导权，因而几年中一再批判他，打击他。中央和红军主力要撤离苏区了，宗派主义者乘此机会“甩”掉瞿秋白这个“包袱”，这是很可能有的心理。但表面上还是工作“需要”的重用，不是还让他当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嘛！也有的说是因为他有病，不宜随军长征，把他留下来还是照顾呢！实际上，当时谁都知道，主力一走，苏区很快就要被白军踏在铁蹄之下，体弱多病更加不适合打游击。伍修权说：“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事实证明，像董老（指董必武。——引者注）、徐老（指徐特立。——引者注）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② 所以，当时稍知内情的人都替秋白打抱不平，毛泽东、陈毅、陆定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1952年8月初版，第141页。

^② 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伍修权同志回忆录》。

一、吴黎平等,还有雪峰同志,都抱不平,甚至很气愤。主力红军出发后,陈毅还要把自己的马给瞿秋白,叫他追主力去。冯雪峰后来曾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做包袱甩给敌人”。^①莫文骅将军的回忆特别值得重视,他记述了苏进于1940年看望毛主席时关于瞿秋白、毛泽覃等被留苏区导致他们牺牲的谈话。他写道:

雪峰同志对“左”倾机会主义搞宗派,把许多反对他们的应当随队长征的好同志当作不可靠的人留在苏区,葬送在敌人的屠刀下,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这一点,从开始就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了,并且态度是非常鲜明的。^②

冯雪峰跟上力红军长征动身前,“怀着抑郁难忍的心情去向他(指秋白。——引者注)告别”。瞿秋白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不要为我的安全过分担忧,你们突围北上肯定比我更艰难,道路更险阻……”说着,瞿秋白忽然脱下自己身上的长衫,披在冯雪峰肩上,深情地说:“雪峰,这件长衫伴着我战斗了七八年,留下与鲁迅先生共同战斗过的痕迹,现在给你做纪念,伴着你出征吧!”^③这里引用的这些话,见于海宇回忆冯雪峰的文章,经过了冯雪峰和海宇两次转述,而且隔了几十年,所以,有些语气和用词及句式习惯等等,不太像秋白原话,如“战斗了七八年”、“与鲁迅先生共同战斗过”等,但赠长衫给雪峰,既是作“纪念”,又是非常实用之物相赠,对挚友的御寒有用;既是让长衫替自己随军长征,又是让长衫替自己伴着亲兄弟似的至友。这种心情,这种

① 陈早春:《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

② 莫文骅、苏进:《冯雪峰在长征中》,《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

③ 海宇:《一件不寻常的长衫——追忆冯雪峰对瞿秋白的怀念》,《回忆雪峰》第205—206页。

方式,确乎是秋白的,而这长衫曾伴着秋白与鲁迅、与雪峰一同有过那么不寻常的经历,现在相赠时说到鲁迅,也是真情深情的流露啊。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出来的时候,即1942年年尾,经过了八年包括长征、抗战和集中营极不安定、极其艰险的历程之后,他还珍存着秋白所赠的那件长衫——那是一件青灰色哗叽长衫;直到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那天,他激动地穿起那件长衫,眺望远方,“他是在与秋白烈士一起,共同迎接上海的解放”。^①

长征前夕告别,赠长衫留念,那是他们最后的一面。秋白牺牲之前在《未成稿目录》的《痕迹》一书目录里“苏区”部分,专门列了一个题目《真君谭(雪峰)》。可知,雪峰是秋白最怀念的人之一,他与雪峰的交往,共同做的事业也是他一生“痕迹”即历史中最值得记述的一个方面。“真君”二字令人猜想是秋白对雪峰为人的总体感觉。然而,稿“未成”,我们只能从前述他们交往的情况来推测了。

秋白就义之后,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得到噩耗,立即转告雪峰,雪峰非常沉痛。后来他转述毛泽东“沉痛”的话,那其实是他为“失去了一个好朋友”而悲痛。他于1936年又到了上海,见到鲁迅。他和鲁迅总要谈到秋白。他所记录的鲁迅的那些话,所描述的鲁迅因秋白之死而发生的难以名状的心情,也正表现了他自己的心情——“对于牺牲了的战友的痛惜与怀念情绪”。^②1936年10月初,鲁迅逝世前不久,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刚刚装订出来,鲁迅赠一本“皮脊的”给毛泽东,一本“蓝绒面的”给周恩来,这事就是雪峰经办的。

^① 包子衍:《雪峰年谱》,第161—162页。

^② 《回忆鲁迅》,第141页。

1953年10月开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54年2月出齐的四册本《瞿秋白文集》主要是冯雪峰编辑的,他还为《文集》写了序言。这部近200万言的书,他只用了短短的一年就编成了。当时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艺界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编秋白文集不知花了多少不眠之夜,“他真是像捏着一团火,急于要把《文集》赶快印出来。这决不仅仅是一般的工作上认真负责的精神,而是他对待自己战友和同志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①他还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写了《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一篇,在1955年写了《纪念和学习瞿秋白同志》的文章,这都是他对秋白的深情纪念。

^① 王士著:《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志》,见包子衍:《雪峰年谱》,第187页。

同蒋光慈关系很亲密

1 瞿秋白在文界有不少关系密切的朋友,蒋光慈是其中之一。蒋光慈于1927年在创造社出版部印行的《俄罗斯文学》一书的《书前》写道:

关于本书的下卷,我要深深感谢我的朋友屈维它,因为这是他的原稿,得到他的同意,经我删改而成的。

此事即可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同寻常。

瞿秋白在1931年6月写的《学阀万岁!》长篇论文里用反语论述“反动文学”(指中国不断进步的新文学。——引者注)的“小反动大反动的分别”(先进性的差别。——引者注),在指出《阿Q正传》等创作“已埋伏着那种狂妄的奔放的

热和反抗一切的号召……尤其是带着野蛮性的反抗”(指作品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新的人性和文明性,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狂妄的奔放的热”,是很高的评价。——引者注)之后,说到了“偏偏要‘转变方向’”的“一些无赖”(指提倡进步“革命文学”的作家们,也包括在《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写作时就“转变”了,在1923年就从事革命文学运动的自己,也包括稍后转到同一方向的鲁迅、郭沫若等。——引者注),说“他们甚至于怕自己的死尸还会作怪……居然请人家来鞭自己的尸”(指革命文学家们怕自己原来从旧社会、绅士阶级承袭的根性会有害于革命,有害于将来的新社会,就借助从外面“拿来”的革命思想、革命文艺思想理论,来助成自己的脱胎换骨,以变成革命人,变成真正的革命文学家。他自己、鲁迅,还有许多“转变方向”的文学家都是如此。——引者注),然后,他讲到了蒋光慈及其于1927年11月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小说《短裤党》:

至于这些无赖之中最先叫喊的,那正是最无耻的“短裤党”——“党而短裤”,可谓无耻之尤者矣。甚至于接着就自称洪水猛兽,混蛋,混蛋!

“最无耻”“无耻之尤”等是拟敌人口气而用的反语,反过来,那是“最光荣,最先进”的意思;“洪水猛兽”是借用蔡元培于1920年给《新青年》题词里的四个字,在这里当然是作为革命者的勇猛的代用语。他还为“短裤党”和蒋光慈的同名小说写了个注释说:

短裤党是 Sans—Culotte,这是巴黎大革命时候的暴民的称呼。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幸而作者有些饭桶,这种主要理想没有显露得透彻。

法国“大革命时候的暴民”即革命党被称为“短裤党”,借来作为蒋光慈小说的书名,真实的含义就是“共产党”了。这个书

名是瞿秋白给蒋光慈提供的。“暴民专制”的真正含义自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瞿秋白指出蒋氏小说的这一理想,自然就是对小说思想内容和倾向的基本肯定,这在许多人对该书多有骂语,多表恶意,恨不得立刻消灭它及其革命影响的时候,在作者受到党内宗派主义者打击的时候,是对作者的支持和赞誉。至于“饭桶”一语的使用,那是好友之间的善意的幽默,带着对该书缺点的批评,同时也是秋白作为革命文学队伍中的一员,对所作的“革命文学”的自嘲,认为这样好的主题和题材却在文学的表现上“没有显露得透彻”。他对该书的技巧是不满意的。“幸而”一词也是拟着那些诅咒该书的人的心理而用的,也是反语,真正的含义是:如果技巧上也好,“显露得透彻”,那该是多好,我们革命文学家就从“饭桶”的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境界了!

《短裤党》是以1926年冬至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背景和题材的,主要写第二次起义的经过,纪实性很强。蒋光慈在序里说,他写作时几乎忘记了是在写小说,“真感谢我的时代!它给予了我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可惜我的文学天才是很薄弱的,我不能将它所给予我的统统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书中所写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好像报告文学,只是人物的名字换一下,杨直夫就是瞿秋白(杨之夫,杨之华的丈夫;“直夫”二字又有概括其性格正直和基于革命道义而显现猛进锐气的意思),史兆炎就是赵世炎(前二字谐音倒置;同时含有反映历史必然规律,作为历史趋势征兆的革命烈火的意思),秋华就是杨之华(秋之花,秋白之花,同时含有美丽可贵的意思),江洁史即蒋介石,沈船舫即孙传芳。其中对杨直夫的描写占了较大的篇幅,写其抱病工作,真诚强韧,镇静多思又明快凌厉等等,行文中渗透着作者对好友秋白的深切感情和钦佩之意。

蒋光慈这个人,有热情,有强烈的革命追求,对革命真理、对

文学爱得很执着,作为作家能投入到革命洪流中,深入了解和体验革命生活,同时又明显地桀骜锋利,具有太阳社、创造社多数青年文学家那种罗漫谛克似的气质,在后来与鲁迅论争的时候也仍然表现得颇充分。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说的作为鲁迅的“诤友”的“浪漫谛克的革命家”,蒋光慈也是其中的一个。不过,蒋光慈对瞿秋白却是很敬重、很钦佩的。这种敬重和钦佩,决不是因为秋白做了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也决不单是因为秋白为他的《短裤党》等作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不单是因为秋白1927年2月24日写成的《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这一意见书对第三次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和秋白对于《短裤党》写作所提出的意见使他的这一作品成为革命事件和革命人物的写照,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并对起义胜利后的图景有所呈映,主要则是因为自从1921年他们相识到大革命失败前后,在长期的交往中,他始终感到秋白的为人、见识、学问和文学才华,尤其是瞿秋白革命情怀和理智,足为师友。

2 蒋光慈,原名侠僧,笔名光赤,1901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小秋白两岁。20岁的时候,他和刘少奇等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1921年9月,瞿秋白被聘到东大任教,作教学翻译,同时参加该班党的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志和兄弟。1922年7月,蒋光慈曾有一首《西来意》诗送给秋白。其诗曰:

渡过了千道江河,
爬过了万重山岭;

……

更不计及跋涉的艰辛，饿乡的风雪冷。

维它啊！

俄罗斯好似当年的印度，

你我好似今日的唐僧。

作者自云是读秋白《赤潮集》，见序中有“西来意”三字，乃有所感，即随手写了这首诗。由此事和诗中用语可知他们当时是常常相互送阅作品，常相唱和的。蒋光慈当时的诗集《新梦》稿上多有秋白笔迹，亦可证两人关系的亲密。可惜蒋光慈所说的秋白著作《赤潮集》却不知去向了。蒋氏所说《赤潮集》如果不是《赤都心史》的未定稿初名，就应该还另有一部稿子。按时间推算，《赤都心史》写毕于1922年3月，光慈7月见的《赤潮集》有可能是“心史”，也可能又有了新的集子。

1924年秋至1927年春，他们同在上海，1927年5月初到大革命失败，他们同在武汉，后来到1928年4月之前又同在上海。在这三个阶段，蒋光慈都是秋白家里的常客，交谈随意，谈革命也谈文学，他们之间几件重要的事都发生在这个时期。杨之华后来曾写道：

秋白同蒋光慈的关系也很密切，相当看重这位中国早期的革命作家。蒋光慈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同秋白谈论文学工作方面的问题，了解革命斗争的情况。……当时，我们党难以用更多的精力去指导文学工作。他曾对此向秋白提过意见。秋白赞扬他对党的事业的关心，鼓励他作为从事文学工作的党员，更多地发挥积极作用。^①

他们先是在上海大学共事，蒋光慈由秋白介绍于1924年秋天起在社会学系教俄语。他们住的也很近，在一个弄堂，来往就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13页。

更多。瞿秋白参编的刊物《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等常请蒋写文章。蒋当时教书是次要的工作,主要还搞文学创作,他的小说处女作《少年漂泊者》(1925年出版)和最早的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1927年初出版)都是征求了秋白意见经修改才定稿的。1927年1月他出版的诗集《哀中国》,书名是请秋白题的。接着就是《短裤党》的写作,我们在前文已说过一些与秋白有关的情况。现在据蒋氏自序和杨之华的回忆再补充一点,就是秋白事先曾对蒋的写作提出希望(大意):要写好深刻真实地反映革命的作品,必须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深切地了解革命和革命群众。蒋光慈急速地写作,仅半个月就完成了《短裤党》,秋白看了却不满意,嫌它艺术上粗糙,后来甚至过苛地说作者“没有天才”。瞿秋白是以高标准要求革命文学,渴望着杰作出现。他知道自己的老朋友理解他的心情,会为了革命、为了文学而持续努力的。

武汉时期,他们的交往有两件事值得重视。一是蒋光慈参与中共中央办的长江书店工作,瞿秋白通过蒋联系文界一些人,开展新闻、出版、文艺方面的活动;二是蒋光慈曾与孟超、杨邨人等联络要出一种刊物,定名为“太阳”,秋白曾过问其事,以为可由中宣部办,发表革命文艺作品,但因局势恶化,未能实行。

汪精卫叛变革命前后,瞿秋白忙于各种急务,蒋光慈也回到上海。1928年1月,文学团体太阳社由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等发起正式成立。钱杏邨后来说,秋白、杨匏庵、罗绮园、高语罕、郑超麟等共产党人都参加了太阳社,瞿秋白在工作上有许多指示,但因为政治工作繁忙,却没有写什么东西。只有匏庵、绮园,用笔名发表了几篇小说。^① 秋白的确由于和蒋光慈关系

^① 王铁仙:《瞿秋白文学评传》,第117页。

密切而出席了太阳社的成立仪式。事先蒋、钱找他谈过此事,他谈了些鼓励他们的话并提出一些希望,甚至说到文艺工作上的意见都是可能的,但如王铁仙等所说,那不是“组织”即中共中央的“指示”。钱杏邨回忆说秋白没有为太阳社及其刊物写什么,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六大”之前,瞿秋白的政治工作太忙了,他不可能有工夫写文学方面的文章。但是蒋光慈发表在《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上的《关于革命文学》及太阳社的党员作家们那种以战斗的热情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积极地与实际革命斗争紧密结合的精神,的确是和秋白的文艺工作主张基本一致的;蒋光慈这篇带有太阳社团体纲领性的文章,发表在秋白出国赴苏联筹备“六大”之前两个月,写的时间可能在1月里或更前一点,依照他与秋白的关系,这篇文章有可能是请秋白看过的,至少是依照与秋白交谈的精神写出来的。自然,蒋光慈终究是蒋光慈,即使很尊重、很努力地要贯彻秋白的意见,也仍然是和秋白有距离的。蒋光慈文章中关于革命已到“极高涨的时代”的说法显然是照秋白当时对形势的估量来写的,秋白错了,蒋也错了。然而,不能因此把太阳社后来与鲁迅的论争激化到那种不适当的程度,也归咎于秋白。他4月里就出国了,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到5月11口才写完,前三节发表在《太阳月刊》3月号,不要说瞿秋白当时无暇顾此,假使有工夫来过问,他也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1923年他就说过中国还是“狗彘食人的中国”;1927年又说农民“仍旧是受苛酷……剥削”,“农民的组织至今没自由保存的自由”,农民还是“幼稚和无组织”状态等^①;后来更明确地说过幼稚的浪漫谛克革命文学家们,“有些时候,是自欺欺人的,例如,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编4,第779—780页。

他们一开口便说‘阿 Q 时代死去了’，说‘中国农民都有很严密的组织’了——其实，阿 Q 式的贫农雇农还到处多有。”^① 从秋白出国前派郑超麟调解太阳社与创造社之间的矛盾这一事实看，如果秋白得知和过问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关系，也一定要批评蒋光慈，进行调解而不会让矛盾激化到那么不适当的地步的。

瞿秋白第二次赴俄期间，蒋光慈于 1929 年夏东渡日本，写出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对革命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1930 年又发表了一个长篇《咆哮的土地》（1932 年改名《田野的风》出版），是写当时农运的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思想线索与瞿秋白的观点一致。

3 蒋光慈的死是有悲剧性的。他虽于是 1931 年 8 月 31 日病逝，却也是时代的牺牲品。旧社会不能容他这样的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可死的“罪证”，国民党新军阀追捕他是“理所当然”的；在党内，他又那么敏感，那么激烈地反对错误的领导，决绝的性格使他走到提出退党的地步，自己也犯了错误，竟于 1930 年 10 月被开除党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才 30 岁就著作等身的作家就这么死了，太令人痛惜！

蒋光慈去世后，秋白的心情表现没有留下文字的材料，但从他同年 6 月里的文章《学阀万岁！》几次讲到蒋光慈和他的作品来看，他是深深铭记和惦念着这位好友的。他说蒋光慈的创作不过是“小反动”的文学，够不上“大反动”的资格（“小反动”、“大反动”是秋白在该文中对革命文学分层次的说法，“小反动”指已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3，第 196 页。

有的初步的尚有明显缺点的，“大反动”指彻底的“能力很大”的革命的文学。——引者注)。但他指出，蒋光慈的作品已经与“绅商文学”“市侩的清客文学”等划清了界限，受到那些学阀的“围剿”了(秋白在文章里是摹拟着“绅商”、“市侩”等及其政治代表、文学代表们的口气说：“咱们……宣战”，向着“大反动小反动”的文学)。从这些话，我们也应该看出秋白对好友蒋光慈的怀念和支持。

1933年7月，秋白在《读〈子夜〉》一文中又提到蒋光慈，那是把蒋的《丽莎的哀怨》一书的“意识”与茅盾的《子夜》相提并论。他说：“在意识上”，《子夜》引起人们对吴荪甫的“同情”而对“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憎恨”，“这好比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中的黑虫，使读者有同样感觉。观作者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等，也许作者的意识不是那样”，而是因为“书中的主人翁”是吴荪甫和丽莎。

蒋光慈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凝结着秋白的心血或在问世后得到秋白的注意和评论。他们是同志，是兄弟，是好友，秋白把蒋光慈的(还有茅盾等革命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看作包括自己在内的“我们”共同的文学工作；他的分析评论，都带着“我们”共同的自我检点的意思。之所以如此，除了共同的革命志向、共同的文学目标之外，他们之间亲密的好友关系，他们的深入心底的情谊也是重要的因素。

肝胆相照的挚友

1 他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深情和渴望，对我说：“我无论如何要去和鲁迅、茅盾告别，跟他们好好谈一谈。”

这是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一书中述及秋白在1934年1月初离开上海赴苏区之前的心情时写下的，其中所引秋白之语，表现了他与茅盾的交谊是不同寻常的。

茅盾在去世的前一年，即1980年，在《回忆秋白烈士》一文中写道：“我和秋白相识多年，，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一个能肝胆相照的挚友！”“我再拿起笔来写怀念秋白同志的文章，却是含着欣慰的眼泪，为了庆贺秋白同志的‘再生’！”文中“再生”一语，指

经过复查,中共中央为秋白恢复名誉。从茅盾的这些话,也可以看出他确乎是深深了解秋白的,他们感情至深。

2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曾用郎损、玄珠、方璧等笔名,茅盾是他于1927年发表小说《幻灭》时开始用的笔名。浙江桐乡青镇人。杰出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创建人和中坚之一,因而从1921年成立该会时他就从郑振铎等原《新社会》《人道》诸友那里知道了秋白。1922年秋白的《饿乡纪程》由郑振铎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他读了,更发生了“对于这位不相识的作者的敬仰的情绪”。^① 1923年夏天,约在7月里,他们在上海大学见而了。当时秋白做教务长、社会学系系主任,在党内兼着中宣部的工作,主编《新青年》,同时参加上海区执委会的活动。茅盾在上海大学兼课,讲授小说研究,在党内是上海区执委会委员。稍后,秋白和杨之华结婚后又和茅盾夫妇成了邻居,都住在闸北顺泰里,茅盾住11号,秋白住12号。所以,从1923年夏到1926年1月茅盾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之前这几年,他们的交往很多。1923年7月到1924年初,他们每隔几天就开一次会,支部会常在茅盾家里开。成为邻居之后就几乎天天相见了。他们的孩子独伊和沈霞在同一个幼儿园,谁有时间谁就一起接送两个孩子。杨之华又介绍她的同学张琴秋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交友结婚,介绍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入了党,杨、孔、张三位也是好友。秋白本来就熟悉沈泽民,这样茅盾与秋白就更近了。大约是1925至1926年,秋白与茅盾谈心已谈到中央领导人之间

^① 《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121页。

的意见分歧。据茅盾回忆,秋白不止一次地说起陈独秀,虽很尊敬陈独秀,但觉得陈不该信任和重用作风不正、思想浅薄的彭述之,也觉得陈有些专断作风。“五卅”运动中,秋白主持《热血日报》,茅盾、郑振铎等办《公理日报》,相互配合,推进革命高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期间,他们都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会议,都参加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接触比较多。会议前后他们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文章方面也相互配合。秋白于1925年8月写《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6年1月写《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3月写《阶级斗争与阶级间的联合战线》等;茅盾于1926年春在所编《政治周报》上发表《国家主义者的“左排”与“右排”》、《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等文章。

武汉时期,茅盾于1927年初到武汉,秋白3月里到那里。秋白代理中宣部领导工作,茅盾4月份开始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两人相别数月重逢,除了倾谈各自经历和感受之外,工作上的联系也很密切。茅盾直接领受和贯彻秋白对办报的意见。后来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回忆说,当时秋白的意见“一是揭露蒋介石反共和分裂的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真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秋白已经向茅盾谈了对蒋介石的看法:“十分阴险”,“完全是个新军阀”。他们还曾商议办一份党报,但由于形势迅速恶化而没办成。

3 秋白和茅盾在情感上特别亲近起来是1930年到1933年的几年。“左联”于1930年3月初成立,茅盾于4月结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秋白

8月从苏联回国,9月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据茅盾回忆,这个时候他们又重逢了。那是秋白先想到因特殊环境脱党的茅盾,用秘密联络方法写信请开明书店转给茅盾,留了地址,说已经改姓“何”。茅盾夫妇就去拜访,秋白表示支持茅盾写小说。杨之华的《回忆秋白》一书记述1931年4月茅盾夫妇来访时,向房东的问话是:“何先生在家吗?”但这时秋白又改了化名,叫林复。那是秋白被撤除中央领导职务三个月以后的第一次来访,可见得有1930年说“改姓何”的事,才有这一次的误问“何先生”。

1931年4月会见茅盾,是秋白再次介入上海文艺界参与“左联”领导的开始,也是30年代他在文艺创作、翻译、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再出现一个新高峰的开始。接着,5月里他就与冯雪峰见面了,接着与鲁迅有了密切联系。这样,鲁、瞿、茅、冯既是亲密朋友,又实际上形成了“左联”的运转中轴。杨之华在回忆1931年4月茅盾夫妇来访及以后的交往时写道:

我请他们夫妇上楼进房后,悄悄地告诉他们说:“秋白又改名换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复了。”

秋白转到文化战线……茅盾当即向秋白表示了关切和欢迎之情,向他谈了他的创作情况和打算。秋白请茅盾介绍了文艺界的情况……

……机关被敌人破坏,牵连到这个住所……茅盾夫妇请秋白到他们家里去住,王一知同志带我到别的地方……可是那位过去的朋友……怕连累……想出了……客气的逐客办法。……不得已,我只好走向茅盾的家。

茅盾夫妇住在静安寺路庆余里一号的三楼上,房子很窄小。秋白住在那里,已经使他们两个孩子让出床铺睡地板了。我这一去,更使他们受挤了。天气又闷热,秋白和我

心里深感不安。但茅盾夫妇始终热情地接待着我们,使我们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秋白在茅盾家避难的那些日子里,他俩总是愉快地谈论,谈形势,谈上海文艺界的情况,谈“左联”的工作,谈他们的作品和工作计划……永远谈不完似的。秋白的心情很愉快,态度很安详,好像根本没有想到敌人的搜捕和避难的境界。^①

后来秋白先后移住到紫霞路谢澹如家、鲁迅家、机关、施高塔路东照里等多处,但一直与茅盾保持着联系,在革命文艺活动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茅盾当时担任过“左联”的执行书记,不当书记后也仍然是核心人物,是台柱子之一。秋白为使“左联”摆脱当时居主导地位的“左”倾和宗派主义影响,扩大战线,团结更多的作家,推进左翼文化运动而提出的设想、建议,要通过一些得力的人去实现,茅盾就是一个,鲁迅当然是主要的,其他还有雪峰、丁玲、夏衍等。“左联”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个文件(1931年11月通过)就是由雪峰起草,秋白、茅盾都参与拟订的。秋白建议强化刊物阵地,除了坚持《前哨》这个理论刊物,要再办一个新的文学期刊。茅盾等就把被禁的《前哨》改名《文学导报》继续刊行,并另办了大型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从而扩大了战线,团结了更多作家。秋白建议回顾、总结和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1928年以来的“普洛”文学运动,茅盾就在《文学导报》发表《五四运动的检讨》等文章,推动讨论;秋白的《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论文也是这种研究的成果和战斗的火力。显然,他们的配合是很好的。

他们交往的深度还表现在茅盾创作《子夜》、《路》和《三人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24~125页。

行》等小说时征求和采纳秋白的意见,秋白则竭诚提出看法和建议,并在作品发表后给予评论和鼓励。茅盾于1931年写中篇小说《路》是应《教育杂志》之约,要写成与教育有关的内容。“本来写的还是中学生,”茅盾说,“后来有位朋友以为应当是大学生,我尊重他的意见,也就略加改动,使之由‘中’而‘大’。”(《〈路〉后记》)他所“尊重”的就是秋白的意见。《路》出版后,秋白又说恋爱情节中的某些文字还可删除;再版时茅盾就删掉了一些。《三人行》也是1931年写的中篇小说,秋白于1932年春在《谈谈〈三人行〉》的文章中既肯定茅盾是“杰出”作家,“思想”和“知识”都“超出”一般作家,但同时又指出这部《三人行》“艺术上的表现”有严重缺陷,“三个人”(指小说写的三个主要人物“姓许的”、“惠”和“云”)一个是“侠义主义”,一个是“虚无主义”,一个是“市侩主义”。作者虽然把第一个的“颓伤”写得“相当透彻”,但把“侠义主义”安在“贵族子弟”身上,由于不符合“中国的贵族”的实际,就不得不把“姓许的”“截然分做两段”,却“看不出什么转变的过程”,而且“只会想去暗杀什么燕子巢的老板”,也“可怜”得很,所以,这个人物“部分的失败了”。作者想以第一个人的描写“打击”那种“用打破一切信仰的‘高超’态度来巩固对于现行制度的信仰”的虚无主义,但是“攻击太没有力量了”,反而会使读者认为“惠”的虚无主义“没有转变的必要”,所以作者的创作意图在第一个人物描写上也“失败了”。作品头几段把第三个人“云”写成了“正面的主人公”,所写的他的话“差不多是句句要读者佩服他”,但他确实是“‘愚蒙顽固’的市侩主义”,小说却“并不加以鞭笞”,“变好的过程也是没有的”。这样,秋白就作结语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而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对现实生活了解不深,写起来就“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

的”，违反了现实生活的辩证法。秋白以这样的深入说理批评挚友的作品，不仅是在尽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责任，而且是出于真正的深深的爱护之情，是推心置腹的。有市侩心理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样拆朋友的台，是让朋友出丑，他们不能理解秋白、茅盾这两个挚友之间是两片“心的绿地”合为“一片”的。秋白是在作“我们的”自我批评，茅盾以同样的心来看待这种批评。1952年他在《〈茅盾选集〉自序》中说：“徒有革命的立场而缺乏斗争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这个道理，在《三人行》的失败和教训中，我算是初步的体会到了。”

1931年10月至1933年，茅盾在酝酿和创作长篇小说《子夜》的时候，曾先把头几章的内容讲给秋白听，又把几章原稿给秋白看，两人仔细地商讨，有一次竟一连谈了五六个钟头。从整体结构到具体细节，茅盾都采纳了秋白的一些重要意见，如从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与大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最终握手言欢，改成吴败赵胜，删去赵伯韬为搞垮吴荪甫而挑起工人罢工的情节，还让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改坐雪铁龙高级轿车（原稿让他坐的是一般的车），让刚愎自用的吴荪甫在绝望时歇斯底里地发生一个“单纯的野蛮的冲动”，强奸送燕窝粥来的佣工王妈，也是受了秋白意见的启发而写出来的。《子夜》出版后，秋白在《〈子夜〉和国货年》一文中说：《子夜》出版“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中国的这些‘人’，在《子夜》里，大半还在‘狗’的愚弄，欺骗，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已经在奋斗，在抵抗。他们的弱点大半不在自己的不要抵抗，而在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圈套，以及一切种种间接的，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狗意识的影响。”“在文艺上表现出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但“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后来

他又写了《读子夜》一文。作家酝酿构思和写作,像茅盾这样征求意见,像秋白这样提供意见以至很具体、很重要的建议,都是很少见的。

4 瞿秋白和茅盾之间还有件事是必须提到的,就是他们在“大众化”问题上,大方向一致,原则立场一致,但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曾发生了一场论争。秋白强调“语言”是“很关重要的”,茅盾则说“技术为主”而“‘文字本身’是末”;秋白说旧小说语言是“死的”,“五四”以来的是“新文言”,也“没有活过”,茅盾说秋白“骂倒全体,不能使人心服”;茅盾说应该用《水浒》等“杰出”小说的技巧,引导大众的“艺术感应”,“不能使大众感动的就不是大众文艺”,秋白说要求作者人人做施耐庵,只能把大家“吓得不敢动手”,那是“停止大众文艺运动的办法”。总之,争论得不可开交。然而,他们都是为了推进大众化革命文艺,而且都是为了探求,都是在探求。秋白说有茅盾出来和他争论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并且说茅盾“的确补充了我的疏忽”,但又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就必须再争论。他们的论争的确是有了相互切磋,相互补充,避免片面性,推进认识,推动大众化的效果的。他们没有顾及个人得失、个人面子、个人争高下的念头,争论不仅丝毫不损友情,倒在彼此都那么认真的切磋中更加亲密了。秋白评《子夜》的文章,是在“大众化”问题争论之后,这也充分证明那样的论争对于他们之间的挚友关系完全是起了促进作用的,那样争论就是肝胆相照的挚友关系的一种表现。

秋白最后写《多余的话》的时候,末尾提到自己想再读的几本书里就有“茅盾的《动摇》”。写上这几个字,实际包含了对挚友的怀念,同时也包含了两人的思想联系。《动摇》是茅盾于

1928年写的后来命名《蚀》的三部曲之一,另两部是《幻灭》和《追求》。《动摇》在这三部曲里居中。茅盾后来说,这三个中篇是“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大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奋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① 这些小说是在“消沉”心情、“孤寂”生活中写的,作者“有点幻灭”、“悲观”,自己“都很老实的表现在三篇小说里”。秋白列《动摇》为可以再读的小说之一,是同《安娜·卡列宁娜》、《红楼梦》、《阿Q正传》等排在一起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秋白至少是为有茅盾这样写过杰作的朋友而欣慰的。秋白也可能想到,《动摇》描写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表现的作者的情绪很真切,可以照见自己所自我剖析的某些精神特点。《多余的话》中的自我分析就与《动摇》有相通之处,而且也 and 茅盾一样有借自己的著述“发一星微光”的意思,也像茅盾将三部曲命名为《蚀》的意思一样,是对“消沉”等情绪的否定。这时,秋白仍然想到他和挚友茅盾的心是相通的。

秋白遇害之后,茅盾心情非常悲痛。直到20年后,他写《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一文时,开头两行就说:

六月十八日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沉痛的日子。瞿秋白同志是在二十年前的这一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的。

当时,在为悼念秋白,向敌人示威,友人集资出版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的时候,茅盾和鲁迅、郑振铎一起奔走,而且他个人出资100元(在当时,这是个不很小的数字,况且是在经济那么困窘的时候)。

晚年,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多处回忆到秋白事

^①《茅盾论创作》,第30页。

迹和他与秋白的友谊；逝世前一年还写了《回忆秋白烈士》的文章，并为秋白故居题字。

秋阳皓皓似春阳

1 1935年6月4日,《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到长汀国民党36师师部监押所访问在狱中的瞿秋白。当李问及郭沫若与共产党的关系时,秋白答曰:

郭沫若到日本后,要求准其脱党,闻系出于其日本老婆之主张,以在日如不脱党,处处必受日本当局干涉,不能安居。苏维埃中央原谅其苦衷,已准其脱党。

记者所录秋白之言大致是事实,但秋白此时这样谈郭,也像讲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一样,是一种带“保护性”的说法,又有某种灵活性,“闻”字之使用,“已准”之说,也仍然可以理解为秋白和党组织是相信郭本人的革命意志不变的。

事实上,就在记者来访一个星期以

前,即5月28日,秋白已在狱中写了一封信托陈炎冰(36师师部军医)寄出去了。现在知道秋白在狱中写的信,除了致杨之华的,致鲁迅的,就是致郭沫若的了,由此可知郭在秋白最后的心境中所占的位置。写这封信时,秋白已经写完了《多余的话》,信的内容、情绪与《多余的话》相一致,可以相互参照着看,但所表达的对两人关系的“温暖的回忆”和友情的抒发则是信里独有的。

沫若:

多年没有通音问了……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西园寺公去看你,还登载了你和孩子的照相……

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我早就“猜到了”我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论在那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更加有趣……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的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廿八江州狱中

这封信是对老朋友讲真情实话。谈到郭的情况(如报上的照片、新闻、研究和著作出版情况等),表现出平时的关注。述说自己现在的情况和心境,述说曾有的交往及“豪兴”,尤其是“勇猛精进”的祝愿,都自然流露着真诚可贵的情谊。其中,说在“阶级战争”中被俘。“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及信末的四个字“勇猛精进”等仍然表现了革命者的豪气。这封信是不可一般地视为消沉的。说到“尽量的披露”自己的真相,说到没译出想译的书等也是真实心境,但也明白表示了正准备牺牲的心相——说“恐怕没有可能”实现“心愿”了。这封信经过柳亚子父女及陈其瑗、陆丹林等人多次周折,转递到郭沫若那里时,虽然秋白早已经就义,但所有参与转递的人和整个转递过程,正是人们对秋白烈士深怀敬意的表现。

2 正是在秋白信中提到的郭著《创造十年》的续集里,郭记述了他和秋白初会和交往的情形。那是1925年年底前后,秋白已是中共中央几个重要领导人之一,由蒋光慈陪同初次去会晤已“转变方向”而“意趣”正“集中在政治问题”上的郭沫若。两人自然早已相互闻得许多事,相互读过著作了。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秋白当然知道该会同创造社之间的一些纠葛及其关节所在,对郭的为人风格、思想倾向、文学主张和创作成就也早已心里有数。郭自然也早就知道秋白,况且他既已“转变方向”,热心政治,既已与蒋光慈这位秋白的老友熟悉,就更会了解到秋白多方面的情况。当时,整个国民革命在继续高涨,但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秋白等共产党人在“五卅”后为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活动也进到一个新阶段,开始抵制和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与戴季陶主义的理论斗争也正继续

深入。郭沫若当时在上海编《洪水》半月刊,和“醒狮派”、“孤军派”国家主义者论战正酣,他与秋白一见面就激昂地大讲国家派的荒谬,特别反对其“中国必须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张。秋白肯定郭的观点正确,说应该“趁早把它写出来”。郭不熟悉土耳其情况,又缺资料,秋白事后就把有关土耳其的材料找出来请蒋光慈转给了郭沫若。郭特意记载了此事。此外,说到文学及其翻译时,秋白建议郭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巨著《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巴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郭当时还没读过这部小说,又觉得托尔斯泰“是贵族,又还倡导无抵抗主义”,当时就没有译,不过“三年以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从郭所记的谈话内容来看,秋白似乎并非代表党组织去接触郭,也不是为一件什么具体的事,而是个人之间的结友式专访。秋白当时革命的政治兴趣正浓,热力正盛,看到郭沫若这位诗人、这位文学家竟有那般同国家主义激烈论战的政治意趣和革命热情,也许就特别地喜欢起来了,理智上或许也想到了可以扩大党在知识分子中的盟友吧?或许想到可为党物色到一个人才吧?

1926年1月,秋白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期间推荐郭到广州任职,但并未向郭本人说过此事,郭是从别人那里听说广东中山大学聘他做文科学长“是出于秋白的推挽”。郭于3月下旬到任,不久就提出入党要求,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与恽代英商量,建议郭参加一些实际斗争。和郭沫若谈话,建议他参军做宣传工作的正是秋白的好友恽代英。郭接受了建议,就到了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后来随军参加北伐。郭投入革命的这个过程,应该说是从秋白的“推挽”开始的。

3 北伐中,郭沫若因为与蒋介石有直接接触,了解蒋背叛国民革命和反共的阴谋,知道蒋制造的赣州惨案、安庆惨案等罪恶内幕,于1927年3月31日在南昌朱德家里连夜奋笔疾书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于4月9日发表。该文在“四·一二”之前发表,有重要意义。接着他又写《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脱离蒋介石以后》等文。蒋下令通缉“惩办”郭,郭于4月潜至上海,接着就到了武汉。这时秋白已在武汉,据羊牧之回忆,秋白曾亲自到武昌长春观访郭沫若,要他利用与李宗仁的私交说服李共同反蒋。郭沫若分析了李的情况——已升任第三路军总指挥,想与白崇禧等自建体系,在汉逼走汪精卫,在宁逼走蒋介石,政治上有野心——说“实无把握”说服李与共产党共同反蒋,但他答应去动员李。他们还谈了对整个形势和对蒋介石的看法。郭沫若还讲到蒋介石想拉笼董必武的事,并让他转告陈独秀不能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是一个油头粉面的舞台小生”,“向左转”等等不过是演戏,“决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朋友”。此外,他们还谈了“老子到底姓什么”、将来黄鹤楼的重建、苏东坡夜游赤壁之类的话题。与郭沫若分别后,秋白还说,郭沫若讲到曹操“孤烧船自退,横使周郎得名”的话“终非明主之言”,认为郭“是有感之言,现在我们党内也有这种人”。^①

他们还曾同游黄鹤楼。那时郭沫若常到中宣部来找秋白。郭虽然穿着军装,但一眼望去,还是文人气派。秋白常对别人说,郭沫若虽有些浪漫主义色彩,却有“面撞”蒋介石的“四川人性格”^②,话里带着敬重之心。当时形势迅速恶化,在黄鹤楼诵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名句时,秋白的心情却

^① 《瞿秋白研究》1,第389页。

^② 《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93-94页。

是“成败且不去计较”，在未被“淘”去之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未料，武汉之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名可屡移头可断，
心凝坚铁血凝霜。
今日东风吹永昼，
秋阳皓皓似春阳。

这是《瞿秋白笔名印谱》出版时郭沫若的题诗，时当1959年。郭氏旧体诗有些是应酬性的，这一首却很令人觉得是真情。头两句确是秋白英雄风貌、高尚情怀和伟大人格的写照。“凝”、“霜”作为秋白的名字嵌人，与对秋白“名可屡移”的事实、毁誉不计的忠诚心性、以全部身心整个生命贡献于人民革命和社会进步事业的英烈品格的肯定和歌颂，自然地出为诗句，是真意；末句以“秋阳”喻秋白（也是秋白名字和笔名“宋阳”的简缩），言“皓皓”然“似春阳”，不仅是一般地讲秋白烈士事迹和思想品格之闪耀光辉，给人温暖，也含着秋白对郭沫若本人的光热给予，是郭氏作为具体的一个受惠者的感受。

早在抗战时期，1939年7月16日，郭沫若在重庆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上，朗诵《海燕》之歌，他郑重声明说：

《海燕》歌的中文译文很多，但今天选的是瞿秋白先生翻译的。瞿秋白先生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奉献给了我们民族了。今天纪念高尔基先生，朗诵瞿秋白先生的译文，也是纪念瞿秋白先生。

第二篇

才 华



人们怎样谈秋白才华

1 才华卓著,是瞿秋白的突出特点之一。凡是熟悉他的人,无论是他的家人、亲戚,还是同学、同事;无论是同辈、长辈,还是晚辈;无论是文友、战友,还是一般关系的交往者;无论是他的同时代人,还是后来研究他的学者们;无论是与他论战的对手,还是追捕他、囚禁他、试图“软化”他的敌人,都曾对他的才华产生不同寻常的感觉,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回忆、评论、研究他,几乎没有不述及或盛赞其才华的,即便是那些在政治上、理论观点上反对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有学问和艺才;即便是敌人对他的恶评,也往往从反面照见其高才的光彩。

敌人往往说瞿秋白“恶毒”、“狡猾”。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说:“瞿秋白赤化了

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① 国民党右派的刊物《社会新闻》摘登秋白狱中遗作《多余的话》时加按语说,这一著作仍然是瞿秋白“狡猾恶毒”的计谋,“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把这些话反过来看,就是正因为瞿秋白才华卓著、足智多谋,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活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威力,能够沉重地打击敌人,使敌人的如意算盘不能实现,敌人才那么咬牙切齿地说他“狡猾”、“恶毒”;正因为他才华卓著,掌握并极善于传播革命真理,极有效地引导和团结人,才使千万青年倾向革命,投入革命;正因为他卓越的才华和智慧也表现在《多余的话》里,在敌人眼皮底下以巧妙的手法表述、传播共产党人的思想和主张,表面上像“谈天”,而实际上仍然与国民党根本对立,所以《社会新闻》编者才那样写按语。

胡秋原是瞿秋白的论战对手,秋白曾以“易嘉”的笔名撰写《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文章,批判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一起”,弄得“万华撩乱”,而实际上是“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脱离广大的群众”的文艺“自由”论。^② 秋白的文章既有严肃的原则性,又具理论深度和说服力,还很注意掌握政策,争取和团结对手。胡秋原虽然还坚持他自己的某些观点,却不得不佩服秋白,表示“愿意参加”讨论:“我赞美易嘉先生的态度,倘若左翼理论家都能这样平心静气地讨论真理,我想,大家一定愿意参加。”“易嘉先生毕竟是曾经写过好些文章的人,尤其是文艺与革命问题,既革命,又艺术,有这双重资格,所以他的文章,也是一篇‘美丽的’,革命的散文——是一篇革命的‘艺术品’,不像有些文章使人望而却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54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第55-62页。

步。”^① 秋白的文章收到这样的效果，不能不说与他的才华有关。

从敌人对瞿秋白的忌恨反证他的才华，从论战对手的反应来看秋白才华，有上述几例已足够了。下面我们看看一些正直的、进步的、著名的人物是怎样谈论他的吧。

著名的革命元老、民国时期被尊为学界泰斗、大师的蔡元培先生，曾说秋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1935年秋白被捕后，郑振铎说过这样一件事：国民党中央在南京组织了一个处理秋白的委员会，开会讨论的时候，蔡元培主张以不杀秋白为宜，他说像秋白这样的人才，在中国不可多得。蔡先生对瞿秋白的了解，一方面得之于公开的著作和20年代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期间瞿秋白在国民党中央及政治委员会工作的表现；一方面得之于鲁迅等更熟悉秋白的人。

鲁迅对现代中国各界的人物，甚至对那些很著名的人物，都很少有才华方面的高度评价。在他所特别器重的人才中，得到他最多最高评价的是瞿秋白。谈到秋白杂文，他说：“真有才华”，“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谈到秋白的论文，他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他更赞美秋白的翻译，认为“在国内的文艺界是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与他比较的”。以上是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里述及的。鲁迅亲笔写的文章对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的评价是：“皇皇巨制”，“信而且达，并世无两”^②。谈到秋白被杀害，他在致友人的信里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③ 又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132页。

② 《鲁迅全集》7，1981年版，第465页。

③ 《鲁迅全集》13，第132页。

说：“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①冯雪峰与秋白极相熟悉，又是被公认为纯朴诚笃的人，他也熟悉很多现代文化名人，但他用“天才”二字评说的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就是秋白。例如说秋白是“有天才的作家”，说鲁迅、秋白是“两个天才的脑力劳动者”等，他还完全赞同鲁迅对秋白的评语。^②

丁玲是很有才气的作家，她非常熟悉秋白。能在她心目中在才华方面居高位的人不多，而秋白就是一个。她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一文中，不仅说秋白是“多才的作家”，而且述及许多生动事例，写出她所深深感觉和认识到的秋白在教课、谈吐、写诗、文艺评论、哲理思考、翻译、篆刻等多方面的卓异才华。

茅盾也是熟知秋白的，他自己也是高才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还没和秋白见面的时候，他读了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书就心慕作者其人了，说猜想秋白“是一个博学，思想锐敏，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后来见面熟悉了，秋白果然如他所猜想的那样。^③作家搞创作很少有拿着自拟的提纲和稿子征求别人的意见的，像茅盾这样的大作家更少有这种情形。但是，据茅盾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创作长篇小说《子夜》的时候却是这样征求秋白的意见的，而且非常尊重秋白的意见。论年龄，茅盾比秋白长三岁，论在文学上的经历，茅盾早已是著名评论家和写小说的大手笔，他这样做，除了友情原因，显然还因为他认定秋白的思想水平、文学见地、文学才艺之高。

陈独秀、李大钊都既是知名教授和才华横溢的新文化巨子，

①《鲁迅全集》13，第158页。

②《回忆鲁迅》，第122～142页。

③茅盾：《回忆秋白烈士》，《红旗》1980年第6期。

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们都特别器重瞿秋白。1922年冬陈独秀到苏联出席国际会议,他在短期的相处和共同工作中就选定年仅23岁的秋白预备作为中共中央的重要青年干部,要秋白一同回国,回国后即委以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之重任;李大钊则推荐秋白在编《新青年》的同时担任上海大学教授、教务长。这样的事实,说明陈、李看中了秋白,除了看到其革命情怀和品行外,显然也是看中了他的才华。

秋白的高才睿智、多才多艺引起人们对他的特别注意,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秋白的才华有哪些方面的表现?是如何形成的?这些才华在他的生活道路、革命生涯中起了怎样的作用?究竟该怎样认识秋白的才华问题?下面拟对此分层分面地作一些述说。

“没有学历”的“天才人物”

1 有位研究瞿秋白的学者，曾幽默地摹拟着某种人物的口气说：秋白同志的职务能不能提级，职称能不能晋升的问题就不要争论了——他没有学历，作品又没有得什么奖，连个省级的三等奖也没有，学历证书和得奖证书这些硬杠子他不够嘛！才气的有无和高低是不好讲的。

这位学者当然知道瞿秋白牺牲已经半个多世纪，活着的时候当过大学教授、系主任，在党内曾主持中央工作；这位学者的幽默，自然是借以发发感慨的。但他的幽默摹拟，却启发了我想到这个题目：“没有学历”的“天才人物”瞿秋白。

瞿秋白的确没有拿到一个符合现在定职称的起码要求的学历证书。他唯一

的学历证书,是1908年他9岁的时候从常州冠英小学初等班毕业时拿到的。此后经过在家自学于1910年春进入常州中学,他并没有高等小学的毕业证书。在常州中学本应于1916年毕业,但1915年他却因家里付不出学费(还因为他是一次学潮的骨干,学校出布告有“瞿爽素行不谨……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的话)而停学。后来瞿秋白曾于1916年底到武汉,考入武昌外国语专修学校。但他觉得该校教学质量不高,只读了很短的时间,约于3月初就随表兄纯白到了北京,当年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可是他只读了三年,就于1920年8月接受《晨报》和《时事新报》的聘请,于10月启程赴俄了。赴俄不是“留学”而是当记者。这样,瞿秋白的最高学历只能算是俄文专修科肄业。

然而,才华如何,是不能用一纸学历证书论高低的。请看“没有学历”的秋白之才的一些表现吧。

他中学时代就写了二三百首诗词。那些诗词,散轶几绝,我们只从今存的他约于14岁时写的一首《白菊花》诗来略窥一斑吧。诗曰:

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此诗咏菊寓志,意境明朗清疏,天真自然,情融于景,高洁中隐着淡淡的怅然意绪;文字上却又巧妙地把自已的名字“秋”、“白”、“霜”嵌入诗中。比他年长几岁的中学同窗好友李子宽回忆起当时秋白写诗词的情形时说,秋白与任乃讷写得最好最多,当非虚言。秋白赴俄前夕,他的父亲作为一位很有文艺素养的文化人,也要把那些诗词留作“纪念”,足见秋白少年时代的诗词已达到颇高的水准。然而,秋白自己却是刚到20岁就把那些诗词称为“旧时诗古文词稿”而“视如敝屣”了。那是因为他的才华又向别的方面去发挥了。

瞿秋白的父亲是画家,他从小也表现出作画的才气,到中学时代已作得一手好画了。常州博物馆今存一幅他赠表妹金君怡的山水画,作于1916年,他才17岁;上海博物馆还存着一幅他的山水画,是1919年他20岁时赠同学李子宽的。前者是横幅,画江流滚滚,间有巨石当流,波涛冲激而过,浪花怒溅;隔江有秋林一带,虽经秋风严霜而萧疏,却很有挺秀之意,云气弥漫亦不能掩其气概。后者画老松数株,浓荫覆盖,水阁一座,槛前若有人横琴抚弦;隔溪幼树成林,溪水荡漾,令人有松风荡耳、琴韵悠然的遐想;阁后层山叠翠,点染于云海之外,愈看愈远,愈远愈奇;画上方题“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胸中具此潇洒,腋下自有出尘之慨,何必苦索解人耶”,下方题“己未清明节,子宽学兄雅属”,末署“秋白瞿爽”。^①还有一幅阿Q手执钢鞭的漫画,大约是1933年春在鲁迅家避难时和鲁迅一起谈起《阿Q正传》而顺手画的。原件是一张印着“OS原稿用纸”的稿纸,是鲁迅当时用的,画所占面积约两方寸。这幅画,看来是兴之所至,随意画出,但它是由10个Q字母组合而成,构思独特,新颖别致,落笔简练,十分传神。人物脑袋高扬,右腿微曲,手挥钢鞭,动感极强,那是十足的阿Q神气。这幅画虽是随手画的,却是令人拍案叫绝的杰作,堪称天才的创造。

对书法和篆刻,秋白不仅爱好而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书法先学颜真卿,后学魏碑,兼得其他书派某些笔意,终独具体格和风致。看他书赠鲁迅的《雪意》诗手迹和将狱中照片赠陈炎冰时题辞手迹,不仅功夫不逊于一些著名书家,而且清秀流畅,柔中见刚,既有正气神韵之美,又富潇洒笔致之美,无论字的结构,还是篇幅布局,都疏密相宜,呼应自然,匀称明朗,整体感

^① 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

强,在书艺上可以说到了独特、上乘的境界。他的篆刻,最初由他的六伯父世璜启蒙,后得他的中学国文老师史蛰夫(当时工诗文,擅长书法,更是颇有名气的篆刻家,著有《蛰盦印话》)的精心指导,加上他自己兴趣浓厚和善于领会要义、把握要领,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刻得很好了,石章刻得尤其好。羊牧之说见秋白“自刻有双、霜、爽、秋白、铁梅、涤梅、梅影山人”等名章。后来在写作和革命斗争不十分繁忙和紧张的时候,也刻过一些。丁玲回忆秋白在上海大学与王剑虹的新婚生活时说,他们除了谈文学、读诗、写诗,秋白还把他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小石块上。最后他在狱中还刻过许多。他的篆刻总是独具创意,古朴中不乏新奇之感;遒劲亦兼雅致,大章不粗拙,小章不小气;刻刀凌厉,同时极有分寸感,简洁利索,同时谨细精到。看他自己的名章和“秋之白华”等章,就刻艺水平而论,称他为篆刻家也不算过分的赞语。

秋白对乐曲也很有研究,并且唱昆曲和吹洞箫都蛮好的。唱昆曲是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学的,并成为他的爱好之一。在上海大学的前期,秋白还常吹吹箫、唱唱昆曲,并且教会了王剑虹和丁玲。

以上不过是他曾有的爱好,偶尔为之的,但从中可见其多才多艺,而且都达到了令人佩服的艺术境界。他的才华主要在革命活动、思想理论方面去发展了,其次是在文学创作、翻译、语言文字学研究等方面表现出来。具体情况,我们另文去说,下面略述概况。

秋白在少年时代就常思考国家、民族、社会、人生价值、人与人的关系等大问题 and 复杂问题,感到“政治恶象的激刺”了;在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开始把屠刀对着革命党的时候,在地方上如常州也出现主政官员肆虐、政象乌烟瘴气的时候,少年秋白竟在

“国庆”日做出写挂“国丧”灯笼的奇事；

十六七岁的时候，他竟能够考虑到整个“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

十八九岁就做起“文化救中国”的功夫和事情来，思考“佛教人间化”、“出世”“人世”、“避世”“厌世”等深奥的问题；20岁就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中成为俄文专修馆的进步学生领袖和北京学联的领导人物，成为《新社会》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和《新社会》团体的主脑，写出了许多很有哲理深度的文章发表，开始了新文学创作，发表了很优秀的诗文，开始翻译介绍俄国文学，与耿济之合译成《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等；

21—22岁就写出了数十篇新俄通讯报道，写出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散文杰作，以其簇新、丰富、深刻的思想蕴含和奇特卓超的艺术在思想界和文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24—25岁就主编党中央理论刊物，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成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要员、国民党中央政委会成员；26岁成为中共中央五常委之一；24至27岁几年中就形成了颇具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支柱，提出了初具完整体系的中国革命理论、战略、策略，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开创性、奠基性的工作；

28岁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领袖，主持中央工作，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在党和革命的生死关头，作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决策，决定采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重大行动；

29岁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在世界革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很有名望的人物；受大党沙文主义者和党内宗派主义集团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他在上海革命文艺界、左翼文化界与鲁迅等一道致力领导并

亲手做了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工作，为中国文化的革新、进步立下了丰功伟绩。单是两巨册《海上述林》就足以使他的名字在文艺和文化史上永远闪光了；单是一篇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就足见其思想学术上的卓异才华，足见其宏论的伟力了。

他只有 36 年的生涯，从 20 岁算起他的写作时间只有十几年，而其间大部分时间是紧张地做革命政治工作和其他非文事的工作，还有很长的时间是在被追捕中，生活极不安定，处境极其危险，根本无法写作，然而，他的论著、文学创作和译品竟多达 500 多万字。没有超乎寻常的才华，这样的成绩是无法想象的。

最后，借用一位外国学者，苏联籍华人郭绍棠的一段话结束本节：

瞿秋白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令人惊奇的是，瞿秋白怎么能在三五年间达到这样的文化高峰！他出色地掌握了俄语，精通中国各种体裁的白话文和文言文，西欧语言也学得不错。他还较好地掌握了语言学研究方法，因此才得以制定汉字拉丁化方案。他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熟悉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从大作家到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的），所以他具有历史、哲学、经济理论、国际工人运动等领域的渊博知识。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瞿秋白既具有学者、革命思想家的天资，又具有革命实践家同样卓越的才干。这样的天才人物只能出现在那些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知识并从人民创作源泉中取得灵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间。^①

^① 《瞿秋白研究》6，第 258～259 页。

写作的高速、高效和勤苦

瞿秋白从 20 岁到 36 岁牺牲那年总共才十几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紧张地从事革命活动,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被敌人悬赏追捕,东躲西藏,甚至一天换几个地方,因而,用于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可是,他的尚未完全收齐的文集(他的作品有许多散佚了)和译文集竟有 500 多万字,这是一般毕生从事写作、写了四五十年的人也难以达到的数字。有许多研究他的人,也感到惊奇。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写作、以怎样惊人的速度写作的吧。

瞿秋白思维敏捷,下笔也敏捷,而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写作。据夏衍回忆,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瞿秋白到爱文义路普益里夏衍的寓所接洽工作,夏

衍不在家,他就利用等夏衍的半个小时时间,写了一首山歌;其他一些时候,他还利用一小时、半小时的空隙时间,写杂文、“小调”等。^①

为民众、为伟大的革命事业和文化理想而奋斗的热情促使着他争分夺秒地写作,而他那枝笔又极灵敏、极熟练和具有多种功能。许广平回忆秋白和鲁迅合作写杂文的情况时说,秋白先把腹稿讲给鲁迅听,两人交换意见后,他就立即动笔,“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②一个中午就写两篇精美的杂文,这是何等的才华!

秋白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常常重病在身,但除了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瞆的几天以外,他从没有休息的日子,为了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他往往十天八天连续不安眠。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就是这样赶写出来的。让我们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为例来看吧。书中编的是他从1927年8月“八七会议”到1928年6、7月份中共“六大”总共不到一年时间里写的政论、报告、发言稿等。这一年时间是党和革命危机最严重、斗争最激烈、他主持中央工作需要开无数的会议和做各种各样复杂繁重的领导工作的时期,最紧张、最繁忙,同时又是带病工作。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他写的收在这卷文集中的文章就有40多万字,况且这还不是全部。这样的高效、高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笔力劳动是多么惊人!况且,那些文章不是一般的可以信笔写来的文字,而是理论,是关于革命的路线、方

①《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185页。

②《瞿秋白研究资料》下,第359页。

略、政策的极重要的会议的报告，关于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研究性著作，是需要密切联系实际、具有事实根据、针对急迫的现实重大问题的慎重的指导性文章，是需要认真研究对象、研究分歧和矛盾的基础上十分注重理性的透彻、逻辑的严密和注重说服力、穿透力和排击力的辩论文章。如此看来，秋白的才华的确不能不令人盛赞了。

让我们再看看 30 年代瞿秋白写作的一些具体情况。1931 年 12 月 25 日至 28 日情况如下：25 日写《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两篇，共约 4000 余字；26 日写《鹦哥儿》和《沉默》两篇，共约 3000 字；27 日写《暴风雨之前》，约 1000 余字；28 日写《新鲜活死人的诗》，约 2000 字。这是每天一两篇的速度。1932 年 1 月 15 日写《财神还是反财神？》，约 1 万字；16 日写论文《苏联文学新阶段》，1 万余字。1932 年 3 月 10 日写《谈谈〈三人行〉》和《不可多得之将才》，共约 7000 字；13 日写《拉块司令》，约 1400 字；15 日写《小诸葛》，约 1400 字；18 日写《老虎皮》，约 2000 字；20 日写《“匪徒”》、《英雄的言语》两篇，共约 4000 字。这是隔一天就出一两篇文章的速度。1932 年 5 月 30 日写《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约 8000 字；31 日写《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约 9000 字。1933 年 4 月 11 日一天写了《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内外》、《透底》四篇杂文。1933 年 4 月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该文近 2 万字，据杨之华回忆是 4 天写成，每天平均近 5000 字。他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约 2 万字，是 1935 年 5 月 17—22 日共 5 天写成。总之，瞿秋白这样的写作速度，又快又好，确实是超乎寻常的。

对他翻译的情形，丁玲有段回忆的话：

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几枝烟，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读过他写

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字都没有改动。^①

请注意啊，秋白是在翻译，不是在抄写，一夜翻译一万字！这是除了用“天才”二字才能说明的才华了。

了解了以上情形，也就大致可知他在那么短的迫促生涯里何以有那么多著作了：一是精神力量强而深厚，热情高；二是勤苦，有韧性，一直坚持不懈；三是很好的天赋经过认真的多方面的学习和写作上的实练而有超乎寻常的发挥。

^①《瞿秋白研究资料》上册，第149页。

出众的谈吐和辩才

谈吐幽默,讲演引人入胜,很有辩才,这是瞿秋白才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又一突出方面。

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一文中就是把“辩才”作为秋白才华的重要方面来看的。他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指“五四”运动时期办《新社会》旬刊的青年学生团体和参加各校学生会活动的许多青年们,除了郑、瞿,还有许地山、耿济之、瞿世英等等)成为重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茅盾很熟悉秋白,从他的《回忆秋白烈士》一文看,秋白留给他深刻而特别引起倾慕感的印象,就是相互联系的两方面:一是“博学,思想锐敏”;二是“健谈,

有幽默感”，“极有风趣”。秋白自幼活泼伶俐，熟背许多诗词，经常出谜语、猜谜语，听故事、讲故事，口齿清晰，出语机智敏捷。他的妹妹轶群在《回忆哥哥瞿秋白》一文中写到1923年从苏俄归来的瞿秋白“态度沉静，显得严肃”的时候，说他“不像过去那样好说好动”了。“好说好动”自然是秋白少年时代直至出国前留给轶群的印象，而这“好说好动”四个字，的确描述出了少年秋白鲜明而突出的特点。对少年秋白非常熟知的羊牧之的许多回忆可以印证轶群的说法，而且令人感到少年秋白的“好说”总是口才出众，这是与他丰富的知识、情感和敏锐的感觉、总要“突破范围”的心理气概分不开的。

大约十四五岁的时候，秋白一边吃饭，一边很有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他又用筷子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乡下人还不知多少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哩。”那么年少，他就这样侃侃议论革命大事和百姓疾苦而出言不凡了。

约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要把一些衣服送去典当，其中有他母亲的绸棉袄。羊牧之问：“天一冷太夫人怎好没棉袄？”他苦笑着说：“天下冻馁人，何止我母亲，到那时再说吧！”作为少年，这样的口风，这样的器度和心路，多么不同寻常！

还有一次，看到衣衫褴褛的农民在街上卖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头上插着一个稻草结，低垂着脸。秋白拍拍小伙伴羊牧之的肩膀，说：“走吧！……好像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当时，正有一个戴宽边礼帽的大胖子从身边擦过，他指着那胖子对羊牧之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就好过了。”大约在这件事的前后，他们谈到《水浒传》，秋白曾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酒保。”当时年岁更小的羊牧之

说：“做个酒保有什么出息？”秋白笑着说：“做个那样的酒保也是有意思的。”

秋白当时才十几岁，他的想法和言语自然还都是幼稚的，但是，他那对世事的灵敏感觉，他那样的“心境”，他那活跃的思想、年岁小而气概大的特点，以那样的谈锋、话语表现出来，却是一般少年——甚至许多成年人所远远不能及的。少年秋白的谈吐已经闪着正气和才气聚合而初燃的火光。后来的秋白渐渐地成熟起来，沉静、严肃的方面当然逐渐增长，可是，好说好动而且说得精彩、口才出众、敏捷机智、幽默风趣的特点仍然明显地持续着，而且有所发展，自然那是成年人、大文化人和革命家秋白的新的样子了。

在上海大学时期，作为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和革命宣传鼓动家的瞿秋白，讲课、讲演所表现的才华，更是引人注目。那时秋白讲授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等。学生都很喜欢听他讲课，有人形容他上课时候的情形说：“在青云路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震动，似乎要倒塌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地听，一直到下课为止。”杨之华是当时的学生，她在《忆秋白》、《回忆秋白》等文章里写道：“秋白讲课的地方是一个最大的课堂，但我一到那里，就觉得这个课堂太狭小了，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热情的听众，其中除了社会学系的同学，还有中文系、英文系的学生，有时上海其他大学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来听课。”“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神志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

秋白在其他公众场合的演说、讲话、报告、发言，也是极有风

彩、引人入胜的，总是引起强烈反响，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较早的事例是在“五四”运动中，他多次在学校、在街上讲演，宣传鼓动，以爱国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热情推进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因此他两次被北洋军阀政府的警察拘捕。郑振铎所说的秋白在学生会活动方面表现的“出众的辩才”，主要是亲自目睹当时的情景留下的印象。第二个例子是1923年刚从苏俄归国时在北京的讲演，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的许广平十年之后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些情形。她在《瞿秋白与鲁迅》一文中说：女师大请秋白来讲演，讲的是苏俄新社会的情况，“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就往上一扬的神气还深深记得。那时（秋白）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第三个例子是上海大学时期，他在郑振铎和高君箴婚礼上的简短讲话。婚礼前还发生了一件秋白为郑、高及郑母刻图章的趣事。据茅盾等回忆，郑振铎对于在结婚证书上加盖主婚人（郑母）图章大概“看得很郑重”，就写信请秋白刻。不料秋白的回信竟有写着“秋白篆刻润格”的一笺：石章每字七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看了，以为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请茅盾刻。茅盾久不刻章了，手头又没有刻字工具，正找刀试刻，秋白派人送来了红纸包，上面写着“贺仪五十元”几个字。郑振铎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茅盾已打开红包，却是三枚图章：郑、高两章合为一对，边款刻“长乐”二字，意思双关——一取夫妇长乐的吉语，二与郑、高都是福建长乐县人相合；另一章是郑母的。按前信中“秋白篆刻润格”算来正好是红包上所书的“五十元”。这出人意料的玩笑，引得茅盾和郑振铎不禁捧腹大笑。秋白讲话是这天下午婚礼上的事。讲题竟然是“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开头一句大意是说婚礼当然热闹欢快，喜气洋洋，可往往是一个美好的女

子遭罪悲剧的开始。这话使得四座皆惊。接下去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一番话,讲得又诙谐又庄严。满堂宾客,或瞠目结舌,或鼓掌欢呼。此事在当时被传为奇闻。此外,他在广州同国民党右派辩论时的发言和在武汉中共“五大”上的发言等,除了内容的真理性之外,他那既慷慨陈词又从容论证,既明畅凌厉又严密透辟,既击中对手要害又说服多数听众的辩才也是在论战中致胜的要因。

瞿秋白平常的谈吐,他和好友、恋人、妻子的交谈等又另有风致。丁玲的《回忆与随想》有很生动的记述。她说,她和王剑虹最初与秋白见面时,秋白“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第二次见面“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他的讲法也和那种“像瞎子摸象”的讲法大不一样,他讲起来“像熟练的厨师剥笋”,谈起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他的话就更多,“我们……都听迷了”。到了上海大学,秋白与王、丁交谈时,讲话面更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西南北……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

秋白关于农民运动的谈话也表现出特别的睿智和幽默。有一次,汪精卫的秘书对秋白说,何健军长的父亲被戴高帽子游斗了,还从口袋里拿出《湖北农民》报给他看。何健的父亲是土豪。秋白看过报导说:“何老太爷养尊处优惯了,能走走跑跑也有好处。”在一些人以“过火”为借口反对农民运动时,他说:“农民要活命,要养家婆子女,就得有土地,要想得到土地,就得要政权。但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和财神菩萨都不会给他们。他们只好自己动手。他们在风里雨里劳动惯了,手大脚粗,动起手来,碰了军长老子的头,伤了主席三姨的腰,有什么可指责的?现在不

是只許州官放火的時代了，農民不起來干，就只有死，只有受剝削。”但他也對辦報的同志們說，要講策略，鬥惡霸地主，重點講他們魚肉鄉民的罪惡，農民的義憤，卻不必點出他們的兒子是誰，擔任什麼職務。點了，不利於聯合，也不利於鬥爭。

夫妻之間，秋白談吐的特點也很顯著。有一次他對楊之華說：以後有空要把“秋白之華”“白華之秋”“秋之白華”刻成圖章，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的意思。還有一次，他從江邊找到一塊石頭，白質里隱有紅絲，他磨平一面，刻上“家在江南黃葉村”一句話。楊之華說他書生氣重，脫不了文人積習。他則笑着說：“文人積習是改不了了，但一個人的興趣，應該是多方面的。列寧酷愛文藝，歡喜下棋；工作時還歡喜哼俄羅斯民歌呢。”

第一流的奇异新诗

秋白似乎是天生的诗人。他的心是诗化的,他的情感世界、他的一切精神创造活动、他的全部生涯,那么美尚,那么绚烂夺目,那么高迈激荡、正气浩然,充满诗意。他写的诗,由于生活极不安定,由于各种变故而致的散佚,留存至今的不多,但我们知道他一生都是常有诗作的,从少年时代起直到就义前在狱中都作了好多诗。即使在武汉时期那样紧张的革命活动中,他还找石头刻诗句;即使在第二次赴苏联期间那样复杂的政治矛盾中,他也有诗作。他的书信、散文、杂文也都是饱含诗意的,论文也时见诗情。诗心和诗化的革命活动、创造活动,酿成语言形式的诗,流泻于笔下,在秋白那里,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或许可以说是

“天生诗才”的意思。

限于篇幅,不能全面分析他的诗,这里只选出几首,从中略窥其诗人才华之一斑。且看作于 1923 年的新诗《过去》:

淡绿色的落叶儿,
秋意中轻轻飘展呢。
落叶儿,我送你归去,
祝你安安心心抛离“生意”。
春华秋实,你的使命尽了:
地上枯死了绿茵的草,
枝上飞去了啁啾的鸟,
只落得把秋来报告。

新与旧,过去、现在与将来,几乎是秋白一直萦绕心头的诗题,他的谈话里、散文里、论文里,都常有这方面“心象”的表述或涉及。他在《饿乡纪程》里说:“我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生在‘旧’的监狱里”,“过去的留恋,心理现象情绪中的自然状态,影响于人的个性却也不少……‘过去的留恋’呵,你究竟和我的将来有什么印象,可以在心灵里占一不上不下的位置呢?……一心另有归向了,一挥手,决然就走!”在写《赤都心史》的时候,有时感到“心智不调”、“心灵的病状”,觉得“一切一切过去渐渐由此回复我心灵的旧怀里”;有时写道:“世界是现实的,人是活的”,“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要求以达这‘新’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者都不推辞”,“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新诗《过去》所表达的思想、所呈现的心态是上述状况发展到 1923 年而成的。

当时的秋白是“江南新燕”,迎春潮,衔春色,激越奋飞,然而“过去”在“自然状态”的“心理现象情绪”中仍然不能不有“印象”的延续,“个性”之中仍不能不因惯性的作用而存在复杂的新旧

交错、更替现象。或许还因为当时正与王剑虹热恋，他的情感纠葛也涉及过去与现在及将来的问题。具体事虽不可妄猜，诗人对过去那种意绪——那带着虽送其归去却仍呈现“淡绿色”和“飘展”形象的缠绵味儿，似乎并非单是一般历史或时间意义上的“过去”所引动的。全诗以“落叶”形象为中心，融和着诗人的主体心性、情绪构成意境，而“秋”之“实”作为现在，是诗人立足之处，进而这“现在”当然引向“秋”的将来。这诗如果题为“落叶儿”，似乎亦可；但秋白以“过去”为题目，就使读者在欣赏诗美的同时也随诗人进到哲理思考的境界。这诗与秋白少年时代的旧体诗《白菊花》有心性上和诗艺上的相连通之处。《白菊花》（“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和这首《过去》，都是诗人本然心性的呈现。前者将自己的名字“秋”“白”“霜”自然嵌入，后者中“秋”也是自身，“秋”字三次出现，都可作双关的解释。“秋意”即秋白现在的意绪；“秋实”即已经成熟的、新的秋白，作为现实、有益之“实”，奉献给世界、奉献给将来；未行的“秋”，乃是“落叶”（即“过去”）已“尽”的“使命”的目标或结果——没有“过去”，自然不会有这结果，但这被“报告”的结果（即“秋”）又引向将来。诗人不否定“过去”的价值，但要“安安心心”地送别，而执着现在，走向未来。过去的“绿茵的草”毕竟已经“枯死”，过去的“啁啾的鸟”毕竟已经“飞去”，“落叶儿”虽还是“淡绿色的”，虽还在意绪里“飘展”，但毕竟是“落”了。“我”怎能否认“你”（“落叶”、“过去”）的美呢？我怎能忘记“你”曾尽的“使命”呢？然而，却只能“送你归去”。

鲜明、具体而有极强动感的形象，由诗化的心性、回环流动的情感意绪而生成，这种形象又以其艺术美与“我”的心象铸合为带着决断兼温柔的、略带朦胧特点的意境，而这诗境又渗透着深邃的哲理。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诗才之卓异。

与《过去》同时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的《天语》，格调与《过去》有别，但同样是绝妙好诗。全诗如下：

大地山河，如今还剩得几许，
便欲倚飞云，一直叩天门去。
静悄悄里，像听得宇宙低语；
寒浸浸，光芒涵照斗牛路。
飘忽归来天国，故乡已无住处，
那莽尘寰乱攘攘，怎能回顾？
何处，何处？

……

天却有情，恨我高绝，
殷勤来问我那人间苦。

这首诗和《过去》一样，以前没见有人分析其意。和一位朋友谈起来时，他说：字面上是好懂的，是说天有情，诗人闻得“天语”的感受，但究竟由何感面作，底蕴如何，则十分朦胧难解。笔者在这里也只能按秋白当时（1923年下半年）的某些史实和他的情感波流，谈谈自己的看法。中国历来有“诗无达诂”的说法。秋白这首《天语》也许就属那种难有确解的诗吧。诗题以“天语”二字来标，似乎是作者故意要用《红楼梦》那种“甄士隐”式，把真事隐去，令人虽知大旨言情，却如面对着“天”而于天情、天意、“天语”各自去意会。诗已发表70余年，按说该有如“红学”中那样的纷纭众说，至少也该有几种意见和赏析方法，然而却至今还被冷落着。因而，我觉得无论我说的是否有点道理，无论我说的错到多么荒谬，我也得说出来，以引起大家来探讨《过去》、《天语》这类表现了诗人才华的诗篇。我觉得这首诗一定是秋白与王剑虹恋爱中的情诗，但不同于一般的情诗，按字面解为诗人与“天”、“地”的关系也可以说通，若联系诗人与心目中“天上的仙

女”王剑虹的爱恋故事,则可以解得更透彻。

据丁玲对秋白的回忆,“剑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他自己却在“凡间人世”;他又用法文“我的心”的音译“梦可”二字叫王剑虹。在他们初恋而未明朗表白时,王剑虹由于自尊心极强,宁可把爱情关在心里,宁可“窒死”也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因而要回四川故乡去,是丁玲帮助他们,秋白去叩“天上的人儿”的门,他们才热恋起来。我觉得,了解了这些,《天语》之谜就豁然而解了。

王剑虹,“虹”是“天”上之至美;“故乡”在四川,那是“天”府之国;爱情又使秋白觉得王剑虹其人是“天”上的“仙女”;在爱情明朗化之前,剑虹大约从1923年夏天在南京初会秋白起就暗暗地爱上了秋白(秋白大约也是那时就把剑虹看作“天”上的人儿了)。到上海大学,经频繁接触,剑虹又暗暗写下了热烈地爱秋白的诗(丁玲说,是丁玲在王不知道时把诗拿给秋白看了),那是出于天然的在“静悄悄里”的“宇宙的低语”啊!这样,“天语”之题隐去的真事,“天却有情”不就豁然可解了吗?

由于对“天上的人儿”的爱驱使,虽身在“凡间人世”,面对“还剩得几许”的“大地山河”,“便欲倚飞云”(那“虹”是在“飞云”中的)而“一直叩天门去”。恰于这倾慕之中,心有灵犀,“像听得宇宙低语”,竟如庾信《哀江南》词中“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的意象——二十八宿中斗宿和牛宿是星位相临近、光芒相涵照的两宿,它们在地上所对应的是江浙皖赣区域。虽然钟爱剑虹,虽“欲”飞去叩天门,却因“凡人”与“仙女”之别、“地”与“天”之隔,尚未敢明白地去爱;虽相“涵照”,却尚未聚合为热恋的雷电。那“静悄悄里”的“低语”是心底的声音,虽是“宇宙”之天然即爱的声音和情意,却不能不因“分于湘汉”而有“寒浸浸”之感。以上是诗人爱心的自然情状。接着,易位想象那“天上的人儿”

之“飘忽归来天国”——也许是基于剑虹曾要回“故乡”，要回“天府之国”的事实吧，但诗里避去真事，而将“故乡”那“莽尘寰乱攘攘”，已“无住处”的情形铸成艺术意象。最后，“天”的“有情”，就是借代说“天上的人儿”的有情，“殷勤来问我那人间苦”就是天地之恋、仙凡之恋的佳境了。终于，这恋情还是与“大地山河”密切联系着，是向往着“天”（理想）而更与解“人间苦”的情怀、志向相融通的。

双层的意蕴，情绪流动的复杂过程，多镜头多景象的纷呈和交替，竟然用那么简洁的十行诗就完成了，意境、韵味、格调又是那么美，的确非有出类拔萃的才华不可。

再看一首《铁花》。这首以颂劳工、爱劳工、咏理想为要义的诗，情感激越，调子高昂，又较易解，被引用和称赏也较多。全诗五节共20行，从首节“工厂”内“锻炼着我的铁花”起，以次节锻炼的情形“嗤嗤地烧着了花蕊”承；第三节写环境里“锤”声、“金铁”声如“铜松拂着刚风”，转到“我真爱上了”的抒情；第四节写力源“有力的掌”和热源“工厂”的“火”支持和“照耀”着“我这壮勇无畏”；末节以“劳工之怒”、“幻想着大同”、“引亢高歌”与“锻炼着我的铁花”相整合结束全诗，激情也达到高峰。

《过去》、《天语》都像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形式“词”化来（秋白对词有深入的研究，词填得极好），简洁而细腻，曲折幽隐，适合那作意、情调的表达。这首《铁花》则较多有“歌”的特点，明快而热烈，刚强豪壮，也与题材及作意吻合，同时不失之于“粗”，其诗的结构、诗行形式、语言诗味儿、韵律的和谐都是很美。意象上“我”与“铁花”是一而二又二而一的，“火涌”、“火颶”、“铁炉”、“刚风”又同“锻炼”、“劳工之怒”、“大同”、“高歌”融为一体，既具整合的豪壮美，又不乏意境深度上的美。在自然而然地运用“比喻”和“比较”的艺术手段时，以“阳光的煦和”“月光的抚慰”反衬

“融融的火颯”中“铁花”那种“嗤嗤地烧着了花蕊”的引人发生新型之“爱”的鲜明形象，“铁花”之喻也确乎够绝够美的！

“别人无法代笔”的旧体诗

秋白有奇绝的上乘新诗。可是，将他的新诗与旧体诗相比较，我似乎更喜欢他的旧体诗。那是秋白表现于诗上的另一种粲然才华。

秋白的旧体诗，已有较多的解说和赏析，我在这里只略说其所表现的作者诗才之卓异之处。韵脚、平仄、对仗是否工稳，组句是否熟练，粘联、承转是否自然等等，是历来作旧体诗必须讲究的，只要按“规矩”下些基础功夫，中才之人也都能熟起来。有的人弄熟了，每天都可以写好多首合乎格律的“律”、“绝”之类，却总是平庸得很，甚至矫情满纸，故作豪语或无病呻吟。那些既乏味庸劣、矫揉造作，又连基本体式也凑得不成样的，当然更等而下之，更说不到“诗才”二字

了。只有那种诗如天成,真心性、真情怀自然呈现、独具一格,辞采、语味儿、炼句的神韵、整篇流程的源头波峰涛谷旋荡及归向、意境美及其演化等皆有不可取代、不可混淆的异彩的作者,才是上等诗才。瞿秋白的旧体诗明显是达到了这种高度。陈旭麓先生说到秋白“是一个少有的富有才华的人,他在许多方面才华横溢”的时候,对于秋白的旧体诗,举他写于1917年的《雪意》和1935年的狱中诗《梦回》为例,认为秋白文字风格具有“别人无法代笔”的特点,其风格的一贯性也很明显。^①那么,我们就先从《雪意》来看吧。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诗写于生活最“枯寂”的时候,秋白白云诗里有“忏悔的贵族”的“颓唐气息”。不过,就诗艺而论,雪意凄心、孤寂怅惘、旧梦如烟,乃是实境况、真情绪的自然呈现。特异的那样一位有高度文化素养的青年,“士”的家庭已破落的秋白,在那特定的政治黑暗、社会污浊、文化混乱的京城环境里,自身虽已“忏悔”,却生活无着、亲人难顾、前程难瞻,怎能不感到“雪意”之冷、心境之凄、孤独怅惘呢?而“雪意”、梦烟的词色、语味多么妥贴而又独具特异风致啊!“天寒沽酒”由“雪意”生发而来,承“心惘然”而再现出自身形象,结句那折梅伴醉的动状静态、浪漫气息,既是“枯寂颓唐”中保持高洁品格、美质雅仪的生动确切的诗化,又是与雪意、梦烟、以酒抗浊相联属、相呼应的最佳艺术表达。这诗,即使置于唐代以来最佳绝句之中,也是毫不逊色的。其可贵的

^①《瞿秋白研究》4,第241页。

卓异诗才主要在于：那诗心、诗性、诗格、诗风，高而奇，质而雅，又独具神韵，不可替代。

狱中《梦回》诗曰：

山城细雨作春寒，
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
偏留绮思绕云山。

反复地好好读读、品味品味吧，这确是秋白那《雪意》式诗心诗性诗格诗风在另一特定环境里的表现。虽是“长安”（北京）变成了“山城”（长汀），“雪意”变成了“春寒”，独自“沽酒”变成了狱中“孤衾”，却是同一风骨的细相变化。“旧梦残”与“旧梦”如烟，则是连用词和语意都是呈现出同一个心性的表征的。作家、诗人常有孤独感，这是古今都较普遍的现象。秋白由于其生涯的特殊性——自少年时代就家庭离散，痛、苦、愁、惨，相当孤寂，后来只身离国，虽沐“红光”，重铸心“钟”，投入“开天辟地”的事业，同时也如《赤都心史·三五》所说，在“草创”之时感觉“孤独无助”；归国后高昂奋进时期，他的群众观念虽使他成为坚持集体主义而弄“赤潮”的革命家，但不正常的党内斗争、自成系统的理论思考的超拔、周围的昏乱现象等，也会使他有孤独感；被排挤、打击，被逐出长期所在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后，即他把《雪意》书赠鲁迅的前后那几年，孤独感更是伴随着他，到了狱中，那是又一种“孤独”了。“天寒沽酒”、凄心怅然、折梅伴醉的孤独和保持高洁品格、美质雅仪的心性，演化为“万缘俱寂”和“绮思绕云山”的情状了。“绮思绕云”，是在狱中环境，在“孤”、“寒”之时出现的，就更加可贵；是在“梦”回的时候更鲜明地感觉到的，梦中的一切“寂”然全无，心中偏偏“留”着美丽的思绪、高尚的情怀，就更说明这“绮思”的牢固，更说明这“绮思”已经是属于作者心性

的了,是自然而然永固性的存在了。在狱中特定环境中牢固地保持着高风亮节、憧憬着美好理想的情形,用这种从表层看是写实(“山城”“细雨”“春寒”“孤衾”皆写实)写梦的诗来表现,亦真亦幻,作意深隐,静中有动,形神相得,“寒”冷“孤”独却有“春”“雨”预示着希望,“万缘俱寂”却有“绮思”高绕着“云山”。这样美而心性化的诗的确是高境界、高才艺的。

我曾猜想这首《梦回》诗很可能还与秋白对王剑虹的回忆有关。他们在热恋时和做夫妻时秋白总是叫剑虹为“梦可”,他在狱中的文字中记有“与王剑虹结婚”和“剑虹死”之事,自然也会忆及当时的诗一般的生活和剑虹仙逝之后他自己的心情。那么,他借这首诗也将自己有关的内心活动融合进去,也是可能的。题曰“梦回”亦暗合他对王剑虹的称呼,“孤衾”之语亦合夫妇死别之事,“旧梦残”“万缘俱寂后”也可以用王剑虹已去世十多年而秋白已另有夫妻生活并且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情形作解释。“偏留绮思”正可解释动笔写诗时的回忆追念。“云山”二字也能与“虹”、与她在秋白心中的“天上的人儿”相合。联系秋白与王剑虹的关系所作的这种猜想与前文所作的分析,此二者不必看作是相互排斥的,高才的诗人,其作品意蕴上的双关,乃是不罕见的。我们曾述及的秋白为郑振铎夫妇刻的“长乐”图章就双关得那么巧妙;此《梦回》诗当亦不可排除双关构思。才华出众的诗人自有奇绝的诗艺。

《江南第一燕》、《读〈自由谈〉有感》、《题远东第一伟人铜像》及狱中诗词《浣溪沙》、《卜算子》、《百年心事》,还有集句《狱中忆内》、《斩断尘缘》、《偶成》等,都是上乘之作,而且各有特点。《江南第一燕》诗曰:

万郊怒绿斗寒潮，
 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
 为衔春色上云梢。

这首诗于1923年12月写在致王剑虹的信中。当时，秋白与剑虹热恋新婚，同时在革命事业中英气勃勃，展翅高飞，他主要是协助孙中山请来的顾问苏俄共产党人鲍罗廷从事国民党改组和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中国最进步的新兴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一面加强自身发展和优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6月）确定新的大方针之后，多方“检点”，精心研究和领导工农革命运动，贯彻新战略新策略，沿着新途径动员和组织新力量；另一方面与辛亥革命以来旧有的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革命党人合作，把国民党改组为统一战线的形式，借已有的革命地盘广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当时就有“借窝生蛋”之说，那是不准确的比喻。“检点新泥筑旧巢”则既能涵盖当时共产党人参与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又有了更广的涵义，如果解释为把旧中国变个样子，也不出离诗句设喻的形象所涵盖的范围。革命重兴了，高潮到来了，正愤怒地“斗”反动势力之“寒潮”。诗人酿成“万郊怒绿斗寒潮”的警句，作为全诗之首，气势雄壮，这是一般作者难以达到的。以“绿”满“万郊”的勃发生机为背景，以“江南第一燕”比喻诗人主体的形象，既与背景相得，又是诗人精神——那种革命自豪感和灵敏矫健——的表现。奋飞的江南新燕，“衔春色上云梢”，这是何等令人神往啊！

恋人夫妻间的情书，自然是关乎情爱的。秋白那种对恋人的爱，正是与革命的、奋进的情怀相融为一的。我们不必在字句中寻找单单应对着只在相恋的个人之间才有的爱语。不过，秋白此诗之绝妙，除了前文所说，还可以从“为衔春色”、“新泥”、

“旧巢”等双关之义去体会。这些与情爱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

这诗,意蕴富,气象新,诗境宏阔,格调高昂,又以多种比喻的形象之美、主体动态描写的健捷高迈、绘景的色彩和情致美、诗句间的自然贯通和全诗整体的和谐美特别见佳。

《读〈自由谈〉有感》诗曰:

不向刀丛向舞楼，
摩登风气遍神州。
旧书摊畔新名士，
正为西门说自由。

这首“打油”诗,曾书赠鲁迅。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所谓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阔佬“名士”,却毫不思抗日救亡,而在“舞楼”艳阁里“摩登”(modem)——骄奢淫逸、颓废纵乐、纸醉金迷的“现代化”。这时有文人作文章说什么真正快乐的情死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那样,为西门庆那样的“自由”写颂歌。秋白以此诗“打油”,一面描绘国民党政府及其社会基础——剥削阶级“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的情形,并予以鞭挞,揭示出他们那种与人民的爱国斗争相背的反动性和穷奢极欲的腐败性;一方面嘲讽和批判文化界那些作为腐败、反动统治者的伴生物的“摩登”文人(“新名士”是“摩登”文人的另一说法),把那种“新”到或者“摩登”到“为西门说自由”的倾向与上流社会的腐败联系起来。这种善于讽刺的幽默,是秋白的诗的又一风格。狱中诗有“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的名句,那是反语讽刺,也是属于秋白式幽默的。

写散文的大手笔

无论在秋白文学创作中,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散文的地位都特别地突出和重要。在“五四”以来灿若星辰的散文家之中,没有谁能取代他那枝大笔,他的散文那种“大”气、强辉、异彩、诗境史笔哲思融一的高境界的特殊美,与其他大散文家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冰心、郁达夫、徐志摩、叶圣陶、朱自清、茅盾、沈从文等人的杰作一起形成中国现代新文学散文美不胜收的艺术世界。

“五四”新文学散文的初萌时期,他就有了—些很优秀的作品,其中有些篇章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最早的散文诗。他那大手笔的才华已经略见端倪:

月影儿冷笑:“哼,世界寂灭了!
大地上正奏着好音乐,你自己不去

听！那洪大的声音，全宇宙都弥漫了，金星人，火星人，地球人都快被他惊醒那千百万年的迷梦了！地球东半个，亚洲的共和国里难道听不见？……”我不懂他所说的声音。我只知道我所说的声音。我不能回答他。我想，我心响。心响，心上响：“这一切声音，这一切……都也许是心外心里的声音，心上的回音，心底的声音，却的确都是‘心的声音’。你静悄悄地去听，你以后细细地去听，心在哪？心呢？……心在这里。”

（《心的声音·绪言》1920.3.6, 20岁作）

新的世界巨变，弥漫宇宙的洪大的声音，作者还“不懂”，然而，有相应的真切“心响”。“心外心里”“心底”的声音交响——“心”就“在这里”，静静地、细细地“去听”吧。宇宙之“大”、新声音之“大”、“心”之“大”、“心响”的真切，令人神往；动中又有静听之态，见心性之相。20岁就有此宏奇之文，非天才而何？

紧接着，他的散文杰作《饿乡纪程》问世：

阴沉沉，黑魑魑，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过一点半点阳光……

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居然露出一线，那“阴影”跟随着他，领导着我。一线的光明！……就此照遍了大千世界。……

……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饿乡纪程·绪言》1920.11.4, 20岁作）

阴沉黑暗感、寒湿腥秽感、灿烂鲜艳感、大千世界的视野、兴奋的心之虽朦胧却强烈的追求（受“阴影”即新思潮、新理想、世界革命新象的引导）、“为大家”开辟“光明”之“路”的决绝之气、

勇进之态,这些相比相照,变化流动,相因相融,整合为动人心弦的文章。20岁竟然有如此文笔,如此气象!

荒凉广漠的大原,拥抱着环回迂折的峦谷,冷风凄雨,严霜寒雪,僵绝的冰流渐渐的溅裂,飞舞的沙砾阵阵的扫掠,一切“天然”的苛酷累年积月,层层抑遏,却有兀傲猖狂的古树,翹然矗立于其中。……年龄无量数,幅员无量,经受尝试无量苦……时时贴拂自己的万里长枝……似乎是已经老态龙钟……然而……也崛然强项。只有凄微的风色,匿黯的日影,重云摩顶,孤鹁啼枝,添绘了几许悲愁的景象!……预觉“严冬之恶神”狂暴,却还有余力作最后的奋斗……他是自信的,神圣的古树呵,自有他永不磨灭的自信力。

……我们的老树……远古以来积弱亏蚀——况且赤舌的尖儿刚扫着他腐朽的老干,干是一旦崩裂,他所自信的春意之内力,趁此时机莽然超量暴出,腐旧蚀败的根里,突然挺生新脆鲜绿的嫩芽,将代老树受未经尝试的苦痛。

……孤零零这一棵古树中的新枝,好不寂寞凄清。何况旧时残朽的枝叶,侵蚀的害虫……依然如旧,或者暴风霹雷之后,天文的反动,更加暴虐……春意的内力呵!……还希望勇猛精进抗御万难,一往不返,尤其要毋负这老树兀岸高傲的故态呵!

(《饿乡纪程》末篇,约作于1921年初,21岁)

用“古树”和“春意的内力”“鲜绿的嫩芽”“新枝”来比喻旧世界旧社会文化和其中刚生的新国度新文化,比喻古老枯朽却又兀傲神圣的中华传统和受世界剧动、赤焰初照、内力孕生的新生力量。老大的古树如何——时间上的历史与现实,形貌上的“万里长枝”和“零星琐叶”、“老态龙钟”和“兀傲”“矗立”,气质上的

“积弱亏蚀”和“神圣”“自信”、“朽旧蚀败”和内力犹存,变化上的被摇动、被扫照、被激发,在“崩裂”时“内力”出新;新芽新枝如何——从无到有,是老树的“神圣”“自信”“内力”因宇宙间“春”气而焕发“春意”的产物,它有希望,有前途,但它“嫩”,而且必然要承受老树旧有残朽之物和病虫的遗害,又必然“代老树”受外在“苛酷天然”、“暴虐”力量之害而经受“苦痛”,它现在也正不能没有“寂寞凄清”之感。作者是属于这“春意的内力”,属于“新枝”的,或说就是那刚刚“挺生”的“新脆鲜绿的嫩芽”之一。这“春意的”新芽新力正要“超其能量而暴发”,热望着与整个“新枝”即处于旧世界、旧文化中的新社会、新兴文化力量一起,不再因袭“故态”,而要“勇猛精进抗御万难”,最终使整个世界变个新样!

这是通篇高度诗化的散文,具有崇高情怀美、明澈史识美和深蕴哲理美,具有广袤万里、伟岸千丈的宏大美和日影重云、风雨雷电、春枝新芽等变化着的万千气象美。文气放而不恣,理路纵横交织而毫无错脱隔塞;语汇丰富,精于修辞,而毫无浮华之感;诗心高迈而不玄;文质细密而不腻。

秋白 20 岁至 21 岁写的《饿乡纪程》已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杰作。该书是作者将赴俄“路程”和“心程”交织起来写的,17 个部分(包括绪言)构成相连续、相呼应的长卷,各部分又相对独立。其创造性是非常突出的:在形式上是“随感录”式散文、单篇抒情“美文”和传统游记的融合和发展,其中的散诗篇章开“五四”以来散文诗之先河;在内容上,那么广、那么深的社会画稿,当时无人能比,对自己向往社会主义而发生心理变化历程的生动写真,更是当时独一无二的;诗、史、论结合,气魄宏大、行文奔放的风格,也是古今罕见的。

到了苏俄,他接着写的《赤都心史》,又达到一个新高度。《赤都心史》既保持了《饿乡纪程》的长处,又因已到苏俄,见到了

真切的实际状况而改变了急切向往“新国家”的那种意态和追求上的朦胧性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迫促感,改变了较多政论、思想文化论渗入所造成的稍欠精悍的文笔,写得更冷静深沉、从容镇定,更见本色,更加自如,写法更多样,技法也更熟练。书中篇章多属日记、杂记式,随着作者情绪的变化和所闻见、所心应、所思所望的人、事、景、物、问题、精神文化境界的移转,也呈现多种风格,有的热烈激越,有的则沉静深刻;有的最显内力奔涌又理智明睿,有的则舒缓婉约而诗境清朗;有的朴实质直,有的冷峻含蓄;有的极有谐趣,有的低回悱恻,还有的如交响乐。于是,全书呈现为自由抒写、色调斑斓而又和谐统一的整体。让我们读几段品味一下:

路氏(卢那察尔斯基)招待我们坐下之后,我们就拿出问题请教:最近教育上的设施和东方文化的意趣。路氏是一演说的艺术家,谈吐非常的风雅,又简截了当,总谈不过十分钟,而所答已很完满不漏。他面色灰白,似乎不大健康,所穿衣服非常朴素。他的谈话大约如下……起身告辞,路氏握手道歉说:“可惜现在有一委员会要开会,我不能多谈了……”^①

文字极质朴,洗炼到无一冗字,却写出一个大文化人的风貌,内容丰富而真切,作者感受、敬佩的心态亦在其中。

愁惨的阴云已经散尽,凝静的死雪已经化完,赤色的莫斯科渐渐融陶于明媚的春光。蔚蓝的天色,堆锦的白云,春气欣欣……基督教主庙壮丽的建筑,辉煌的金顶,矗立云际,依然昂昂突显神秘的奇彩。庙旁旷园,围着短短的灌林,初春的花草,鲜黄嫩绿,拂拭游春士女的衣袂。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25页。

莫斯科最大的教堂……不多时,人渐拥挤,最高神甫到了。只见一老者穿着银色长袍,仿佛中国的道士服装,旁有两侍者,服装相类。一侍者手执香炉,垂着银索,在前一面走着荡着……大礼拜式就此开始。随后神甫走到堂中向众画三次十字,一侍者展开斯拉夫文《圣经》……高声朗读……仪式,延长约有两小时。

……我说仿佛不在欧洲。他(友人郭质生)笑着说俄国东方文化很深。……诚然不错,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①

有中国古代优秀写景文、记游述事文之风致,画中有诗意,逼真的场面描写精炼而呈现精神风貌;只一两句议论即可见作者湛深的文化眼光。

馆(咖啡馆)门开处,一位“美人”走进来了,红粉两颊,长眉拂黛,樱唇上涂着血滴鲜红的胭脂,丝罗衣裙,高底的蛮靴,轻盈缓步的作态坐下,眼光里斜挑暗视,好像能说话似的。拈着一枝烟,燃着了……“新妓女”神气的女人……店主人……用法文说道:这又不知道是哪一位“委员”的相好,看来很有钱呢……^②

写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开放商业,在促进经济恢复和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些污糟现象,“新妓女”是其一。寥寥数语就勾画出人物形貌,而且非常传神,引店主话只一句就有两种奇妙效用:一见某些“委员”腐化现象于新政权有损;二见店主等精神状态。

某乡有一地主,(土地财产被)没收之后,他到处询问,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41页。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155页。

向各机关去申诉：“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没收财产？”——他始终不明白是革命。特地跑到彼得堡中央劳农政府，又撞了一个钉子。——精神病更厉害了。……有人可怜他，给他讲解这是“革命”，他已不是地主了。

——什么！什么！……啊！……不是地主？没收？房子，田地？……呀！什么！……什么！

小村落的尽头，一间木屋外，残枝堕叶，雪影稀微之处，常可以看一人，有时背着手，有时叉着腰，独行踽踽，来去踟蹰，不时指手划脚，呢喃自语：

呀！什么！^①

本段文字刻画了一个无法懂得“革命”的土地主。单是这种关注就足见作者入社会生活之深和思致之殊。这样的作品，若无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写不出的。几句话就写活了一个人，就能引起人们多方面的思考。形象、情绪、生活逻辑紧密凝在一起，而一个22岁的青年，文笔就这么老道，更令人惊奇。

病魔，病魔！……

低徊感慨缠绵悱恻之情，故乡之思隐约能现。……噢！

噢！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总应当”脚踏实地，好好地去实践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是一件。……“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斲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202页。

……我要“心”！……痛痛快快地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①

病中情绪“低徊”，然而，这是多么透辟的自我观照和分析啊！从自以为“不是寻常人”到“回头看”，到自感“可笑”，这正是“坚固”的“现实派的内力”在发生良好作用，将引向新的“突进猛出”。这段文章表述清晰，思理湛澈，又渗透着感情，既具有启发力，又具有感染力。这样的自我心性写真，可贵啊！

远东大会召集，用得着我这“东方稚儿”……

灰色的短夜，星汉徐移，“沉闷”如飞云一般渐渐吹散……凝凝的细露，淡淡的晓色，长林丰草间偶然一阵一阵清风，“夜”的威权慢慢地只剩得勉强支持的姿态。小鸟欣欣的相语，蛩虫朦朦的相投，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天际直射，烘烘烈烈，光轮轰旋——呀！
晓霞，晓霞！

……

革命怒潮的先声……革命赤日的遥光，那正是“晓霞”的散彩。群众的伟力，愈抵拒愈激厉；不如欢笑相迎。回念，回念……预想，预想。^②

秋白参加了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心弦上的乐谱激越高昂起来，流泻于笔端就是这“晓霞”之诗。景既是真的、有其自然之美的，又是完全情感化的、象征的，语言的活泼、明快、热烈、“散彩”，正是作者心潮心光的外化，也正是革命光焰、“革命怒潮”的折映。

文章才华，总与心的丰富、心的活跃密切联系着，总与心灵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209页。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229—231页。

对于自然,尤其是对于社会的感应,对于世界和本国度的历史进程、人民状况、大潮起落、精神文化波流的敏而深的感应密切联系着。语言的功夫、艺术的技法等固然也是才华的重要因素,但其发挥如何也往往受着心态情怀及外感演化状况的制约。

《赤都心史》之后到30年代在上海文界三年,秋白有不少光彩熠熠的散文,如《赤俄之归途》、《那个城》、《一种云》、《儿时》等,那也是与“社会画稿”整合着的“心史”。我们不再细说。他的散文最后一高峰是《多余的话》,那其实也是“心史”,与“史诗”相整合的“心史”。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用“多余”二字是曲笔,是隐真法;必须说、不能不说,才是秋白的实情、真意。卷首所引《诗经》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就是告诉读者,“我”是由于深广的“心忧”而不能不用特殊方式讲出必须讲的“真情实话”啊!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是他的真感觉。这里把心境毫无虚饰地写了出来。他担任党内最高政治领导的时候,实际上并不缓滞,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那是他率领革命队伍急转猛进的时期。他在这里说的不是历史进程,而是说自己的“感觉”。由于他自拟的标准高,尽管在“一步一步”向上,还觉得拉车拉得不好,“感觉”自己像“羸弱的马”。他不像那些实际上是劣马却自吹为千里马的人。这倒令人更敬重。他说的只是“感觉”,希望有能“胜任”的强手来代替自己,而并未否定当时不断前进着的革命历史。无论设喻、文字,还是理路的清晰、表述的分寸,都是极精到的。但也有既精

深又有失误之处：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工作是“但求无过”……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秋白是领袖，是烈士，是大才，文章卓尔超群、闪光溢彩或惊天地泣鬼神，但并非在心性上没有弱点，理智上没有误区，行为和文章毫无瑕疵。《多余的话》有自贬太过之处，有些片面的观点和分析的失误。上引这段文字中“十几年”的“一场噩梦”之说就失了分寸。他的性情、兴趣是否完全适合做政治领导工作，他的政治兴趣究竟有怎样的变化过程，那当然都是可以探讨的，但其“十几年”“历史的误会”之“噩梦”的说法是有缺点的：说理上太强调了性格、爱好，“本来”意愿与政治活动的矛盾，情绪上的低徊有碍分析的准确性。然而，综观《多余的话》全文，那是一位高风亮节的革命家兼文化巨子真切深刻的“心忧书”，以“自我分析”剖露“内心的真相”的方式表达多层面的心忧：为整个“中国问题”、中华民族的命运面心忧；因苏区被毁、革命受挫而心忧；深感自己的党存在多种严重病状而心忧；虑及“历史”留下的精神文化之病根（包括人的文化素质、心理、情感等受局限受侵蚀而致的偏、陋、昏、乱，也包括革命思想理论的错误）而心忧；思念“旧游”（包括同志亲友，尤其是爱妻），诀别之际忧其处境和前路。书中有写作动因、执笔心境的隐曲表达，有自身生涯（尤其是政治生涯）的“真情”自述，有性格、气质、情感、志趣及整个复杂文化心理意识的透辟自剖，有理性与“思路”的冷静回顾和真诚、清醒、人木三分的自我析评、自

我检讨,有对自己在党内路线和理论斗争史上各阶段所历重大事实、所关重要人物、所持态度、所立思想观点系统、所担责任的真切而全面的反思和现时“不同政见”的暗示,有感人肺腑的“告别”辞。总体看来,可以说是特殊形式的自传,思想自传,一生的“心史”和所历中国现代革命史、精神文化史的整合。由于环境特殊,时间仓促,笔墨是高度浓缩的,简括婉曲,含蓄幽隐,言近意远。读来,你会感到这“心忧书”是秋白整个思想和人格升华的产物,是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伟人在自我完成,并且放射光辉,照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精神文化史的斑斓画图。上引的那段谈“历史误会”的文字,虽有失了分寸的方面,但细读起来,他那种以“超我”的理智,从“历史”和个人状况关系上反思“领袖”问题的气度和责任感,多么不平凡!心境情绪有其复杂的真实。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导致政治兴趣的减少,是真实的。这真实的表达,不是既见其心的坦荡,又于后人、于革命中教训的汲取有益吗?他“顾全大局”,也是事实,是“历史”让他那么做的,他虽“感觉”自己不能“胜任”,却在还没有出现能“胜任”者之前按“历史”的要求而“顾全大局”,拉车前进!这样写来,不是可以给我们后人深刻的启示吗?用“噩梦”二字,在其心态上主要是觉得自己没有把革命的车拉好,深自内疚啊!

革命家兼诗人的秋白,其复杂情绪、理智矛盾、气质的多面性,在《多余的话》这最后自剖中,由于他的坦诚、本色、强烈反虚伪反丑恶的倾向,由于他那不断有新追求的“心”,他的人格升华到一种新境,胸怀更广阔,情操更高尚了。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我唯一的亲人(指杨之华)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这不是最好的诗吗?这是广阔美善的胸怀流出的诗!是崇高的生命意识生发的诗!这是最深切诚挚的爱凝成的诗!他向爱妻的“告别”,令人心碎啊!但也令人感到了最深的真正的爱。

《多余的话》作为散文,在秋白作品中,既是最沉静、最本色的,又是最“冲动”、最热烈的;既是最“坦白”质直的,又是最含蓄隐曲的。人格新境与最成熟期的艺才,在有意无意之间融为杰作。

“并世无两”的译笔

“信而且达，并世无两”，是鲁迅对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的评语。鲁迅自己是大翻译家，他有不少批评和嘲笑某些译品的话都内行得很，得到他较高评价的翻译家极少。只有秋白这样最杰出的大译笔，才得到他“并世无两”的评语。

茅盾也是翻译家，他称秋白的翻译为“卓越范例”，他在1954年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世界文学翻译中的许多卓越范例……瞿秋白译普希金的《茨冈》和高尔基的一些短篇，也证明了艺术创造性的翻译是完全可能的。”

据骆宾基在《初访“神坛”》中回忆，冯雪峰劝骆宾基一定要读秋白翻译的《茨冈》，并且诵着《茨冈》中的诗句，盛赞说“多口语化，多精炼，字字不都有光泽

么!”又说“是瞿秋白使我们中国人真正认识了普希金这个伟大的诗人”,如果没有秋白那样高的中外文学素养,是绝对翻译不出普希金的语言风韵的。

翻译,是秋白在文学专业上的特长。他在受过普通中学教育之后,在教育部俄文专修馆受高等教育,学的就是“翻译”专业。他不到20岁就在翻译方面打下了极坚实的基础,20岁上,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就向翻译的最高层次攻坚了。他从翻译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和《祈祷》开始,那译文就不同凡响,与耿济之合译出版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当时在中国译界就很受关注了。他还译了果戈理的话剧剧本《仆御室》、小说《妇女》,阿里鲍夫的《可怕的字》,兹腊托夫拉斯基的《痴子》,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他还为沈颖译的《驿站监察使》、沈颖和耿济之合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了序。他翻译果戈理的《仆御室》时(1920年初)就自取笔名“易嘉”,即“译家”的谐音,说明他有志于成为翻译家,而其译品也的确是“佳”品啊!后来,他译《解放了的堂·吉珂德》等作品时继续用此笔名,其译文更为佳妙。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接纳外来文化,翻译介绍外国著作。以前,翻译欧美著作较多,能译俄文著作的较少,“五四”之后,移译俄著成为风气,俄文馆的青年即其重要生力军。秋白则是其中矫矫者,他的带头作用、推动作用最大,成就也最显著。

第一次赴俄期间,瞿秋白写《赤都心史》时翻译了莱蒙托夫的诗《烦闷……》、《安琪儿》,邱特契夫的诗《瞬间》、《寂》,高尔基的诗《阿弥陀佛》(即《市侩颂》)等。他还在写报导和研究俄国文学、文化及革命史的过程中翻译了一些资料。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教员和教学翻译时,他随堂口译俄国教员的讲课,大大提高

了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的水平。

1923年瞿秋白回国后，翻译了鲍狄埃的《国际歌》，柴霍夫的小说《好人》。在担任《新青年》季刊主编和在上海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时，他随时翻译所需要的论著片段。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他做鲍罗廷等人的翻译。第二次赴俄期间，他仍旧常翻译共产国际的文件、共产国际致中国共产党的信和其他外文资料等。

30年代在上海文界的三年，是他翻译成就最大、水平最高的时期。他翻译的文学作品有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一天的工作》、《岔道夫》，葛拉特柯夫的长篇小说《新土地》（稿被毁，仅存残稿），还有高尔基早年创作的《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整本的《高尔基创作选集》（8篇，加上卢那察尔斯基写的序）、高尔基的诗《市侩颂》和小说《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第一章，有别德讷衣的诗《没工夫唾骂》、帕甫伦珂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莱蒙托夫）的小说》、马尔赫维察的小说《爱森的袭击》，有普希金的诗《茨冈》、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珂德》等。翻译的论著有《“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13篇）、《列宁论托尔斯泰》（两篇）、《高尔基论文选集》（25篇），还有卡美尼夫的《歌德和我们》、列维陀夫的《伯纳·萧的戏剧》、吉尔珀汀的《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布勃诺夫的《高尔基的文化论》、涅拉陀夫的《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言》、楷达耶夫的《苏联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此外，还有一些如《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中从外文报刊上选译的文章等。如果加上他在各个时期翻译的一些政论和社会文化论，他的译文总量（包括散佚的）当不少于300万字。要知道，他在成年后总共只有短短15年的社会和文化活动中，主要是在做革命政治工作，而能够用来执笔翻译的时间是那么少，然而竟有这么多数量、这么多品种的

译品,的确可以说是翻译家中的“天才”啊!

量大,品种多,是一方面;质量高,是高才之译的更重要的一方面。他的译品,从选材到译笔都显示出质量的高水平。现略举几例,以使读者对秋白译笔有个大概的印象。

首先让我们看看被誉为“艺术创造性的翻译”之“卓越范例”的诗译《茨冈》。作者普希金曾在1820年被流放到南方的摩尔达维亚地区,在多瑙河畔与茨冈人^①有所接触。在这次流放之前和重新回到京都上流社会之后,他主要是在那畸形“沉闷的城市”文化中,他厌恶那充斥着“偶像”、“堡垒”、“锁链”、“钱迷”的旧环境,因而感到茨冈人那种保留着颇多原始性的精神文化有其可贵之处,如质朴友爱、“孩子气的柔和的自由自在”。他在离开他们之后心里还长久地保留着一种依恋,觉得那“平和的”车辆令人神往,更“喜欢他们那一片快活的歌声”。然而,他心里同时有理智的声音:“可是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在荒野游荡的茨冈人啊,“不幸的自然的儿子!”他认为到处都存在的“情欲”,必定要使“自然的儿子”们逃不脱不幸的命运。——这大约是含着他在爱情生活和婚姻上苦痛的心程和有关思考的。于是,在《茨冈》的诗题下,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被官府追捕的城市上流社会的青年阿乐哥逃到南方,遇到茨冈姑娘真妃儿,两人产生了爱情。老头儿(真妃儿的爸爸)也很高兴,对阿乐哥说:“要是你真愿意……你就做了我们的人,只要惯了就成了,虽然说是穷困,倒也自由得很。”阿乐哥留下来和真妃儿结婚了,抛弃了原来“那锁链似的文明”,渐渐过惯了“茨冈的生活”,“爱他们的过夜的草堆,爱那永久的懒惰的沉

^① 通称“吉卜赛”人,又叫“波希米亚”,是一个富有音乐传统,一直流行巫术、居无定所的民族,流荡、卖艺是他们生活的特点。

醉”。可是两年之后,真妃儿的爱情转移了,还唱着“爱了另外一个他”的歌儿,故意气阿乐哥。阿乐哥虽然还爱真妃儿,即使在梦里也在叫“真妃儿”,可是已经知道她不爱他了,因而“又难又苦”。老头儿劝他别难过,说:“女人的心理,可来得个随便。”然而那是自然的,谁也不能对姑娘说“爱着一个不准变心”。老头儿还讲了自己的故事——妻子丢下了小女儿跟别人走了,他再也没有找爱人。阿乐哥的夫权意识和报仇心理没有因老头儿的劝告而改变,在一个黑夜里,他发觉真妃儿去和情人幽会,醋意支配着他杀了他们。老头儿只是对他说:“离开我们罢,骄横的人!……我们不磨难也不处死人,我们不要血也不要呻吟……离开我们罢!祝你安宁!”诗的最后结语,诗人心里是朦胧的忽而光明、忽而悲惨的幻影。

《茨冈》就是这样一部杰作。大诗人普希金作为“忏悔的贵族”既厌弃了旧文明,又带着某些传统遗痕,既神往茨冈式的精神文化,又感到是“苦楚的梦”。《茨冈》以俄国古代民歌为基本形式、经过精心加工的创作,来表达诗人丰富复杂、波波折折、微妙流动着的心情和思缕。诗的翻译,本来就是极难的,译这样的诗更是难上加难。然而,瞿秋白译的《茨冈》,内行们都盛赞不已,称为诗歌译品中的“卓越范例”,称为译诗之“绝唱”。请看写阿乐哥厌弃畸形的城市文明的一段:

他们爱呢,
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赶走,
出卖自己的自由,
对着偶像磕头;
讨那一点儿钱,
还带一根锁链。

我丢了什么？
是卖朋友的干活，
是那些发疯似的要钱的家伙，
是荒谬绝伦的判决词，
还是耀武扬威的羞耻？

原作意蕴精微，把城市畸形文化中一些人的心理和行为写得活灵活现，使读者精神上升起一种激忿，秋白的译诗达到了同样效果；译者将原作前四行直译为六行，也和原作一样是隔行韵；原作后四行则基本上以意译法译为四行，原作颠倒词序的修辞，增强了挖苦和讽刺力，译诗则用通俗口语，灵动、鲜活地再现了原诗的修辞效果；译者还将原诗第6句和第7句的次序颠倒过来翻译，既是押韵需要，又注意到轻重缓急，恰如其分地传达了诗意；译诗第5、6句开始换韵，7至10句又两次韵，这种把中国民歌与俄国歌谣的融和与沟通，正是秋白中外贯通、中外并用、博学多才的一种表现；最后四句译诗既准确又特别传神，将原诗传达得出神入化，是呕心沥血的巨匠之译！^①

范立祥先生将秋白之译与别种译法比较，举如下几句为例：

安静得什么也……
南方，南方的夜……
那碧青的天上
挂着一个月亮。（瞿秋白译）
万籁俱寂
夜晚
一轮明月
点缀着南方蔚蓝色的天际（另位译者译）

^① 此段及后面的比较分析参见范立祥：《瞿秋白翻译艺术探微》（三）。

范立祥说,与原诗对照,后一译者是直译,行数(两行)与原诗相同,不押尾韵也相同,句法结构亦无多大的不同,音节也完全相等,内容和形式都与原诗表面吻合;秋白是意译,形式上与原诗有较多差别,变为4行,变为主动句,变为押随韵(前两句一韵,后两句一韵),还将本来作修饰语的“南方”一词译为一个单词句,提到前面。然而,秋白的译诗却忠实地译出了诗人的情绪,意境、诗质与原作相合。“安静得什么也……”既比“万籁俱寂”那种用成语的译法活泼、通俗,又使读者在夜的空间里产生不绝如缕的想象,省略号的使用也是译者增强这种效果的手段。总之,诗给译活了。普希金那种对“南方”、对“茨冈”怀恋之心、神往之情及掺和着的难言的复杂意绪,在“安静得什么也……/南方,南方的夜……”这种译诗中表达得多么贴合、多么微妙啊!

秋白的卓越翻译一方面与他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之高联系着,另一方面也是他认真下功夫精益求精的结果。锡金见过秋白译《茨冈》的草稿,他说:“几乎在草稿中,每一句一节都经过几次修改,在那些诗句上面,画着许多的符号,那是权衡着音节的抑扬的;还有在许多纸片上画着许多小方格子,试验着字句的短长;再有,在方格子不能应用的时候,他用他创制的拉丁化方案的新文字先写录下来,有时写一个词,有时写一句,有时写一大段,然后再用方块字翻译出来,再修改,务使达到流畅明白的程度。”

再如对高尔基《海燕之歌》的翻译,20年代初他就有一译稿,题目译为《暴风鸟的歌》,30年代初又改译,题为《海燕》,译文更加精彩了。有翻译界的内行将别人译的《海燕(之歌)》与秋白所译作过比较,认为无论“信”(忠于原作)的程度还是“顺”(或“达”即译文的顺畅)的程度,无论文学风格的传达,还是诗境美、韵调美、语句篇章美传达程度,都是秋白译的高一筹。

白濛濛的海面的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闪电。

翻译界的内行们对照原作分析这段译文,曾指出多方面的优尚之处,其中最令人叫绝的两点是:其一,不仅意思完全翻译出来了,而且译文的句数和意群也与原文相等,音节上除了个别意群外也与原文完全相同;其二,原作发挥俄文舌颤音的特点,全段中使用了九个,使作品有高度音乐美。汉语没有舌颤音,不好直接移来。秋白为忠实表达原作风格,采用替代和补偿的方法,用汉语叠音词(如“白濛濛”、“得意洋洋”)、押脚韵(如“间”、“燕”、“电”)和汉字平仄声的协调(如平声“濛濛”后接仄声“海面”,“在阴云和海的中间”一句平仄相间)来作替代,这样就与原作殊途同归,有了铿锵悦耳的效果。

再如《国际歌》的翻译也是精益求精,他弹着钢琴,斟酌音律,反复修改译文,并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诗曲本不必直译”的规律性认识来。他将 International 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既避开了中文意思表达与音律的矛盾,又与世界各国(多是拼音文字)唱法相通,至今广为翻译界和音乐界盛赞。

秋白被称为翻译上的“开拓者”、“探险家”和“圣手”,内行们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和称赞。我们举一例来看看。高尔基有一首题为《市侩颂》的诗,秋白于 1922 年 2 月翻译了一次,题目译为《阿弥陀佛》,基本上用四言诗译出:

不用论断,不用操心;无知的寻求,愚昧的评论。日间之伤,请以梦治;明日之日,自然能至。生活,生活,万千经受,哀矣,哀矣,宠辱时有。何所愿望?何为忧怫?“日既夕矣”,阿弥陀佛!

1933 年 12 月又用新诗体翻译了一次,题目译为《市侩颂》:

不要追求,不要议论,

寻找的是疯狂，讲理的是蠢笨。
晚上的梦好医治白天的伤痕，
而明天要来的，让它来就成。

活着——就得会过活：
惊慌，悲哀和快乐。
愿意些什么？后悔些什么？
活过一天——阿弥陀佛！

秋白最初译诗就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例如 1921 年至 1922 年初翻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和高尔基的诗，用半文言和中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就是大胆的、开创性的尝试。将高尔基《市侩颂》这一讽刺诗的题目译为《阿弥陀佛》就足见其大胆的开创性，用《诗经》式的四言诗来译，也既准确又有强烈的“打油”讽刺意味。30 年代用新诗体翻译，又是一条路子，而且也非常成功：无论对原作的思想情感，所刻画的市侩形象和精神状态，还是对原作的讽刺诗调子、意味、风格特征，都传达得极妙，真是达到了翻译上的“化境”。

翻译，是秋白的特长，其译笔确是“并世无两”的。他在就义前的遗作《多余的话》中说：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了。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这段话中，秋白白云翻译俄国文学是他“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是带着自贬过苛的心理倾向的，他当然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具体知识，而且他的思想理论、革命领导方面所表现的才干，所

起的历史作用,我们决不可低估。但他即使是在自贬心理颇重的情况下,也说到翻译是自己的长项,始终怀着“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这也足以说明,他在翻译方面的才华不仅与别的译家们相比是杰出的,而且在他自身的各种才华中也是较为优尚的。

优化语言文字

改革文字,优化语言,是文化革新和建设的基础工程,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百年大计。

瞿秋白在进行革命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分出精力研究语言、文字,以他对文化、对将来“新中国”事业的远见,为语言优化和文字改革作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本文不去说瞿秋白作为杰出的作家、翻译家、政论家、高水平的编辑以其作品、译品、编辑产品提供明白晓畅、新鲜生动的语文范例的实践,单说他的文字和语言研究及其见解、主张所表现的才华。

首先是他作于 1929 年,由苏联 KY-TY 出版社于 1930 年出版的《中国拉丁

化的字母》一书。据郭质生回忆,这项工作的最早动因发生在秋白第一次旅俄的时候,他受到列宁的启发,开始和郭质生讨论这个问题。瞿独伊在《寻觅双亲的足迹》一文中写道:“据郭质生以后告诉我,一九二二年在全东方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父亲再度与列宁会面,列宁当时说:‘拉丁化对东方语言是一个革命的因素。’在列宁的启发下,两位朋友(指秋白与郭质生。——引者注)在这段时间内开始共同探讨这个有趣而又非常困难复杂的问题。”^①1928年,秋白第二次赴俄,开始了有系统的研究,曾经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讨论。1930年出版的《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创制了25个字母,列出“子音表”(6组共26个)、“母音表”(12组共36个)和“汉字拼音表”。秋白的这本书及其提出和运用的创造中国拼音文字的方法原则,成为后来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及进一步研究的良好开端和基础。40年后即秋白就义33年之后,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于1958年批准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按秋白提出的原则进行的,就是在他所做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出来并付诸实施的。

其次是他于1931年至1932年写成的《新中国文草案》。“草案”于1953年据其手稿编入《瞿秋白选集》第二册,后来又编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于1989年出版。该“草案”比1930年更完备了,“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拼音表”都重新研究修订。字母修改为27个,字母表定出印刷体大写、小写,手写体大写、小写共4种写法,增加了《字母的名称》、《字母的读音》、《说明》几项内容。声母分为唇音、舌音、喉音、齿音、软音五类,写了五条说明。韵母分简单韵母和复杂韵母两大类,每类又分出鼻音和非鼻音。“拼音表”也更科学化了,更精密了。

^①《瞿秋白研究》1,第367页

此外，“绪言”把指导思想、原则、意义等讲得更明晰和全面；把《拼音规则》、《书法大纲》、《文法规则》、《拼音和书法的说明》列出专章，写得很详尽；还单独列出《汉字检音表》。这部著作已经是文字改革很有系统、很精密的设计。他的创造性才华实在令人敬服！

第三，他写了许多关于语言、文字的专文，又在其他的文章、书信里论及语言、文字问题，他联络了同志、朋友一起来研讨，做这方面的工作，既在当时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项，有助于政治革命和文化革新运动的推进，又具有长远的文化意义，推进社会发展的意义。

瞿秋白搞新文字，提倡用“现代中国普通话”写作，注重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减轻广大普通民众学文化的困难。他说：“中国的几万万民众……极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即使识得几个字……仍旧不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言语和文字。这里，除开根本的原因（指社会制度所导致的压迫、剥削、贫困、苦悲的存在。——引者），还有中国文字本身的困难：汉字的复杂和紊乱，以及文言或者假白话的不能够成为口头上的言语，以致于文字和言语几乎完全分离。”^① 他还曾对人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过一番苦乐的呢。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去练习。成年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文人，真是谈何容易！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3，第423页。

的学者去研究吧。”^①

瞿秋白继承和坚持“五四”时期反对“文言”的最彻底的主张,认为中国的汉文从西周时代就和口语分离了,“文言”留传了几千年,只在极少数人即士大夫官绅圈子里使用着,与“活人的话”不搭界,更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绝缘,完全是“鬼”的话,是完全“死”的,而且从来没活过,因而主张绝对地要废弃;同时也认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白话”是“假白话”,是掺杂着文言和生硬的欧化语汇、欧化文法的非驴非马的“骡子话”,也要改造。因而,他非常强调要创造新的语言。他说:“创造新的语言是非常重大的任务”,“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完成任务,“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瞿秋白在语言文字问题上的有些看法未必妥当,例如把中国言语文字的分​​离说得那么早,那么绝对,把汉语汉文发展的程度估计得那么低(曾说“中国的言语……那么穷乏……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见《论翻译》),把“古代汉文”(他说“包括《诗经》……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说成都是“统治阶级的文化遗产”,把“五四”新文学的白话语言的进步估价偏低,缺点说得过于严重等等。他的偏颇可能与他太理想化的要求,与他在情感上嫌恶中国语言文字存在的毛病,嫌恶其太脱离多数民众有关。但他的确很明睿透彻地指出了文言和“五四”以来文学中的“白话”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无产阶级来领导创造新的语言,来完成这一非常重大的任务,则是高瞻远瞩的。

他有些颇显极端化的观点,连一些很进步的新文化人也难以接受,有的还写了文章与他论战。但仔细研究了的文章就

^① 彭玲:《难忘的星期三》,《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会发现,他的批判基本上是有的放矢的,他的建设性的意见多是有深刻理据,应该实行的。他批评“不成腔调的文腔”,要求变革文腔,是因为中国确有用“活死人等级”的话做的诗。“美人螭首变成凶猛的鬻髅”之类的“诗句”,那时常能看到,出现于刊物上和诗集里。这类诗人确如秋白所说,有的就“原本是不要活人懂的”,“连鬼都不懂”,那些诗、文“读不出来”,即使读得出,“也不像话”。于是,他倡导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主张“真正的用俗话写一切文章”,不用“周朝话”、“明朝话”、“螺子话”,“新式的白话的文艺应当变成民众的”,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创造出平民的诗的言语”,“使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①学外国语言和文学,他主张“学它的根本”,语言上要学人家那种“读起来可以像说话似的腔调”;输入外文“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要做到使之在中国现代普通话中“得到真实的生命”。他赞同鲁迅所谓“据为己有”的主张。对古代的文言,也并不一概排斥,而主张要采用口头上说得出来的文言,就是要把文言变成白话也就是采用那些还有生命力的文言,为语言创新服务。

秋白于1929年3月18日写给杨之华的信说: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指拉丁化的中国拼音文字字母。——引者注)……想同你一起研究……将来有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改良……通用到实际上去……这或许要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但是发端是不能怕难的。之华,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有趣了!

从这段话不仅可以看出秋白曾想把搞文字改革作为“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知道他对此很感到“有趣”,而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396、522页。

且可以联系后来的事实,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工作的进展,看到他在 20 年代就有了惊人的远见,看到他那种可贵的非常自信的“发端”创始的精神和魄力。

办报办刊编书的巨擘

办报刊,做编辑工作,编纂书籍,是瞿秋白在其社会活动生涯中一直在做的工作,是他的才华和革命精神表现得很突出的一方面。他直接参与、主持或直接领导过十几种报刊,亲自动手编辑过多种影响很大、很著名的书。他所办所编的报刊,所编辑的书,都发挥了很好的以至重大的革命作用或文化作用,都体现了崇高的精神,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因而在报刊史、编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可以说秋白是办报办刊编书的巨擘。

1 1919年11月1日创刊,1920年5月出至第19期(5月1日)被禁的《新社会》旬刊,是秋白和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

瞿世英等以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刊行的。该刊中坚人物郑振铎称瞿秋白为“新社会”团体的“主要的‘谋主’”，认为他“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说“秋白尖锐异常的正面攻击或明讽暗刺的文章是《新社会》里最有分量的”。该刊是“反帝反封建的队伍里一支勇敢的尖兵队”^①，猛烈冲击旧社会、旧文化，力倡社会改造，急切热情地呼唤新社会。其影响面，北京周围不必说，远到四川、两广、东北等地都有它的读者。

《新社会》被禁后，其原班人马又组织《人道》月刊，于1920年8月5日创刊，仅出1期。秋白也是其主要成员。10月里，秋白出国，《人道》社诸友聚会为他送行，还有诗的赠答。

创刊于192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社会科学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秋白既是主持者又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25年4月改为月刊，1926年7月停刊。该刊由于经费困难和人手太少，往往不能按时出版，季刊只有4期，月刊实为不定期刊，只出过5期。但秋白主持的这个杂志一直像他在《〈新青年〉之新宣言》所说，是中国“革命的罗针”，对“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作科学的分析，“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继续推进“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运动”，为“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而致力。^②

秋白1923年初回国后在筹办《新青年》季刊的同时就参加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2年9月创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1925年1月起与蔡和森（二人都是中央常委）共同主

^①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见《忆秋白》。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第8~12页。

编该刊。该刊共出 201 期(1927 年 7 月停刊),秋白为它撰稿 70 多篇。这是快速传达中央声音、指导全党工作的刊物。

1923 年夏至 1924 年 2 月,秋白还参与了中共中央另一杂志《前锋》的编辑和撰稿工作。该刊共出 3 期,主要宣传党在国民革命中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创刊号上就有秋白的论文三篇。

《向导》停刊三个月后,192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重新办起周刊,命名为《布尔塞维克》。秋白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同时,担任该刊编委会主任。他不是只挂名,而是直接而具体地领导该刊工作,在 1928 年 4 月出国之前,他经常主持编委会,并大量撰稿。创刊号上他写的《〈布尔塞维克〉发刊布露》一文说:“革命思想方面,比‘向导’时期尤加十倍的必须有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反对一切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扫除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妥协主义;只有建立这种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才能彻底的完成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①秋白这时的思想有些偏“左”的色彩,但他提倡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号召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斗争,则是正确的。1928—1930 年在莫斯科期间,他仍然非常关心该刊。

秋白于 1931 年到 1933 年在上海文艺界与鲁迅、冯雪峰等一起领导“左联”工作的时候,《北斗》杂志的创刊就是出于他的提议。丁玲做主编,秋白在该刊发表《乱弹》等许多文章,实际上领导着该刊的工作。“左联”的其他刊物如《文学导报》、《文艺新闻》、《十字街头》、《文学》等,他都以发表文章或通过鲁迅等人起领导作用。1932 年冬他与鲁迅、冯雪峰共同商议纠正《文学月报》的错误〔该刊发表芸生(邱九)的《汉奸的供状》,以恐吓和辱骂代替战斗,表现出“左”的错误倾向〕就是一例。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5,第 10 页。

1934年初,瞿秋白到瑞金,他在担任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时还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主持创办《苏维埃文化》月刊(7月创刊)。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只出一期。这一期第一篇文章就是秋白写的《文化战线的红五月》,另有李伯钊的剧本《无论如何要胜利》,还有关于“教育经费自给”和办小学等问题的专论。该刊编委会早在4月15日拟的预告和征稿文(21日刊于《红色中华》)说,该刊“要反映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形,和群众文化生活……无论是论文、叙述、文艺都欢迎……”

2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实现,瞿秋白在上海参与领导和编辑两党合办的《民国日报》,并为主要撰稿人。当国民党右派在该报采取破坏统一战线的办报方针时,他曾与之展开斗争。1924年10月8日,他致鲍罗廷信说:“我回答说(回答国民党在该报的主编叶楚伦。——引者注),国民党中央不久前有过决议,认为报纸的文章(指《民国日报》发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文章。——引者注)不符合代表大会宣言(指国民党“一大”宣言。——引者注)的精神……中央(指中共中央。——引者注)请您尽快在广州解决问题,请提出新编委名单并取得中派的答复。”^①由此可见他为贯彻正确的办报方针,为“彻底的改造”《民国日报》所作的努力。

1925年6月4日至27日,瞿秋白按中央决议创办和主持了党的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虽然只出版24期就被军阀政府查封了,但该报对掀起大革命的高潮起了巨大作用。秋白编报特别注意面向工人和其他普通民众,无论社论或其他评论还是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2,第649页。

新闻、专题报导,都特别短小精悍,多刊登极简短的杂感、小言、民谣和其他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所以文章都特别注意口语化,通俗而生动。秋白亲自写的几十篇文章既饱含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特别有鼓动性;既及时分析形势、提供理论武器,为革命运动导向,又充分表现出热血沸腾的心态,激发群众斗争热情,激励群众斗志。在办报的路子上他也注重依靠群众,征求和尊重群众的意见,在广大工人、学生和其他革命群众中组织了大批通讯员,报上常刊登群众来信来稿。该报出至第十期时销数就达到了3万份,除了上海,在很远的江西、山东等地区也有许多读者和投稿者。

1927年秋白在武汉时,茅盾在那里做《汉口民国日报》的总主笔。茅盾后来回忆说,秋白曾对该报编辑工作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真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秋白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与茅盾是好友,就通过茅盾实现党对办报的领导,使该报“整版整版地刊登讨伐蒋介石、号召东征的消息和文章”。^①当时国共两党的斗争逐渐激化,而以国民党名义办的这张报纸又不能不刊登国民党中央的布告和政要讲话等等。报上刊登工农运动、妇女解放的消息和共产党的文章多了,国民党就来干涉,共产党内右倾的人也怕因此得罪国民党,所以茅盾很为难、很苦恼,曾与秋白谈这个问题。于是秋白建议“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还说新办的党报将请茅盾当主笔,同时由中共中央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写社论。但由于形势急速恶化,秋白这一建议没有能实现。

秋白在苏区有两段时间曾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

第二篇 才华

编。这张报纸创刊于1931年12月,最初是苏区政府机关报,1933年春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共青团苏区中央共同的机关报。从秋白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的日期(1934年3月29日起到7月7日)看,他负责该报工作可能是在3月下旬至7月初和红军主力撤离之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期间。后一段时间的情形,他当时的秘书庄东晓回忆说:“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困难愈来愈多……秋白同志是日以继夜的坚持工作,《红色中华》照样按期出版,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①直到他离开苏区的前夕——1935年1月21日出版《红色中华》的最后一期(第264期)。

早在1933年8月7日《红色中华》报改组后约4个月,秋白(当时他还在上海)就曾在党刊《斗争》第50期发表过《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②这篇文章指出,中共中央和苏区政府与民众的联系“还是非常不够”,“《红色中华》……还不能够充分的执行自己的任务”,并且具体地指出“《红色中华》的几点缺点”,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

第一,《红色中华》……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照现在的几期看来……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

第二,“自我批评”……还不够。而且有这样一个缺点: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指出来的(这当然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

^① 庄东晓:《忆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见《忆秋白》。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7,第630-633页。

却只有笼统的叙述。……

第三,消息的编辑方面也有很大的缺点。……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

第四,……《红色中华》报上对于有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机械的,至少,说服性质太缺乏些。……

他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主要是:

1.“党的建设”、“工会的作用”、“社会改革”等要具体地反映在报上,“优点和缺点等等,必须反映”,“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暴露“坏现象和缺点”要讲“纠正”了没有,该怎样“纠正”,跟踪报导“纠正”的情形。

2.消息的编辑方面,“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的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编辑方法是应当改良的”。

3.“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还应当加强,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增强说服力,对于重大问题、新问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4.组织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

5.在《红色中华》之外再办一种“真正通俗”的《工农报》,普及到略识浅近文字的读者。

秋白的这篇文章既是对当时《红色中华》具体切实的工作指导意见,又是他的新闻思想和办报方针的深刻表述。文中深含着对当时统治着全党的王明错误路线的批评,现在看也是正确的,有理有据,无可辩驳。但该文和他在党刊《斗争》上发表的其他重要文章一起,却引起了王明宗派对他再次沉重的政治打击,他们在9月里就发文件批判他。然而,当时和后来的正直的革命者,尤其是新闻工作者,仍然非常珍视秋白的意见,按他的正

确而深刻的思想把革命的新闻事业向更高阶段推进。从他后来主持《红色中华》报时的情形看,他是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的。《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3月29日)、《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4月3日)、《纪念“五一”与援助华北工人斗争》(4月12日)、《中国能否抗日?》(6月23日至7月7日),这是他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从这些文章的内容和发表的时间来看,都是苏区工作在一个个时段上的宣传中心,都贯彻了他提出的对重大问题“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的意见。他负责该报时,“编辑方法”也明显改进,工农兵通信运动也开展起来了。

3 在编书方面,瞿秋白编自己写的书就表现了很高的编辑水平。举个例子说吧。1927年初,他自编了一本论文集,收入1923年至1926年的论文共174篇,附录6篇,《赤潮曲》一首,共约91万字。当时送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因时局骤变而被搁置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由其女独伊等交重庆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这部书稿的定名、选文、编目、写序都是秋白自己,连画版式、定字号、字字句句的核对也处处留着他的手迹。该书按内容分8类编目,先列一总目录,后列分类篇目。他在自序里对8大类(“国民革命”问题、“帝国主义与中国”、“买办阶级之统治”、“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世界社会革命”、马列“理论问题”、“赤化漫谈”)分别作了简要明晰的概括,并说明编此书的目的在于“呈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的成绩,并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使读者易于找着我的思想的线索”。书稿的确明晰体现了他的理论“系统”和思想“线索”,精心的分类和分层,文章编排的先后次序,标题的拟定,都井井然清

晰易辨,含着独特而深邃的思考,表现出高明的编辑艺术。另外,从校改和画版上也可看出他的编功之精。

在武汉他曾计划编辑出一套农民革命运动丛书,毛泽东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第一本。这本书经秋白主持在长江书店出版时书名为《湖南农民运动》(一),可见是准备接着出(二)(三)……的,后因时局恶化而未成。但从这件事可看出秋白编辑出版丛书的计划。已出的这本毛著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来半个多世纪都有重大影响。

在上海文界,他帮助鲁迅编了苏联版画集《引玉集》等书,与鲁迅共同编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他自己编了一本《鲁迅杂感选集》。这些书都很有价值,而其中后两本书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看,突出地代表了秋白编书的高水平和风格特点。编辑《萧伯纳在上海》的特点之一是思想水平高,眼光敏锐,看问题深刻,选题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及时地作决断。英国作家萧伯纳于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停留了半天,会见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也应世界笔会中国支会之请而与一些会员见面,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报刊上有许多消息、记述和议论,所表现的心理、态度各种各样。畸形的社会文化之中,“事前的‘欢迎者’,各自怀着鬼胎”,“事后的一些‘欢送者’,就大半瘟头瘟脑——大失所望”,“偏偏还要借重他”,“于是乎关于他的记载,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秋白和鲁迅就果断地确定了选题,把报刊上的有关文章收集起来,编为一本书,“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照鲁迅的话说,编书的用意在于一面照出“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一面也反映“萧的伟大”——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也决不被帝国主义的“跟丁”所利用。自然,这本书也以秋白的《写在前面》和鲁迅的《序》表达出“只有中

国的民众”才是“真正欢迎”萧的，才“认识他现在是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① 编辑该书的特点之二是不仅按内容特点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写了精辟的引语，而且对编入的文章写了按语，点出文章要害，透视作者心迹，表明编者观点，帮助读者阅读，还写了些杂文、补白编进去，加上《序》和《写在前面》，使编者的主体思想、态度、主张更加突出。特点之三是效率高，迅速获得深广的社会效应。萧伯纳于2月17日到上海，当天离去，《萧伯纳在上海》2月22日就编成了（秋白的《写在前面》写于22日，当是编完后写的），鲁迅2月28日写《序》，书于3月里就由“野草书屋”出版了。这本书的具体编辑工作是秋白担任的。上述特点，主要是他的编辑风格的表现。

《鲁迅杂感选集》一书，我们在别的文章中多有论述，这里不多说了。该书的编辑思想，秋白在《序言》里作了充分深刻的表达。可以说，从秋白编该书和写《序言》这篇宏论在鲁迅研究上、在现代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论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鲁迅在思想史、近现代精神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才得到科学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第299-300页。

开创性的理论思想

瞿秋白在 20 多岁时就成了大理论家,承担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创始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他的理论思想和后来成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相比,自然有其幼稚和错误之处,但他在理论上、思想上那种创造力所显示的才华,却是谁都不能不承认的。

第一次赴俄前他在《新社会》旬刊上的不少文章和赴俄途中的《饿乡纪程》里就显示了不凡的理论思考力,多有闪光的社会论、政治论、文化论的深刻新见。第一次旅俄两年即写出《俄罗斯革命论》的专著,《赤都心史》中也多有表述卓而不群的新型理论思维的文字,而任东方大学翻译和教员又大大增强了较系统的

社会科学知识积累,强化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素养。回国后在上海大学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写出多本理论著作,如《社会哲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社会科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现代民族问题》等。对于这些,他后来在《多余的话》里曾说“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成的“幼稚”的讲义。然而,我们应该说,他当时作为年仅24岁的青年,能把那些理论编成相当的统序,写出那些自己的领会和看法来,并且能讲解得让大学生们信从,能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就非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不能做到的了。况且,他同时写了大量论文在《新青年》季刊、《东方杂志》等著名刊物上发表,那则是联系和针对中国实际的思想成果。那时,他的理论思想已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已经比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等较早介绍马列理论的人有了明显进展,深广得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作了初具系统性的概括介绍和阐释,并且应用于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研究,在中国揭开了多种学科的新理论篇章;第二,闪烁着独立思考的光彩,其开创性相当突出,不仅弥补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所缺的马列主义原理研究,而且是用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见《多余的话》),都是中国革命所亟需的开创性、奠基性的理论探索。他那超乎寻常的思想创造性已呈现得相当显著。当时共产国际派来做中国革命工作的要人鲍罗廷、魏经斯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之所以同时看中瞿秋白这位青年革命理论家,不是没有根据的。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激化,随着党内理论指导上分歧、切磋和斗争的演化,秋白的理论思考更活

跃、更丰富、在党内外更有影响了，他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一。从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国民党执委会和政委会工作到1926年，短短的三年多，他的理论文章就约有近百万字。1927年初他曾自编成论文集一部（因故未出版），在《序言》里写道：

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然而我确是这一集体中的一个个体……集体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正在于其各个个体之间的切磋……将我的成绩同着我的错误一齐汇集发表，正是因为要发展中国社会思想的自我批评……

瞿秋白将自己那个时期的理论归纳为八个方面，表明其理论思考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第一，“中国国民革命”问题。除“国情”分析和革命史研究外，他还早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认定”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建立包括工农在内的“平民的民权”，这“民权”（民主）必须也必定“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因而必须争得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袖”（领导）地位。“直达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是与那种要先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对立的。秋白认为，中国民主革命与实现社会主义之间应该是也必定是贯通的，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争得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这种思想，这样的理论，现在的人们已经看作历史常识了，但在当时——那是摸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啊——他这样思考，这样主张，却是“先觉的”，是很需要独立思考的理论创造力的啊！那些要等待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资

本主义制度后,经过一个时期(有的说等20年)再发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在理论上还居于主导地位,秋白发表“直达”论与之“切磋”,是很需要理论勇气的。

第二,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秋白论定:中国虽未沦为某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却实际上是许多帝国主义统治着的“国际殖民地”。这与人们后来所通晓的“半殖民地”的理论认识已很相近,但他的说法更突出了中国与“帝国主义”关系的特点。他由此论定中国革命的“使命”在于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处在“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的革命一旦胜利,必然是为“创造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一“支流”。

第三,“买办阶级之统治”问题。他从各种事实论定“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合伙“统治全国”,他们是革命的对象。但作为资产阶级的右派,他们也伸腿到国民党里来,时刻试图谋取领导权,把革命引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的路。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正是针对买办阶级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秋白的预见(如1927年血的教训)。

第四,“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问题。秋白“变军阀战争为平民推翻军阀战争”等“呼号”,对五卅运动性质、意义、教训的论述,都关乎革命的总战略、总策略,其中也多关涉“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的研究。

第五,“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问题。这是秋白1926年论文的“总题”,论及农民的“奋起”和“要求平民政权”,论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北伐的革命意义、资产阶级“攫取领导权”和“妥协倾向”,从而论证在革命“成败存亡的紧要关头”无产阶级应采取怎样的路线和战略。

第六,“世界社会革命问题”。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不在”世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远目标在“共产主义”,因而必须研究共

产国际,研究俄国革命及社会改造,研究其他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以作为中国革命的参考。其中多有理论卓见,成为他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第七,马列主义“理论问题”。指的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其中有根据原理对“当代‘伟人’”们(指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勱、胡适、戴季陶等等)的“理论”的批判,显示了秋白理论的思想战斗性特点。

第八,文艺论。秋白既介绍阐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联系中国文艺状况——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发表自己多方面的思想观点。其中要来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的思想,虽有片面性,但其基本的、正确的方面成为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观念,在经他后来的修正和提高之后,至30年代发展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光辉的文化论、文艺论,成为他同鲁迅等领导“左联”的理论基础。

上述八方面所呈现的理论敏锐性、思想的丰富性和真理性以及相当的系统性,既与秋白从五四时期到旅俄及归国之初打下的理论基础有关,更与他处在革命领导核心,能够得到多方信息并感受到各种理论分歧的发展情况有关。1926年秋冬到1927年,党内思想分歧显著、错误的理论导致革命实践中明显失误的时候,他实际上领导了同错误倾向的理论斗争。1927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就一面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理论,一面较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道路、步骤、政策等问题。他对领导权、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党的作风问题特别重视,所提出的观点已经可以说是后来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雏形了,虽然由于复杂原因,其中包含着“左”倾思想的因子,但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而且具有先导作用。

从中共“五大”(1927.5)前后到“八七会议”几个月中,秋白的理论逐渐取代了陈独秀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在“八七会议”上,他被推选出来主持中央工作,这次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基本上是按他的理论思想制定的。

1927年10月至1928年春,瞿秋白曾发生“盲动主义”错误,但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发现并纠正了这种错误。这也是难能可贵的!1928年夏,他在中共“六大”前后所作的理论检讨和新的研究如《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基本正确的理论体系。

1930年发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是秋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予以纠正的。当时,极左的教条主义理论很盛行,他在理论思想上转为着重反“左”,独立性更强了。其后不久,1931年初他被排斥出中央领导层,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理论思索。他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著作,直到就义前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也仍然含着深刻的理论思想。

《多余的话》在《我和马克思主义》一篇里中肯地分析了自己的“思路”即理论思想,分析自己研究理论的过程和“独立思考”的困难,借以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传播和实际运用的历史,开拓新思路,启示后人立足实践,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思想路线,既排除“歧路”的干扰,又要有独立的创造性。其他各篇也都显示出他的思想进到了更深更成熟的阶段,其思想意义不可低估。例如,他自析政治生涯及主客观矛盾,实际上透视了一代革命领袖产生、成长、行动的轨迹,“历史的误会”论虽有其不妥之处,却在揭示“历史”规律上有理论意义;自剖马克思主义理智与“异己”意识的矛盾,其实又引向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有志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怎样“磨炼”的问题,告诫同志及

后人只有以巨大的毅力克服“异己”意识,才能在革命队伍中站稳脚跟,实现志愿;反思自己所经历的党内斗争及主要错误,提供教训,引向关于路线的理论思考,实际上提出了使中国革命有一条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的问题,提醒大家要以顽强的斗争去纠正错误倾向——包括王明宗派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思想指导;自剖文化素质包括知识、道德、价值意识、心性、习惯、爱好等,思考其与生活道路、事业之成败的关系,思考如何使具有新旧杂揉文化素质的人进向高新境界的问题,这对于后人寻求“人”的健全美尚,深有理性上的启发意义。在表达这些思想的过程中也有某些缺点、矛盾,但其思想的深刻性、丰富性、启发力量是巨大的。

笔者在本书里曾这样写道:瞿秋白表现着真正的理论家、思想家的那种独立、强韧、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精神,总想着必须更深一层、更进一步,在更新的领域探得更有真理性的思想成果,因而他的理论视野、“思想宇宙”十分开阔,凝思的结晶总有理智的新光。如果分别研究他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革命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文艺思想、道德观、教育论、历史观、新闻论、语言文字及翻译等方面的思想成果,你都会有重要收获,都会受到深刻而特异的启示的。无论在“原理层面”还是在“应用层面”,他的思考成果都有令人惊奇的开拓性、创新性和科学性,你会感到他是现代思想史上一颗异光闪闪的巨星,后起的明星也掩不住他那种光辉。自然,理论上、思想上的拓荒者、创始者免不了有缺陷、有失误,果树尚且有受病虫害而结出的不完美的果子,有被风暴摇落的未成熟的果子,何况生活在复杂环境中、常受到人世风暴冲击的思想家的成果呢?

卓越的领导才干

1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似乎主要看重和研究瞿秋白在文化工作上的才华和成就，尤其是他的文学才华和成就，似乎不那么重视，甚至讳言其革命业绩及所表现的卓越才干，甚至在革命史的撰述中，瞿秋白的名下只剩了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之一的“罪责”，甚至连由他或以他为主首先提出的革命方略、指导性的理论观点、开辟的道路、挽救和发展革命的重大举措、取得的成效和进展、为后来的全面胜利奠定的基础等等，也被淹没或者归到别人的名下了。直到现在，瞿秋白作为革命领袖的形象、他的伟大贡献及所表现的才干，在一些人心目中仍然很不明晰，甚至仍然认为他在这方面是“失败”的，仍然认为他不过是一

个书生,不过是文才好。我们认为这样的印象是对瞿秋白的很大误解,对此有必要进一步澄清认识。

瞿秋白没有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年代,那是错误的党内斗争打击了他,是敌人杀害了他;他在当领袖的时候没有战胜革命队伍内的错误势力,他被解职了,被“打倒”了,那不能归咎于他当领袖的“不行”,而是另有客观形势及党内外、国内外、革命队伍内外的多种复杂原因的。他的死,他个人革命政治职位的丧失,革命运动的某些挫折、失败,固然不能说与个人素质才干的情况绝对无关,但决不应当以此推论他就是“不行”。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了自己的许多缺点、错误,说了自己的“绅士意识”、“文人结习”、“弱者的道德”等等,那是他用革命领袖的高标准来对照所作的过于严苛的自我检讨和自评,我们必须考察全部历史事实和他的全人,怎么能用他自己在悲伤内疚的心情下所说的某些过苛的自评如“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等来为他作结论呢?他有些话,如“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负担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等等,笔者在《心忧书〈多余的话〉》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分析辨证,认为这都与“历史的误会”一语的特定含义联系着,实际上还是讲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错综运动中形成了历史的事实,作者由于挫折和失败,在深自内疚,从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寻找原因。由于认为自己的性格、才能、学识等与理想的革命领袖的标准相差得很多,他就说自己当领袖是“勉强”地“混”过来的,是“不配”的,是“虚负”了领袖名声的,因而说是“历史”安排错了,“误会”着把一个“无聊的‘文人’”安排成了革命领袖。我们认为,瞿秋白事实上是一位很好的领

袖，具有高尚的品质，表现了卓越的才干。解他的职，倒是解错了；杀掉他，倒是杀人者的罪恶。

2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合流，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革命气势骤然低落。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的共产党人牺牲了，部分悲观消极不干了，还有一些叛变投降了，革命面临被扑灭的危险。党内的领导层，本来就有同国民党新右派妥协倾向的，这时候更消极退缩了，多数则处在束手无策或散乱而又很难开展活动的状态。本来要被共产国际送往海参崴办党校的瞿秋白，在新任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到来之后，于7月21日被补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是7月上旬在陈独秀被停职“退出中央”之后重组的临时五人政治局，成员有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了。在这个时候，如果主持中央工作没有高度的睿智和卓越的才干，如果决策不明、举措不当、组织不力、运筹不周，那局面和后果将不堪设想，那就很可能无所作为或者因决策和指挥的失误而被强敌扑灭。

5月份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会议上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会议决议、“五月指示”等，虽仅过两个月，但许多内容早已过时。如要求靠汪精卫及其武汉政府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实行土地革命、新编工农武装、惩办反动军官等，在当时就无法实现，汪叛变后更无法执行。6月30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还在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加大力支持第三营垒（即武汉方面）”，7月10日虽不得不讲退出武汉政府，但仍然要求抓住“国民党的

旗帜”，“筹备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共内部则只讲到改组中央，惩罚陈独秀、谭平山等，实际上主要考虑的是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失败应负的责任推卸下来，而没有拿出挽救革命的办法。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7月21日才到武汉，他新来乍到，情况分析，策略制定，尤其是实际行动上的举措，当然主要靠瞿秋白。罗明那兹来华之初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按共产国际既定的指令严厉惩罚陈独秀，主要召集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要求在行动上仍然打国民党的旗帜，至于具体行动，即使像已经提出的举行南昌起义的动议，只传达共产国际的电报说：如有把握成功，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如果举行，俄国顾问也不参加暴动。而瞿秋白则早在庐山听取李立三、邓中夏关于南昌起义可能性的报告时就同意举行起义了。7月26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正式决定前委成员。后来，在很长时期里，人们在讲南昌起义时几乎不提瞿秋白的名字，实在是不应该的。他当时已经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而且主持了起义决策的会议。

“八七会议”的召开，固然是共产国际决定的，但是从筹备到在会上作报告，从组织工作到大会制定总方针及多方面的具体观点和政策，都主要是秋白领导的。对照瞿秋白在这次会议前的著作来看《中央“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大多数观点是一致的。这就足以证明这一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会议和会议文献，主要是秋白领导着召开和制定的。“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当然也是关键人物、主要的领导者，但他主要是贯彻“国际”指示的，中国党和革命的具体情况，总方针下的具体内容自然主要是瞿秋白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提供。会上，瞿秋白被选举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和三常委之一，并确定由他主持工作。从此，他正式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

他后来在《多余的话》里说,他当时是不愿当主要领袖的,“不愿意……代替……独秀”,代替陈独秀做主要领袖是“实逼处此”,而且他仍然“觉得非常之‘不合式’”。然而,从事实来看,他是临危受命,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他主持“八七会议”,带领全党否定了原来右倾的错误指导方针,确定和较好地贯彻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新方针,毅然决策举行南昌起义和稍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完成了革命的伟大转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局势,领导着革命继续发展。即使他只有这一功绩,也是非常伟大的了,没有卓越的才干,怎能做到这样呢?

3 国共合作破裂后,在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开辟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共产党初建时期,通过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逐渐掀起大革命高潮,意义重大。问题发生在共产国际非常轻视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苏联的援助重点在国民党,只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接受其领导,共产国际实际上由俄共指挥。这样,中共既在统一战线中实际上并不居于领导地位,又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没有独立自主性。两党合作之中必有分歧和斗争,这种斗争显著和激化起来的时候,必定由合而分。问题在于在国民党新军阀新右派早有反共阴谋和渐露背叛革命的倾向的时候,共产党既没有积极地争(由于复杂因素牵制和国民党的力量当时毕竟远强于共产党,实际上也很难争到)领导权,又没有自己的军队,终于要吃亏的局面其实早在1926年春就大致定了。而共产党竟

没做好一旦国共分裂就自己独立领导革命的准备,连思想准备也没有。这自然主要不应责怪哪一个人,因为前文说过,直到蒋介石叛变后,直到汪精卫公开“分共”前夕,共产国际还很严厉地不容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秋白自然也不是完全先知先觉的,但他早有了无产阶级要“争领袖权”,要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政权的主张了。到了蒋汪相继公开背叛革命之时,共产党基本上处于被动局面,实际上是被迫而不能不独立出来了。在那种形势之下,必须临机应变地考虑一切,要制定并且即刻实行独立领导革命的全新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多么艰难的任务!瞿秋白于7月21日才进入临时政治局,在此后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就举行了南昌起义,就思考、制定出“八七会议”决议;而会后的数月中就雷厉风行地把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初步开拓出一种局面,尝试出了一些经验。我们不能因为这段时间里发生过盲动错误,而否定独立领导革命初期就取得的创始性进展,而且决不应低估这种进展的意义。各地的各种起义和农村斗争的开展,虽然多有失败,但终究发动、组织和积聚保存了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地盘,成为后来发展的基础。

4 在秋白做主要领袖之前,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直到他领导决策,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和各地的其他多次武装起义,相呼应,相汇合,才建立了真正红色的武装力量。应该说,是瞿秋白领导了建立军队、党掌握枪的创举,是从他做主要领袖开始,中国共产党才发展起真正的持久的武装斗争。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建军上有重大贡献,他们做的军事实际工作比瞿秋白多,也更内行。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当时

是瞿秋白主持着中央工作,所有重大举措,他都是主要决策者和总体指挥者。固然,他多次说自己搞军事不如朱德等,但我们不能忘记,正是他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的理论思想,当他作为中央五常委之一于1926年4月发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的文章,论述中国革命“革命战争是主要方式”、“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党要指导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的时候,其他同志虽有做具体的军事工作的,却还没有像他这样的思考和对有关指导思想的理论概括;当他于1927年冬写《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一文的时候,已经是对革命武装起义和已经建立的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指导思想的概括了。他一直是积极推动、指导武装斗争的,而这个阶段其他同志的具体军事工作的进展,正是在以他为首的中央指导下的进展。

5 在瞿秋白做主要领袖期间,党和红军已经创建了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道路实际上已经开始,尽管尚未明晰地作出指导思想上的概括。应该说,瞿秋白是领导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袖之一。

他很早就倡导和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及其武装斗争,党的“五大”期间他更加强调“建立农民政权”的重要性。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之始,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作报告讲“土地革命”方针时,就把武装暴动、农村政权、土地革命联系在一起了。稍后,1927年秋冬之际他又明确提出了“各地的农民暴动的斗争方式,必须……明显地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①“革命地域”就是革命根据地。我们不能忘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

^①《瞿秋白选集》,第386页。

大,最初是在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的重要决策之一,革命在这方面的进展,与他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当然,毛泽东第一个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那是英明伟大的。而将毛泽东,还有其他同志“创造革命地域”的具体实践迅速概括成指导思想,指导全盘,则是他作为当时主要领袖的英明伟大之处。

6 在与共产国际、与俄共的关系中,瞿秋白不止一次地在重大举措中,依据充分的事实和正确的理论,抑制或纠正了国际和俄共的错误,作出正确选择,既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独立自主的精神,又使对方的错误意见在特定的过程中难以公然强加过来,即使他们最终强加过来或者设法报复,理屈的仍然是他们。这为后来毛泽东等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与俄共的关系提供了经验。

共产国际和俄共的确对中国革命有着不可否认的重大支持,国际主义精神的发扬是可贵的。但他们毕竟对中国的实际比较隔膜,同时往往由于某些领导者的错误判断和“老子党作风”,由于他们的盲目的民族优越感和宗派主义倾向,而有错误的指导、建议和强加过来的命令。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和俄共对1927年冬至1928年初瞿秋白主持工作期间中共中央发生的“盲动”错误,起初是有过火批判的,加上中共中央内部本来右倾的机会主义者乘机倒算,实际上就有了否定“八七”会议以来基本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推进革命的较好局面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一方面检讨“盲动”错误,承担责任;一方面摆事实、讲道理,维护正确的方针路线,而且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同时,当时共产国际和俄共特别是米夫等想把王明等对他们俯首贴耳的人塞进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也是瞿秋白

(他当时是大会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和正直的战友们一起,有理有节地防止了这种强加。所以,后来他在《多余的话》里说:“第六次大会的时候……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这虽然似乎主要是说个人的“进退”问题,实际上讲了当时维护“党的政治主张”和抵制米夫王明宗派(“新干部”实指王明等)的事。说“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指的就是“六大”时中共中央抵制米夫王明宗派,使他们的图谋没有得逞。

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和其后在担任“国际”主席团成员和中共代表团团长期间,秋白对于那些错误地否定或曲解中国革命的意见也总是据事实、据真理予以辩驳和澄清的,对于“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也提出异议。“斯特拉霍夫”(秋白当时发言用的化名)的名字使得五洲四海的国际共运的朋友们肃然起敬。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事件上,他领导着中共代表团以周密的调查和灵活的策略,否定了原来俄共中山大学的组织和有关部门所造成的“江浙同乡会”冤案。

1930年他主持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妥善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同时,也抑制了米夫、王明宗派的夺权活动。

然而,正是他以上这些言论和行为,使得共产国际和俄共不少头面人物大为恼火。他们终于找出种种借口、捏造种种罪名,把秋白“打倒”。先是在1929年利用王明宗派等围攻他,接着把他逐出“国际”总部,撤掉他中共代表团团长之职;最后以直接干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强令执行的方式把他开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而代之以对他们唯命是从、奴颜婢膝的“新干部”。不过,

秋白虽受了打击迫害,但他表现的气节、品格和才干,他所留下的经验,仍然是弥足珍贵的。

7 作为主要领袖的瞿秋白处理早期党内斗争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也是他的睿智和才干的突出表现。

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和“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错误,都是在他做主要领袖期间主持纠正的,都是他亲自处理有关的党内斗争的。那是极其复杂而又十分重大的问题,要处理得好,首先需要有正直高尚的革命品质、正确的立场,但如果没有卓越的才干也是不能奏效的。“八七”会议前后,他一面仍然很尊敬陈独秀,一面批判和纠正陈独秀确实存在的错误。他认为不应专责陈独秀一人,共产国际和原中共中央的主要成员(包括他自己)都有错误,都有责任,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大家认识已发生的错误,寻找根源和纠正错误上,放在拟定新的方针、路线、政策上。这从“八七”会议文件和他领导的决策和举措可以得到明证。当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陈独秀非常严厉,秋白却继续约陈为中央刊物写稿,安排好陈的生活,劝陈去莫斯科共产国际(这当然含有让陈自己去解决与共产国际的矛盾的意思)。后来,1929年,陈独秀实在在错误的路上走得过远了,有了非组织活动,与“八七”方针对立,与“六大”方针对立,而当时秋白又远在莫斯科,正受米夫王明宗派的围攻,陈独秀在国内被开除党籍,究竟与秋白是否有关,有怎样程度的关系,尚难说清。

“盲动”错误,发生在秋白当主要领袖期间,又是在他自己领导下纠正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袖,在自己的任期内很好地纠正自己在领导上发生的全局性、倾

向性的错误,瞿秋白是第一个。秋白是在“盲动”现象发生不久就有察觉并部分地纠正,在共产国际下达指示之前就制止过江苏、湖北等地的盲目暴动和多处的乱烧乱杀行动。他的主要错误在于把革命低潮看成了持续高涨的形势,因而在总的指导倾向上有“盲动”错误。而这种错误又是与当时共产国际的认识及在指导性文件上的表述分不开的,与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观点和作风分不开的。在党的“六大”上,秋白没有丝毫推脱,他诚恳检讨,承担责任,深刻地分析错误根源和形成错误的过程,提出切实的纠正错误的方法途径,在“六大”之后把革命引导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后来,他不仅自己切记“左”的教训,而且在纠正“左”的错误上有重大功绩,包括对“立三路线”错误的纠正,也包括30年代在上海参与“左联”领导工作时纠“左”的实际效果,例如纠正“左联”初期的冒险活动,和鲁迅一起纠正“辱骂和恐吓”的倾向,纠正党内作家在对待鲁迅上表现的“左”的态度等。

李立三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也主要在纠正错误,而对犯错误的人只是要求改正,同时予以保护,仍然选举李立三为政治局委员。当时,党内各种分歧意见和派系矛盾发展得很复杂、很激烈,秋白却处理得很好,基本安定下来,各方面的工作都正常开展了。料所不及的是,仅仅时隔月余,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突然把李立三错误的性质升格,定为“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假冒的‘左派’”、“右的机会主义实质”、“像托洛茨基主义一样”,12月的“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又把主要罪责扣到秋白头上,主要的批判对象也从李立三变成了瞿秋白。“半托洛茨基主义”、“调和主义”、“小团体主义”、“两面派”、“反共产国际”等致命的政治帽子压下来,加上米夫、王明宗派的猖狂报复和中共中央内部某些人的随风转舵、落井下石,秋白的政治命运就成了定局。但这种结果,既不能说是秋白的

立场、观点错误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才干不行,而是错误的、邪恶的力量一时间太强太凶了。

8 善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这是和瞿秋白一起工作过的人共同的反映,也是他成为党的“很有声望”的领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他之前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很有学问,很有经验,很认真负责,“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多余的话》),也很有威望。但他的缺点是“家长”作风比较明显,除了对李大钊他是尊重的,自己当了总书记也仍说学问、道德、建党和宣传马列主义都比不上李大钊,而对别的人(那时中央委员、常委都比陈年轻约20岁)就不那么客气了,一个人说了算的专断方式是司空见惯的。在秋白之后做过主要负责者的李立三,也是够专断的,连恽代英那样非常有涵养的老战友,都难以忍受他那种固执错误意见、独断专行的作风。向忠发更谈不上什么领导才干。王明等后起的主要领导人,唯我独尊,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谈不上什么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连张闻天那样文质彬彬的本来很一致、很接近的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也不怎么得到他们的尊重。瞿秋白则不同,他知道战友中哪些人是农村工作的里手,哪些是搞城市工运的行家,哪些是搞军事武装斗争的名将,哪些人善于做党务、经济财务工作,因而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在大政方针明确之后,具体工作上充分发挥每位领导成员的专长。这样,他与各位委员、各部门负责人的关系也很协调。

第三篇

心史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張敬白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

第一頁的張敬白

何止當三、四、五、六

這是一篇從前的

主介腦與主有以

何者

這日工是始於一九

二一、二二、二三、二四、

二五、二六、二七、二八、

二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

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

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

瞿家的“千里驹”和“名士化”倾向

瞿秋白的家族，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他幼时只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的“少爷生活”。十三四岁时就已经很贫苦；十五六岁时，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十七岁，母亲自杀，一家星散。因而，童年一过，到少年时代，就难说他还有什么“少爷”心态了。不过，官绅之家，尤其是书香之家的“精神遗传”必定心有积淀。然而，巨大的“变异”也在所难免。

他幼时，做官的大伯世琥，曾夸他是瞿家的“千里驹”，那是看他聪慧过人，给予他一种预言式的期望和鼓励。后来，秋白的确成了千里马，但是却不属于绅

士阶级,而属于被剥削被压迫而起来革命的人民了。

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出生,按华历是戊戌年12月18日。清朝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就发生在这一年。新政失败了,但社会革新的潮流却是谁也无法平息了。后来,杀戮维新派的慈禧也不得不搞“预备立宪”的“新政”。康、梁提出的废科举、办学堂、倡新学、办报刊、兴实业、改财政、搞预算、设邮政、派人出洋游学等等,实际上都逐渐办起来了。无论慈禧等是否只是为了稳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倡革新之士、新兴工商业者、开明的官绅等是否只为自身的发展,中国以欧美为参照而谋求富强,同时反抗列强欺侮的变革进程,实际上在持续着。同时,孙中山等代表人民强烈愿望的革命党发展起来,要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所以,到了秋白七八岁的时候,即1905、1906年,确如秋白后来所说,中国社会“疾然翻复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挡”。他的生活环境受这影响不小,心灵也不单是受中国文化模塑了,加上经济生活的“揉挪”,他的“万千变化都在此中融化”。^①

秋白的家族本是旧绅士家族,但他出世时这个家族及其社会关系中又不乏新派人物。他的叔祖瞿赓甫做过湖北按察使、布政使,曾与张之洞一起办“新政”。秋白祖母的堂弟庄荪甫也是新派人物,是常州新式学校冠英小学的创办人,秋白即入该校读书。其伯父世琨曾留学日本学法政,回国后任法政学堂提调;堂兄纯白毕业于“欧化”的京师大学堂法文科,曾任几所新式大学教员和交通部通译、外交部职业文官。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的秋白,读的又是新式小学和中学,心灵所受已与以前时代旧绅士群族中的人大有区别了。他八九岁时,革命的风息已渐在中国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23页。

荡动；十二三岁时，辛亥革命的高潮虽转瞬即逝，但他已受到过感染，幼小的心灵曾为之振奋，虽是短暂而朦胧的，痕迹却永难磨灭。

家族、家庭、故乡环境是“旧”中渐有“新”气，“新”又大致是开明绅士之“新”，这“新”里仍流动着绅士文化的精神、读书做官的变式传统。“千里驹”之语，仍然大致是渐渐没落而又“回光返照”中的绅士家族对秋白所寄予的学优而仕，将来支撑门楣、治国平天下的期望。族人亲戚中做官的，即使是“新派”，也是“新”的“衣租食税”者，精神文化的旧根仍然很深。叔祖赓甫在常州建“八桂堂”，这宅院中又有“天香楼”（秋白出生之处），单是这名目就标志着家族的传统文化色彩，更何况传统的诗礼书香之持续不绝呢。即使到了很穷的时候，“读书种子”学优而仕的倾向、讲“面子”和摆绅士气派（如他父亲拿印着虚衔的“大红名片”叫衙门打过一个“混张”的人等）的绅士风也还是存在的；到了无米下锅的时候，仍然用着仆妇，宁肯欠债也让裁缝做长衫穿。这样的绅士意识自然对秋白也有影响。秋白在《饿乡纪程》里说的那种“垂死”的“士的家族”，那种“家族制”之下好人生活“枯寂”，坏人在孔教“假面具”下“背地里嫉恨怨悻诅咒毒害，无所不至”的人际关系，使少年秋白“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感到“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心里发生无数的问号。既然能感到“昏昧”，有那么多疑问，也就应该说少年秋白的心里有了求“变”的因素，有了变异以至叛逆的因素了。

在“千里驹”意识、学优而仕的精神环境中同时获得了较好的基本文化素养、用世志向和社会活动方面的博识和气度，却并非都是不好的了。旧官绅的政治行为、用世有为的心态固然有其阶级倾向，但也有其一般意义上的人世出世、社会管理、忧国忧民、治国拯民的因素，与别种阶级、新样政治、进步社会活动也

有相通之处。秋白作为那种“大家族”的子弟所受的影响、所得的素养,在旧阶级倾向被渐渐否定后,也成为探求和向新的方向入世进取的心理、知识、能力的因素;绅士大族的“千里驹”心理,也会转变为革新进取的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角”心理。他后来的“我是江南第一燕”心态,自然是“心质”变化后的豪迈革命气度,然而却难说与幼时受过的用世、大器的精神熏陶无关。

秋白自云:“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么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这就是和前述那种传统绅士意识中读书做官用世、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倾向相左的另一种心相了。二者在少年秋白心里形成一种矛盾。但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根源的。一则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里本来就存在与入世从政、治国平天下不同的另一些人生观,更看重治学或从艺的就是其中之一。儒士们在不能“兼济天下”时的“独善其身”也近乎此。秋白从读书中和社会文化中无形中受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就会发生这种念头。二则他的父亲无心仕途,潜心于“黄老”学和绘画艺术,秋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自然的事。三则当时政治的腐败、政治的恶象在读书人中引起颇为普遍的逆反心理,少年秋白受到这种心理气氛的传感也在情理之中。四则家境日渐窘困,能否走成读书做官的旧路,对少年秋白实在是个大问号,即使能像他叔祖虞甫做了那样的大官又如何呢?况且时代和家境再也提供不了那样的条件了。年幼的秋白也许尚无这样明晰的理性思考,但对生活和环境的直感也会引动那种念头的。

因而,中学时“名士化”倾向的发生就不奇怪了。“名士”是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指的是有名气却隐居不做官的文化人,所谓“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秋白写自己读中学时的情形时在“名士化”三个字上加了引号,表示与

传统的名士道路并不相同,而有特定的含义。他所读的常州中学是一所“欧化”的新式学校,开设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格致(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兵操等课程,还由学生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学校组织的多种游艺活动,培养准备进入社会所需要的技术、艺术、体育等技能。受这种教育培养的学生自然在知识结构和其他多方面文化素质上与旧知识分子不同,心理上也渐向现代式知识分子的方向发展。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太畸形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指辛亥革命——引者注),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指袁世凯及接续下来多年中的政府——引者注)。因而,“‘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青少年学生所受的“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励”和“破产”、“堕落”但仍然活动着的“文学”的影响,就反映在心理和学习上。秋白和他的一些同学就想成为“名士”,“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这就是所说的“不期然而然”的“名士化”。^①这种在形式上和色彩上“复古”的倾向,实际上是对恶政逆反心理的表现。辛亥革命只带来了短暂的光明感,旧社会几乎毫无变化,在盗寇似的军阀独裁、黑暗腐败的政治恶象之下,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完全成了虚伪的装饰了。对此,学生们怎能不厌恶呢?秋白等少年当时还同社会“隔离”着,发生那种“名士化”现象是很自然的。后来,尤其是“五四”的时候,一碰到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浪潮,他就再次振奋起来。“名士化”只是他心史上在少年时期一种过渡性现象而已。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23-24页。

知识“饥渴”和厌世心理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了,秋白竟在这时被迫辍学。上学时他已有“厌世”的心情,这时就更沉入了精神的苦海。本来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很沉默,常常只是闷在房里读书,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有时出现低热。虽然会有同学来谈谈,也偶尔到环溪大姑母家住些日子,但多是在家即冷寂的瞿氏宗祠里枯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实在太难承受了!

不料,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1916年春节刚过,当他在无锡联系找工作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自杀了!没有家产又没有工作的父亲怎能抚养得

6个孩子?! 秋白是长子,才17岁啊! 阴森的社会、冷酷的人际关系像风刀雪剑,使他发出“亲到贫时不算亲”、“饥寒此日无人问”的悲愤哭声。

一家星散,他到无锡市郊穷乡僻壤里一所私立小学(杨氏国民学校,又叫江陵国民学校)教书。他在《饿乡纪程·四》里说:“精神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这种心境是早有的“名士化”心理倾向加上在母亲自杀后他那种无法继续求学、走投无路的生活状态形成的。

饥渴似的求学愿望和经济生活的要求使他不久就辞了无锡教职,另寻出路。他说:

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落日……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指其堂兄纯白。——引者注),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希望——饭碗问题间接的解决法。同时却又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然而……引起我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又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这三四个月的旅行……心灵上却渐渐得一安顿的‘境界’。……然而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社会中之社会现象啊!

一个才17岁的少年,尽管文化知识基础很好,思想比较早熟,但怎能懂得自己的东奔西走求出路是破产的绅士家族社会现象之一呢? 然而,的确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是秋白自己后来认识到的。从个人心灵现象的角度来看,秋白在17岁上这段心路历程,比同龄的一般少年要丰富复杂得多,已开始接近成

人知识者心态了。痛,苦,愁,惨,既超乎一般的深而且剧烈,他舒解“郁积”、“渗洗”心性的新的动态又特别值得注意;心灵上得到“安顿的‘境界’”既是难能可贵的(相对于那种在郁积中泯灭掉和在剧烈惨痛中折断心旌的,当然可贵),强烈的追求并且开始独立去闯路的那种心态,更不可低估其积极意义。

在《多余的话》里,秋白曾说:“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书。”十六七岁就是他从辍学到武汉、黄陂之行这段时间。别人的回忆中还提到那时他读过《资治通鉴》和四史等书,还有佛学的《成唯识论》、《大智度论》(《摩诃般若释论》)等书籍。这些书中有一些对当时的秋白可能助长其“复古”、“避世”之心,但也会助增其对恶世的反感和憎厌,未必都是消极的。不过,书的影响恐怕并非主要的,时间那么短,书难说能读很多,主要当是贫困而又处在人生岔路口如“盲蝇乱投”的那种实际生活状态导致了他所说的那种心态。

1917年春,刚满18岁,秋白到了北京。想进北京大学而没有学费来源;参加文官考试,想一步取到“饭碗”,又没考上,于是进了既可取得资历又不需交费的俄文专修馆。他说,1917年起至“五四”之前在北京的三年,是“最枯寂的生涯”。

朋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指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引者注)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指以佛教准则为指导的实际作为。——引者注)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

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寄生生涯(指吃的饭是堂兄纯白供给。——引者注)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对社会问题的疑问……

在《多余的话》里,他说: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灰世主义的理智化。

从秋白自述可知,“五四”前的三年,他的心境表层主要特征是孤独、枯寂,持续着在武汉已初步形成的“安顿的‘境界’”,但深层却因存在着许多矛盾,因矛盾的逐渐复杂化和难以解决,而并不那么“安”,也就实际上“静”不下的,实际上在变化着,心理底层的潜流回旋荡动着。“不安的感觉”早已存在,只是“藏”着而已。以“灰世”哲学为主要内容的课外研究(课内主要学俄文)是受“新官僚‘民国’”恶象的“痛苦激刺”所致,然而,随着哲学程度增高只形成“理智化”的“灰世观”。只要那“新官僚‘民国’”的恶象还存在,那“重大的痛苦激刺”是消除不了的。钻研“国故”,尤其是经学、佛学,与现实的一切实际生活确是相隔离的,然而,将来如何“自立生计”的问题总要考虑吧,眼下的“寄生生涯”又怎能不引动对社会问题的疑问、对人际关系的种种感受呢?即便从他研究今文经学和佛学的“志向”、“愿心”而论,“以文化救中国”和“佛教人间化”之中也仍含有经世致用、解决社会问题、改变现状的意思。“入世”和“出世”两种心理的并存、纠结、矛盾及其运动,在秋白心灵中的这种复杂现象,理智上“无常的社会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其实都是和中国历来许多知识分子的

心境状况及理智特点颇有相似之处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许多“新杂志”从 1918 年起对秋白渐有明显影响,他那“忏悔的贵族”的颓唐和深层的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入世”“出世”的心理纠葛,开始受到新的触动,那主要是外来新思潮的触动。但由于他还在与社会实际相隔的学校生活里,在书本感受范围内,就仍然被纳入他的“厌世主义的理智”中。不过,毕竟是受了新的触动,又“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怎么样医治”的问题也进入思考范围,但未解决。“变”的要求在滋长,一旦有时机,一旦与社会实际变动、革新活动接触,他那种“救中国”的志向、改变现状的心愿,入世用世、解决社会问题“疑问”的要求就一定会有新的表现,新的发展变化。

“热烈”、反思、“猛进”心态及复杂性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后来革命家的瞿秋白,他可能只作为“忏悔的贵族”,在他“二元的人生观”支配的心态中,一面端着俄文饭碗,一面在整理国故、研究今文经学和佛学方面发展。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没有一个个秋白似的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青年学生,如果没有一个个青年学生那种敏感多思,发生各种“疑问”,求解放、求变革、求发展心态,也就不会有群集的精神共鸣和汇合的洪流,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相激互动的。秋白作为当时激进学生中的一个,他在运动一开始就非常“热烈”,是有运动前就存在的心理原因的。社会的黑暗、政治的恶象、人间的不平、生活的贫困枯寂、出路的渺

茫等等,长期地给予他剧烈的刺激和沉重的压抑,虽在某些情况下转成“厌世”的“安顿”,但也能在另一种条件下转成反抗和突破式的“热烈”。他早有社会问题政治解决的思想萌芽,曾被佛学研究等摧折了,然而“折”并不是断了根,不是火绝,而是潜隐下去了。五四运动兴起,那根的复萌和成长也是理所当然。“无常的社会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以文化救中国”的志向,与“五四”式的精神文化革新大潮之间也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秋白在谈自己投入五四运动时,是这样说的:

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漩涡。(《饿乡纪程·四》)

“五四”洪流把他卷入漩涡之后,孤寂的生活打破了,火热的斗争和社会实际生活的接触,给他许多强烈而深刻的新感受,其心路历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在惊天动地的爱国反帝学生运动中,秋白做了学生领袖,并开始与民众运动相结合,初步体验了做社会政治活动主角——新式“千里驹”的味道,体验了“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的情形。同时,他看到并且在亲自经历“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的情形。

学生运动高潮过后,秋白读书和研究的情形与运动前大不相同了,深广的反思,“社会改造问题”的探求成了他心灵世界活动的中心和强烈的兴奋点,具体内容已经不是今文经学、佛学、老庄之类,而是和《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大致相似了,“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

在“众流并进”转成“趋向”各异、“潜伏的矛盾点”很快暴露的时候,秋白灵敏地感到了新思潮的“紊乱摇荡不定”。他自己的心境、思想也发生了新的矛盾。他从“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

梦”中醒来之后,感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痛苦”,感到“社会改造问题”的复杂性,认识到从“家族农业经济破产”问题到“旧社会组织”的肿瘤问题,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哲学问题、文学问题等等,都必须从书本走向实际。但他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等办《新社会》旬刊之初,只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多余的话》)。在这种倾向下,可以感到和揭露旧社会的问题,但实在开不出医治中国实际病症的药方。但是,秋白在《新社会》旬刊上和别处发表的文章,的确是大声疾呼地引向对旧世界的破坏,也引向对如何改造问题的探求。“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他和《新社会》团体的“无限兴味”,尤其是秋白,他看到“社会主义”是引向“实际”解决之路的——新俄国,第一个实行社会革命的国度的出现,成了参照系。因而,《新社会》旬刊后期所表现的倾向有了变化,虽不是“真正的‘社会党’”,却被军阀政府(这“垂死的死神”看见“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的警察厅当作“洪水猛兽”而封闭了。实际上,他们对“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的意义”都像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清晰。这种情形,一直到他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也仍然持续着。不过,他已经用初步“唯实”(唯物)的准则来正视和整理“思想方法”,渴望着把“研究对象”真正地“认个清楚”,不能再主客观“混淆”着“紊乱”下去。

为了求得“实际的结论”、“真实的智识”,又有了《晨报》、《时事新报》聘请采访新俄的记者的机会,秋白就决定了“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研究共产主义”,研究“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研究俄国文化和俄国革命(《饿乡纪程》五、九、一二)。不过心态的复杂性依然存在,但有新的发展:以“‘斯笃埃’主义”(古希腊一种特重克己修身、摒弃享乐的思想派别,今通译为“斯多葛派”。——引者注)

的精神去冒险旅俄,他曾说并不是“为社会”,而“仅只是本于我的好奇心而适应生活,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只是求精神生活的安宁,甚至于还是求物质生活安俭的倾向”。(《饿乡纪程·八》)这种带有个性主义色彩的心态倾向和“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求得“中国问题”相当的解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心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于他的整体心态中的。这种复杂性不妨碍他的“猛进”。

“宁死亦当一行”,极其兴奋地毅然决然“向着红光里去”的那种心理的“猛进状态”,是秋白从决定赴俄起到赴俄途中写《饿乡纪程》期间突出的特点。无论在与亲人、与朋友、与故国、与“过去”告别时,还是在启程后遇到、采访到多种信息时,尽管有“不忍”的心情、“留恋”的思绪、多种疑问的存在,他都终于“一甩手”而启程。他在途中得新俄“空气”、“得理论”、“得事实”的时候,是多么激动和昂扬!他呼唤中国“老树”焕发“春意之内力”,“挺生新脆鲜绿的嫩芽”(在某种意义上当是比喻自身的。——引者注),“希望勇猛精进抗御万难,一往不返”的心力,多么深厚,多么强劲!

探寻心海的灯塔

秋白于1920年10月从北京启程赴俄,由于在西伯利亚的谢苗诺夫白军破坏了铁路而在哈尔滨停了50多天,1921年1月到莫斯科,开始了在一个新型国家采访、考察、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的生活。

初入新俄,秋白就敏感地觉察到赤都“处于欧洲无产阶级‘心海’的涛巅,涌着俄罗斯劳动者心血热浪”,而对于“颠危震荡于资本主义风颶之中的孤岛”的新俄,他准备着以自己的“内力”迎受那“饿乡”之“饿”的考验,只要不被“轧窒”,就自信在“人类文化交流之中求一灯塔”的努力是有前途的。

新的生活,新的文化环境,一切新影响陶冶着“东方稚儿”秋白。但远不只是

客观环境自然而然地作用于主观,更是自觉主动地去探知新国度的“切实隐掩的深处”,深察“个人与社会间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结构”,着力于文化的核心层的研究,捕捉其精魂,“冥求人生问题答案”(《饿乡纪程·一一》)。他的考察面很广,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情况,从表层到深层,无不注意,尤其是对共产主义“人间化”的系列报导,经济政策转变中从高层到底层的各种动向和精神文化内涵,更是考察得深而细;文化上,从“将来主义”艺术到工人文化生活,从卢那察尔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等名人的言行,到其他国家文化人在新俄的活动,到普通人的心理活动,从新旧文化的斗争到民众中新旧精神现象并存和演化的各种活生生的例子,他都去细察。这样的考察过程,也就成了他心史的发展变化过程。

秋白在苏俄期间加入了共产党。1921年5月,张太雷作为即将成立的中共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介绍秋白入党。9月,秋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时正式入党。他在《多余的话》里说:“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指入俄的最初几个月,一面为《晨报》写报导,一面学俄文、俄国史、文学史的时候。——引者注)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很通行了。”这说明他曾在搞文学还是做政治工作的问题上有过心理矛盾。这矛盾,客观上是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造成他的顾虑,从主观上说并不是不革命,而只是深爱文学,想专修文学。他的观点,显然是搞文学也可以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这时的秋白与赴俄途中写《饿乡纪程》时的心态有了些变化。初定赴俄之时和途中,强烈的好奇心和精神生活的冲动,使

他急切地要求改变环境,巴不得即刻离开“没有一点半点阳光”的中国“黑甜乡”,激动地憧憬着“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在那炽烈情绪勃发的时候,显然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气息。到了莫斯科,“饿”成了亲历的现实,“吃了几个月黑面包”。新国度的复杂实际状况与原先的憧憬毕竟有相当远的距离,尽管也曾经预想过可能有的困难和曲折,却终不如现在亲历的感受那么真切实在。他虽然仍旧强力自勉,保持镇定、勇猛,但“来此绝国”“如此孤独寂寞”的感觉(《饿乡纪程·跋》),以及“饿乡!饿乡!你还是磨炼我的心志,还是亏蚀我的精力呢?”(《饿乡纪程·一五》)的疑问也同时发生。他除了完成报导稿子的写作之外,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俄文和对俄国文化的深层考察上,用在写《赤都心史》那样的文学作品和《俄国文学史》那样的专著上,这应该是他当时的实际情形。想去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想主要做政治工作的念头恐怕真是没有的。入党的事提上日程时,甚至入党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具体工作上主要搞文学的心理倾向和实际情形,恐怕仍然是持续着的。然而,正是在入党前后这段时间,他的心理的核心层——最根本的理智层——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作上也不期然而然地由搞文学为主转到革命政治工作为主了。他在《多余的话》里有如下的说法:

到俄国之前……读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到俄国之后,虽然因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的一切……自然有别人去干……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社会的幻想没有冲

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去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工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这实际上是宣告自己的基本观点以及这种基本观点形成过程和在具体工作上也转向实践这种理论的革命政治工作的过程。情绪上似乎是从爱文学、要研究文学的兴趣去说，理智上却用曲笔揭示实际的转变过程——自身的心史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基本心向的转变，根本的社会理想的确立，以及关于这种理想的“辩证”科学逻辑在头脑里取代“当初”的“幻想”的情形，揭示出这种转变、这种过程有其历史规律性，不以自己原有的主观兴趣为转移。但是，起初“没有认真去研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之后“就搁下了”，这样的叙述只是说没有把读政治书、研究政治作为具体工作的重点，只是说当时去做别的具体工作（文学研究等）了，而别的工作也是在这种基本理智、心向指引下的。后来由于东方大学工作需要（“东大”中国班实际上是革命干部的摇篮，共产党许多高级干部是这里培养的。——引者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革命方略的探讨成了主要的内容，没有多少工夫继续研究文学，不

过是心绪上因爱文学而略有不足之感,却并不是不想做革命政治工作。

从秋白写的通讯报道和《赤都心史》里的文章来看,他入党的时候,即1921年5月和稍后一点如6月里,他的心理态势是较高昂的。写于5月4日的文章说:“满街都插着赤色旗”,“共产党的精神非常之好”。^①5月致俞颂华的信说:“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资本主义……全俄职工联合大会……在讨论之中,此种过渡办法甚有味。”^②5月20日记有“夕阳红艳,照着他们神圣的劳工……只听得工人谈说得很高兴”的事。^③6月23日写的《莫斯科的赤潮》,7月6日写的《列宁杜洛次基》,“歌声入云际”的描述和看“列宁伟大头影”的新奇的感想等呈现着秋白心潮澎湃的情形。8月份起因为生病而有心神“忧黯”借庾信诗句“魂兮归来哀江南”来抒发的文章。9月10日写的《心灵之感受》一文值得注意,记录对一位参加过实际革命斗争,后在军事学院工作,“屡经困厄”者的访问。那人说:“‘为人服务’,忘了这‘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这是因为秋白也深受感染,发生共鸣,“默然”地渗入心底,所以才郑重记述。

因而,我们可以说,秋白的“心灵的明镜”、“心灵的圣钟”,在对各种新影响反应和共鸣的同时,也像经过了重镀重铸一样,已是一种新的“镜面钟身”了。从他的“心影心响的史诗”,我们可以听出新基调的心弦乐谱。请听一听吧:

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不能为现代“文明”所恶化。

我的职任很明瞭。“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类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247~248页。

② 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288、148页。

新文化的胚胎。

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①

达到了这种境界，心灵世界里也仍然会有矛盾，有尚待整理的心理纠葛。秋白从破产的绅士家族中出来，在非常复杂的中国近现代文化网络中受过20年的模塑，怎么可能一改变世界观就变得通体晶纯呢？非只秋白一人，别的谁也不可能在进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心理阶段后就完全与旧“我”绝缘。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向新的理想的世界文化进变过程中，旧物不可能截然地抛断，新俄环境中“‘东方式’的死寂”，“资产阶级市侩主义”的病状，经济落后所造成的社会精神的落后性，传统的宗教迷信，小私有者的狭隘，新官僚与旧官僚相通的某些腐秽之物等等，都仍然存在着，甚至有变形的新滋长。就是那些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也不可能把精神世界净扫得一尘不染。就秋白自身来说，常有“病体支离”之时，又与故国亲人远隔万里，加上物质生活的困苦，心绪出现“低徊”、“忧黯”、“伤感”、思归等状况，毫不奇怪。他作自我分析时说：

“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感伤……

噫！心智不调。无谓的浪漫，抽象的现实，陷我于深渊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卷1，第212～213页。

……①

这是他 1921 年 12 月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说及“心”“智”之异，教人勿从“智”的话之后，联系《墨子》中“圣人不患苦难，而患疾病”的说法，对自己受病魔之害中的心神情绪作分析时写出的一些话。自我分析的文章当然有一定的真性，身体病状引动心理病状。但是，他仍然说：

当寻流动的浪漫，现实的现实。
流动者都现实，现实者都流动。

他仍然在尽力摆脱心灵的病状，要亲切感受现实生活！他要从“心智不调”的“深渊”中跳出来，“于现实生活，社会之流动中”，寻得“实际的论证方法”，认为“那才走得人类文化史的一步”。他说：“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亟起直追！现实世界中‘奋斗之乐’，就是他的报酬”。②这是他 1922 年 3 月写下的话，此后在东方大学期间大致是这种心态。病了好久，刚刚好转一些，他就于 4 月至 8 月连续写了十几篇共约七八万字的通讯报道，有对 1921 年苏俄概况的综述，有对全俄苏维埃第九次大会的报道，对经济新气象的分析，对俄共“十一大”的介绍，还有外交、世界劳工统一战线、海牙会议、知识分子问题、“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革命党”问题等多方面的内容。他一面担任东方大学革命理论教学翻译工作，一面大量写作思想政治性很强的系列报道，那种主要做革命政治工作的高昂的心理态势，似乎已经习惯了。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共产国际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举行“四大”，中国共产党派陈独秀、刘仁静、王俊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秋白给他们当翻译并和他们一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1，第 220 页。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248 页。

起研究和拟定向大会报告中国革命形势的稿子,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以至于又累病了。

激越心态和“韦护”的忏悔

在共产国际“四大”期间，瞿秋白与陈独秀朝夕相处，谈得很投机，陈独秀邀他回国工作，他就和陈一起于1923年1月回来了。

离开中国两年，时间并不算长，中国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然而秋白一回来就感受到“异常的激刺”。他说想不到回来见到的是一个“狗彘食人的中国”！^①多年前鲁迅就用“吃人”二字概括中国的情形了，两年前秋白所在的就是“狗彘食人的中国”！现在他之所以感受到“异常的激刺”，主要是两年中他自己变了，对新俄的情况又已经习惯，一从新俄环境转换到中国环境，反差实在太大，事事都使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第412页。

他感到强烈刺激。

归国前夕,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俄国人问他,中国何以泛滥着“舶来货的谣言”,还提出中俄关系、孔子学理、中国究竟是什么社会制度、北京政府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孙逸仙的革命是怎么样“革”法等等。他自己也准备回国来研究中国社会,寻求实际的解决方法。这种心理准备更使得他把中国与新俄对比。他一到中国就看见到处是军警,就听到上海罢工工人遭“洋狗”噬啃的消息,英国人在汉口惨杀华工的消息,直系军阀曹锟贿赂“猪仔议员”、议长吴景濂指令军警殴伤请愿学生 200 余人的消息,等等。舆论界、思想界呢,多被所谓“最高问题”笼罩着,即只谈军阀“高等”人物的“大心事”——总统选举、争议员席位、争“巡阅使”职位、在“制宪”上搞政治交易之类,而揭露恶政、探讨社会改造的声音被遮掩着,很微弱。秋白因此而激愤,回到北京才 4 天就写出《最低问题》一文,接着又写了《赤俄之归途》一文,两篇相配合的文章,表达了他在环境转换中把中国和新俄相比较所得的强烈感受,呈现出激越的心态:

处于如此严酷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还只顾坐着静听人家谈最高问题制宪问题,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呵。

当年五四运动的精神哪里去了!

中国平民若还有点血气,无论如何总得保持我们汗血换来的吃饭权。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①

其实,五四精神已经在部分人那里转进到实际革命斗争的深入,如当时共产党所做的工农运动的发动工作,安源等地的矿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1,第 412~413 页。

工、上海等地的职工都有党所组织的罢工活动和其他革命活动，长辛店和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正在酝酿。秋白文章中的那些话，是他急切的革命情绪的表现，对于那些失了“五四”锐气，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在那所谓“最高问题”舆论笼罩下无所作为，甚至做顺民、做应声虫的人，是有警醒作用的。

秋白回到北京仍然住在堂兄纯白家——东城大羊宜宾胡同；有时也住在瞿世英家——黄化门西姐姐房。他一面和兄嫂、弟弟、好友们欣慰地重聚，一面投入紧张的工作，白天夜晚都在撰写文章。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在北京，他已参加了中央的宣传工作，一面给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写文章（如1月31日发表的《政治运动与知识分子》），一面为他所主编的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准备稿件。6月出版的第1期共15篇文章里就有他的6篇理论文章，还有一首《赤潮曲》和他翻译的《国际歌》。同时还参与筹备党的“三大”、演讲宣传（如许广平回忆，他曾到女师大讲演）、“二·七”大罢工期间和事后的工作、中央机关迁往上海的工作，以及自己的公开职业的业务联系等等。这也表现了他做革命工作的高昂心态。

回国之初，瞿秋白曾由李大钊联系想在北大俄文系谋教职，那是为了便于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工作的开展。此事未成，大约因其堂兄纯白的努力，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派人送来了聘书，以月薪200元聘用秋白。然而秋白没有往就那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职务，其中自然有中共中央的意见，同时也因为那份工作与秋白志愿不合，他那时是很热切地要做革命政治工作，要搞革命理论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研究，要搞革命文学活动。恰因“二·七”惨案后中共中央要迁往上海，党的“三大”召开在即，国共两党合作的筹备大有进展，拟合办上海大学，秋白就南下上海，并由李大钊向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推荐，就任上大教务长和社会学系

系主任。这正适应革命工作需要,也很合乎秋白志愿和他在革命活动中奋飞的心理态势。

秋白作为从苏俄归国的代表出席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成为大会上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事先参与大会文件的草拟,会上又传达共产国际“四大”决议和“五月指示”、作报告等。这自然与陈独秀、李大钊对他的器重有关,同时也因为他有激越的革命情怀,而大会的中心议题又是贯彻国际“四大”精神,搞国共合作,他正好熟悉国际“四大”的文件和情况,又是积极主张国共合作的,因而工作得很起劲。

这个时期,他心境的另一些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其中,与家人亲戚关系中的心境是一个方面。这时与求学时不同了,他已是成人,又在外国当了两年记者,颇有了名气,回来又同孙中山、陈独秀等大名人一起做事。与弟弟、妹妹、有情义的亲戚欣慰地相聚自是人情之常;抚育培养弟弟,向扶助过他和抚养过弟弟妹妹的叔伯姑婶兄嫂报恩,他自然要想到的。况且,实际上,“大家庭”对于他这样一个从外国回来的人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叔伯姑婶兄弟姐妹都引颈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其中亲情是一面,而经济生活上的迫切需求则更是显然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他虽名声在外,经济收入却微薄得很,真是难为他了。所以他说:“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7月30日致胡适信)不过,党的“三大”之后在杭州的约20天里,他对于既有亲情又有恩情的伯父伯母(世琥夫妇)很尊敬,规矩周到,“不露革命者锋芒”(瞿秋群语)。其实也是无须露锋芒的。世琥虽为官数十年,倒确实同一般腐朽、顽固的封建官吏不一样,不单是为官时两袖清风,在困窘中还抚育秋白的两弟一妹(景白、坚白和秋群),而且思想开明,他早就送纯白学新学、洋务,对秋白致力的事业也不反对,听秋白讲俄事也兴致勃勃。

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交往,是秋白心境又一方面的表现。他在杭州拜访过在西湖疗养的胡适,稍后又有信致胡适,说:“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这是把胡适当作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而给予相当的尊重,同时也贯彻统一战线精神。胡适颇看重秋白才华,曾向商务印书馆推荐秋白的稿子,还把秋白作为编辑人选向该馆推荐。秋白致胡适的信说:“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囑,已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及译著。’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无奈此等人款‘远不济近’……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的教务。”秋白当然不可能只去静心研究,他要做中国革命的“江南第一燕”!

此后秋白一面办上海大学,为革命培养干部;一面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和著述,又兼编《新青年》季刊,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奔忙于沪粤之间。一方面搞革命政治工作,一面从事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同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赤潮澎湃”,“猛攻,猛攻”,“何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从《赤潮曲》里的这些诗句,也可以看出秋白这时的心潮。

1923年至1924年间,秋白既有其社会科学研究的天地,又有其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革命观发挥其宣传家特长的现实政治评论的生活;既兴致勃勃地从事符合其主张的革命政治工作,又有他的诗的世界,有满足其文艺爱好、实现文学志愿的活动。多方面统一和谐,较均衡地全面发展,这大约很适合他的特点,因而处于一种总体上高昂的心理态势。“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这首写在致爱妻王剑虹信里的诗,是他当时心态特征的敞露。

1924年7月前后,秋白在总体高昂的心态下,也曾发生过一个侧面的特殊的情绪旋流和急奏的哀弦。那是他新婚才半年的爱妻王剑虹病重和仙逝时的心理波澜。从1923年8月起,他们是那么热烈而深挚地爱着。那是烈火、雷电般的爱,是诗一般美的爱,是交响乐一般丰富而和谐的爱!可是,王剑虹病的时候,秋白竟为工作所迫而不得不常离开她,虽在她病危时陪着,然而她竟那么急匆匆地归天了!秋白悲哀至极。

据丁玲回忆,剑虹死后,秋白曾有十来封信给丁玲,“这些信像谜一样……总是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丁玲写道:

他什么地方对不起她呢?他几乎每封都责骂自己,后来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那末,他是挨了批评,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他只是把我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他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所苦呢?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深的嫌厌自己,责骂自己呢?我不理解,也不求深解,只是用茫茫然的心情回了他几封信。^①

“梦可”是秋白对剑虹的爱称,法文的音译,意思是“我的心”。在这件事上,秋白是非常孤独的,似乎谁都不了解他,不能理解他的心曲。他嫌厌自己,责骂自己,却又认为别人都没资格批评他,除了天上的“梦可”——那个他“对不起”的人,他的爱妻。他称她为“我的心”,她也实在是他的“心”之所在。“对不起她”,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心”。现在,她死了,在“天上”了,只有她有资格来批评他,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的“心”了解和能够批

^①《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154页。

评自己。这就是自我忏悔。

他因为理智所定的志向,因为这志向所寄的工作,在革命的急务、环境、组织关系、人际关系中,急迫得发生了料所不及的家庭悲剧,因而嫌厌自己没能够把“梦可”,把爱妻,把自己的“心”留住。悲剧是事实,他不能责怪革命工作,不能责怪为了工作的组织和同志,他只能自己向已经在“天”的爱妻忏悔,向自己的“心”忏悔!

后来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可》写的就是认识秋白之前的王剑虹,1929年又有一本小说《韦护》,又大致是秋白、剑虹之事的纪实文学。钱璆之先生说得好:“从表层看,小说写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从深层看,未始不是写了主人公的性格和心理的矛盾(《韦护》中提到的‘两重人格’与《多余的话》中所谓‘二元人物’,并非没有联系),未始不是那个时代青年革命家的某种生活剪影和带有一定典型性的心灵冲突。”^①

《韦护》里男女主角韦护和丽佳分别以秋白和剑虹为模特儿,王观泉先生在《瞿秋白传》里引用了韦护对丽佳说的一大段话,比较集中地写出了丁玲对韦护心理矛盾的看法,我再从中略摘一些来看看:

我相信你是比其他一切人都能了解我的。……我能得到一点爱,即使只有你所给我的百分之一……我一定永远睡在爱情的怀中讴歌一世。可是你知道,我却在未得爱情以前,接受了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这将我全盘变了……一面站在我不可动摇的工作上,一面站在我生命的自然需要上。……但是太不幸了,真是你的不幸,你为什么爱我呢?……啊,多么甜蜜的时日啊!……只是太短促了。

^①《瞿秋白研究》5,第355页。

……多么可惜啊！你没有看出我的怯懦来，你没有一丝一毫想从我工作上取得胜利（意思是“你丝毫也没想过用爱情把我从工作上拉过来”；“怯懦”指在你的爱力下我会被征服的。——引者注），于是终究造成了我们的爱情的不可弥补的缺憾，这分离的惨剧！

小说中这段韦护的话，连语言都很像是秋白的，我真怀疑丁玲写作时手头有秋白致王剑虹的信呢！既遵守革命人生观的“铁律”，又执着于纯真美好的爱情，未必就是两重人格。如果在陪爱人逛公园和一件重大的革命行动之间只能选择其中之一的时候，选前者 and 选后者，那是有重大差别的。在爱人的生死关头去救助她（或他），和革命工作的一般事务（如可今天写也可明天写的一篇文章）之间，如果选择后者，那“爱”字就要改掉了。秋白的具体情况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王剑虹的病会那么重，会那么急骤地到病危的程度（从丁玲的回忆中可知，她在“暑假将到的时候”离开秋白和剑虹，尚且没想到剑虹会有重病，暑假里还收到剑虹说“病了”的信和秋白附言，仍未料到剑虹会有很重的病，然而剑虹竟那么快于7月里就逝去了。那么，同样可知，秋白也是完全没想到剑虹的病会那么重、那么急），而他的工作的确十分重要（如5月份的中央扩大会议等）。因而他一定是觉得出席会议不过是短暂的分离。哪料，等到知道剑虹的病情较重时已经救之不及了。“她（王剑虹）早就说她有时感到不适，”丁玲说，“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秋白、我和旁人的注意。我知道她病的消息之后，还只以为她因为没有我在身边才对病有了些敏感的缘故，我虽不安，但总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① 如果秋白是因为忙，因为奔忙中与剑虹分离而没有“注意”到她的病会

^①《瞿秋白研究》5，第152页

那么重和急，他所深爱的剑虹之死自然会使他在特别悲哀的同时，又十分“嫌厌”和“责骂”自己。他的心深深地忏悔，剧烈地伤痛！

然而，他决不是后悔自己走了革命的路，决不是认为不该去为革命奔走。他算是较快地摆脱了丧妻的沉重精神负担，这一方面是与杨之华的爱所给予他的温暖的安慰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是火热的革命斗争使他去为实现理想而承担日益增加的工作重任。杨之华是一位很能理解他丧妻之哀的知己，又是一个和他一样激昂的革命战士，她的爱与秋白的“工作”是相互促进的。1924年11月他们结成高飞的双雁，秋白的“云梢”心态就更激越了。

“热血沸腾”与“怅然若失”

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秋白担任政治决议审查组长,作长篇发言,被选为五常委之一。1925年春到1927年春,秋白在国民革命的高潮持续推进之中,心理态势的主要方面和总体特点可以说是“热血沸腾”。

这两年中,中国各种矛盾和斗争都急剧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斗争发展为“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战争,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老右派的斗争在持续,与新右派、新军阀的斗争也逐渐公开和尖锐化。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谋杀,共产党内的不同政治主张、对国民党右派新军阀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也渐渐演化为“左”右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

秋白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都是属于激进的，斗争情绪是昂扬的，观点、主张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也越来越赢得较高声誉和革命派的拥戴，他的心理态势也就越来越在革命政治斗争的方面高涨。

秋白当时主要做宣传和理论工作，一直夜以继日地写文章，同时参与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和中共中央、国民党政委会的工作，参与处理各种矛盾和斗争。“五卅”运动中，他除了参与集体领导，还创办和主编《热血日报》，在发刊词里他说：“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这也正是他自己情绪激愤、心态高昂的表现。杨之华回忆说：报社只是一间客堂，一张桌几条长凳，在那炎热的天气里，秋白常常忙得满头大汗，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兴奋过。^①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他也同样激昂，《中国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那样的长文一夜写成，又写得那样尖锐透彻。为了给中国革命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他因吐血住在医院还编写俄国革命史略。在北伐和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他虽然过于乐观地认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亟亟乎殆战了”，革命的前途已经“开了一个新阶段”，但他说：“应当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责任”，必须“不妥协的猛进”。^②其中显示着猛进心态。在领导上海工人起义的问题上，他和陈独秀的意见不一致，陈曾“讥讽秋白自告奋勇”^③，从这“讥讽”里我们倒可以看到秋白激越昂进的姿态。在党内同错误倾向、错误观点的斗争中，他写于1927年2月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论文集〉自序》，写于4月的《〈湖南农民革命〉序》也表现了热血沸腾的心理特点。

① 《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32页。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4，第377—379页。

③ 杨之华《回忆秋白》，第59页。

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
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①

《瞿秋白论文集》之出世(因形势急转,迅速恶化,此书
当时未能出版。——引者注)正当革命战争剧烈之际,中国
革命大踏步的前进……我希望论文集很快变成陈旧的文
籍!^②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
战线去奋斗……^③

这些文章充分表现出秋白当时心潮的主流。

不过,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幼稚状况相一致,秋白这个
时期的热血沸腾固然可贵,但也是确有缺陷的,如没有想到反
革命势力的强固,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根基之深,没有对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的心理准备。所以,在蒋介石叛变,公开向共
产党举起屠刀时,秋白和许多革命者们一样是没想到轰轰烈烈
的大革命会那么快就失败的。

此外,他后来在《多余的话》里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
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虽然我当时对政治
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
失”的。

他这种心情是容易理解的。他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同时又
酷爱文艺,对他来说,最适意的是两方面都能从事。然而,在革
命斗争剧烈,革命政治工作占去了几乎全部时间和精力的时候,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4,第528页。

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4,第420页。

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4,第574页。

因怀念文艺而有“怅然若失”之感,这是很自然的事。无可非议!

血的教训,太沉痛了

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

作为中央常委的我,也有责任,我深感在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单是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干不好革命。^①

这是羊牧之回忆文章中复述的秋白的话。文字的表达未必与秋白原话多么相近,但所表达的心情当是基本相符的。

党的“五大”结束时,秋白因劳累身体病状又加重了,人们劝他休息,他说:

^①《忆秋白》,第81—82页。

“形势紧迫啊！已经跨上了战马，除非中枪倒下，能不向前冲么！”^①

1927年5月至7月，他既要经常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又主持中宣部工作，兼管党报，还要参与中央农委工作，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里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与国民党右派斗争，还有各种文件草拟、文章写作的担子，总之，“忙透了”。他有时穿西装，有时穿长衫，有时又是军装，以适应不同场合的工作需要。他到处作报告都是讲“进攻”、“进攻”，与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等人的“退让”呈明显对照。可见，秋白当时虽处在日益恶化的艰难形势之下，但心理态势的主要特征仍然是积极进取的，是要“向前冲”的那种战斗者的激昂。

但是，另一方面，秋白仍然能比较沉着地分析形势，比较正确地对待陈独秀等有错误倾向的同志，他也存有防“左”的心理。当时，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尖锐对立，例如鲍、陈主张把革命中心转移到离苏联较近的西北地区，罗易主张南征回广东；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鲍、陈主张“和缓”，罗易主张“彻底”，但他们都认为中国党内不存在机会主义或不会有孟塞维克。秋白则通过细密分析认为有机会主义，在革命的发展上，他主张东征捣毁蒋介石南京政府后再北伐（从当时武汉政府已准备“分共”的情况看，秋白这一主张已经无实现的可能）。当时的民众革命运动中的确存在着扩大了打击面的现象，存在着“无组织行动”的乱抓乱斗乱打的现象。秋白主张“进攻”、发展农民运动的同时，指出“农民骚动的原始旧方式”的存在，“是与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正确

^①《忆秋白》，第85页。

指导不相符合的”。^①这是他防“左”的表现。

秋白后来说他自己在“五大”至7月那个时期也有“错误”。现在看来,秋白那时的错误也与心理矛盾有关。他与鲍、陈、罗共同的错误在于:认为当时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与左派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致力于拉住汪精卫,而没有认出汪是个狡诈的假左派。这种上当,与他当时对共产国际仍有明显的盲目信从心理是相关的。共产国际在万里之外遥控中国革命,对实际情况没有切近的了解,直到6月底还对汪精卫怀着幻想。况且即使是较正确的指示也往往不能及时到达,两位国际代表又各有理解。当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够明晰时,秋白就往往在两位国际代表的不同意见之间犹疑或调和着提出兼顾双方的意见。

从“八七”会议起,瞿秋白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对于这一变化,他在《多余的话》里有段话说:

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

秋白反对和最尖锐地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动机是光明正大的,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谋取地位,而是“只想望着”陈独秀改正错误。中共“五大”上他仍主张选陈为总书记,他向那些仍持反对意见的人说,陈独秀没搞非组织活动,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过的,够得上“光明磊落”,至于错误,“检讨了就行了”。他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4,第608页。

的确没有取代陈的意向。“实逼处此”指的是1927年7月下旬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到武汉之后,秋白被推上主要领袖位置的情形。形势在急剧地变化,共产国际的训令也几乎是朝令夕改。后来,毛泽东曾说:“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①那些“命令”中也包括“改组”中共中央。“七·一五”前夕,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已于7月上旬把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蔡和森等原中央常委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成立了一个五人临时政治局,由张国焘主持,其余四个成员是李维汉、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没有开代表会,也没开中央全会,采取的是由鲍指定的方式。临时政治局组成才10天,新任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于7月21日到了武汉,带来的新训令是召开紧急会议,严厉处罚中共中央,“改组中央”,贯彻新方针。当时陈独秀已经和共产国际顶牛,五人临时政治局及原中央常委的多数不主张再改组,并抵制惩罚中共中央及首领。但另一些人则是“急进”姿态。蔡和森后来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里说,他当时主张斩钉截铁地执行国际训令,承认党的一切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央”,处罚中央及首领,除保留秋白一人外,其余旧常委不再参加领导班子,而以工农运动的激进代表人物毛泽东、彭公达、向忠发、王荷波、顾顺章等充实中央。从蔡和森主张旧常委“只留秋白一人”来看,秋白是“急进”派所拥戴的。蔡又说:“和森违背指导团体的共同,独自急进的主张……处罚中央及首领。”可见秋白又是不主张“惩罚”的。同时,从五人临时政治局的行动来看,准备南昌起义的事又由成员之一的李立三和秋白的老搭档邓中夏一起到庐山向秋白报告,征求秋白的意见,这足见五人临时政治局的多数也拥戴秋白(除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9页。

了张国焘,别的成员如李维汉、张太雷等都信赖秋白)。据李维汉说,当时虽然秋白不是临时政治局成员,但由于他的声望,却实际上参加了中央的领导。^①

从上述情况可知,秋白当时是旧常委中唯一得到意见对立的两派共同信赖的人。所以,罗明那兹刚到武汉,秋白就被补入临时政治局,稍后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主要领袖,这虽然也是“国际”决定,却是合乎众意的,是由于大家拥护而非他莫属的。他在《多余的话》里说“实逼”、“轮到”他主持工作,“不得不担负”,那都是隐去了具体细节和缘由的说法。

然而,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又说:“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减少兴趣”,是很有分寸的说法,不是没有兴趣了,也不是兴趣很低,只是与以前相比较的一种对心态的表述。以前几年,青年革命政治家的特点非常突出,处在政治上升时期,对政治工作的兴趣十分强烈,加上革命高潮的感召、鼓舞,形成那种“上云梢”、“热血沸腾”的状态。在领导集体中工作多年后,青年式的政治兴趣在1927年开始向比较冷静的状态变化,这其实是有其合乎一般规律的方面的;另一方面,革命高潮在这时转为低潮,各种矛盾斗争交织着,政治领导工作十分复杂和艰难,要说还像高潮时期一样的乐观兴奋,也不符合实际。尤其是在党内纠葛变得有些畸形化、人际关系在中央被共产国际“改组”时因派别和主张的不同也变得不协调的时候,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作为解决矛盾的一个棋子,更是影响“兴趣”的。“兴趣”减少,革命的理智更加劲健,责任心依旧强烈,肩负主要领袖的重任之后,那种力挽狂澜,猛御风雷,完成革命大转折的气魄,多么令人神往!

^①《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10页。

“盲动”时期的心态与“退出”之念

“八七”会议之后，总方针明确了，但是究竟怎样有效地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究竟怎样挽回形势，转进到新阶段，究竟怎样组织革命力量，怎样使党健康、坚强起来，领导革命的转变和推进，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有比较抽象的原则而一时还来不及制订出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可靠的措施。当时的各种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尖锐激烈，要理出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对策还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然而那么急迫的形势，那么险恶的环境，哪里允许领导者从从容容呢？就党和革命队伍来说，也存在很多很复杂的难题。举其大者，一是共产党各级干部、党员多年在国民党里，国共合作前提下的那套工作方式、习

惯及旧方针、右倾错误的余毒,改变和消除起来就有极大的难度,一些人因反对新方针而离开了革命队伍,甚至在敌人高压和屠杀中叛变了,一些人愿意贯彻新方针却受着旧习惯、旧观念的束缚;二是敌人的高压和屠杀引起了党和革命队伍中普遍的强烈反弹,一些人的报复和拼命情绪难以控制,愤怒急躁却束手无策的状况更为普遍;三是形势剧变、看法分歧之中在批判“机会主义”的时候互扣这顶帽子而发生的内部纠葛和为避“机会主义”之嫌而冒险拼命的现象也相当严重。秋白在这种情况下做主要领袖,真是难为他了。

谁都不是全知全能的,谁都不是心无杂质的。在前述那种情况下领导一个党,领导一个大国的伟大革命,如果不发生任何错误,不发生任何心理上的复杂现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秋白发生了被称为“盲动”的错误,心理上发生过感到“无聊”、想退出领导岗位的现象,这是不应当深责的。

他后来在《多余的话》里实事求是地写道:

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的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必须另起炉灶。而我……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的……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

当时整个路线错误……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作为刚刚就任的主要领袖，瞿秋白急切地想挽回形势，取得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显著成效，尽管他和那些缺乏系统理智思考的愤怒报复、拼命的基层干部群众不同，“急性病”却是共同的。他对形势估计为持续“高涨”，心急是一个原因，强烈的主观愿望导致了对形势观察和分析的乐观失实。直到1928年4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还说1927年11月“有人说革命潮流低落，更是错误”^①，“广州暴动后，革命的高潮进入长期激战的形式”^②。

各地多次的暴动一再失败，尤其是尽了极大努力、作了多方面准备的广州起义也很惨地失败了。以秋白之敏、之智，在常态之下是应该能认识到革命处于低潮，应该放弃以城市为中心、举行大城市暴动的路子而“另起炉灶”了。但是，他仍然没有认识到，没有改变。我们从他1928年4月写的一段话和对列宁的话的引用，也许可以大致窥见他的心理：

灰心失望烦闷的状态，对于艰苦而猛烈的斗争中，受不起锻炼的人，是无足怪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最后一个放下直接的革命斗争方法——直到用完了一切可能，方才放下这些斗争方法，直到没有丝毫比较速成的希望的影子，直到号召准备群众罢工、暴动等的方法明明白白是失了基础，然后再肯放下这些方法……”^③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5，第430页。

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5，第455页。

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5，第433页。

要做列宁所说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堕入灰心失望烦闷的状态,要在艰苦而猛烈的斗争中受得起锻炼,要与那些放弃革命的人划清界限,那当然是好的,有积极的理智和意志。但是,把列宁这段话用来作为在当时具体情况下坚持举行大城市罢工、暴动,以求革命“速成”的理由,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中国当时已经没有革命“速成”的丝毫希望了,“明明白白是失了基础”了。秋白这样引用列宁的话,表现这样一种心态特点,就是拘守俄国革命模式,太重列宁的本本,而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当时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的问题尚未摆在最紧要的地位。上述情形或许还和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影响有关。

秋白心态的另一方面,他在《多余的话》里这样说:

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觉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指政治领袖的工作。——引者注)是“替别人做的”。……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在空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

人们,尤其是受过传统的隐逸人生观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斗争激烈、自己为之而特别劳瘁的时候,发生退隐“逍遥”的念头并不奇怪。秋白当时会有这种念头也许还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命令式的指导有关,他自己的主张难以自由地去

贯彻；也许还与内部矛盾的难以处理有关，右的和“左”的，还有怀着争抢地位之心的人，都有各种责难，这从党的六大上的许多发言可以看得出来。然而，在“六大”上他又没能说出自己想引退的意思，那是因为他的进退成了“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他如果退出领导核心，就不利于党的六大方针的正确制定，张国焘等机会主义者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反对“老子党主义”的独立意识

党的六大后,秋白留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从1928年4月第二次赴俄到1930年8月回国,这两年多可以说是秋白生活上最安定的时期(杨之华也在莫斯科),但心境却仍然是波波折折的。

起初是中共“六大”上尖锐复杂的矛盾要处理,他自己须就“盲动”错误作检讨,承担责任,还有职位“进退”问题引动的心理矛盾;后来与俄共、与共产国际的矛盾因中山大学事件而尖锐起来,他所受的精神压力是很沉重的,心境更加不平静。

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秋白的心理矛盾早就存在了。在大革命时

期,尤其是1926年底到1927年7月,他虽然没有和共产国际发生冲突,但他对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发生的错误和在失败时把责任全推给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而予以“惩罚”的做法,是很有意见的。对“盲动”错误,他更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也是与包括共产国际的指导在内的“整个路线”上存在的问题相联系的,他虽然在中共“六大”上完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但对于“国际”和俄共那种自以为完全正确的姿态,也是有看法的。他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的发言中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不去计较别人对我们的错误承担什么责任,我们也不想文过饰非。^①

这话里实际上包含着对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批评:不计较是“我们的”态度,“别人”(实指共产国际和俄共)承担不承担什么责任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想“文过饰非”,“别人”是否也应当如此呢?

中共“六大”以后,秋白不仅深刻省察“左”的“盲动”错误及根源,自警不再犯“左”的错误,并注意防止和纠正中国共产党“左”的倾向,而且独立思考、独立自主的意识明显地强化起来,敢于向共产国际和俄共提出异议,据理力争,维护正确主张;对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提出质疑;领导中共代表团为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是俄共中大当局和有关部门搞出的冤案)平反;抵制米夫等“国际”和俄共头面人物扶植王明宗派的做法。这是一个政治领袖更加成熟的表现。谈到中山大学事件时,他在《多余的话》里说: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380页。

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职务,准备回国。

言行“非常出奇”、“故意夸大事实”、要“‘打倒’对方”,说的主要是米夫等“国际”和俄共头面人物所扶植的王明宗派,这说出了秋白当时的感受。正因为秋白表现出明显的独立自主心态,对“老子党主义”者不驯顺,而总有独立思考的意见和主张,他们就要扶植一个言听计从、完全驯顺的宗派来取代他。他们要“打倒”的远不只是“劳动大学”的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而主要是秋白。秋白的“调和”本不错,现在看也仍然是正确的。他们加给他的“机会主义的庇护者”的帽子,正好说明他是在尽力保护同志,维护党的团结。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共产国际(实际上由俄共主持)作为中共的领导者(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政治生命是有生杀大权的,秋白的独立自主意识,他的一系列违背“国际要人”意图的意见和做法,注定了他将被“打倒”的命运。

秋白之所以那样不驯顺,那样抵制“老子党主义”和“左”的宗派教条主义,一方面是坚持真理,坚持正当的革命原则,也真正是维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正确路线;另一方面,从心理深层来说,他早已不在乎当不当政治领袖了,早已有“退出”之念,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感在起着作用。他曾对人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须有……独立

自主的勇气,决不能奴颜婢膝地听命于人。^①

^①《墨秋白研究资料》上,第64页。

“无可形容的重压”

1930年8月秋白回国,9月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现在看来,秋白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既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团结了犯错误的同志。然而,共产国际却像抓到了秋白的莫大罪证似的,对他大加讨伐、打击,仅仅三个月之后就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出马,来华直接操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撤销秋白中央领导的职务,扶植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做主要领导人,开始了中共党史上错误空前严重、造成损失重大的“左”倾时期。这是1931年1月里的事。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写道: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

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

“无可形容的重压”,在他负责政治领导时期的不同阶段,感觉该是有区别的。“八七”会议到“六大”前后,当是还有些“千里马”心态的,尽管“拉的车”觉得很重。“六大”之后到三中全会前的两年多,心理态势是有起有伏的。最初还比较适意,后来烦恼渐多,1929年秋天起明显失掉共产国际的信任和受米夫—王明宗派的围攻。到归国前,那是相当忧郁不安的,其爱弟景白的失踪、王明宗派的气势汹汹、米夫等共产国际和俄共某些人的弄权搞鬼,都是带有恐怖性、致命性的现象,回国倒是一种暂时性的解脱。

三中全会是他心态总体低落中相对呈显起势的时候。从他主持会议的稳健和对于推进革命表现的乐观来看,从他既认真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突出地强调“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①,又对于某些人搞的“无原则斗争”(实际上包括米夫等扶植的王明宗派的一些活动)采取严厉态度来看,他的精神状态是呈现进取性的。他和多数同志一起,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特有精神,提倡自我批评,表示一定要把无原则斗争的倾向和方式打下去。然而,正是因为他坚决按正确的原则办事,尤其因为他主持的三中全会没有把王明等增补进中央领导中,使得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俄共的米夫等在莫斯科就疑忌和打击秋白的一班人)大为恼火。他们立刻以各种“罪名”狂轰滥炸似地批判起秋白来。一起参加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7,第4页。

三中全会与秋白共同作出决议的一些人,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却受到秋白保护,由秋白按正确原则予以团结的同志,这时也为了解脱自己而把责任推到秋白头上,其中有的人很快地变成了米夫—王明宗派的附庸。所以,四中全会前的两个月,秋白的心境最附和前引《多余的话》那段文字所说的“无可形容的重压”的情形。

不过,秋白并无恋位之心,他对个人的荣辱进退,认为是枝节问题,在四中全会上他只听批判,毫不辩驳,又按别人定的调子作了极简略的检讨和声明——他已料定辩解是毫无作用的,自己也就无意辩解了。被解职,从个人来说,倒是卸下了千钧重担,“松了一口气”,可以“休息”了;但从革命事业方面考虑,他有深深的心忧。这是矛盾的。后来,他一直为自己没能够为维护正确路线坚持斗争而内疚,为自己作为主要领袖却既没能防患于未然又没能在王明宗派祸患成气候时把它打下去而内疚。看到“左”倾宗派教条主义的祸害越来越严重,他就越来越心忧党的事业。

在上海文界 和苏区的心理矛盾与忧虑

1931年到1933年,秋白离开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在上海文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时期,他的心境如何呢?他说:

四中全会后……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多余的话》)

人们把秋白30年代在上海文化界

的三年称为他的“黄金时期”。从他的文艺生涯说,这种说法是不错的。他把“自己的家”那“荒芜”了十年的“田园”耕耘出一片春色。环境十分恶劣,物质生活极其艰难,他和文界好友鲁迅、冯雪峰、茅盾、丁玲等一同干起文艺工作,兴趣盎然,精神抖擞,像是永不知疲倦似的。努力的效果很好。“左联”改变了“左”的倾向,转入劲健精进,同反动文艺和错误文艺思想的斗争节节胜利,他自己创作、翻译获得了很大丰收,他感到真正的欣慰和喜悦。

然而,瞿秋白毕竟还是革命政治家,尽管已经“脱离了政治舞台”。当时他似乎已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因而自比为“骷髅”,但是即使已是“骷髅”,“还是不肯沉默”。^①他写起《骷髅杂记》来,那是深含着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此外,1931年10月起至1933年8月,他写的政论竟达约30万字。单是这个数字,就足见他那革命政治家的心灵还活跃着,而决非“骷髅”。

而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竭力提防秋白这么一位被“打倒”的政治领袖的复活!于是,又一次的政治打击临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1933年发表在党刊《斗争》上的几篇文章被说成是“机会主义”的。他们以中央名义发文件专门讨伐起秋白来。当时上海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李竹声杀气腾腾地朝秋白吼叫:“像你这样的人,我只有把你一棍子敲出党外去!”在这样的打击之下,秋白的心境怎样呢?

1933年9月27日,秋白写了《我对错误的认识》作检讨;第二天,他写下了一篇散文《儿时》。将这两篇文章对照着看,不难发现他当时的真实心境。检讨文说:“我的那些短评……有一个系统的整个的立场……这是机会主义的立场”,“这是替悲观主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第539页。

义做开路先锋。中央同志说我从‘左’的错误到右的错误,这是的确不错的。”^① 这样的检讨明显是按照“服从”的组织原则写的,全文几乎是照抄那份批判他的中央文件和照录“中央同志”之所“说”。这样写明显是违“心”的,是为“顾全大局”而在党内矛盾上取退让的态度。宗派主义者把持中央,对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批判者不能不作检讨。这种冤案,只有等到改变了现行错误路线,才有可能平反。这种改变又要靠一定方式的党内斗争。秋白对此是很明白的。采取怎样的党内斗争方式呢?何时才能改变现行错误路线呢?这是他心存深深忧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儿时》一文则是他自身在党内斗争中处于下风时真实心理动态的表现。由“失败”,他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②

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因而,他在竭力防止自己去走那“‘浮生如梦’的人”的路,不能让“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像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儿时”——青年时期,每天都热力无穷地为理想而奋斗,为寻找“新的真理”而前进,现在呢?情形不同了:

“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

这实际上主要是说早就“知道了”宗派主义者极左的一套,“看厌了”他们的那副嘴脸,透露出深隐的真实心境。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7,第651页。

② 《儿时》一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2,第95-96页。

理智上,他清楚地知道世界和社会在前进、在出新,因而也发生另一面的心情,就是愿意像以前那样进取,去寻求新的真理,促成新的变化,以取代陈旧之物,“于是想念‘儿时’”。然而,心理上的悖论也就发生了:“儿时”是属于“过去”的,“过去的”毕竟过去了,是回不去的,况且把“儿时”看得格外宝贵,乃是“生命没有寄托的人”的心理特征,自己在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后退几步,想恢复已经走过的路,即“请求”那“儿时”的“无知”回来,以重新获得“求知的快乐”,这不又是“生命没有寄托”的表现吗?于是感叹道:“可怕呵,这生命的‘停止’。”“可怕”,不是指宗派主义者所给的惩罚可怕,而是指如果变成“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那是可怕的。

文章结尾处说:“未来的还是未来。”“未来”是希望所在,现在所期待的东西,还没有到来。他在文前所引用的龚自珍的诗末句“一灯红接混茫前”所呈现的形象或可作为他心境的写照。要出离“混茫”,就是把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每天干些什么。

似乎有些什么特殊原因,秋白刚刚被“无情打击”了一顿,就被调往中央苏区政府任教育委员(教育部长),1934年1月到任,至1935年2月被俘,在苏区共约一年。这一年,虽被作为“老机会主义者”受政治监控,他自己还是努力地办教育,推动群众文艺活动,而且去作些考察,“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有时和冯雪峰、毛泽东、吴黎平等人谈谈,也有某种情趣。但是从《多余的话》中所说和有些人的回忆看,他的心态也有其复杂性。《多余的话》中写道:

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要完全不问政治却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厌倦着政治”，显然主要是厌倦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者沿着“左”倾错误方针搞的那老一套；“敷衍塞责”，显然是在政治监控下应付错误领导者的代用语，对革命工作他是很认真的。他有不同的政见，只是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就在被批判时立刻“放弃”这些对错误见解的态度和方式“委曲求全”。他实际上一直在忧虑着当时中央在大政方针上存在的问题。他曾同吴黎平说过含有如下意思的话：“真理终究存在，是抹煞不了的。”看来他是认为王明等在“抹煞”真理，他们的指导不符合真理；党内斗争有“必要”，但要讲“道德”，“决不应采取阴谋诡计”。^①实际上他内心非常反对王明等那种不正当的、过火的党内斗争。

近年来(指的是在苏区。——引者注)，感觉到这一切种种(指感到自己缺乏与普通群众的联系，缺乏具体切实的工作经验和“普通常识”等。——引者注)，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这是比较积极的心态。但是，紧接着有段话值得细读：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语言”……终于一无所获。

办义务小学、师范学校等具体工作，与各种人物的接触等，不可能在具体知识上“一无所得”。细读起来，“没有‘共同的语言’”、“一无所得”等，似乎不是单指具体知识的学习，还另有弦外之音，似乎与他对“王明路线”统治之下的政治气氛的感觉有关。苦闷、孤独感好像也是如此。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损失，中央和红军主力不得不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即

^①《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64页。

将被国民党占领。居最高领导地位的宗派主义者要乘机把与他们政见不合的人甩掉。瞿秋白被甩下了,实际上导致了他的被俘。他曾郑重而急切地要求随军转移,他当时的职务是政府部长,又有重病,按正常情况是完全应该随红军主力与中央一起走的,他完全不适合留在极其危险的游击环境中。然而,当时的“最高三人团”拒绝了他的请求。当时他“心情有些激动,但没有吭气”,“那天酒喝得特别多”。^①凭着他的洞察力,当然是看透了他们的用心的。他的心是悲凉的,激愤的,他已经差不多预料到了自己此后的命运。他对有的同志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可以保证,一定为革命奋斗到底。

^① 吴黎平回忆。见《瞿秋白研究资料》上,第66页。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福建汀州水口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先被押入上杭县监狱，5月9日解到长汀国民党36师师部监押所。6月18日唱着《国际歌》，缓步赴刑场，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的盘龙冈盘膝而坐，微笑饮弹，从容就义。

在狱中，身份没暴露时，他曾以化名写“呈文”争取保释，并分别写信给杨之华和鲁迅，希望设法营救。不久，被叛徒指认出来了，他就准备着就义，识破和挫败了敌人诱降的阴谋。他一直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高风亮节。

然而，他就义30多年后，竟发生了把烈士打成“叛徒”的疯狂的“讨瞿”运动，有人说盖棺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

一个“叛徒”，竟“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一笔勾销”。于是，愚蒙狂乱的红卫兵把八宝山烈士陵园里的瞿秋白墓碑砸掉了。这是多么令人寒心，多么令人悲愤的事啊！

“讨瞿”的主要“理由”是说瞿秋白烈士生前曾在狱中写了一本《多余的话》。秋白这篇遗作被认为是“叛徒的自白书”。实际上怎样呢？

后来，中央对秋白在狱中的表现进行了认真周密的复查证实，并得出结论：他一没有改变革命的立场、观点、信仰，丝毫没有被敌人的“优待”和诱降所“软化”；二没有透露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三在《供词》中，在和宋希濂（当时是国民党军36师师长）等人谈话以及在与国民党中央派来的劝降人员周旋之中还继续宣传革命思想；四在被杀害时唱《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镇定自若，微笑饮弹。哪里有这样的“叛徒”呢？

瞿秋白是始终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伟大事业的。他始终怀着一颗坚定的革命者的心，一颗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心！

《多余的话》是他在“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时，对党对同志对亲人“说--说内心的话”，说--说“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笔者在《心忧书〈多余的话〉》一书中专门论述和评注了秋白的这本遗著，这里不再作详细的解析，只简略地谈谈秋白写《多余的话》所表现的他在狱中的心境，同时也据他的狱中诗词和别的材料，联系起来看看他当时心灵活动的特点究竟是怎样的。

在狱中，他的内心世界深层动态突出的特点是“心忧”。《多余的话》卷首所引《诗经》句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借用来总说写《多余的话》是“心忧”而致，如果有人认为“我”有所“求”，那就是“不知我者”，那就是误解或是曲

解。他“心忧”什么呢？他被俘时，红军主力早已撤出中央苏区，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狱中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虽可以看出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率领下继续战斗前进，但也能分析出在突围之初在李德等错误指挥下已受的极大损失，能够分析出红军主力在损失了大半之后处境是多么艰难和危险。中央苏区呢，则已基本上被国民党占领，留守的红军游击部队将要完全损失掉。他相信革命力量会再壮大，将来会胜利，但现时是多么危险啊！他怎能不“心忧”？狱中词《浣溪纱》就含着深深的“心忧”，尤其是末句“黄昏已近夕阳红”，明显含着感到即将进入一个黑暗的时期的忧虑。“夕阳红”自然表明自己革命精神依旧，革命还有明天的希望之意；“黄昏已近”既说自己将要牺牲，又说黑暗的来临。这一句之前的两句“湖海楼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明显是讲历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海时期和武汉时期，“黄昏”句就自然是讲眼下的情形。所以分明也是“心忧”之语。

革命严重受挫，党和红军处于险境，他不能不想到党自身方面的原因，即存在的严重病状，尤其是中央领导层内的隐患即王明宗派及其错误路线。这更使他心忧。他的狱中《无题》诗（“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就是这种心忧的表现，是将郁积的情绪用反语写出。那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英雄”们，“治国平天下”竟把个好端端的瑞金苏区给毁了，而且还在继续为害，革命者岂能无忧？

想到王明宗派“左”倾教条主义的祸害，秋白倒又觉得与自己很有些关系。从《多余的话》里看，他一是认为王明等的错误，从远因来看可以说是他自己的被称为“瞿秋白主义”的某些“左”的理论思想更严重的发展；二是认为自己当领袖时虽曾努力防止却没有能够做到，竟在“绅士意识”支配下主要采取了“调和”、“退让”态度，让他们得以成气候了；三是自己解职之后又没有很

尽力地“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而只是“例行公事”地做了些工作，没有能够消除既已存在和发展着的“祸害”，因而自己应负的“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因此，他十分地内疚，在《多余的话》里过苛地责骂自己，他甚至因自己有时对错误路线退让而说自己是“叛徒的一种”。有人把秋白的这句话解说为他同国民党关系上的“叛徒”，那是极大的误解或曲解。他那么自厌地、过分地责骂自己，是在路线问题上一种深深的强烈的内疚所致。我们现在来看《多余的话》不仅不能用他过苛的自责之语给他作结论，而且倒应该从中看到他那颗对党对革命十分忠诚的心！

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应该理解为“尽力地”。——引者注）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

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

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别的方法。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

读了这些话，我们不是非常清晰地看到秋白那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吗？

当然，他也有些复杂的伤感、悲凉、郁闷、低回情绪的流露。“寂寞此人间”、“孤衾旧梦残”、“枉抛心力”、“万缘俱寂”等诗句

确有与早年那种“热烈”、“云梢”心态不同的另一种情绪。《多余的话》里也有因多年郁积的深层心理矛盾，在“冲动”中要“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时候所表现的情绪复杂性。例如，他非常自我嫌恶地说：“唉！脆弱的人呵！……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此外，还有一些用“噩梦”、“滑稽剧”来说自己生涯的话。然而，我们在读他这样的话的时候，一要深入地想一想他说这些话的复杂的具体背景和原因；二要想到他说这些话都是拿一种理想的革命领袖和“无产阶级战士”的高标准来自我分析、自我衡量，缺点是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甚至有“左”的思想方法的遗痕，但他是在做灵魂的自我净化的功夫。这种自剖、自责、自我批判在促成他的思想和人格的升华，这是和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相统一的；三要看到他同时又有与孤寂低回情绪不同的更多的别的话，甚至在同一首诗、同一节文字中间就有。例如：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这是和“寂寞”句在同一首词中的，不是说明他当时的心境中含着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感吗？

何事万缘俱寂后，
偏留绮思绕云山。

“绮思绕云山”也是他当时心境的一面，而且是主要方面。不然，如何能微笑着就义？

由此可见，瞿秋白始终保持着高尚深美的灵魂。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他的狱中表现，他呼着革命口号盘膝而坐，微笑着面对刽子手的枪口，那么从容地就义，为他毕生的心史写下了光彩的最后一笔！

附录



按：《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于1935年5月17~22日写于福建长汀狱中的一本遗作。这里据《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7）排印。“文集”本是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抄本刊印的，作了校订和注释。文中〔 〕是标明错字、漏字的。

由于至今没找到作者手稿，有人认为真伪难以断定，有人甚至认为是假的，或“篡改”过的。我经过考证和分析，曾写一本《心忧书〈多余的话〉》一书，认为无论从思想逻辑、情感表现来看，还是从文章风格、用语习惯来看，无论从当时知情人的回忆看，还是从我们对每句话的考辨来看，都可证《多余的话》出自瞿秋白手笔，而且没有什么“篡改”（抄写中的错漏不能称为“篡改”）。

这是秋白一本特殊的重要著作，可以看作是他自写的心史、评传，出版者希望附录于书中，就附录于此罢。

多余的话

□瞿秋白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①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

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谈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火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

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②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③(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④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⑤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⑥。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

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之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①(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②,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

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基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

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的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压]。精神上政治

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刚满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最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病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瞆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经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得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啊!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睿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

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米亚^①——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翻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

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着〔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久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个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只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

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①,梁漱溟[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

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宣[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遍，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传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

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的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著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〇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觉得反而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的议

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考”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①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再自由的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更进一步的关口,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一九二七),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无〔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的;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

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严重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的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的任务之中,最重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线,派别观

念也使得党内到处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的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觉的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觉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可以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员。我呢,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

太迟了！从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研究——到这时候才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可以干一干，“以度余年”。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负了一部的工作，虽然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却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党的争辩[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一些，说“奋斗”是实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却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杀[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咏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使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改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智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

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会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气势凶凶[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

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觉〔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为甚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会总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板〕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像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了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则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

有〔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智识和累坠〔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智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是清理一本账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那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①。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书是乱七八糟着〔看〕了一些,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这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一个“读者”。

讲到 I 仅有的 I 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本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 别

· 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好[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

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的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做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做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生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

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的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

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宣〔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到〔照〕过几次 X 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的状态那一定可以发现一些什么。这对于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③,中国鲁迅的《阿 Q 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九三五·五·二二

记忆中的日期

——附 录^⑭

- | | |
|-----------------------------|-----------------------------|
| 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 | 生于常州 |
| 一九〇二 | 入私塾 |
| 一九〇五 | 入常州冠英小学 |
| 一九〇八冬 | 初等小学毕业 |
| 一九〇九春 | 入常州中学 |
| 一九一五夏 | 因贫辍学 |
| 一九一六二月 | 母亲死 |
| 二月 | 赴无锡南郊某小学任校长
是年父亲赴济南,弟妹分散 |
| 八月 | 辞无锡教职返常州 |
| 十二月 | 抵汉口考武昌外国语专修学校 |
| 一九一七四月 | 在北京应普通文官考试未取 |
| 九月 | 入俄文专修馆 |
| 一九一九一月 | 与耿济之瞿世英等组织《新社会》
杂志 |

- 五月 任俄专学生会代表
- 一九二〇八月 应北京《晨报》聘起程赴俄任通信员
- 一九二一一月 方抵莫斯科
- 五月 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
- 九月 任东大翻译始正式入党
- 一九二三一月底 返国抵北平
- 七月 参加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 九月 返沪任上海大学教职
是年加入国民党
- 一九二四一月 与王剑虹结婚
- 一月 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 七月 剑虹死,赴粤
- 十一月七日 与杨之华结婚于沪
- 一九二五一月 参加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被举为中委
- 一九二七二月 写批评彭述之的小册子
- 三月 赴武汉
- 四月 参加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仍任中委
- 七月 (宣言退出国民党)赴庐山
- 八月七日 参加“八七”紧急会议后实际主持政治局

一八二八四月三十日	离沪出国
六月	参加共产党六次大会仍任中委留 莫为中国共产党代表
一九三〇六月	撤销驻莫代表职
七月	起程返国仍在政治局工作
九月	参加共产党三中全会
一九三一一月七日	参加共产党四中全会被开除政治 局委员之职请病假
一九三二秋	病危几死
一九三四二月五日	抵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员
一九三五二月十一日	离瑞金
二月二十三	抵福建汀州之水口被钟绍葵团俘
二十六	入上杭县监
五月九日	解到汀州三十六师师部

注 释

①语出《诗经·黍离》。

②《新社会》旬刊,1919年1月1日创刊,次年5月被查封。

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在李大钊的组织和指导下,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发起,于1920年3月创立。

④《妇女与社会》,即《妇女与社会主义》(Femme et Socialisme)。其作者倍倍尔(August Bebel, 1840~191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⑤《晨报》初名《晨钟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1916年8月创刊于北京,1928年6月停刊。

⑥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记述,他是1920年10月14日从北京

动身去莫斯科的。

⑦陈独秀当时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⑧“四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和瞿秋白等5人组成中央主席团(即中央常委会)。

⑨《逸经》所刊文本,自“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米亚”起,至以下第四段“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一句为止,共遗漏4段文字。

⑩《逸经》本自“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至“文艺评论”,共遗漏36字。

⑪《逸经》本遗漏“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句。

⑫《逸经》本自“这些都做了”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共遗漏26字。

⑬《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今译《克里姆·萨姆金的生》,副标题为《四十年》;《鲁定》,今译《罗亭》;《安娜·卡里宁娜》,今译《安娜·卡列尼娜》。

⑭“附录”的“记忆中的日期”有不准确之处,这里不一一注明。《逸经》本没有刊登这个“附录”。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瞿秋白：情感·才华·心史

作者 =

页数 = 4 0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